

# 目 录

## 德穆楚克栋鲁普自述

一、百灵庙“蒙古自治运动”片断·····	( 1 )
二、伪蒙古军政府成立前后·····	( 16 )
三、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始末·····	( 58 )
四、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的成立与瓦解·····	( 88 )
五、北平三年·····	(138)
六、搞“西蒙自治”经过·····	(156)
七、赴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经过·····	(189)

## “百灵庙蒙古自治运动”片断

### 一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东北四省，内蒙古东部各盟旗也随之沦陷。继而日寇又向西部各盟旗伸其侵略的魔掌，与热河接壤的锡、察两盟便首当其冲，以致人心动荡，惶恐不安。适在这年冬，蒙古各蒙部旗联合驻京办事处处长兼蒙藏委员会蒙事处处长吴鹤龄，将他一手制定的“蒙古各盟部旗组织法”呈请国民党中央政府明令公布。我当时是苏尼特右旗扎萨克亲王兼锡林郭勒盟副盟长，锡林郭勒盟盟长索特那木拉布丹（索玉）因病请假，由我代理盟长职务。我是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就托滂江电报局长徐茂候代拟电报稿，盖上盟长大印，向国民党中央政府拍发，反对吴鹤龄的这个“组织法”。同时，我派锡林郭勒盟驻张家口办事处处长补英达赖赴北平面见陆海空军副司令张学良，洽请拨给枪枝弹药等物，并联络包悦卿、贺喜业勒图默尔根（号颖伯，即小卓王）、达密林扎布（太仆寺旗前任总管）等，以蒙古旅平同乡会的名义也致电国民党中央政府，一面反对吴鹤龄的“组织法”，一面吹捧我“素孚众望，洽顺舆情”，应出任蒙旗宣抚使。包悦卿、达密林扎布二人并到南京活动，宣传我握有五千骑兵，是蒙古具有实力的人物，大吹大擂了一番。

这两次电报的拍发，和包悦卿的吹捧，引起蒋介石的注意。一九三二年秋，蒋派他的亲信桂永清（当时任军官训练班主任）和军政部派到察盟以枪换马的余玉琼、彭秉离等前来我旗（苏尼特右旗）访问。这时包悦卿也由南京北返，陪伴桂永清一同前来，桂永

清对我是恭维备至。包悦卿曾将蒙古旅平同乡会电请派我出任宣抚使事和桂永清谈了，桂对包说：“我看德王是个年青有为的王爷，宣抚使是老年人干的事，他干这个干嘛？依我之见，应当组织军队，扩充实力，在蒙旗先组织一个骑兵师或旅，当一个中将师长或旅长，不比干宣抚使好吗？”包悦卿当即将此话转告我，我当下表示首肯。桂就给蒋介石打电报，并将电报原稿交由包悦卿转给我看，全文记不清了，仅记得有“将来收拾蒙事者必属此君（指我）”一语。桂对我这样重视和吹捧，使我感到无上的欣慰。嗣他又表示想去看索王，我就派我的专用汽车把他送到乌珠穆沁右旗。他回来向我说：“我看索王凝神注目看人的神气，静听别人谈话的态度，是一个具有成见，十分固执的人，可能对你作些新的事情有障碍，希望你注意及之。”当他临行时，又对我说：“静候佳音吧，蒋委员长可能召见你。”

他走后不久，果然蒋介石就电召我前往武汉相见。我接到电报后，认为机不可失，就偕同补英达赖、韩凤林、丁我愚等前往武汉。路经北平时，曾去面见张学良，张即指示铁路局为我等一行特备专车一辆，并派蒙旗处处长袁庆恩率同宪兵四人护送。到武汉后，行营招待我们住在璇宫饭店，次日即前往行营见蒋。关于桂永清所说组织蒙古骑兵之事，未作详谈，嘱我和秘书长杨永泰、参谋长曹浩森接洽。我见蒋后，就令韩凤林拟具蒙古骑兵师编制计划和所需要的武器，送交行营办公厅。嗣又由杨永泰和曹浩森接见我，说给我“蒙古保安统监”的职务。我当下想到，索王是锡林郭勒盟保安长官，我如担任保安统监的职务，地位就在索王之上，可能引起索王的不满，不如担任蒙古骑兵师长又实惠又相当。当向杨、曹表示不愿接受说：“我此次来见委员长，不是专为要官而来。”话虽漂亮，言甚刺耳，杨永泰闻听之后，马上表现不甚愉快的神气，没有再作什么回答，我就辞出归寓。

嗣闻招待我的韩副官说：“蒋委员长要去长沙视察工作。”我

为了表示拉近乎，亲到长江岸上送行，不意到岸送行者，仅有武汉警察局长陈希曾。接着杨永泰、曹浩森等宴请我，还邀请我坐飞机环绕武汉上空，又招待我参观汉阳兵工厂、长江上的军舰、黄鹤楼等名胜古迹和武汉大学等处。当时武汉小报上曾登有“带着油松大辫子的德王，在武汉大出风头”的消息，被行营给以停刊多日的处分，表示对我的“尊重”。参观各处后，行营秘书邓文仪前来璇宫饭店见我说：“关于编制蒙古骑兵师事，委员长指示以后再行考虑。至请发武器一节，答应拨给机关枪四挺，步枪数百支，可在此具领，另拨迫击炮两门，须到南京军政部洽领。”我遂派了我愚前往行营军械部门领到机关枪四挺，所发步枪数百支，因系破旧之物未即具领，请再补发新的枪支。

在武汉告一段落后，留下了我愚洽办未完之事，我就偕同补英达赖、韩凤林等返北平，依据蒙藏委员会关于“重选盟旗代表、改组办事处”的命令，进行组选代表，反对吴鹤龄之事。这时除锡林郭勒盟已确定郭尔卓尔扎布、补英达赖为代表外，乌兰察布盟也确定拉希色楞为代表，伊克昭盟确定僧格林沁为代表，并均已先后到达。其他各盟旗代表就在北平酝酿组选，结果又确定贺喜业勒图默尔根、多尔吉为哲里木盟代表，呼、昭两盟因既已沦陷，又无适当人选在北平，没派代表参加。组织就绪后，代表等就赴京请愿。国民党中委白云梯、克兴额等想利用晋京代表请愿的声势和蒙旗地方实力的支援，特怂恿军政部长何应钦来电邀我赴京洽商蒙事。蒙藏委员会总务处长陈敬修也来北平迎接班禅赴南京，特到嵩祝寺见我，表示欢迎我和班禅同车南往。这时吴鹤龄已被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石青阳解除了蒙事处处长职务，调任参事闲散之职，并命令他重选蒙旗代表，改组办事处。吴鹤龄在这种压力之下，感觉对他不利，就匆忙地由南京赶来北平，请于华亭（蒙名罗布桑车珠尔，系吴岳父之喇嘛弟弟，后还俗为镇国公）出面奔走联络，托班禅的堪布和乌兰察布盟的德瓦根敦等为我们居中调解，吴鹤龄偕同于华亭曾亲到嵩祝

寺和我见面。接着又由班禅出名宴请我俩，堪布们代表班禅陪同我俩聚餐，劝我俩合作。继又由德瓦根敦、拉希色楞等出面在邈英番菜馆邀请我俩宴会，进行调停，但我俩均未表示接受。

我和班禅同乘专车到达南京后，一面见何应钦洽办请拨武器之事，一面和进京请愿代表商洽进行反对吴鹤龄、改组办事处之事。桂永清更是时来看我，陪同我往见以关心边事自居的考试院长戴季陶。桂以“蒙古通”自居，向戴介绍说：“我曾亲到锡林郭勒盟各旗访问，知道锡林郭勒盟各旗王公均唯德王马首是瞻。”

吴鹤龄托请巴文峻出面调解，巴曾到中央饭店见我说：“吴鹤龄业已表示愿意奉令改组办事处，他只担任卓索图盟代表，其他各盟旗代表均由新代表担任。”我没有接受巴文峻的调停，并内定补英达赖为新的办事处处长，准备接收。后来因白云梯与石青阳争权夺利，改组办事处之事就被搁浅下来，我表示要整装回蒙，以相对抗。

为时不久，蒋介石由武汉返京，先在励志社宴请我和各代表，继又叫桂永清通知在军官学校单独召见我。届时由桂永清陪同我前往见蒋，寒暄后，桂永清就把建立中央军官学校张北分校计划递上请蒋阅看。蒋略加翻阅即放在一边说：“现在决定在张北设立分校（张北分校后来没有办成），特派桂永清按照黄埔的精神办理，培养蒙古方面的军事干部人材，好做编制蒙古骑兵师的准备。”继又说：“蒙古王公制度是可以存在的，希望不要为此操心。”

现在回想起来，桂永清到我旗访问时为什么向我建议组织蒙古骑兵呢？嗣到武汉见蒋时为什么杨永泰又提出给我蒙古保安统监呢？后在南京见蒋时为什么又提出建立张北分校呢？据我现在的看法，蒋介石这样重视我，是有原因的，对给我职位问题上前后有了变动，也是别有用心的。因为在民国十九年阎、冯倒蒋失败后，阎锡山特派赵太东、仲跻翰二人由蒙人道布顿（曾任察哈尔一个旗的总管）当翻译，想通过我旗前往外蒙，被我旗防卡盘查扣留。我

曾将此事告知察哈尔省主席刘翼飞，我想刘翼飞定告知张学良和蒋介石。从此蒋介石对我可能有了印象，想争取我作为他统治蒙古的助手，并认为我旗是通往外蒙的要冲，有组织蒙古骑兵进行“防共”的必要，同时在蒙古组织起一部分武力，对于附近的杂牌军队也有牵制的作用。所以蒋介石特派桂永清亲到我旗察看情况时，有向我建议组织蒙古骑兵之事。嗣到武汉见蒋时，杨永泰又提出要给我蒙古保安统监名义，不给蒙古骑兵师长的实权，是想利用我作招牌，不愿叫我掌握实力。所以后来在南京见蒋时又提出建立张北分校的计划，这是叫桂永清为他培养军事干部掌握实权，叫我担任空军的保安统监的具体措施。记得在占平解放，我到南京时，桂永清已当上了海军总司令，特在他的家里设宴招待我，并请国防部五个厅、处长、国民政府一个管军事的局长和白云梯等作陪，他情不自禁地流露说：“如果依照我从前的计划，在内蒙组织起来五万骑兵，东北不会叫共产党拿去，也不会造成今天这样的局面。”接着他又向我介绍在座的厅、处长：这位是主管军械的，那位是主管电台的，说我如有所需要时，请向他们各位进行接洽好了。通过这一席谈话，足证蒋、桂有意叫我组织骑兵，是以“防共”为第一要义的。其后我在阿拉善旗发动“西蒙自治运动”，前往广州请愿时，桂永清特又给我机关枪四挺、步枪二百支，也是想利用我在内蒙组织“反共”力量，为他们效力，作垂死的挣扎。

在南京见蒋后，我即将韩凤林留下在军官训练班当教官，并以需用军事人材为名，向高级教育班交涉要出了正在受训的蒙古学生云继先，又向军政部洽领迫击炮二门及补发武汉行营许可的步枪几百支，还到中央政治学校蒙藏班参观，和正在求学的蒙古青年做了接触，以期对我有深刻的印象。这时我对于改组办事处之事已感冷淡，又不愿再陷入白云梯等争夺权位的漩涡里，遂分别到各机关访问，各机关首脑也分别宴请我，这样应酬联络了几天。这时外蒙的逃亡者迪力瓦还在南京，我和他常相过从，有一次我问他：“内蒙

搞自治可以不可以？”他答说：“外蒙既可以进行独立或自治，内蒙为什么不可以自治。”这几句话对我有很大的影响。我不愿再在南京作无味的政争，就偕同一部分代表北返。另一部分代表参加了办事处的改组。吴鹤龄的处长改称主任，这一场政争就这样结束了。记得当时报纸上登载着“德王等晋京请愿未遂，拂袖返蒙”的消息。我这次竟落了个乘兴而往，负气而归。所以到北平后，又和旅平蒙古知识青年作了广泛的接触，招收了二十余名蒙古学生，由云继先和于福康、云敬圣带领着，随我一同返归苏尼特右旗，着手培养人材和力量，备作待机而起的政治资本。从这一段经过中，说明我武汉见蒋是想取得蒙古的军权，赴京请愿是想取得蒙古的政权，但均未如愿以偿，于是便想归来搞自治，实现我的政治野心。

我回旗后，即在西营盘成立了蒙古干部学生队，委派云继先、于福康二人为教官，把从北平招来的学生一律编入该队受训，把从武汉和南京所领到的武器拨归该队使用。这时我认为即使中央军校张北分校成立起来，毕竟是国民党中央的系统，一切须受他人的监督，不如自办一个学生队，训练自己的干部方便。不久，陈绍武、陈国藩、霍宝书、乌麟、王泽春由绥包一带前来苏尼特右旗，丁我愚、亢仁等也相继前来。我正招致青年来归，当然力表欢迎，推诚相与，常相聚谈，共同研究讨论怎样对待当前紧张时局下的蒙古问题，决定由锡林郭勒盟联合乌、伊两盟发动内蒙自治。这时我俨然以青年领袖自居，以期出问蒙事，掌握大权。

## 二

我虽然罗致了一部分蒙古青年做为我的臂助和基干，但自知我的职位不过是副盟长，声望不高，年纪又轻，不能领袖群伦。号召各盟旗参加，必须得到年高、“爵尊”之王公的同情和支持，特别是在锡林郭勒盟进行自治，首先必须取得盟长索王的赞同和杨桑

（杨桑曾任过锡林郭勒盟盟长）等老年王公的谅解。杨桑向以我的前辈自居，认为我好大喜功，时常流露不满之意，曾有“锡林郭勒盟出了一个苏尼特王，不知什么时候闯下乱子，锡林郭勒盟前途殊堪忧虑”之语，盟长索王也是对我不满的。因此必须设法说服他们同情自治，最低限度不致出头阻挠自治。经我反复思量，认为通过班禅来说服他们是个最妥善的方法。这个方法还是郭道甫和我谈过的。

记得在一九二九年我随同班禅去沈阳面见张学良洽拨武器，曾与郭道甫（这时郭任东北蒙旗师范学校校长）见面，常相过从，他曾对我说：“外蒙和内蒙情况大致相同，为什么外蒙独立成功？是因为有哲布尊丹巴这个宗教领袖，在蒙古民众中形成了中心信仰。反观内蒙历次抗拒开垦或独立运动都归失败，是因为各自为政，形同一盘散沙，没有中心信仰，以致历次运动无一成功。现在听说班禅的堪布们正请中央用武力护送班禅回藏，一时尚恐不能实现。趁此机会，应当联合各旗集资在蒙地为班禅建庙，请班禅留在内蒙，做为宗教领袖，形成中心信仰，对我们进行蒙事，是会起到一定作用的。”他这个建议，我很以为是，返归锡林郭勒盟后，即和盟长索王商量，索王也即表同意。当派我和松津旺楚克（浩济特左旗扎萨克郡王）代表锡林郭勒盟，前往北平联络各盟旗王公商洽为班禅在内蒙建庙，挽留班禅在内蒙长期居住，各旗王公一致表示赞成。适这时班禅在北平，郭道甫也来平公干，我们就去面见班禅，确定在锡林郭勒盟和哲里木盟各建一所庙。嗣因“九一八”事变发生，哲里木盟已经沦陷，遂将各旗集资十万余元，在我旗和乌珠穆沁右旗为班禅建庙二所，在一九三一年请班禅前来我旗过冬，一九三二年夏在锡林郭勒盟各地哮经。因此，既取得班禅对我的好感，也使锡林郭勒盟各旗王公对班禅有深刻的印象。

迨至一九三二年，我正和青年们研究进行自治，设法说动索王同意时，班禅适由乌兰察布盟百灵庙前来我旗，并要去贝子庙、乌



珠穆右旗等地啐经。我认为机不可失，遂请班禅帮助我，同他前往乌珠穆沁右旗说服索王。在我们没有到达之前，听说日本关东军参谋田中久曾带蒙语翻译金永昌前来劝说索王赴“满洲国”参观，并要求在乌珠穆沁旗设置特务机关，安装电台。索王因“九一八”事变后，曾派人到过呼伦贝尔盟海拉尔向凌升探询日本对蒙旗的情况，凌升曾答复索王说：“日本最厉害，我们与任何人合作都可以，但不能与日本合作。”因此，索王对日本存有戒心，遂应付说：“你们日本有力量你们就说，要征询我的意见，我是不同意的。”并推托身体肥胖，动转维艰，不能前往，可派协里胡图里前往奉天、长春等地一行。田中久等走后，我陪同班禅到达乌珠穆沁右旗，索王对我提起田中久前来要挟设置特务机关和电台一节，甚感头痛，乏于应付，问我怎么办。我不敢同他直接谈自治的事，答复他说：“班禅佛爷正在此地，何不请求佛爷指示明路。”索王就同我去见班禅，请示对策。班禅即答复说：“前次德王和我说的联络锡、乌、伊三盟会商蒙事很好，现在正是时候了，积极去做就对了。”索王当下也表示赞成，于是第一步说劝成功，就请索王以盟长名义做出公文，盖上盟长大印，派我代表锡林郭勒盟去见乌兰察布盟盟长云端旺楚克（云王），后又加派乌珠穆沁旗的协理若乐格尔扎布一同前往。我遂偕同亢仁、丁我愚、阿乐腾格尔勒等驰赴百灵庙，先派员与云王送去公文并向云王表达请其出而倡导自治之意，云王当时还徘徊不定。恰于此时，蒙藏委员会蒙事处处长巴文峻等一行前来宣抚，经由四子王旗等地到达了百灵庙，亢仁当将我等候云王前来研究倡导自治问题告巴，我也请巴去劝说云王早来。巴文峻虽然身负宣抚蒙旗归向国民党中央的使命，却对内蒙自治也尽心赞助。他在南京时，曾参加过参谋本部边事研究组，讨论过这一问题，知道地方自治性质的内蒙自治，尚在国民党中央许可之列，遂允前往劝说云王，云王这才表示愿意与我共同倡导自治，当率同其弟根敦扎布和仕官沙拉巴多尔济、那逊瓦齐尔等前来百灵庙。这时乌珠穆沁右

旗台吉若乐格尔扎布亦赶来参加。遂于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六日在百灵庙举行了第一次自治会议，八月二十四日发出通电。当时潜伏在我旗庙上冒充喇嘛的日本特务人员雁目却向韩凤林说：“你们发动自治太早了，时机还未成熟，不如我们日本军的力量到达这里时再进行发动自治为宜。”足见日本帝国主义对我们向国民党中央要求自治，不感什么兴趣，而是企图在日本的卵翼之下进行自治。九月二十八日召开了第二次自治会议。其后黄绍竑、赵丕廉来百灵庙，经过许多周折，虽然争的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一般称百灵庙蒙政会）的组设，但我们极不满意。当下决定除通知各盟旗选定晋京代表要求许可内蒙自治外，并派陈松山（蒙名布仁巴雅尔）前往包头面见孙殿英，请其支援自治。据他回来报告说：“我见孙殿英后，力表内蒙自治绝无其他背景，纯系蒙人迫切的要求，以期把各盟旗团结起来，实行御侮图存，请大力支援。孙殿英甚表同情，并说就是内蒙自治有外人背景，也没有什么关系，他仍尽力支援。”同时我又派韩凤林前往北平日本大使馆分支机构，探询对内蒙自治的态度。韩凤林回来报告说：“我到北平曾见着日本大使馆的柴山武官，请支援内蒙自治，他说现在中日之间存在的问题很多，不断发生冲突，但仍保持邦交，内蒙自治系中国内政问题，日本不便出面干涉。”言下颇为冷淡，对内蒙自治似乎不感什么兴趣。我听到韩凤林报告后，认为柴山武官是日本的外交人员，不便表示对内蒙自治的态度，乃又派补英达赖前往伪满面见溥仪，并通过溥仪的介绍与日本关东军吉冈安置参谋接洽，托辞购买枪支，探询日本关东军对内蒙自治的态度，没有得到明确答复而归。

### 三

百灵庙蒙政会成立后，仅领到开办费两万元，用以维持办公和职员的生活，每人支给十五元生活费，仅够伙食之用。这样勉强维

持，终非久远之计，即向国民党中央政府有关部门请领经常费和建筑费，但尽管函电交催，亦无结果。我为了解决这个面临的迫切问题，特密派陈绍武前往庐山面见蒋介石，一则报告日本人进出西蒙，请示如何对待，再则请拨经常费及枪械电台等物，以济急切需要。结果得到蒋介石的答复，准予拨给经常费每月三万元，建筑费十二万元及枪械电台等物，速向南京有关部门洽领。至于怎样对待日本人进出西蒙问题，蒋介石答复要以不亢不卑的态度相机办理。并嘱陈绍武转告我，他不久即来绥远巡视，请我和云王前往相见晤谈，还叫陈绍武给我带来他的复函一封，内容也是和对陈绍武所说的大致相同。

不意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韩凤林被捕事件。这个事件发生的原因，据我了解有三：（一）、在蒙政会成立之后，我派韩凤林为保安处第一科科长，云继先为第二科科长，朱实夫为第三科科长。当由蒙政会下令叫各蒙旗选送蒙兵，责成保安处组织保安队，并派韩凤林随同本会委员托克托胡前往南京与有关机关接洽保安队的编制和请发经费及武器事项。韩、托走后不久，锡林郭勒盟各旗就选送蒙兵前来，我就责成朱实夫主持组织训练。因为乌珠穆沁右旗的蒙兵，不惯基本训练的约束和语言隔阂的关系（朱实夫不懂蒙语、蒙兵不通汉语）对朱实夫有了不满情绪，群向宝道新反映。宝对该旗蒙兵表示同情，反说朱实夫应当迁就蒙兵的生活习惯，在训练上不必操之过急，这种说法当然引起朱的不满。迨韩凤林返后，朱就将这事的经过向韩叙说，希望得到韩的同情和支持，不意韩对朱却未表同情，反说宝道新的意见对，这又引起朱对韩的不满。接着我又发表韩兼保安队的总队长，朱实夫想取得总队附的职位，我也没有给朱发表，这是我对人事安排上失当。朱主持训练保安队一场，落一个费力不讨好，连一个总队附也没到手，当然更为不满。在这以前，蒋介石蓝衣社的特务李才桂率同工作人员以“内蒙旅行团”名义前来百灵庙侦察情况，当时因韩凤林赴京，我就派朱实夫接待

他们。韩凤林返后，李才桂才来拜会我，我对他说：“你如有事，可与韩凤林接洽，因为我事情多，诚恐招待不周。”但是韩凤林却没有很好的接待李才桂，招致李才桂的不满。李曾向朱实夫说：“韩凤林这个人态度傲慢，盛气凌人，很难与之洽谈。”朱实夫曾将此话告我，却未引起我的注意。并且在百灵庙蒙政会成立后，日本人常来锡林郭勒盟和百灵庙拉拢我，我也叫韩凤林充当日语翻译（因韩是日本留学生，在士官学校毕业），朱实夫也可能把这事向李才桂反映。其实韩凤林是个民族主义者，仅仅做了我的日语翻译，并无拉我投日的行为。记得我曾和他谈过：“在当前时局下，我们要利用日本的力量，把蒙古复兴起来，你看怎样？”韩对我说：“我在日本留过学，深知日本的满蒙政策是不怀好意的，应当十分注意。”李才桂认为韩凤林有拉我勾结日本的行为，便报告了驻在北平的国民党宪兵第三团团长蒋孝先，当韩凤林赴北平忌戒大烟瘾时，就被宪兵三团逮捕。这是可疑原因之一。（二）、韩凤林由南京返回我旗时，曾向我报告说：“我在南京充当军官训练班教官时，桂永清曾一再拉我入蓝衣社，我坚决表示不肯，愿意回蒙工作。”由此推断，因为韩凤林拒绝参加蓝衣社而遭忌于桂永清，也是很有可能的。记得在韩凤林被捕后，我曾电请桂永清居中营救，桂给我复电仅一句话：“我已将原电转呈委座了，”表示甚为冷淡。这是可疑原因之二。（三）、百灵庙蒙政会成立之后，由吴鹤龄介绍赵汇川，由万福林介绍刘建华前来百灵庙，我都委以工作。嗣我发现赵汇川有曾扩情给他的密电本，他知道被我识破后，反将密电本献出，以实告我，表示忠诚。我曾嘱他将蒙政会经费未发，工作人员不安情况密电曾扩情，希他转以告蒋，促使经费的速发。当时关起义任蒙政会电台总台长，认为赵汇川私发密电，形迹可疑，曾向我告密。我说这事我知道，叫他把电报打出去吧，关起义也就放心了。但赵汇川是否持此密电本或以其他信函方法密告情报，我再未注意防查。至于刘建华也与蒋介石的特务组织有密切关系，曾给

韩凤林馈赠八音子手枪一支，无非是想买好韩凤林，并想通过韩凤林的关系取得我的信任，便丁作特务工作。当韩凤林赴平忌大烟瘾时，赵、刘二人随同前往，到平后的次日，赵、刘二人说下午亲到韩家来打牌，嘱韩在家等候，不意届时宪兵三团的官兵十数人乘坐大汽车前来韩家，即将韩捕去。捕韩的汽车刚经开走，赵、刘二人即赶到韩家，未受株连，此为可疑原因之三。

韩被捕后，蒙政会驻平办事处处长包悦卿曾面见何应钦要求释放，质问何应钦说：“韩凤林究犯何罪，竟被宪兵三团逮捕，什么三民主义，简直是害民主义；什么青天白日，简直是暗无天日。”何应钦矢口否认，允为注意访查下落，设法营救。但韩终未得释，仅由北平军分会给韩的家属送去五百元，作为慰问救济之资。在蒙政会成立后，我曾派包悦卿、郭尔卓尔扎布赴平敦请何应钦就任指导长官，何应钦答复不久来绥转赴百灵庙。适在韩案发生时，何应钦来绥包视察，白海风劝我迎何前来，我很负气地说：“他把韩凤林捕起来，还欢迎他来干嘛？”仅去电报请何前来。何答称急待返平，无暇前来。为了援救韩凤林，我曾迭电蒋介石报告李才桂与韩案有关，要求释放。蒋来电答复说：“韩案发生，蒙胞既然怀疑才桂，显见才桂有不洽蒙情之处，应即撤销其内蒙旅行团团长的职务。”不久李才桂就离开了百灵庙。

到了是年秋天，蒋介石将到绥远视察，在他未到之前，先派萧振瀛带着金丝猴皮袄等礼物前来百灵庙，邀我和云王赴绥见蒋。我同蒙政会的中上级职员讨论研究可否赴绥，多数认为我与傅作义的关系不好，外边又有谣言，深恐赴绥被扣，劝我不要前往，以防不测。嗣我又与陈绍武单独商量，陈对我说：“我前次赴庐山见蒋时，蒋对您非常器重和关怀，并且您派我赴庐山就是为和蒋拉拢感情。这次蒋以国家元首的资格到绥巡视，你是蒙古地方长官，正应前往相见，作进一步的拉拢，便中还可商洽解决绥蒙之间存在的纠纷问题，应当抱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精神前往，不要前怕狼

后怕虎地顾虑，以致坐误时机。”我也认为既系蒋介石相邀，谅傅作义不会把我怎样，遂和云王、包悦卿、陈绍武等赴绥等候见蒋。

蒋介石由宋哲元陪同到达绥远车站时，我和云王曾到车站迎接，蒋下车后首先与云王和我握手，接着蒋又召见我和云王，包悦卿、陈绍武也随同进见。蒋先问云王：“蒙政会成立之后诸事如何？”云王答称：“我是年老多病，诸事多亏德秘书长（百灵庙蒙政会成立，云王任委员长，我任秘书长）帮同办理。”蒋又面向我说：“方才听云王说，你帮助他很好，今后仍希你尽力帮助云王，作好蒙政会工作。”我当将韩凤林被捕之事提出，要求蒋设法营救。蒋答复我说：“这事我返京后当详为查问，待到一月后总会得个水落石出。”接着我又向蒋表示，蒙政会愿敬献军马三百匹，答谢中央许可自治关怀蒙古的盛意，蒋也表示接受。谈话到此，我们就告辞归寓。继而绥远各界首脑又举行欢迎蒋介石训话会，邀我和云王、包悦卿等参加。训话会开始时，首由傅作义致词，继由蒋介石训话，蒋训话后，邀请云王和我讲话，云王推托未讲，我遂登台致词说：“自清朝以至现在，国家最高元首只有两次到达我们这个边远地方，前次是康熙皇帝，这次是蒋委员长。但是康熙是为征服我们蒙古而来，蒋委员长是为帮助我们蒙古而来。我们表示竭诚欢迎。”我用蒙语讲完后，由包悦卿用汉语翻译，蒋介石听了我这套吹捧之词颇为高兴。

我从绥远见蒋返回百灵庙后，当用蒙政会的经费购买军马三百匹，派补英达赖偕同刘建华送往南京军政部。约经一个月的时间，接到以“北平民众锄奸团”名义印发的一个传单，大意说“韩凤林是勾结日本，背叛党国，出卖民族的汉奸，实属罪大恶极，为全国人民所痛恨，已经作了断然处置，沉之大海。”我接到这个传单，经和丁我愚研究，认为这是蒋介石耍了一个花招，不好正面的明确答复，来一个侧面的传单作为变相的通知。由此推断韩凤林这个人可能是没有了。但营救之心仍然未死，在无望中再求万一的希望。于

是就叫丁我愚拟具了一个电报，详述李才桂前来百灵庙作暗地侦察和不满韩凤林的情形，以及韩到北平时被宪兵三团逮捕的经过，以云王和我的名义，再电请蒋介石予以释放，并坚定表示如再不释放，我等身负蒙政会的要职，连一个职员都不能保护，实在无以对同仁，只好恳请辞职，以卸仔肩。不料这个电报发出后，惹起蒋介石的恼火，当来复电责备我们说：“君等任意推断，肆意要挟，尚知国家有纪纲否？”

我为了弄清蒙政会内部与韩案有关人员，特令稽查处主任李凤诚检查来往信件，发现云继先给朱实夫来的一封信，其中大意说：“韩凤林被捕后，秘座（指我）对实夫兄怀疑甚大，应加注意。对保安总队长一职，务要尽量争取，我们谁干都可以，务使不要落于他人之手。”同时又据曾在干部学生队受过训的人员向我告密说：“云继先、朱实夫联络在蒙政会任职的土默特旗籍人员，策划掌握保安队的官兵，争取保安总队长的职位。”因此，我对云、朱有了怀疑，云、朱对我也有了戒心，这就种下了后来云、朱策动保安队兵变反正的根源。

一九三四年秋天，日本驻在天津的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乘坐飞机前来我旗活动，其目的是想拉拢我进一步靠近日本，我也就以礼相待。他对我说：“你进行蒙古工作怎样？有没有困难？如有困难时，可向我说，我当尽量帮助。”接着他又自吹自擂地说：“我到哪里，中国官员都怕我，因为中国政府的事情都瞒不了我。”我就对他说：“我们蒙政会保安处科长韩凤林，在北平被宪兵三团逮捕，现在生死不明，希望你帮助调查了解一下。”他很自负地说：“我能有办法知道，俟我详细调查一下再行告知你。”过了一个时期，他就将关于探询韩案的经过，通过驻在我旗的日本特务机关长穴浦转告我说：“国民党中央宪兵第三团团团长蒋孝先赴庐山向蒋介石请示机要工作时，蒋介石就命令蒋孝先速把韩凤林设法逮捕处死，蒋孝先即密电驻在北平的中央宪兵第三团吴团附负责处理。

当韩凤林来平时就有特务人员尾随前来，韩到平后即进行逮捕，当天晚上即行枪杀。”后来在伪蒙疆时期，我主持举办韩凤林（蒙名胡克巴图尔）追悼会，追赠以“中将”的头衔。并派赵汇川、刘大光二人前往北平寻找韩凤林的尸体，经过当时伪北平市长袁良的协助，终于找到，另行埋葬。

韩凤林事件发生后，我采纳了关起义进行多边外交的建议，派刘建华赴广州和正在搞西南独立的胡汉民、陈济棠集团取过联络，请其支援内蒙自治。刘建华到达广州后，把我大吹大擂了一番，夸张说我在内蒙有五万骑兵云云，但也没有什么结果。只是他得了胡汉民赠送的旅费五百元，返回百灵庙时，给我带来一个用象牙镌有胡汉民、陈济棠、周佛海、萧佛成等十数人名字的精致赠品和信函一封，仅表示愿意赞助，没有实际支援。我也认为西南与内蒙古相距甚远，仅能声援，无补实际。

从此，我就进一步与日本帝国主义勾搭起来了。



## 伪蒙古军政府成立前后

### 亲赴长春与关东军勾结

伪蒙古军政府的成立，是我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建立伪蒙疆政权的正式开始。当时虽已有了在蒋政权隶属下的蒙政会，但不能满足我的政治野心，并且蒋介石杀了我的得力干部韩凤林，令我非常不满，又加在西公旗事件和特税问题上，我与绥远当局的斗争也着着失败，使我更为气愤。因此，在百灵庙蒙政会时期，我就和日本方面暗行拉拢，企图凭借日本的力量，扩充实力，以达成建立“蒙古国”的妄想。到了一九三五年冬，我便亲自出马，和日本关东军直接勾结。这时我由百灵庙返锡盟苏尼特右旗，日本关东军特来电报邀我前往伪满新京（即长春）商谈要事，我即偕同迪力瓦、陶克陶和驻在我旗（苏尼特右旗）的日本特务机关长穴浦、中岛万藏等乘飞机前往，面见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和西尾参谋长。旋即和坂垣副参谋长、田中隆吉参谋等商谈，结果商定：日本帮助西部蒙旗先搞一个“独立局面”，继而建立“蒙古国”，并送给五十万元和五千支枪，作为扩编军队之用。

我由长春返旗后，就和穴浦商量，关于搞“独立局面”、成立统一机构问题。穴浦建议说：“现在日、蒙既经合作，统一机构必须从速建立，我看最好是进一步强化百灵庙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简称蒙政会），作为统一指挥机构。因为这样做是承认已成事实，易于发挥统一指挥的作用。”当时我认为这事有和蒙政会委员长云端旺楚克（云王）研究的必要，就带了十万元前往百灵庙交到

蒙政会上，作为扩编保安队之用，并向云王报告赴长春和日本关东军接洽的经过。云王说：“既然这样做了，就应本着‘怕就不做，做就不怕’的精神继续进行，但必须慎重从事，力求稳妥为宜。”接着我又说：“现在亟需成立一个统一指挥机构。一个办法是成立‘蒙古军总司令部’，一个办法是强化蒙政会，你看哪一个办法好？”云王说：“在你盟（锡盟）那边成立蒙古军总司令部，联络上较为方便；在百灵庙这边强化蒙政会，做为统一指挥机构，不大方便。”意思是怕傅作义反对。

我由百灵庙返旗后，适田中隆吉和我商谈这一问题，我提出要成立“蒙古军总司令部”，强调这是我和云王商洽所得出的意见。田中隆吉主张成立“蒙古军政府”，强调这个名称响亮，包括政治和军事，可以指挥行政和部队。讨论结果意见还没有统一起来，他就急于要走，说是主持进攻察东之事。我就着手筹备成立伪蒙古军总司令部。

## 日寇策划进攻察东经过

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四省之后，就成立了伪多伦警备军司令部，任命李守信为司令官兼察东自治长官，率领三师人马伺机进犯察东。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制造进犯察东的借口，故意挑起了张北事件。扮演张北事件的主要角色的本信亲说：“张北事件是多伦特务机关故意制造的。根据张家口领事馆与察哈尔省政府约定，凡属日本人进入察省地区，必须持有张家口领事馆的证明和加盖察省政府印信的护照。但在一九三五年夏，我和日本商人三名，由多伦前来张北，未带察省政府的护照，强要进城，守城士兵阻挡，不令通行，因而发生口角，被守城卫兵把我等押解到察省部队中看守。张家口领事馆得讯后，强调这是对日本人的侮辱，提出强硬的交涉。”后经中、日双方进行谈判的结果，在缔结协定条款中规定宋哲元

的正规军从张北、宝昌、康宝、商都、沽源等县撤出，由当地保安队维持地方秩序。这样以来，察东便成了特殊化地带。日本关东军就乘此机会，派田中隆吉前来多伦，促使李守信率队于一九三五年冬进犯察东。当进犯沽源时，当地保安队曾奋勇抵抗，把伪多伦警备军的参谋长程云山击毙。李守信又加强兵力进攻，并有日本飞机在上空盘旋助威，投弹轰炸，当地保安队终因兵力单薄，陆续撤退，李守信便很快地占领了察东六县，控制了察哈尔东部八旗，进驻张北县城。此时需要建立行政机构，统辖所属旗县，当由我以蒙政会名义下令成立察哈尔盟公署，任命卓特巴扎普为盟长，达密林苏龙为副盟长，并定于一九三六年一月一日举行“察盟公署”成立典礼。

## 白云梯、吴鹤龄之来

这时国民党中委白云梯落选，政场失意，潜住天津，想来蒙地活动。住在我旗的日本特务机关长穴浦，特派中岛万藏乘坐飞机，前往天津把白云梯接到我旗，意在拉他下水，以资号召。吴鹤龄也因活动国民党中委未成，欲来蒙地活动，但吴鹤龄这个人心眼多，好脚踏两只船，为了取得蒋介石的谅解，特去面见参谋总长朱培德说：“听说德王已和日本拉上关系，蒙政会那边情况可能有变动，我想去一趟，劝说他不要胡闹，别上日本人的当。”朱培德当时将他这一套活动转达了蒋介石，蒋即召见吴鹤龄说：“你要去蒙地走一趟是可以的，但务要随机应变，能够设法制止日本西进更好，如不能制止时，能够设法使其缓向西进就行。只要你能做到这一点，就算完成了你此行的使命，也算你的一项功劳。”（这段话是吴鹤龄在日本投降后，才告知我的。）于是吴鹤龄便新与当选的国民党中委尼玛尼特索尔（尼冠洲）衔着蒋介石赋予的使命，离京北上。他们到达北平时，我正在百灵庙，曾接到吴鹤龄要来的电报，我复

电欢迎他速来，就返归我旗。

陶克陶特向我报告说：“听说吴鹤龄来，要从中破坏蒙、日合作，日本方面决定要处置他。”我听后，就去特务机关找宓浦说：“我听说你们有处置吴鹤龄的计划，千万不可这样作，因为吴鹤龄是我叫他来的，希望他帮助我们工作，你们要处置他，对于以后蒙古人前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影响不好。”宓浦答复我说：“既然你这样说了，我们一定尊重你的意见，决不处置他。如果蒋介石的蓝衣社派人把他杀了，可与我们无关。”我觉得宓浦的活动仍有杀害吴鹤龄之意，遂将此事告知迪力瓦，希望他出些主意。迪力瓦很郑重地提醒我说：“吴鹤龄曾与你意见不和，发生过冲突，如果这次被日本人所杀，外界可能怀疑是你所为，你就有口难辩，怎也洗刷不清了。务要从速电知吴鹤龄按照约定时间到达张北，你好便于从中保护。”我很以迪力瓦之言为是，即给吴鹤龄去电报，约定务于二月一日正午十二时，即“察盟公署”举行典礼时到达张北，万勿有误。迪力瓦旋又向我叮咛嘱咐说：“你仅约定时间在张北与吴鹤龄见面，以便从中保护，我认为还不够周密，应该派可靠的人率同卫队前去保护，接他来王府才妥当。”我遂又派李秀山率同卫队乘坐大汽车一辆，前往张北保护吴鹤龄，并接他来我旗。我即偕同达密林苏龙，乘坐飞机到达张北，这时尼冠洲已先期到达，吴鹤龄果也如约前来。见面之后，我很想把日本人方面预谋杀他的消息告知他，但这时李守信、卓特巴扎普和田中玖日本人等都来和我周旋，我又去李守信的部队中送去劳军费一万元，紧接着又参加了“察盟公署”成立典礼，总未得到机会和吴鹤龄个别密谈。举行典礼后，我又催促吴鹤龄速赴我旗，吴还强调说：“你知道我是一向素食的人，虽然带有厨子来，还得整理一下用具，忙什么要走呢？”我很着急地触动他的衣襟说：“现在你要听我的，我叫你走，你就快走，万勿延误！”尼冠洲在旁也劝吴鹤龄说：“德王爷很诚意地劝你走，你就走吧，不要固执啦。”谈至此，我即赴飞机场乘飞机返旗。

吴鹤龄也在李秀山率队保护下，偕同张绍庭、于宝恒等乘坐汽车起程，到达城门时，因未持出城许可证，守城警兵拦车不准通行。吴鹤龄当即派员到“察盟公署”托请尼冠洲取到出城许可证，守城警兵始验证放行。车开出张北几个小时，天又傍晚，快到化德时，见后边有汽车灯亮，似在追赶，因吴鹤龄所乘汽车，速度较快，后边汽车灯亮不久就看不见了，当晚宿于化德。

这时宝贵廷正率一团士兵驻守化德，他的日本顾问烟草谷，接到张北特务机关长田中玖扣留吴鹤龄的密令，即催促宝贵廷执行。宝贵廷婉言拒绝说：“吴鹤龄不是到别处去，而是到德王府去，德王并派有卫队保护，我不能下手扣捕，如果非要扣捕他不行，可以迳向德王交涉。”烟草谷见宝贵廷不执行，急得直跺脚说：“这是特务机关长的命令，如果不执行，就要受到处分，非执行不可。”宝贵廷说：“我如执行这个命令，无法向德王交代。并且吴鹤龄跑不了，要抓他很容易，何必急于在此地扣捕。”烟草谷见宝贵廷坚不执行，虽然十分着急，但因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势力才伸入西蒙，尚须尊重蒙系军官的职权，迁就宝贵廷的意见，不能以顾问资格直接指挥士兵，他手下虽有几个亲信随从，也不能把拥有几十个卫队的吴鹤龄扣捕，遂即作罢。吴鹤龄却得在化德安全渡过一宵，翌晨乘车到达我旗。我当即安排他住下。

吴鹤龄到我旗第二天，我把接到尼冠洲被杀的电报转给他看，他才恍然大悟，特来见我说：“我在南京已给蒙政会要下十万元的建设费，本想领到后再来，但是接到你的电报，嘱我不要候领十万元，务要从速前来，这次又这样地保护我，你把我看得比十万元还重要。”他这样来表达他对我感谢的心情。我当即安慰他说：“这是我很需要你帮助的，所以希望你从速前来。这次对你略尽保护之责也是应当的，何必感谢，今后希望你安心居住，不要顾虑。”

## 尼冠洲被杀事件经过

尼冠洲是明安旗的佐领，为卓特巴札普的得力助手，时常代表察哈尔盟到外边进行联络。尼为人擅长辞令，善于交际，好做政治活动，因此名望逐渐提高，成了察盟人士中头角峥嵘的知名人士。在国民党政治场合中，都视他为蒙旗地方上有力人物，吴鹤龄一向同他过从甚密，引为知交，他当选国民党中央委后，吴鹤龄当然更和他拉近，以资互相支援。吴鹤龄衔蒋介石使命，前来蒙地活动之事，可能是与他共同商量后所作的，所以，他们二人一同离京北上。到达北平时，尼冠洲还以新当选国民党中央委资格，对来访记者发表谈话，表示此次来蒙，是为了宣抚蒙旗归向中央，因此，就引起日本方面的注意。当他来到张北后，卓特巴札普倚为自己的唯一臂助，当委以“察盟公署”总务厅长之职。日本方面也知尼冠洲是察盟的有名人物，拉他下水参加察盟工作，在政治上可能起一定的作用，也同意他任此职。尼冠洲因新当选国民党中央委，当时倾向国民党中央，表示推托不就，却劝说卓特巴札普勿受日本人愚弄，要有自己的主张，特别是在参加察盟会议上，提出很多为日本方面所不愿接受的问题，当更引起日本人的嫉恨。

据吴鹤龄对我说：在参加察盟公署成立典礼时，尼冠洲指着成吉思汗遗像前所供的九只羊说：“我们蒙古人所能决定的就是这九只羊供品，其他一切都是日本人所做的，都受日本人操纵把持。我看你跟我回到张家口过年去吧，在此地能够干什么。”假如这话为日本方面侦知，当更对尼冠洲嫉恨在怀，定要置之于死地而后快。

我从陶克陶的报告中仅知日本特务机关要处置吴鹤龄的消息，不知有杀害尼冠洲的阴谋。同时我更认为，尼冠洲有卓特巴札普的保护，不致发生意外，所以只顾保护吴鹤龄的生命没有注意尼冠洲的安

全。在我返旗后不几日中，白云梯借故要去张家口，尼冠洲也要返回张家口渡春节，白云梯之走，虽未引起日本方面的注意，尼冠洲返张，却招致日本方面的怀疑，认为他从中破坏“日蒙合作”，会泄露机密。日本特务机关遂决心暗下毒手杀害他，预先派出警兵，换穿便衣，冒充土匪，在万全坝上埋伏等候。当白云梯和尼冠洲分乘汽车先后到达万全坝上时，这几个冒充土匪的人，持枪拦住走在前面白云梯所乘的汽车，打开车门，略加询问即行放过。接着又持枪拦住尼冠洲和梁芝祥所乘的汽车问道：“哪位是尼委员？”尼说：“我是尼委员。”这几个冒充土匪的人又说：“请尼委员下车，我们有话说。”尼遂下车，当被一枪打中要害身死。这几个冒充土匪的人，遂弃尸道旁，扬长而去。对梁芝祥却未加追问，仅受一场虚惊，后来梁芝祥对我谈述这个惨案经过时。犹有余悸。

尼冠洲被杀后，外界曾有这种谣传，说尼冠洲当选国民党中委后，蒋介石曾召见他，告知对日进行妥协计划，叫他北来和日本方面暗中接洽进行。嗣又怀疑这个人不可靠，深恐泄露机密，遂又派蓝衣社人员将尼冠洲刺杀，以资灭口。据我推测，这个谣传是日本特务机关故意散布的烟幕，掩盖他们暗杀尼冠洲的阴谋。由此可见，日本帝国主义不但用阴谋毒辣手段，把尼冠洲置之于死地，而且散布阴险欺诈的烟幕，以欺骗、愚弄蒙古人。

## 在苏尼特右旗成立伪蒙古军总司令部

“察盟公署”虽经成立，毕竟是地方政权，仅能指挥所属旗、县，不能号令其他各盟协助扩编军队。为了成立统一的指挥机构，我从张北返旗后，就从百灵庙蒙政会调来中坚干部超克巴图尔（陈绍武）、赛吉尔胡（丁我愚）、玛哈希力（赵文儒）、乌勒吉图（张秉智）、札拉嘎木吉（白景畲）和原在我旗的陶克陶、金水昌、于兰斋、补英达赖、郭尔卓尔札布等，进行筹备成立伪蒙古军

总司令部工作。决定改元易帜，用成吉思汗纪年（经查对《王公表传》，这年正是成吉思汗七百三十一年），制定蓝地右上角红、黄、白三条为象征的蒙古旗，表明脱离了中国的辖属，走上“独立自主”的道路。实则是走上背叛国家、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的道路。

经过积极筹备就绪后，定于一九三六年旧历正月十八日举行伪蒙古军总司令部成立典礼。典礼是在我的王府大蒙古包中举行的，一切都仿照成吉思汗大祭的仪式，在大蒙古包中正面悬挂起成吉思汗的遗像，遗像上面挂着很长的哈达，遗像下面供桌上摆着九只整羊及其他供品等物，蒙古包门上交叉竖起两面蒙古旗。典礼开始时，规定一律实行叩拜礼。我率领蒙古职员向成吉思汗遗像行了叩拜礼后，参与典礼的日本人穴浦、前川也跟着行了叩拜礼。我看到这种情形，真是得意忘形，欣然自得，便向坐在我旁边的郭尔卓尔札布说：“你看日本人都向我们祖先磕头了！”行礼后，我就以成吉思汗三十世孙的资格宣读誓辞。誓辞的主要内容是：“我誓愿能继承成吉思汗的伟大精神，收复蒙古固有疆土，完成民族复兴大业。”我宣读誓辞后，本来预定由关东军西尾参谋长代表日本方面致祝词，只因这天降雪甚大，天气不佳，他没有及时赶到，暂行宣布散会后，西尾才乘飞机来到我旗，乃再召集职员开会，西尾遂当众宣读祝词。祝词大意无非是“日蒙携手，亲密合作”等语。但他祝词中所提到的是祝贺成立“蒙古军政府”，不是祝贺“蒙古军总司令部”的成立，这又说明在名称上还没有统一起来，仍然各行其是。西尾致祝词后，就摆上全羊席招待他。宴会后，他就乘飞机走了。

伪蒙古军总司令部成立后，我就责成陈绍武等制定总司令部组织大纲和安排主要人事。因甚感人手不足，特从伪满约来仓都仍（包海明）、璦门达賚（高庆春）、图木勒巴特尔（刘定一）、恩和阿木尔（包崇新）等，由北平约来特克希卜彦（王宗洛）、莎彦毕勒格图（陈靖寰）、那苏图（王庆三）、忽克金（陈化新）等。在组织大纲中，规定“蒙古军总司令部”最高首领为总司令，大家



推举我担任总司令，李守信为副总司令，下设军务、政务两部和  
一个秘书处，另外还由日本人组成顾问部，负指导军事、政治之责。  
军务部长派李守信兼任，其下设一、二、三课。第一课课长敖云  
章（未到任），第二课课长王宗洛，第三课课长于兰斋，分管军  
政、军令、军法、军械、军需、参谋、作战等事项。政务部长由我  
自兼，下设内务、财政、文教三处。内务处长金永和，财政处长包  
悦卿，文教处长郭尔卓尔札布，分管民政、礼俗、宗教、文化、教  
育、财政、交通、实业等事项。秘书处处长补英达赖，下设一个秘  
书室和文书、人事、会计、经理四科。机要秘书陶克陶，秘书陈绍  
武、丁我愚、文书科长赵文儒，人事科长张秉智，会计科长旺尔克  
札布，经理科长孟昭义。顾问部主任顾问村谷彦治郎，军事顾问山  
内，财政顾问稻茨，文教顾问堀井德五郎。这就是伪蒙古军总司令  
部的组织概况和主要人事阵容。这时吴鹤龄因日本方面还不谅解，  
没有派他担任重要职务。

伪蒙古军总司令部成立后，首要的工作是招募士兵，扩编军  
队，除派宝贵廷、乌云飞赴卓、昭两盟继续招兵外，并派包悦卿赴  
哲盟招兵。其次，因是年锡盟大雪成灾，成立了雪灾救济委员会，  
以郭尔卓尔札布为主任，发出通电呼吁救灾，募集灾款。这年冬末  
春初之际，降雪甚大，天气奇寒，平地积雪尺余，草原多被覆盖，  
水井为之冻结，牲畜遭受冻饿而致死者甚多，牧民生活受了很大影  
响。因此，一面派员赴伪满募集赈款，一面通过“善邻协会”在日  
本国内募捐，并用“雪灾救济委员会”名义，向国内各界呼吁救济。  
结果从日本和伪满方面募到赈款二十余万元，从国内募到赈款四万  
多元，由赈济委员会华北方面负责人何绍南亲自送到百灵庙蒙政会  
者一万多元。关于这项赈款的使用，我采纳了吴鹤龄的建议，决定  
集中使用，不可分散救济。所以这项救济款并未用在救灾上，以后由  
吴鹤龄把持，用来作为毫利希亚（蒙语其意为合作社）的资金，不  
仅吴鹤龄借此大发其财，就是他的手下人罗厉甫、戴宗元也成了富

翁，罗厉甫在北京广置房产，大开商店，成了有名的罗二爷。

## 日本特务机关长浅海

这时日本特务机关长换成了浅海少佐。这个人飞扬跋扈，粗暴蛮横，把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本来面目充分暴露了出来，居然以征服者神气出现，对我指挥命令，毫无礼貌，对蒙古职员更是采取高压手段，见面非打即骂。大家初则避之，不敢挫其锋，继因浅海的蛮横态度，有加无已，均表不满。有一次在冰天雪地中，浅海召集全体职员讲话很久，冻得大家手颤腿战不能支持，接着他又进行考试，就地出题，随时答卷，看见有的人站立姿态不稳，就掴耳光，或用拳头猛捶其胸，简直把蒙古职员当牛马看待，由于浅海对人的态度蛮横，引起大家的极度愤慨，纷来向我表示不能忍受浅海的侮辱。有人提出：这是复兴蒙古，还是出卖蒙古？我们是成吉思汗的子孙，还是裕仁的奴仆！要求离职回家，不愿在此地工作，以免时遭侮辱。有的主张与浅海抗争，不要示弱。我与陈绍武等研究对付浅海的对策，认为浅海的态度蛮横，定有接近他的蒙古人人为之出谋划策。而当时通晓日语接近浅海的蒙古人中只有金永昌和陶克陶二人，并认为陶克陶还在青年，不无一点血性，不致出此下策；而金永昌一向对浅海低声下气，表示恭顺服从，并常为浅海当蒙语翻译，宣扬浅海的好处，他可能对浅海献策：在日蒙合作开始时，应当用高压手段和严厉态度，对待王公和青年，以树立威严，便于今后压服、控制。陈绍武向我建议，为了对付浅海的蛮横，安定大家的情绪，一方面在金、陶二人之中，必须拉一个、打一个。陶克陶虽是关东军的“嘱托”（日语原意也为委托办事，但在此是一个职称，指专为日本特务机关搞特工），毕竟还是青年，易供你的驱使，而金永昌老奸巨猾，不易受你的驾驭。为今之计，应当拉陶排金，并向陶克陶说明我们团结起来是反对浅海，不是反对日本，叫

他向关东军反映浅海的粗暴蛮横，影响“蒙、日合作”甚大，应当从速调离其职务。另一方面，应召集集中坚干部秘密会议，号召大家“加强团结，努力民族事业”。我很以陈绍武的意见为是，表示同意这样做。同时我对浅海的作法和金永昌的行为，也是不满的。因为我原来是妄想利用日本的势力，实现我的统一蒙古、掌握大权的野心，还以为自己不是日本的傀儡呢。金永昌在浅海面前卑躬屈膝，阿谀奉承，我很看不起他，对于陶克陶却有好感，因他曾向我透露日本特务机关谋杀吴鹤龄的消息。对于浅海的做法和态度我更是不满意的。他任我旗特务机关长后，曾去乌珠穆沁右旗面见索王说：“今后蒙古的事情完全由德王负责去作，希你不要从中阻挡。”他说这话的意思是对索王的恫吓，对我的支持，但我认为他这种说法很不妥当。因为索王一向对日本没有好感，不愿与日本“合作”。经我采用很多办法，才说动他同意“蒙、日合作”。我认为对他应当迁就和尊重，以资号召，不意浅海竟出以威胁恫吓之意，这会使索王怀疑浅海对他的恫吓是出于我的教唆，会离间我和索王之间的感情。因此，我就同意了陈绍武拉陶排金、反对浅海的建议，由陈绍武拟具一个以“加强团结，拥护领袖（指我），内除奸细（指金永昌），外抗强权（指浅海）”的誓词，在我王府的西跨院内召开中坚干部秘密会议，张挂成吉思汗像，备有奶酒。计被邀签名参加者有陶克陶、陈绍武、丁我愚、赵文儒、孟昭义、刘定一、包崇新、白景畲、王庆三、张秉智、包海明、高庆春、吾力吉卜林、陶克托胡（陶布新）等。首先由我发言，大意是“忠心为蒙”，不畏强权等语。继而宣读誓词，由参加者签名划押后，面对成吉思汗像，举手宣誓，痛饮奶酒，大有歃血为盟之势。会后我切嘱大家，必须严守秘密。

经过这次会议，果然得到了效果，一般干部便由动摇中安定下来，对浅海的蛮横态度，多置之不理，有时也起而抗衡，浅海对人的态度也较为缓和了。迁至化德时，日本关东军即将浅海调走，另

派田中玖为特务机关长。现在回想起来，我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很大错误，并有罪恶。我投靠日本，就在浅海已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者的狰狞面目，当即招致蒙古青年的极大不满。以致我搞的所谓“独立局面”，大有“树倒猢猻散”之势。这本来已经值得我深思和觉醒，但我为政治野心所驱使，正在陶醉于“蒙日合作”之中，认为浅海既然态度蛮横，换一个态度温和的特务机关长或可好一点。结果赶走了态度蛮横、作法强硬的浅海，换来了一个貌似温和、而手段毒辣的田中玖，还是照样执行侵略蒙古的政策。我运用召开中坚干部秘密会议宣读誓词的方式，麻醉了蒙古青年，使大家从动荡中安定下来，跟我一同走上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的道路，既误了很多蒙族青年，又断送了西部蒙旗，真是罪莫大焉。

## 在乌珠穆沁旗召开蒙古大会

伪蒙古军总司令部在苏尼特右旗成立后，由于僻处牧区，交通不便，指挥失灵，非常影响工作的进展。并因人口稀少，物资缺乏，房屋不多，在供应和居住上多感困难。而且我曾听到田中隆吉说过：西尾参谋长参加典礼后说，西苏尼特旗这个地方，人口稀少，一片荒凉，怎能成立“蒙古军政府”。这时吴鹤龄也向我建议：“既然日本关东军喜欢‘蒙古军政府’这个名称，我们就成立‘蒙古军政府’吧，何必强调非叫‘蒙古军总司令部’不可，弄得在名称上不一致！”同时我想到，关于和日本关东军接洽的经过、“蒙古军总司令部”成立之情形、今后如何开展工作等问题，均有向各盟旗报告和讨论之必要。于是就责成吴鹤龄拟具成立“蒙古军政府”和建立“蒙古国”草案。在建立“蒙古国”草案中，特别强调领土完整，主权独立，要以原有盟旗（包括东、西盟旗）为领域，以葫芦岛为海口。恰好这时田中隆吉又来我旗，我就将建立“蒙古国”草案交给他，请他转向关东军研究并帮助实现。当时他把这个

草案随手放在衣兜里，可能未向关东军反映。后来到了化德，他又把这个草案原封未动地交给我说：“此事以后再说，现在应当集中力量打绥远，只要把绥远拿下来，建国问题就随之解决了。”

我和吴鹤龄等研究，为了讨论“蒙、日合作”及今后如何开展工作问题，急需召开一次有西蒙全部盟旗参加的蒙古大会，并为了迁就索王能够亲自参加以资号召起见，决定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四日在乌珠穆沁右旗，召开第一次蒙古大会。这样决定之后，就以“蒙古军总司令部”名义，下令锡、察两盟各旗扎萨克和总管，务要亲自参加；以蒙政会名义，通知乌、伊两盟各旗及阿拉善、额济纳、土默特等旗，派主要人员参加。届时到会参加者，计锡盟有我和索王、松津旺楚克、雄诺敦都布、林沁旺都特、巴拉贡苏隆、索特那木道尔吉、多布敦、道尔吉、桑都克道尔吉、贡桑等；察盟除察西四旗未派员参加外，察哈尔东部八旗都参加了，计有卓特巴扎普、特穆尔博罗特、哈斯瓦齐尔、色楞那木济勒、穆克登宝、补彦、阿由尔扎那、萨穆丕勒诺尔布等；乌盟参加者有沙拉巴多尔济、葛什克达赖等，并把在蒙政会秘书厅任科长的伊盟达拉特旗人那逊德勒格尔约为伊盟代表，把在蒙政会实业处任科长兼参议的额济纳旗人苏宝丰约为额济纳旗代表，还把阿拉善旗前来蒙政会议洽领枪械的陈那逊巴图约为阿拉善旗代表。李守信、吴鹤龄、金永昌、于兰斋、陶克陶等以“蒙古军总司令部”的军政首脑资格参加。这时吴鹤龄为了取得日本方面的信任，特利用他的岳父于华亭（是卓盟喀喇沁右旗闲散王公，曾任北洋政府众议院议员）与索王的旧关系，尽力说劝索王同意和日本“合并”，亲自参加大会。索王非常讨厌日本帝国主义，但这时看到“蒙日合作”已成事实，就听从了吴鹤龄的劝说，同意了我的做法。我听说索王曾向他旗的协理图桑阿表示说：“现在已做成这个样子了，德副盟长这样做自有他的见地和他的道理吧，今后我们不必干涉他了，任凭他放手去做吧。”

吴鹤龄在大会筹备工作上，出谋划策，审查提案，表现得特别积极活跃。在部分代表到达之时，他曾和我说：“代表已经到了大部分，不能叫他们闲着，闲着就要出问题，应当召集他们开会，招待他们宴会。开会宴会，宴会开会，这是我在南京跟国民党学到的一套办法。”因此，他就和到会的代表们整天开会，讨论问题。迨到代表们到齐举行预备会议时，推选我和索王、李守信、卓特巴扎普、沙拉巴多尔济为主席团后，吴鹤龄在大家推举下，担任大会秘书长。他在掌握会场、进行讨论、通过议案中，起了一定的作用。

在预备会议上，先酝酿协商主要议案，次又有人提出如何筹措军政各费。吴鹤龄主张，可向日本人借款一千万元，作为军政各费。这样协商和安排后，就在索王大蒙古包中举行正式大会，首由索王作简单的发言，说明召开此次大会的意义。继由我报告和日本关东军接洽的经过，“蒙古军总司令部”成立及改元易帜的情形。接着就讨论议案，最主要的有下列各案：（一）关于建立“蒙古国”和先在嘉卜寺（化德）成立“蒙古军政府”，以资整军经武，收复蒙古固有疆土案；（二）关于实行征兵，扩编军队，组织“蒙古军”案。（三）关于实行统制经济，开发资源案；（四）关于成立蒙古生计会，组织救济新村案。因会前已经酝酿成熟，都顺利通过。嗣由吴鹤龄宣读察盟代表中提出将化德县改为“德化市”，由察盟划出归由“蒙古军政府”直辖案。卓特巴扎普当提出异议说：

“化德是察盟统辖的一个县，是谁未经我这个盟长同意，竟敢‘张松献地图’，提出这个议案来！我是不同意的。”吴鹤龄看到这种情况，马上把原文又念了一遍说：“这个议案没有人正式签名盖章，应当另议。”卓特巴扎普也再未说什么，这个议案就暂时搁下了。

在大会进行中，日本关东军参谋田中隆吉、横山顺等乘飞机赶来参加，我向田中隆吉作了个别谈话说：“索王等最不愿意的是怕你们派来顾问，过问蒙旗行政，希你以来宾资格在大会上讲话时，说明现在派来的日本顾问是帮助蒙古筹备建国，以俟工作就绪，就

将派来的日本顾问一律撤回，决不干涉旗政。”田中隆吉果然照我的嘱咐，在大会上讲了话，并将带来的八音子手枪多枝，分赠各盟旗有实力的代表，以资拉拢。接着我们又向田中隆吉提出，向日本借款一千万元问题。他答复说：“你们蒙古有石油矿吗？如有石油等矿源时，借款一千万元那是容易办到的。”从他这几句话里，充分透露出，日本帝国主义要把蒙古作为吸取原料、销售商品、投资赚的殖民地的阴谋。

田中隆吉在大会中看到吴鹤龄的活跃情形和所发挥的作用，钱对他非常重视，很想拉他为日本作些工作。他曾向吴鹤龄说：“我们日本人中，曾经有人主持杀了尼冠洲，我认为这件事作错了。希望你不要因此有所顾虑，今后应当放手进行‘日、蒙亲善’工作。我想请关东军给你一个‘嘱托’，你的意向如何？”吴鹤龄推托说：“这是你对我的关照，但我对此没有什么意思。”田中隆吉当下虽然没有说什么，但在面部上表现出不甚愉快的神色。

大会最后一天进行选举，选出云端旺楚克（云王）为伪蒙古军政府主席，索王和沙王（伊盟盟长莎克都尔札布）为副主席，参与大会的代表都在“选任状”上签名盖章，表示郑重。当晚即以全羊席招待田中隆吉、横山顺和参与大会的全体人员。会后由我率领一部分代表到百灵庙把“选任状”送交云王，并请他今后主持指导工作。云王表示：“我是年老力衰，德薄能鲜，深蒙大家推戴，无任感奋，希望大家共同去作，特别希望德秘书长（指我，我是蒙政会秘书长）多负责任。”这时国民党中央政府已准云王辞去“蒙政会”委员长职务，调任伪国民政府委员，“蒙政会”由副委员长索王执行委员长职务，实际上由我负责。

## 成立伪蒙古军政府

第一次的蒙古大会召开后，我即派王宗洛率同职员数人前往嘉

卜寺接收化德县房屋，进行筹备伪蒙古军政府工作。不意化德县小林顾问拒绝腾房，发生了波折。嗣经与化德县特务机关长田中玖交涉，才把小林顾问的气焰压下去，开始腾房，进行修理。经筹备就绪后，就于一九三六年五月十二日举行伪蒙古军政府成立典礼。参加典礼者除各盟旗代表和前“蒙古军总司令部”职员外，日本方面参加者有日本关东军今村参谋副长，田中隆吉参谋，化德特务机关长田中玖，日本顾问谷村彦治郎等。举行升旗典礼时，首先由我讲话，说明依据“第一次蒙古大会决议”，成立“蒙古军政府”的意义。继由今村致祝辞，祝贺“蒙古军政府”的迁移，强调“日、蒙亲善”，协同一致，完成“蒙古军政府”所负之使命。礼成后，即大排筵席，招待日本来宾及各盟旗代表。

伪蒙古军政府人事安排，依照“蒙古军政府”组织法规定，由云王、索王、沙王以正副主席名义，任命我为总裁，负实际责任，掌握军政大权，实行独裁制。总裁下设一个办公厅，参议、参谋两个部，军事、财政、内务、实业、教育、交通、司法、外交八个署，一个顾问部。办公厅主任补英达赖，军事署长王宗洛，财政署长德古来，实业署长王辑唐，内务署长索特那木道尔吉，交通署长于兰斋，司法署长特穆尔博罗特（特大海），外交署长陶克陶，教育署长金永昌，后将金永昌调任驻伪满代表，由郭尔卓尔札布继任教育署长，参谋部长李守信兼，参议部长吴鹤龄，顾问部主任顾问村谷彦治郎，军事顾问山内，财政顾问稻茨，外交顾问山本倍亲，教育顾问堀井德五郎等。嗣因总裁工作繁剧，又设四个邦办，由李守信、吴鹤龄、补英达赖、陶克陶等担任，帮同我处理军政事务。并派陈绍武为内务署邦办，吉致祥为教育署帮办，帮同署长处理署务。后又增设一个侍从处，由丁我愚为少将侍从处长。乌古廷由伪满来蒙后，暂派为参谋部主任参谋。这是伪蒙古军政府的主要人事安排。



## 组织伪蒙古军

伪蒙古军政府成立后，首要的是搞军事工作，就是招兵买马，扩充军队，由我亲自主持进行，军事署长王宗洛负责办理实际工作。把李守信统率的原有部队，和由伪满各旗招来的士兵，以及在锡、察两盟各旗征到的士兵，重新编为两个军，八个师，一个警卫师，一个炮兵团，一个宪兵队。伪第一军军长李守信，统率一、二、三、四各师和一个直属炮兵队。计第一师师长刘继广，第二师师长尹宝山，第三师师长王振华，第四师师长宝贵廷，直属炮兵队长丁其昌。伪第二军军长由我自兼，统率五、六、七、八、各师，计第五师师长依恒额（依绍先），第六师师长宝彦图，后由乌云飞（突布格尔勒）继任，第七师师长穆克登宝，第八师师长包悦卿，后由札青札布继任，警卫师师长雄诺敦都布，后改为九师由包海明继任师长，炮兵团团长王云五，宪兵队队长刘建华（那木尔），预定全部都是骑兵，总兵力约达一万余人。并为了培训中下级军官，特在我旗东营盘成立伪蒙古军官学校，由我自兼校长，从各部队和各盟旗中选拔蒙古青年，进行训练。

为了考验部队训练成果，特于是年九月间在化德飞机场举行阅兵典礼，计参加被检阅的军队，除伪第一军派来部分部队外，伪第二军所属各师大部参加。由我亲自检阅部队分列式。日本军参谋长坂垣征四郎也来参加检阅，表示满意。坂垣旋即乘坐飞机分赴伊盟札莎克旗和阿拉善旗定远营，说是去见沙王和达王（达理札雅），做拉拢工作。我检阅部队后，赏给士兵每人银洋一元，以资鼓励。并事先派兵打来黄羊多只，就地野餐，表示慰劳。我参加阅兵典礼后，回想在国民党政府隶属之下，等于讨饭，今天要上几枝枪，明天要上几门炮，仅欲编练一师人马而不可能。这时凭日本的力量，居然能够握有两军人马，万余骑兵，如再扩而充之，虽不敢妄想恢

复成吉思汗伟业，也妄想把“蒙古民族复兴起来”，跻于国际强盛民族的行列，我自己也作一个“民族英雄”。幻想及此，真是自鸣得意，喜形于色，有些飘飘然了。

但在得意之中，不如意的事情也就随之而来。首先是日本特务机关长田中玖，以伪第一军经费不足为借口来威胁我。有一次他带着伪第一军的参谋长刘星寒前来见我，说是军费不足，叫我设法筹措。我知他是故意给我出难题，就赌气把伪第一军的经费都批准了，并增批了一些军费，反责成他也设法筹措。他看我面有愠色，也带着不耐烦的神气，一声不响地走了。又因伪蒙古军政府成立了公路局，任命张绍庭为局长，负责办理化德至张家口及各旗县之间的运输。一般商人都愿搭乘公路局的汽车，不愿搭乘日本满铁的汽车，以致满铁汽车公司生意冷淡。田中玖为了使日本人经营的满铁汽车公司垄断交通运输，赚取高额利润，曾向我提出不供给公路局汽油，由公路局自行购买，想用这个办法，迫使公路局停办歇业。我当时认为在张家口还能买到汽油，因而置之未理。不久田中玖走了，田中隆吉来了，才又供应汽油。更因我这时比较信任陶克陶，不信任金永昌，金永昌便和田中玖拉得很近，说我和陶克陶的坏话。

记得陶克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田中隆吉有一次把我叫去，正言厉色地向我说：‘田中玖说金永昌曾向他反映过，说你曾向蒙人表示，蒙古为了自己的利益，跟谁都可合作，既可和日本合作，也可与外蒙合作。现在你说这话可不行。我当时答复田中隆吉说：‘这话是前在多伦时，和金永昌等研究蒙古问题时说的，是在蒙、日未合作以前的话，不是在蒙、日合作之后说的。’田中隆吉反嗔作喜说：‘那时说的没关系。希望你不要顾虑，我是信任你的。’”

陶克陶述说这话之后，又感慨地说：“我们的金永昌先生真厉害，如不是田中隆吉谅解我，我可能就遭田中玖的毒手了。”这又说明，田中玖是想用打击陶克陶的手法，去掉我的助手，给我颜色看，幸亏得到田中隆吉的谅解，才归无事。但这不是田中隆吉比田

中玖好，而是因陶克陶这时确实成为田中隆吉忠实的走狗，绝无另走外蒙路线的意图，所以田中隆吉故意把这套话告知他，叫他感恩图报，进一步为日本帝国主义效劳。

其次，令我不如意的事还有：一、因为从伪满各旗招来的士兵，多是土匪、地痞、流氓、游手好闲之徒，纪律不好，在举行阅兵典礼时，竟在化德街上发生了抢案，士兵打人骂人之事，更是层出不穷，给当地人民造成不良印象。二、在编制和配备上，各方意见很多，争要军马，争要装备，例如第七师师长穆克登宝是察盟人，利用地方上的关系，先购足了军马；五、六两师的人就表示不满说：“我们师是先编制的，反而军马不足，有的部队仍在徒步。而第七师是后来编成的，却配备了足够的军马，很不公平。”意见纷纭，烦言啧啧，叫我很难处理，至感烦恼。三、宝贵廷曾一度暂代伪第二军军长，迨发表他为第四师师长后，就解除了他暂代军长职务，因而对我也有怨言，向人发牢骚。我听到后也很恼火，想把他调到伪蒙古军官学校工作，并叫王宗洛暗地调查他有无煽动军心事情。王宗洛接受我的指示后，一方面告知王云五（王宗洛的胞兄）炮兵团长预作准备，以防不测；一方面调查宝贵廷的言谈行动。嗣向我报告说，宝贵廷并无煽动军心、图谋不轨事情，仅在饭馆酒醉时发过牢骚，我才未调动宝贵廷职务。四、在征兵上，锡盟各旗都按照“第一次蒙古大会”决议，把应征兵名额按期送来入伍，只有乌珠穆沁右旗，因为保安队官佐都青阿、敖恒等反对征兵，在该旗蒙民中散布怨言说：“现在蒙古军政府向我旗征兵要马，是我旗协理托克托胡勾通德王、吴鹤龄等投靠日本，扩编军队之所致，我们应当反对。”号召被征旗民杀害托克托胡。因托克托胡事先得讯逃避他处，始得幸免。继而都青阿、敖恒等又率领被征旗民到索王府请愿，要求免除兵役。这时索王正病重，不得已抱病出面苦苦劝说，才将这事平息，不久索王也就病故。五、乌珠穆沁右旗官员们，为了应付差事，于是年冬特在林西一带雇佣些兵痞，代替该旗

应征旗民入伍。李守信见着我说：“我的林西旧部属都来了。”我对该旗这种应付差事的做法，很不满意，严令该旗务要依照“蒙古大会”决议，把应征士兵送来。该旗官员们迫于我的命令，又设法说服了都青阿、敖恒等，率领应征士兵，前来我旗西营盘入伍。这是我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后，在征兵问题上遭到乌珠穆沁右旗反对的一段经过。当时我很不满，现在回想起来，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强行征兵要马，招致蒙古人民的反对是应该的，也是必然的。

## 和伪满及“冀东”缔结协定

在“外交”工作上，主要是和伪满及“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缔结协定。伪蒙古军政府成立后，田中隆吉就向我建议，应和“满洲国”缔结协定，我即偕同李守信、吴鹤龄、金永昌、陶克陶、卓特巴扎普、雄诺敦都布、索特那木道尔吉等，分乘飞机二架赴长春。

到达后，先访问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伪满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外交部大臣张燕卿、宫内府大臣熙洽、军政部大臣于深澄、蒙政部大臣齐默特色木丕勒等，无非是周旋与宴会。继而就和伪满外交部谈判缔结协定问题，计日本关东军方面参加者有田中隆吉，专田参谋；伪满方面参加者有外交部大臣张燕卿，次长大桥忠一；伪蒙古军政府方面参加者有我和陶克陶。谈判开始时，首先由我和张燕卿分别致辞，张燕卿在致辞中，强调应以日本为中心，达成满蒙合作。我在致辞中，着重从过去历史和当前局势，说明“蒙满合作”之必要。接着就进行讨论，在政治、经济等问题上，没有什么分歧，仅在军事问题上有点争论。我提出“蒙古军政府”甫经成立，实力未充，如果受到威胁的时候，请“满洲国”出兵援助，当威胁解除的时候，“满洲国”即应撤兵。大桥忠一争辩说：“从外交惯例上说，‘满洲国’为了援助蒙古，实行出兵或撤兵，应当有一定的程序和规定，不能你们叫我们出兵就出兵，叫我们撤

兵就撤兵。”田中隆吉插言说：“不必在这个问题上争执吧，本着‘满蒙亲密合作’的精神，按照德王的意见办理也无不可，我看就这样办吧。”因为田中隆吉知道，伪满蒙缔结协定，不过是走形式，出兵或撤兵，还得由关东军作最后的决定。谈至此就告结束了。

又经分别酝酿协商，结果缔结了以共同防共、军事同盟、互派代表、经济提携为内容的“蒙满协定”，由我代表伪蒙古军政府签字，由张燕卿代表伪满洲国签字。这个协定的内容大致如上所述。

（因协定原件，在化德退却时丢失，详细内容记不清楚了）。嗣即根据这个协定，伪满洲国派玉春为驻伪蒙代表，伪蒙古军政府派金永昌为驻伪满代表，双方开始建立了“外交关系”。同时，伪满中央银行在化德设立办事处，发行伪满币，在伪蒙古军政府行政力量所及的地区，流通使用，由此双方也发生了经济关系。这次日本关东军和伪满外交部，还派员陪同我们到奉天参观兵工厂，在东陵举行盛大的招待宴会。旋又到大连游览，到王爷庙访问。缔结协定后，我单独一人去见了伪满皇帝溥仪。关于我和溥仪的关系，下面再谈。

我同伪满签定协定后，返回化德不久，田中隆吉又向我建议，应派外交署长陶克陶赴“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缔结协定，好向他们交涉支援经费。于是我又派陶克陶代表伪蒙古军政府赴“冀东”与汉奸殷汝耕商谈，结果缔结了以“政治上共同防共，经济上互相支援”为内容的协定。田中隆吉即根据这个协定，从“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弄到一百万元，作为伪蒙古军政府的经费。

## 我与溥仪的关系

在这里，需要补充我和溥仪的深切关系。

在我年轻时期，因受封建社会遗毒很深，忠君思想至为浓厚。但我承袭苏尼特右旗扎萨克亲王之后，已入民国时代，无君可忠，就把忠君思想寄托在溥仪的身上，非常盼望溥仪复辟。记得我十六

岁时，我的姐夫穆特賚阿任察哈尔十二旗群●的巡防马队统领，掌握数百蒙古骑兵，参加了张勋复辟活动。有一次他和我说：“我不久就到北京保护皇上登极，你有什么奏摺或有对皇上说的话，我可以替你转奏。”我当时因为年轻，没有做出什么表示，后来张勋复辟失败了，穆特賚阿逃到外蒙避难，株连他的兄弟六人被杀，我还深以在张勋复辟事件中，没有贡献自己的力量为憾事。

迨至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溥仪迁到北京日本公使馆避难时，我曾偕同补英达赖去北京，通过外蒙驻京王公那彦图的介绍，去见溥仪。因溥仪正准备转赴天津，仅得一面，未得多谈，聊表慰问之意就辞出了。我和补英达赖就急忙返回张家口，向商家筹款一万元又到北京，前往日本公使馆，见到了溥杰，表示愿到天津面见溥仪。恰巧这时溥仪从天津来电话，向溥杰询问他母亲的疾病，溥杰趁便在电话中转达我的意思，溥仪答称：“可以前来相见。”我遂和补英达赖把一万元纸币用布袋缠在腰中，外穿宽大衣服，密赴天津，住在华石斧家。经过接洽联络，在日租界张园见到溥仪，当将所带一万元进献，并致慰问之忱。所得到的是数句奖勉之语和赏喝牛奶一杯。但我毫无不满之心，还以为在皇上蒙难之时，得尽献款之诚，是为臣属应尽的义务，感觉无上的欣慰。在溥仪当上伪满皇帝后，我特穿上清时的蟒袍和马褂，戴上朝珠与顶戴，拍照叩拜的跪象，派我旗协理钟昆赴伪满送给溥仪，表示尊君的忠心。我于一九三五年冬赴长春和日本关东军接洽时，先和溥仪的侍从武官张海鹏见面，谈到张勋复辟失败，不胜感慨，谈到皇上又复登极，无任欢欣。接着又见了溥仪，行了叩拜礼，于心甚慰。

当我代表伪蒙古军政府到长春来缔结协定，本有“两国相交”的意味，应当尊重自己的“身份”。但顾念过去的关系，对溥仪个人仍愿以君上事之，以臣属之礼相见。因此，当我单独见到溥仪时，还是行了叩拜礼，溥仪也挥手让座，温语相加，我们二人面对

●群——清末民初年间，蒙古地方的一种行政区划，相当于现在的旗或县。

面地谈了很多的话，内容我现在记不很清楚了。嗣我看见侍从人员均已退出，只有我们二人在座，又向他说：“日本人对皇帝怎样？在我们那边，日本人气焰嚣张，仅是一个化德县顾问小林，竟敢拒绝膳房，阻挠军政府的筹备，对于往来化德的蒙人，也横加干涉，不予便利，使我非常气愤，曾向田中隆吉提出不要小林顾问。田中隆吉答复我说：‘小林顾问不好，改就行了，何必不要他。’我又反驳说：‘你们日本人不好，改了就行，为什么我们蒙古人凌升有错就杀了呢？’”溥仪说：“你这话太硬了。”谈至此我即辞出归寓。

接着田中隆吉来和金永昌等商量，说溥仪要封我为亲王，征询叫什么亲王好。金永昌说：“封为武德亲王最适宜，因为武是采取成吉思汗圣武皇帝的武字；德是采取德王的德字，把武德二字结合起来，是表示德王继承成吉思汗伟业的意思，一定适合德王的口胃。”于是田中隆吉就采纳了金永昌的建议，转知宫内府办理，溥仪又召见我，亲自授与武德亲王《钦任状》，我即拜领接受，表示谢恩。我返寓后，仔细看看这个《钦任状》，上面还有溥仪的署名，我很奇怪，~~怎么皇帝封号还自己署名呢？~~认为不合前清封王只盖大印，皇帝不署名的惯例，足见这个不伦不类的《钦任状》是出于日本人的指使，不是溥仪近臣的主意。这时吴鹤龄也知此事，带有不满的神气对我说：“这时封你为‘武德亲王’有什么用处？还不如赠给你一枚勋章，表示‘蒙满亲善’，符合国际间的礼节。”我当时对吴鹤龄虽没说什么，而脑子里却在这样想，这个“武德亲王”，必要时也有用处，如对守旧的老年王公杨桑等宣扬一下，很可利用溥仪的“钦封”，提高我的身价，把向以前辈自居的老年王公杨桑等的气焰压下去。我虽有这个想法，但这时我认为自己已经掌握了伪蒙古军政府的军政大权，杨桑等对我也比以前尊重，不再遇事阻挠，我也就没向他们宣扬此事，遂把这个《钦任状》束之高阁了。后来我又去伪满访问，拜见溥仪时，对他作了交代说：“现在皇帝在

日本帮助之下，已经登极，再也用不着我效力了，我今后把忠于皇帝之心，忠于蒙古事业。”溥仪也以贵宾之礼待我，宴会时，口称我为“贵主席”了。

## 关于凌升之死

上面我谈了一些我和溥仪的关系。顺便谈谈关于凌升之死的问题。一九三六年旧历正月十八日，在我旗举行伪蒙古军总司令部成立典礼后不久，田中隆吉又来我旗，商洽扩编军队之事。提到所需经费时，他说：“蒙古统一指挥机构已经成立了，亟须筹措经费，现在兴安北省省长凌升因通苏案被捕，听说他的财产很多，可以没收他的财产，做为军政府的军费。”我当即拒绝说：“凌升被捕，对于蒙古人心和西进工作都有影响，最好不要严究，应当从宽发落。至于我们所需经费，满可设法另行筹措，绝不愿把没收凌升的财产充作我们的经费。”田中隆吉见我不但不愿接受这样来路的筹措经费，反有营救凌升之意，立刻转了话锋，向我解释说：“凌升虽然被捕，我想康德皇帝出头一说，也就没事了，希你放心。”谈至此，他即告辞而去。

同年四月二十四日，在锡盟乌珠穆沁右旗召开伪蒙古大会，准备正式改元易帜，成立伪蒙古军政府，当时我和索王，卓特巴扎普、吴鹤龄等提出以大会全体代表名义，要求释放凌升，预定关东军代表到达后，即提出这一问题。在大会进行中，日本关东军参谋田中隆吉、横山顺等赶来参加。刚下飞机后，吴鹤龄就将大会准备给关东军打电报，要求释放凌升情形，向田中隆吉等报告。田中隆吉答复说：“时间来不及了，大概今天就把凌升处决了。”接着他到屋里又继续解释说：“对处决凌升，本来我是不同意的，在关东军参谋会议时，曾讨论处理凌升问题，我这主管蒙事的参谋主张不杀，把前次你和我说的‘应当从宽处理凌升，以免影响西进工作和



蒙古人心’之言都说了。但是主管关于苏联事情的参谋都主张杀，最后实行表决，我是少数，只有服从多数，结果就决定把凌升处以死刑。这是我们内部处理凌升的经过情形，我都明白地告诉你们。”我们听他说明以后，认为既已把凌升处决，没有再向大会提出这一问题的必要，仅在会外时间告知了大家。索王、卓特巴扎普等，都和凌升有交情，闻听之后，不胜叹息。嗣后陶克陶向我说：“田中隆吉和横山顺闲谈时说，杀凌升的事，对西蒙人的印象很不好。”

“蒙古军政府”成立后，我偕同李守信、吴鹤龄等赴长春，在日本帝国主义导演下与伪满缔结了一个所谓“满蒙协定”之后，即到大连参观，曾和业喜海顺（业王）见面，招待我们参观的日本军官小野寺问业王说：“业王爷对蒙古事情有什么意见？”业王说：“蒙古事情我不知道，我只知有满洲国。”当时使我甚感诧异，一向好谈蒙事的业王，现在也守口如瓶，表示冷淡。这充分说明凌升被杀后，东蒙王公明哲保身，惧怕日本，应付场面的心理。

## 改化德县为“德化市”

在“内政”上，首先将化德县改为“德化市”。关于化德县设置问题，我从前就曾表示过不满，因为化德县所在地原叫嘉卜寺，正和我旗接壤，而我的名字汉语译音是德穆楚克栋鲁普，人又称我为德王，头一个字都是德字，如果仍称化德，就意味着我为这块地方所化；如果改称德化，就意味着这块地方为我所化。在百灵庙蒙政会时期，包悦卿曾将我不满化德二字的意思，向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宋哲元的亲信肖振瀛提过，肖振瀛当向包悦卿解释说，化德县这个名称是从崇礼、尚义等县次第排列下来的，绝无化及德王、侮辱德王的意思。既然德王对“化德”这个县名有意见，我马上建议宋哲元主席更改，希你转向德王解释，不要误会。果然为时不久，我就接到国民党内政部的通知，说将“化德县”改为“新民县”。但

内政部虽有明令更改，因察东事件已经发生，没有来得及更改化德县的牌子，当地人仍称化德县。因此，我于伪蒙古军政府成立后，就决心将化德县改为“德化市”。并因卓特巴扎普对此有意见，特派吴鹤龄前往明安旗卓特巴扎普家中，婉言劝说疏解，卓特巴扎普始答应将化德县从察盟划出，改称“德化市”，归由伪蒙古军政府直辖。我遂任命李守信兼任市长，张子荣（卜琳弼里格图）为副市长，听从伪军政府直接指挥，管理“德化”市政。

## 成立伪蒙古生计会和伪蒙古学院

其次是正式成立伪蒙古生计会，发表吴鹤龄兼任会长，并把募得雪灾救济款悉数拨作该会基金，由吴鹤龄负责主持设置“德化商店”，收购灾民的牲畜皮张，转售部队制做军装，筹划集结灾民组成救济新村和重点植树造林等事。不意因此却引起陶克陶、金永昌的不满。他们向人发牢骚说：“这笔资金，是我们到‘满洲国’募得的救济雪灾款，曾向‘满洲国’各界呼吁救灾奔走募集，并向国务总理大臣鞠躬致谢，尽了很大的努力，受了很多辛苦，费了很多唇舌，为什么现在归由吴鹤龄掌握？究竟如何花用，应当问个明白。”并带有不满的神气前来质问我，我当时不由得也就无名火起，顺手把桌上放着的一个茶杯摔碎，很生气地说：“仅仅这一点灾款的处理，你们都不信任我，居然提出质问，今后怎样共图大事！”金、陶二人碰了我的硬钉子，也就神色黯然而退。由于我对吴鹤龄的支持，虽把金、陶的气焰压下去，但因此却引起金、陶和吴鹤龄之间的勾心斗角争夺权利的矛盾与冲突。

其三是设立伪蒙古学院，任命郭尔卓尔扎布为院长，陈绍武兼教导主任，分设师资、电报、补习各班，招收蒙古青年施行短期训练，培养急需的干部。同时在张北设立伪察哈尔青年学校，聘任日本人为教官，侧重用日语教学，进行奴化教育。并由伪教育署主持

选送留日学生。计有胡尔钦毕力格，博和温都苏、卓里克图、都固仍仓、赛春阿、都格尔扎布、德勒格仍贵等十名被送往日本东京，先在“善邻协会”补习日本语文，继即分送日本大专学院深造，培养通晓日语的各项“人才”，促进“日蒙亲善”。还在“德化”设立蒙日语文讲习所，鼓励职员学习蒙日语文。

## 汉奸王道一的下场、日寇以杀人为儿戏

在治安上，“德化”特务机关长田中玖，在伪蒙古军政府成立后，进行招募当地土匪头子王道一，企图用以扰乱绥东治安，作进犯绥远的前哨。不意王道一率领匪众投归日本后，在扰乱绥东方面未起多大作用，反在尚义一带为非作歹，影响后方治安甚大。田中玖为了收拢当地人心，使对日本有好感起见，特将王道一诱捕枪决。这是王道一做汉奸的下场，同时也说明日本帝国主义的狠毒，汉奸如不为其所用，便置之死地。又据伪军法处长关荫南说：“在未挑起绥东战争以前，唯恐在押的军事犯扰乱后方，日本关东军密令指示伪蒙古军的大桥雄熊参谋，亲来通知关荫南，将寄押在张北监狱的九十一名军事犯，开具名单，宣布“罪行”，一律执行枪决。关荫南认为其中有的军事犯系属轻微犯罪，仅判六个月徒刑，已经在押三个月，再有三个月就可释放出狱，恢复自由。对这类罪犯如也执行枪决，未免冤屈，引起官兵不服，而致动摇军心，反为不美。大桥强调这是关东军的命令，必须执行，不能变更或拖延。又经商讨一番，仍由大桥提出意见说：“为了执行关东军命令，只有将九十一名军事犯绑赴人烟稀少的张北山下行刑，在行刑前一律松绑，任其散漫乱跑，后边用机枪扫射，跑了的就算跑了，打上的活该命死。这样处理既可使一部分罪犯获得活命，也算执行了关东军的命令，你我严守秘密，不可对外言说。”关荫南认为再强调原来意见，也是无用，只好同意这个办法。这样执行结果，仍然打死了

十九名，其余七十二名四散逃逸。由此可见，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惨无人道，随便草菅人命。而日、伪执行人员也就视人命为儿戏，任意屠杀。

## 设俱乐部、公开烟赌

日本帝国主义者以确立后方治安为名，任意屠杀。另一方面却在各县城镇设立俱乐部，公开放赌，抽取头钱，其收入名义上是作特殊用途的开支，实际多饱充了经办者的私囊。并公开卖鸦片，毒害人民。由于烟赌的公开，聚集很多游民，不分昼夜，呼么喝六，吞云吐雾，一塌糊涂，弄得鸡犬不宁，秩序紊乱。而无辜人民因而倾家荡产者有之，投河上吊者有之，卖妻鬻子者有之，身体羸弱者更不知凡几，贻害人民，莫此为甚。当时有人出面反对公开聚赌，主张取缔俱乐部，主管其事的日本人反说中国人天性好赌，设立俱乐部，正是投其所好，满足需要，并可从中抽取头钱，增加税收，作特殊用途的开支，拒绝取缔俱乐部。实际上，日寇是想用烟赌毒害中国人民，使之意志消沉，身体衰弱，不思反抗日寇，不战而亡我中华民族，其用心十分狠毒。

## 进犯绥远的部署

一九三六年十月间，“德化”特务机关长换成田中隆吉。他指使王英组织的所谓“大汉义军”已经初步编成，而伪蒙古军也已初步编练就绪，便主张并要亲自主持进犯绥远。他和我说：“九一八事变时，东北军一打就跑，我们没费多大力量，就占领了东北四省，建立了‘满洲国’。绥远军更是不中用的，可能一吓唬就跑，很快就能拿下绥远，可速责成陶克陶组成接收委员会，准备接收

吧。我计划叫王英部队打前锋，利用汉人打汉人，你们蒙古军督后，作第二线的支援部队，即或发生冲突，蒙古军也可少受损失。”我当时认为他的看法也有可能性，并为了早日占领绥远，实现建立“蒙古国”的妄想，也就赞同田中隆吉进攻绥远的计划。王英是志在河套，企图早日当绥西的一路诸侯，表示愿意承当打前锋，于是进攻绥远的问题便确定下来。接着，田中隆吉就直接指挥王英部队进攻红格尔图，由我命令李守信率领伪蒙古军第一军进驻南壕堑，作第二线的支援部队，把伪蒙古军五、六、八、九各师布置在尚义、“德化”一带，守护后方。这时把百灵庙视为后方军事基地，除其他军需器材不计外，仅面粉一项，就运去二万多袋。在派遣驻守百灵庙部队问题上，我曾很费踌躇。先想派战斗力较强，由东北各旗招来的士兵编成的师前去，深恐纪律不好，在乌盟蒙民中造成不良印象。经反复考虑，认为百灵庙虽是后方军事基地，而名义上仍是国民党政府隶属下的蒙政会所在地，傅作义不会派兵来打，于是就把甫经编成的伪蒙古军第七师派去。因为这个师的士兵，都是从察盟各旗征来的蒙民，虽训练较差，战斗力较低，而纪律好。结果把第七师派去，并把原派的包俊山所带的一连调回。

## 向傅作义发出宣战性的通电

这样部署之后，我就以我为伪蒙古军总司令，卓特巴扎普为副司令的名义，于十一月五日对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发出宣战性的通电。这个通电是由吴鹤龄起草的，其全文如次：

绥远省政府傅主席勋鉴：自从在蒙古境内设置省、县以来，蒙旗之权力日趋衰微，蒙民之生计日陷贫穷。为了挽救蒙古于危亡，乃于前年要求自治，当承中央之援助，准予设立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颁布自治原则八项，蒙众欣慰，举国同情。而独贵省始终猜忌，另眼相加，屡次企图破坏自治，其最显著者列举如次：

(一) 贵省各项税收，关于在蒙地及向蒙民征收部份，依中央颁市之蒙古自治原则，一律另分蒙古若干成。当时蒙政会为谋地方之和洽，谅解贵省之困难，仅要求在百灵庙蒙政会统辖地方另分特别税。中央对这项特别税，曾有分配命令，贵省竟擅自变更界线，夺去丰镇、兴和、集宁、凉城、陶林等五县税收，借口多端，曲解明令，经议年余，分文未给。当时中央对贵省已分配特别税，举办各种事业，而蒙政会因未得税收，以致经济困难，原定各项事业，不能举办。贵省对蒙古地方自治，如此暗中破坏，早已引起蒙古民众之不满。

(二) 前年所发生之西公旗事件，纯粹是蒙古内政问题，蒙政会责成主管盟长和平解决，乃义属当然，而贵省独越权干涉，操纵石王，扩大事态，纠纷不已，企图分化蒙旗，推翻自治之居心，不问可知。今春蒙政会奉中央明令，撤回驻在西公旗之保安队，以免发生冲突，并请中央转令保护麦力更召活佛尼达克丹大喇嘛。不意数月后，大喇嘛及其家属从众，被贵省派兵袭击，竟致杀害。如此破坏蒙古自治荼毒蒙人惨剧，凡属蒙族，莫不痛心。

(三) 蒙政会保安队系呈请中央编成，专负保卫地方之责，何等重要！而贵省今春竟利诱该队中不良分子起而叛乱，收归贵省，更于前月装备叛乱官兵，诡称反正，进攻百灵庙，企图毁我自治发祥地，为各旗驻在百灵庙之保安队击退。当由贵省派兵掩护，酿成叛兵互相仇杀，死伤数百名之多，贵省利用无知蒙人，客留贵省，仇视蒙人，为何如此之甚！

(四) 百灵庙蒙政会系全蒙自治机关，深受中央扶植蒙古之至意，全体蒙人视为第二生命，凡属人类，对之莫不寄与同情，不忍加以危害。独贵省阴谋破坏，居心推翻，甚至捏造是非，耸动中央，擅用乌、伊两盟名义，淆惑中央视听，从而产生绥境蒙政会，以致我蒙经营多年之百灵庙蒙政会，归于毁灭，引起蒙民丧失对中央之好感，似此误国殃民之举，令人太息痛恨！

(五) 贵省前于破坏我蒙政会之际，我蒙对贵省并未究明是非，因为命令虽然出自中央，主谋系出贵省，我蒙仍本服从中央之

意志，终于在锡盟盟长公署所在地，成立察境蒙政会，清理百灵庙蒙政会之债务，隐忍退让，毫无不利贵省之行为。而贵省对我蒙反侧愈加压迫，在察哈尔西部一带，百灵庙以南地方，挖掘战壕，修筑炮台，作种种军事上之设施，给锡两、察盟及百庙灵一带无辜蒙民生活上以严重压迫，贵省实欲置全体蒙民于死地而后快。

总之，蒙古愈退让，贵省愈压迫，迫使蒙古已退无可退之地，蒙古民众均希诉诸武力，争取最后生存。本会同仁始终以和平地方为重，只有一线和解之可能，绝不能轻启战端，累及民众，特提出下列要求，希贵省谅察，迅作答复。

(一) 察哈尔右翼四旗，原由察哈尔部管辖，现在该部依中央颁行之蒙古自治原则改盟。为该盟土地之完整及锡、察两盟民众到绥东五县（丰镇、兴和、集宁、凉城、陶林）地方，买卖粮食、煤炭、牛马、皮毛等便利计，即日将察盟右翼四旗，退还察哈尔盟，归本会管辖，以资名符其实。

(二) 百灵庙蒙政会结束工作，尚未完竣，留有职员及保安队数百人。为安定所留员兵和附近居民之人心，免除其生活上压迫起见，请将百灵庙以南一带地方军事设备，经济封锁，即日取消，恢复原来和平状态。

(三) 百灵庙蒙政会保安队原有之步枪、轻机关枪及弹药，均属中央发给。今春贵省煽动该队叛乱时，将武器缴收归绥、武川等处保管，应即如数退还百灵庙蒙政会。

(四) 现在百灵庙蒙政会整理债务之结果，欠员兵俸给及商民债款计达二十万元，是项巨款蒙地无所从出，中央拨给也有困难，贵省年应拨给蒙古之特税二十万元，应速发给。

(五) 今春百灵庙兵变为首各员，蒙政会已发有逮捕令。现在该员等均在贵省任职，证明当时兵变确属贵省唆使，希将各叛徒一律遣反百灵庙，以便处分。贵省袭击麦力更召及惨杀大喇嘛之官兵，均属杀人凶犯，应一律撤职查办，以明法纪。对以上两案前后受害之数百蒙人及其家属，一律发给抚恤金，以慰冤魂。

以上五项系蒙古为了生存至不得已之要求，贵省若反省与承认压迫蒙古之错误应即克期实行。否则蒙古虽弱，亦做最后之抗争。

如演成事变，责任完全应由贵省负担。特此电达。

察境蒙政会委员长德穆楚克栋鲁普、  
副委员长卓特巴札普歌

(十一月五日) “印”

## 傅作义的复电

这个电报发出后，旋即接到傅作义的复电如次：

嘉卜寺察境蒙政委员会德委员长勋鉴：敬电阅悉，自来辩论事理，有强辩夺理者，亦有颠倒是非者，接诵大电，深悉尊处于各案之是非尚未明瞭，兹特分项撮要答复如左，幸详查焉：

(一) 绥特税系代中央征发军费之税收，自治八项原则劈分地方税之规定，该税本在不应劈分之列。北平军分会特示优惠，派员调查，规定五项办法，贵会迄未实行，是贵会不肯按中央规定而劈分，并非绥方不予劈给。至商驼改道，系因贵会拦路苛征，自断商运，具有事实可指。

(二) 西公旗事件，第一阶段由于贵会派兵帮助叛逆曼头，围攻王府，并有来历不明之飞机助战，致该旗横受糜烂，中央命令撤兵，贵会均未置理。第二阶段，本年大喇嘛等返庙，与石王等已订约相安，不知何故，当王道一扰犯绥东之时，该喇嘛忽勾结非本国国籍人，在梅力更召招兵运械，建筑机场，意图与绥东王匪相呼应，大喇嘛于八月八日攻击王府，而石王十三日始行反攻，当战争结束，确有非本国籍人在内。此事谁违中央，谁肇乱源，社会周知，勿烦曲解。

(三) 百灵庙保安队哗变，系在察北改元易帜之后，时间事实，昭昭于社会。该青年等为执事平日所培植，其思想行为度为执事所深晓，中途脱离，当自有故。云等通电对执事在察北行动表示



惋惜，而誓不合作，执事更应自省，不尤他人。

(四) 绥蒙易制，也在察北交乱之际，尔时乌伊官民既畏丧失国土，盼蒙古之密，又不愿与地域不同者共此多事岁月。中央顺俯多数蒙人之情，始行分治，目下旗众相安，边防无恙，与察蒙相较，自有真正得失。

(五) 分治命令既颁，贵会却不遵令迁锡，复在六县易帜改元，组织军政府，接引伪蒙军入察，近又向庙会大批增兵，乃来电云“本会服从中央之素志，以地方和平为重”，且责绥方自卫之不当，似言行不无矛盾。以上就见质数陈其要，至对来电要求及期待于右左者，即执事是否以国家为前提，察北今日成何局面？且察该四旗本多年隶察，相安无事。自张北六县脱离察省管辖，该四旗官民始惶然呈请中央，颁定改隶之令。执事对义既有期勉，义敢不以诚反求于执事，倘执事以国家为重，使察北六县仍归察省管理，恢复旧规，则虽中央明令在前，恐想四旗必仍愿还隶旧制，其他要求自更不成问题。盖今日边土安危，责在执事，而不在义，义服务国家，只知有公，不知有己，同在中央隶属之下，向不存地方与私人之见。执事如摆脱现状，不受利用，幡然有所表现，则往日之罪，义当负之，愿即负荆以请，并立解职，以明心志。否则不但四万万同胞对执事怀疑，即执事左右也难保不作爱国之事。克所馨祝者，宁义谢罪以保执事令名，勿义免过而使执事有负于国。时迫事急，祈执事熟思而力图之，国家幸甚！边防幸甚！

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庚（八日）。

## 如意算盘没有打对

这时蒋介石也来电报指责我，电文内容大意是：“批阅歌电，不胜诧异。台端在电报中所述各节，多属绥境蒙政会之事，应由该会与绥省商洽解决。台端职为察境蒙政会委员长，应管察境蒙政会之事，何必过问绥蒙间之问题。今竟陈兵相见，台端所谓积年倾心

内向者，不知将何以自解？务希以国家前途为重，即日停止军事冲突，听候中央处理。”这时前方军事已接触，意在拿下绥远再说，对蒋、傅来电再未置复。田中隆吉还从伪满航空株式会社调来几架飞机，盘旋空中，侦察助威。

田中隆吉是这次战争的主谋者和指挥者，我和王英是这次战争的仆从和附合者。特别是田中隆吉是以行险侥幸心理对待这次战役的，认为上有飞机盘旋，下有王英部队攻打，后有伪蒙古军督战，这样虚张声势地一威吓，傅作义军队就可以撤退，大则可以垂手而得绥远，乘胜西进，小则也可以扩大战领区域，而壮声威。不意这个如意算盘没有打对，绥省方面既有傅作义的三十五军的兵力，又有国民党晋军的支援，总兵力约有三万余人，而伪蒙古军是新经编成的，训练很差，担任前方作战的王英部队，又属乌合之众，战斗力更差。总计伪蒙古军和王英所率领的“大汉义军”的兵力至多不过一万五千来人。日本帝国主义者仅在伪军部队中配备少数顾问和指导官，并未开来大批日军相助。从数量上看，是众寡悬殊；从质量上看，是优劣分明。因此，由雷中田率领进攻红格尔图的王英部队，围攻数日，未能得逞，迨至绥方援军到后，进行反攻，王英的部队便败退下来，集结在商都休整，李守信立刻派尹宝山率领伪蒙古军部队进驻商都，和傅作义军对抗。

## 百 灵 庙 战 役

这时我得到伪第七师师长穆克登宝的报告，说是傅军孙兰峰旅，正在百灵庙以南集结，等候炮兵部队一到，就可能进攻百灵庙，伪蒙古军第二军的日本顾问烟草谷下令叫死守百灵庙。我接到报告后，认为烟草谷让死守百灵庙，命令不妥。因为新经编成的伪蒙古骑兵，不能死守百灵庙。应乘绥远军不备之际，进行奇袭截击。我很想乘坐飞机前往百灵庙布置，只因有紧急事务待办，未能及时

前往。到了这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晚，孙兰峰旅就进攻百灵庙。蒙政会汽车司机张岱自告奋勇，带着一架机关枪在南山头上配合部队射击，松秀带着伪蒙古军游击队（系迪克丹大喇嘛死后逃来的士兵编成的）在康熙营盘一带山上守护，其他团队亦准备迎击。不意驻在百灵庙的日本特务机关人员首先逃跑，遇见松秀下山领取子弹，误认为有变，竟开枪打死。这时四面枪声顿起，百灵庙遂入混乱状态。伪蒙古军第二军日本顾问烟草谷和第七师师长首先退却，所属官兵也随之溃退。第七师野崎顾问说他是最后撤退的，并说用刀劈了一人，究竟所劈何人，没有说明。第七师官兵退却后，集结在锡拉木伦庙和希拉图庙两地休整，百灵庙遂为傅军占领。

## 石玉山金宪章等反正

田中隆吉为了挽回颓势，又令集结在商都的伪军王英部队，再攻百灵庙。而王英部队的副司令雷中田“自告奋勇”，情愿率队前往，不意这时伪军石玉山、金宪章旅长等，已和傅作义有了联络，待机而动。他们到达锡拉木伦庙时借故未往。雷中田仅率一千多人，再度进犯百灵庙。雷中田虽然“立功”心切，还给我来信，自称“卑职”，以明心迹，但其士兵看到送他们的汽车均已开走，是不管他们的死活，因此都不愿为日本帝国主义卖命，果然一经接触，即行败退，雷中田当被击毙。败退官兵也到锡拉木伦庙集结。这时我不愿意第七师和王英部队混合驻扎一处，除派伪军事署长王宗洛乘坐飞机前往该庙，慰问部队并查清情形联络部署外，特电令穆克登宝，将该师驻在锡拉木伦庙的所部官兵，调到布拉图庙集结，不料指挥王英部队的日本顾问小滨大佐坚不许可。穆克登宝陈说，这是奉“德总司令”的命令，正在指挥部队开拔之际，第七师野崎顾问竟抽出军刀进行威吓说：“驻守此地的部队，都归小滨大佐统一指挥，必须听从小滨大佐的命令，否则就以军刀相见。”

穆克登宝在野崎威吓之下，马上软化了，不敢再力争，只有俯首听命，把我给他的命令抛在脑后。穆克登宝虽然对小滨大佐表示恭顺而服从，小滨大佐对穆克登宝却不信任，当将第七师在山上和要路所布置的岗哨，一律换成王英部队的士兵担任。这时王英部队的旅长石玉山、金宪章等，既感到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后屡吃败仗，前途渺茫，又受傅作义的策动，遂乘步哨更换之际，发动所属官兵暴动起义，将日本顾问小滨大佐等二十余人全部枪决，并袭击驻在该庙的第七师官兵，连长李春林、若格尔札布等和数百士兵，均在出其不意的袭击中阵亡，石玉山、金宪章遂率领部队投归傅作义。穆克登宝却在兵变中，带着大批未发的军饷偷偷地溜走，不但得了活命，还发了一笔横财。他谎报军饷在战乱中丢失，后来用此款买了一辆全新的别克牌汽车。第七师在这次变乱中死亡数百官兵，蒙受很大损失，我和穆克登宝受到察盟蒙民的责难，他们编出歌谣来咒骂我们。这是我勾结日本帝国主义挑起绥东战役所得的结果。

锡拉木伦庙事件发生后，前方战事既然失利，后方军心也多不稳，田中隆吉正拟弃守“德化”，反来欺骗我说：“我们日本军快来了。”我问：“这是真的吗？”田中隆吉说：“真的！真的！日本军快来了。”田中隆吉不但欺骗我，也用欺骗的手法拉拢李守信。有一次，他对李守信说：“你叫李守信，我叫李守义吧，我们是情同骨肉的亲兄弟呀！”这充分说明，田中隆吉为了拉拢人欺骗人，什么卑劣的伎俩都能使出来。我却甘受田中隆吉的欺骗而不觉醒，反认为田中隆吉比别的日本人强，对蒙古甚热心。现在回想起来，真是愚不可及！

## 西安事变后缩编伪蒙古军

正在田中隆吉仓皇失措，对我们欺骗拉拢之际，不意发生了“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实行兵谏抗日。

田中隆吉得到这个消息，喜出望外。在一天黎明的时候，他仅穿裤衩，披着大衣，到伪军事署向王宗洛说：“张学良在西安把蒋介石扣留了，中国从此要发生内乱，对我们作战前途有利”。旋又到了我的住室，报告了这一消息，并征询我对西安事变的意见。我即将吴鹤龄请来共同商量，田中隆吉极力主张给张学良打电报，杀了蒋介石。我和吴鹤龄一致主张说：“现在前方战事失败到这个样子，后方军心也有动摇，与其劝张杀蒋，莫如趁此机会呼吁停战言和，作为缓兵之计。”田中隆吉见我俩不同意他的意见，也就转了话锋说：“这样也好”。于是就由吴鹤龄拟具电报稿，记得内容大意是指责张学良、杨虎城容共抗日，劫持最高领袖，紊乱国家纪纲，因此，特呼吁全国一致声讨，营救“领袖”。并呼吁在“领袖蒙难”之际，停止蒙绥地方之争。“西安事变”解决后，傅军即停止进攻，伪蒙古军也退守原地，双方进入相持状态。

这时日本关东军把田中隆吉调走，派来第二科科长武藤章主持“德化”特务机关，就和我研究整顿部队问题。他主张把伪蒙古军九个师缩编为六个师，每师配备一个山炮连，以便集中兵力，发扬骑炮兵联合作战的效能，并答应每师拨给四门山炮。当时我也认为武藤章的主张有道理，合乎军事原则，而且蒙古军还可能多得几门炮，用以加强部队的编制装备。但我总想扩编伪蒙古军，不愿缩编，感缩编各师之后，人事上不好安排，因而同意每师配备炮兵连，并不同意缩编为六个师。武藤章见我坚不同意，再未强调缩编，也未配给山炮就回去了。关东军另派森岗大佐继任“德化”特务机关长，为时不久，“德化”特务机关长又换成河崎大佐。这时部队中既有金宪章及石玉山等反正，其他部队也有不稳状态。我向人表示：“我们是以蒙古为前提，谁对蒙古有利，就跟谁合作。”这话也许到了河崎耳朵里，因此，河崎在一次会议上讲话说：“蒙古只能和日本合作，不能和别人合作，假如有人认为蒙古既可跟日本合作，也可和别人合作，甚至与苏联亦可合作，那可不行。”从河崎这，

话里句，充分说明日本帝国主义已把蒙古视为禁脔，不容他人置喙，特别注意防止苏联的影响。这是对我们提出的严重警告。实际上我当时认为，苏联是可怕的，象我这样封建王公出身的人，当时是决不会走苏联这条道路的。我感觉河崎有点神经过敏，很想上台讲话驳他，但是我话到嘴边又咽下去。

河崎大佐到任后，对于配发伪蒙古军山炮问题，未曾提及，我也再未追问。为了加强军事指挥机构问题，特在伪蒙古军政府之下，又成立了伪蒙古军总司令部，仍由我任总司令，李守信任付司令，任命乌云廷为参谋长，刘星寒为副参谋长，其下设副官、参谋、军需、军械、军法、军医等六处，副官处长张启祥，参谋处长崔守堃，军需处长崔景岚，军械处长纪树勋，军法处长关荫南，军医处长××。并为了简化层次，便于指挥起见，将伪第一、二两军编制取消，由伪总司令部直接统辖各师，并将部分师长作了调整；因第六师长宝彦图和李明远意见不和，都调任参议，另派乌云飞继任师长；把警卫师改称第九师；第七师因在百灵庙战役和锡拉木伦庙变乱中损失甚大，师长穆克登宝撤职，另行补充训练；对其他各师也进行调整，准备待机而动。

## 七七事变以后一度撤出“德化”

一九三七年七月，芦沟桥事变发生，日本帝国主义集中力量进攻平、津、华北，对蒙古方面还未派来大批日军，绥远方面傅作义军趁此时期却展开进攻。由董其武率领部队进攻商都，商都伪军尹宝山率队迎击，战斗甚为激烈，双方均有伤亡，终因傅军攻城甚急，尹宝山被迫撤退，商都遂为傅作义军占领。尹宝山在撤退途中，井得泉团长又率队反正投归傅作义，这对伪蒙军事方面，又增加了不利影响。这时反正的石玉山率部进攻“德化”，察省主席刘汝明也派部队进驻万全坝上，军事形势顿形紧张。关东军特把田中隆吉

（这时任联队长）从朝鲜调回来，主持军事，急忙采取紧急对策。对刘汝明方面，听说田中隆吉秘密进行联络，允给四门大炮，才缓和了刘汝明派队进攻。但石玉山部队却迫近“德化”，而驻守“德化”的伪蒙古军，仅为包海明率领的第九师少数部队，我当命令王宗洛武装军政府职员，帮助第九师防守“德化”。只因日本特务机关首先焚烧文件，纸灰飞扬，汽车发动隆隆作响，显是作退却准备，因而谣言百出，秩序大乱，无法维持。于是我又下令叫王宗洛带同伪蒙古军政府职员，向察盟镶黄旗撤退。吴鹤龄掌握着伪蒙古生计会汽车，于兰斋掌握着伪交通署的汽车，纷装物品，争先撤退，各机关职员更为动摇，有的领了枪枝争抢汽车撤退，有的顾不上领枪也随着撤退。先于八月十四日晚，向察盟镶黄旗拉白庙撤退，继即撤到多伦。我于大家撤退的翌日上午，曾由包海明陪同视察山上工事，下午我才偕同徐荣侯（时任滂江电报局局长）返回我旗。徐荣侯说：“没有什么动静么，怎么都撤退了呢？还没到最紧急时期，这个也撤退，那个也撤退，成什么样子！”

在大家撤退之后，包海明仍率第九师少数部队防守“德化”，嗣因石玉山部队愈益迫近，已听见枪声，也就率队撤退，“德化”遂为傅作义军占领。这次“德化”撤退是非常仓促的，枪枝既为全部带出，弹药亦未焚毁，重要文件更未焚毁或带出。甚至把苦心孤诣训练多日的军乐队，也未令其撤退。后来傅军进占“德化”时，该乐队却装备整齐，奏军乐欢迎。

我返旗后，听说马占山率领军队进至土木尔台，深恐进攻我旗特派赵文儒前往联络，并让徐荣侯、王石青（专聘教我子侄的汉文教师）主持，在我旗挂上察境蒙政会的牌子，权作应付之计。我这样安排后，即往补英达赖家。途中遇见陶克陶乘坐汽车找我，我遂偕同他一同到补英达赖家中。这时日本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到达多伦，一下飞机就问河崎大佐：“德王现在何处？”河崎一时答复不出，东条对他痛加斥责，并追问失守“德化”的责任。河崎为了

卸责，很可能把失守“德化”之责，推到伪军事署长王宗洛身上。东条旋即派出飞机各处寻我。我乘坐汽车赴多伦，到达哈丹布图庙时，见有飞机盘旋空中，大概就是寻我。但这并不是日本关东军对我特别关心，而是日本帝国主义势力初经伸入西蒙之时，极需我这块招牌，作为他们统治蒙古的工具，一时还不能弃掉。

我到达多伦后，心情是非常恶劣的。认为初和日本“合作”，就遭受惨痛的失败，对日本关东军所谓对蒙古的帮助，有些失望。这时我忽然想起迪力瓦在“德化”和我说过的话：“你如跟日本人合作不来，不如趁早出走，周游世界各国，宣传蒙古问题，把蒙古问题提到国际政治舞台上。依靠世界各国解决蒙古问题，比靠日本一个国家解决蒙古问题好。”我回味迪力瓦这套话，觉得颇有道理，就转和吴鹤龄商量，表示不愿再和日本“合作”下去，想返我旗另作打算，没有把迪力瓦之言告知他。他认为我仍想和蒋介石拉拢，当即劝我说：“你的动机打算，无非是再想和蒋介石拉拢，据我看来，中国是打不了日本的，并且蒋介石并不想认真的打。在百灵庙蒙政会第二次委员会议时，我曾将蒋介石和何应钦对日妥协的意图向你谈过，并且日本人决不会甘心失败，从此善罢干休。现在日军既已占领平津，预料不久就会派兵到蒙古来。与其等到日本打过来，再与日本合作，那就被动了，不如现在主动地和日本合作下去看看局势演变，再定行止。”经过吴鹤龄这样“痛陈利害”，婉言劝说，我遂将返旗想法打消。仍又搜集“蒙古军政府”的旧部，重整旗鼓，借用多伦喇嘛庙恢复办公。

“德化”失守后，傅的部队又向前进攻康保，张北方面也有绥远军孙长胜骑兵旅对峙。田中隆吉面对这一情况，甚为焦急，特用客用飞机一架运兵，一次空运六名日本兵到达张北，计运了十余次，才运到六十多名。刘汝明听说日本军一到，便将布置在万全坝上的部队撤走，绥远军亦再未向前进攻，张北方面战局暂时又入稳定状态。田中隆吉听信河崎之言，认为弃守“德化”是王宗洛的责



任，表示要加以惩治。嗣经王宗洛亲往张北面见田中隆吉，说明弃守“德化”是奉我之命，并非个人擅自主张，田中隆吉始予谅解。

## 在日寇指挥下进占绥远

到了这年十月间，大批日军由多伦正向西开，听说阎锡山因重视山西老家，特把傅作义的三十五军调往雁门关内，原驻绥的傅、阎军队，即开始准备由察北和绥东撤退。伪蒙军便乘机反攻，我在多伦坐镇，用蒙文编成的密电指挥各师前进。先行集中伪蒙古军的炮兵，把在康保一带的绥军打退，继即占领了“德化”和商都，迫近了陶林。当时率队进攻陶林的刘建华（刘系汉人，蒙名阿木尔，当时任炮兵队长）曾向我说：“我们的炮兵打得很准，在进攻陶林时，一炮打中门炳岳（国民党中央骑兵第七师师长）的司令部，门炳岳着慌，即率队撤退，陶林遂为我们占领。”这时李守信率领一部分伪蒙古军进到集宁，我和吴鹤龄、陶克陶亦由多伦率领伪蒙古军政府职员到达张北。据陶克陶向我报告说：据田中隆吉表示，他也掌握了绥军撤退的动态，因为他们的译电员能够译出绥军各部队之间的密电。就是你们德王的蒙文密电译不出来，不知是怎么编的。由此可见，日本关东军不但常听绥军的军事秘密，就是我和蒙古军各师之间的密电也在暗查之列。这充分说明对我仍不放心。后来我为了免除日本方面对我的怀疑，特将蒙文译电本送给了他们，表示坦白。

我到达张北后，将伪蒙古军政府主要人事做了调整，尽量起用少壮人员，任命陶克陶为办公厅主任，陈绍武为内务署署长，张秉智为交通署署长。并由陶克陶率领职员随军前进，做慰问部队和接收工作。我率领数名职员，前往锡盟和百灵庙一带，会同雄诺栋都布等，发动各旗保安队，进行组织“蒙古各盟旗联合军”，计划从草原南下进占绥远。很快与伪第九师包海明会合，逼进武川。李守

信率领的伪蒙古军，也因傅作义移防山西，地方上仅有“国民兵”等少数部队，乘机向西进攻，仅在集宁、丰镇、旗下营等地发生过一些小的战斗，很快就迫近绥远省城，把日本军抛在后边。这时沿平绥路进犯的日本军，除命令李守信向西进外，桑原中佐（驻绥特务机关长）特乘飞机到达百灵庙见我，叫我通知第九师和盟旗联合军缓攻武川，等候日本军从凉城开到，再一致行动。他们的表面理由是，不要孤军深入，以防不虞。实际上是怕伪蒙古军抢先占了绥远城，丢了日本军的面子。因此我只有等候日本军到达，才于是年十月十四日占领绥远省城，十月十七日占领包头。同时武川亦为日蒙军占领，我即发表徐荣候为武川县县长，其他各县由随军工作的政治接收班子临时委派县长。我由百灵庙到达绥远省城时，吴鹤龄、陶克陶、王宗洛、德古来等，已率领伪蒙古军政府职员先期到达，遂和日本方面共同商谈，组织成立了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这时派遣和马占山取联络的赵文儒，也由包头返抵绥远，向我报导说：“马占山表示，决不向苏尼特右旗进兵，并用白缎写了一封信郑重表示此意。随着我军事的进展，马占山率队西撤，我跟他到了包头。由此可见，马占山颇有拉拢我之意。否则，他若当时进兵，占领我的王府是易如反掌的。”

总之，我在这一时期中，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建立伪蒙政权，挑起绥东战役。战事失败后，又在“双十二”西安事变时通电拥蒋，指责张、杨两将军容共抗日。“七七事变”后公开投日，卖国求荣，复在绥远组成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帮助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神圣领土，成为千古罪人。抚今思之，愧恨万分。

## 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始末

### (一) 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的成立与改组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芦沟桥事变，占领平津后，侵华日军就派坂垣师团进攻南口。打开南口后，继续向张家口进兵。日本关东军又派出酒井机械化部队，通过多伦、张北等地进攻张家口。这时，我和李守信也纠合伪蒙古军的主力，先占领了化德，接着即配合日寇向西进犯。在两路日军分进合击及伪蒙古军的配合下，于八月二十九日占领了张家口。先由于品卿、杜运宇等组成“治安维持会”，继而即在日军操纵下，成立伪察南自治政府。这时日本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特来张家口与坂垣征四郎会见，接着又集中两路日军向西进犯，于九月十三日占领大同。先由夏恭、马永魁等组织“治安维持会”，继而即在日军操纵下，成立了伪晋北自治政府。

坂垣师团占领大同后，即南向进攻山西太原，酒井部队则进攻绥远。这时伪蒙古军集中主力在平绥路配合日寇作战，并分出一部分兵力去进攻陶林、武川。伪蒙古军全系骑兵，往往走在日寇前面，作了日本帝国主义军队的前驱。在日、蒙军配合进攻下，十月十四日占领了绥远省城归绥，十月十七日占领了包头。吴鹤龄、陶克陶、吉尔嘎朗（德古来）、特克希卜彦（王宗洛）等，也由张北率领伪蒙古军政府职员到达旧绥远城。

这时，我正在百灵庙组织伪盟旗联合军进占武川，企图为进占归绥卖力。旋接到吴鹤龄和陶克陶等来电，催我赴绥，商洽“建国”

大计等重要问题，并说：“万勿因小而失大”，即派飞机来接。我即以“蒙古各盟旗联合军总司令”名义，委派随从人员徐荣侯为武川伪县长，并发布了安民布告，然后乘飞机到绥。

经与吴鹤龄、陶克陶等商量决定于十月二十八日召开第二次蒙古大会，讨论建立伪政权问题。确定通知参加的人员是：①各市、旗、县，民众代表一名；②各旗札萨克或总管；③各伪市、县长；④经许可之地方代表和团体代表；⑤各盟长、副盟长；⑥伪蒙古军总司令、副司令、参谋长、参谋副长、各师长、各处长；⑦驻外代表；⑧伪蒙古军政府主席、副主席、总裁、主任、部长及各署长。把召集开会通知以伪蒙古军政府名义发出后，一面组织第二次蒙古大会筹备会，由特克希卜彦负责进行筹备。一面我和吴鹤龄、陶克陶、吉尔嘎朗等与日本方面商洽成立伪政权问题。迨至锡、察两盟代表到达后，我们就提出“蒙古独立建国问题”，请日本驻绥特务机关长桑原中佐和伪蒙古军政府顾问部主任顾问部村谷彦治朗，转请日本关东军研究决定。村谷答复说：“蒙古独立建国问题，关系重大，牵涉到国际上《九国公约》问题，需要关东军和日本国内慎重研究，一时不能确定。”我和各盟旗代表们又提出：“‘蒙古建国问题，既经第一次蒙古大会决议，田中隆吉参谋也早有帮助的诺言，这次田中隆吉到达张北，也曾为此问题，向驻大同的东条参谋长请示，据说俟攻占绥远后，就帮助建立‘蒙古自治联盟国’。现在已经攻占绥远省城，而蒙古建国反倒成了问题，我们身为盟旗的代表，还在此地做什么，各自回旗就算了。”村谷急切地答复说：“你们这样说，不是连关东军的话都不听了吗？希望大家耐心等待，不要急于回去。”

当时我认为村谷彦治朗和桑原特务机关长职位不高，对于“蒙古建国”这样大问题，自然不敢提出什么主张，因而我曾和日本驻在归绥的部队长酒井隆商量，希望他居中帮助。我向他说：“蒙古建国是田中隆吉的诺言，为什么现在又不算数呢？”酒井隆答复我

说：“田中隆吉这个人非常冒失，他主持进攻绥东时，我正在天津，曾去信劝他不要这样做，但他不听，一意孤行，结果遭受失败。至于‘蒙古建国问题’，关系重大，非经日本帝国政府研究并经御前会议，不能做出决定。田中隆吉仅是关东军的一个参谋，怎能决定这样大的问题？他当时敢于应承你们，是因为非常需要你们。所以你们要求什么，就答应什么”实际上是不顶事。”嗣后，我又和吴鹤龄等研究，认为“蒙古独立建国”既然一时不能实现，即可以“蒙古军政府”做为政权机构，不再成立新的政权。理由是：蒙古原有领土还未完全恢复，（伊盟尚未沦陷），现在仍是军事时期，所以提出仍以“蒙古军政府”为政权机构比较合适。经和日本方面商量，仍然不同意，授意我们成立与察南、晋北相同的伪政权。

我又与吴鹤龄、陶克陶等商量，应该成立什么样的政权问题。吴鹤龄说：“我们就组织‘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吧，因为我们现有几个盟，是联合各盟实行自治的意思。我总觉得，田中隆吉说的‘蒙古自治联盟’很蹩扭，不如反转过来叫‘蒙古联盟自治’较为通顺。”我同意了吴鹤龄的说法，就责成他拟具“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组织大纲，规定设主席、副主席。下设政务院，管理政务，设蒙古军总司令部，管理军事。拟好后交由桑原和村谷等转请日本关东军研究决定。

嗣即接到日本关东军的电报通知，表示同意，但仅列有主席，没有副主席，并指定我为伪政务院长，李守信为伪蒙古军总司令。吴鹤龄看过之后向我说：“日本关东军这种做法，是居心挑拨。人事安排，本来是我们内部的事情，应由我们自己决定，可是他们却越俎代庖，先为指定了。并且在‘蒙古军政府’时期，你是总司令李守信是副司令，这次日本关东军却指定李守信为总司令，这就使我们很为难，但也不好再变动。假如不照关东军指示行事，必然招致李守信的不满。”接着他又说：“主席一职本应由你担任，但必须云王（云端楚克）表示不就，才为妥当。要不我去面见云王，劝他自动让出主席一职，推崇他为元老，你看怎样？”我当答复说：

“云王年高望重，仍宜推为主席，我当政务院长就行了。”我说这话不仅表示自己的“谦虚”，实际上在当时情况下，仍以云王任伪主席为宜。因这样既便于号召各盟旗王公，又符合日本关东军的意旨，但实权仍归我掌握，云王不过徒拥虚名。对我个人来说，是有利无害的事情。并为了避免内部发生矛盾，也就依照日本关东军的意见，内定李守信为总司令。

这样商定之后，各地代表均已到齐。计锡盟参加者：伪副盟长林沁旺都特、扎萨克松津旺楚克、雄诺敦都布、布达巴拉、巴拉贡苏隆、多不丹等；察盟参加者有：伪盟长卓特巴札普、总管达密林苏龙、色楞那木济勒、诺尔布札那等，乌盟参加者有：伪副盟长巴宝多尔济、沙拉巴多尔济、德瓦根敦、拉希色楞、额尔克道尔吉朗等；土默特旗代表有：亢仁（默尔根巴图尔）、森额等；伪蒙古军政府参加者有：吴鹤龄、补英达赖、陶克陶、特克希卜彦，吉尔嘎朗，乌勒吉图（张秉智）、超克拔都尔（陈绍武）等；伪蒙古军参加者：李守信、乌古廷、刘星寒、刘继广、尹宝山、王振华、宝贵廷、依恒额（伊给先）、萨音巴雅尔（包悦卿）、仓都固仍（包海明）、札音札布（戴选青）、阿尔弼吉呼（张启祥）、崔宇堃、崔景岚、纪树勋、卓里克图（关荫南）等；地方团体代表参加者计有：贺秉温、李春秀、贺云章等；各伪市、县长参加者计有：刘连升，徐荣候、亢锦柔等；蒙古旅平同乡会则有赵那苏图（赵汇川）、李丹山、桑宝（包维翰）组织代表团前来，祝贺第二次蒙古大会的召开并慰问军政人员；外宾参加者有：日本驻绥特务机关长桑原中佐、伪满驻蒙代表玉春、伪察南自治政府最高委员于品卿、伪晋北自治政府代表田汝弼等。遂即召开预备会议，推选我和云王、沙王（沙克都尔札布）、李守信、补英达赖、卓特巴札普、林沁旺都特、巴宝多尔济、吴鹤龄等为主席团主席，特克希卜彦为大会秘书长。

当提出沙王为主席团主席时，卓特巴札普还提出异议说：“沙王没有来，为什么还选他为主席团主席呢？”吴鹤龄当即答复说：

“已经派飞机接去了，很快就会到来。”卓特巴札普也再未说什么。迨飞机返回后，沙王仅派一个什么事也主不了的代表来了，吴鹤龄带着抱怨口气说：“沙王怎么没来呢？这里正等着他。”尽管沙王没有躬亲参加，仍然选他为主席团主席。意在利用他的名义，拉拢伊盟各旗归向伪蒙政权。

主席团虽已选出，大会急待开幕，但伪主席一职还未作最后确定，是否设置副主席一职，也未得到解决。经和桑原中佐及村谷彦治朗商量，他们则以官小职微，不敢决定，允向关东军请示。一直到十月二十八日，开会的那天上午，日本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才乘飞机赶来参加。下机后与欢迎人员略作寒暄。桑原、村谷、吴鹤龄、陶克陶等，即迫不及待地向东条征询关于内定谁为主席及是否设置副主席的意见。东条答复说：“内定云王为主席，德王为副主席就行了吧。”于是酝酿多日颇费踌躇的谁当伪主席、副主席问题，经过东条英机淡淡地一语就解决了。这充分说明，云王的主席和我的副主席是日本关东军一个参谋长加封的，通过大会选举，不过是走走形式而已。

我们把东条英机让至大会堂休息室略事休息后，即举行开幕式，先由我致开幕词，说明召开第二次“蒙古大会”的意义。继由“贵宾”东条英机、于品卿、田汝弼、玉春等致祝词。所有祝词，无非是“日蒙亲善”、“满蒙合作”、“民族协和”、“共存共荣”等语。接着讨论的议题是：通过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组织大纲和成立宣言。经用蒙、日、汉语宣读后，无异议通过了。下午的议事主要日程是，推选主席和副主席。由李守信提议，推选云王为主席，我为副主席。用一刹那征询大家的意见，与会代表默不作声，也就宣布无异议通过了。接着通过对于日本和伪满发出感谢电，并对来宾和文官科长以上、武官团长以上人员授予纪念章。因云王有病未参加，我即当众宣誓就职，大会就告结束。当日在大观园设宴演戏，表示庆祝。兹将大会通过的两个文件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组织大纲》和《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成立宣言》录后：

## 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组织大纲

第一条：蒙古联盟自治政府设主席及副主席，主席及副主席由蒙古大会就蒙古德高望重、有大勋劳于蒙古复兴运动者选任之。主席为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之主权者，主席遇有事故不能执行职务时，由副主席代行之。

第二条：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以蒙古固有之疆土为领域，暂以乌兰察布盟、锡林郭勒盟、察哈尔盟、巴彦塔拉盟、伊克昭盟及“厚和浩特”市及包头市为统治区域。

第三条：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以“防止共产、民族协和”为基本方针，以生、聚、教、兴、养、卫六事为施政纲领。

第四条：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仍旧使用前蒙古军政府之旗章。

第五条：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应用成吉思汗纪元年号，但使用旧历。

第六条：蒙古联盟自治政府设于“厚和浩特”。

第七条：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与地方之权限，依均权之原规，另以法律定之。

第八条：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组织法另定之。

## 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成立宣言

蒙古是有土地、有人民，有组织之民族，有创立元朝伟大光荣之历史。迨至明代，虽然退居朔漠，尚且保持均衡之地位。清初更援兵诸部，兄弟封藩，其固有之土地、人民、主权，毫未损失。及至民国成立，标榜五族共和，我蒙民秉性纯厚，相信待遇平等，竭诚拥护，矢志弗渝。但二十余年来，竟视我蒙为外藩，设置省县，土地瓜分净尽，党政专横，主权侵蚀无余，以致蒙民之生计日趋贫穷，盟旗之权限日趋凋零。生存几至无望，尚何平等之有！因而群



情激愤，不避水火，一致奋起要求高度自治，延续一线仅存之命脉。几经呼吁奔走，获得百灵庙蒙政会之自治。明虽允准，暗实切恨，阳籍扶助之名，阴运摧惨之机，军阀之暴敛如故，疆吏之挑拨日甚，或则大军压境，张出席卷之威，或则经济封锁，迫近灭亡之路，类此荼毒事实，实属罄竹难书。二十余年之竭诚拥护，只得到歧视与压迫，设如依此推移，蒙古将何以生存！且自中国革命以来，军阀割据，内乱频仍，人民涂炭，百业凋蔽。近更外交失策，国事日非，肩畔邻邦，仍复分据疆土，骨肉相残，何暇顾及边疆。我等念祖宗之伟业，为民族之生存，不能垂手待毙，自貽伊戚。因于去春在西乌珠穆沁旗召开蒙古大会，决议成立蒙古军政府并编练蒙古军，外防共产，内安生民，一载以还，规模渐具。今秋中日失和，疆吏乘机谋我，当为防卫计，不得不整军经武，幸赖全体将士之用命，庆得友邦义军之援助，仅及数月，得以收回长城以北之故土，此实天子苏生之良机，言念及此，不胜欢欣。从而奋然兴起，勇往迈进，力图更生，特召集各盟、旗、市、县长官及军民代表，在绥远城举行第二次蒙古大会。经大会决议：本太祖成吉思汗民族融洽、一致合作之精神，即日成立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以蒙古固有疆土为领域，以严防共产、民族协和为基本方针，以生、聚、教、兴、养、卫六事为施政纲领，本互惠互助、共存共荣之精神，敦睦友邦，以期确立东亚和平，实现伟大理想。推选云端旺楚克为主席、德穆楚克栋鲁普为副主席，负责组织成立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特此宣言，以昭大义。凡我全体官兵及将士，希一致拥护，体现我蒙为国家为民族之至情，贡献人类之和平，不仅蒙古之荣幸，抑亦全世界之光辉，天人共鉴，誓志勿渝。

第二次蒙古大会结束后，即派员修葺绥远省政府旧址，作为政府厅舍。但因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组织法未经关东军确定，迁延达一月之久，还未组织起来。我曾去找桑原特务机关长，请他催促关东军速为确定，桑原说：“我已催促了，迄今尚未答复。”并把给关东军的电报给我看，证明他已经催促过。我虽然非常着急，但也只好耐心等候，并嘱桑原再行催促。结果还是等候了多日，日本关东

军才把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组织法核定下来。规定是：政务院长负责制，下设总务、财政、保安三部。与伪政务院平行机构有伪蒙古军总司令部和咨询建议性质的伪参议会。于是我就按照这个组织法着手安排主要人事，除依照日本关东军意旨以主席名义任命李守信为伪蒙古军总司令外，并任命吴鹤龄为伪参议会议长，发表陶克陶为伪总务部长，下设总务、内务、教育、外交各处，总务处长图木勒巴塔尔（刘定一），内务处长李丹山，教育处长陶克托胡（陶布新），外交处长赵那苏图。发表吉尔嘎朗为伪财政部部长，下设会计、税务两处，会计处长乌勒吉图（张秉智），税务处长巴雅尔（吴相文）。发表特克希卜彦为伪保安部部长，下设警务、司法两处，警务处长昌都冷，司法处长卓里克图（关荫南）。专为主席办事的有秘书处，由赛吉尔胡（丁我愚）任处长。并由日本人组成顾问部，最高顾问是金井章二，因在张家口搞“蒙疆联合委员会”，始终未上任，由次席最高顾问宇山兵士负实际责任。总务顾问是中岛万藏，财政顾问是栉部正晖，保安顾问是大园长喜。另外还设有一个伪司法局，任刘永誉为局长。这是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组织概况和主要人事安排。

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四日，云王因病逝世，搞了一个遗嘱如次：

“余幼时即以民族复兴为职志，虽年老体衰，努力民族自强，不敢稍懈。不幸为病魔所缠，竟自不起。我政府副主席以下文武百官切切铭记，协同全体民众，向敦睦邦交，民族复兴迈进，切望完成建国大业，特此遗嘱。”

这个遗嘱原文是蒙文，我特为云王举行奉安典礼，发动各机关团体备花圈、挽幛，前来祭奠。我亲为执紼，并以“吾将何之”四字为挽，率领文武官员公祭。伪满皇帝溥仪特别题赐“世笃忠诚”四字，青年职员们很不满意，认为这仍是以臣属之礼对待“云故主席”。我为了敦睦蒙满邦交，还是主张悬挂起来，表示尊重。

为选举继任伪主席，特于是年七月一日召开第三次“蒙古大

会”，推选我为主席，李守信为副主席，我特发表就职宣言如次：

“本副主席受大会之推选，继任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主席，自知德薄能鲜，深恐不堪胜任，惟有继承太祖成吉思汗之伟大精神，遵奉历次蒙古大会之使命，依据防止共产、协和民族之基本方针与生、聚、教、兴、养、卫六大施政纲领，不辞艰苦，努力以赴。冀望友邦各国及各政府，以互惠互让、共存共荣之精神，赐予指导协助。全体官民将士，须一致团结，同心协力，完成复兴大业，实现东亚和平。海枯石烂，宿志不移，天日在上，其共鉴之。”

我继任伪主席后，深感伪政务院的三部组织较小，认为应当扩大和加强，形成具有国家组织形态。日本帝国主义则为了适应战时体制，搜刮战略物资，加强控制各项工作，认为更有进行机构改革的必要。因此即于是年八月一日实行机构改革，改革的原则和办法是：①废除政务院的总务、财政、保安三部制，实行一厅四部制，即总务厅，民政、财政、保安、畜产四部制。总务厅主管总务、企划、主计、人事、外交等工作，为一切行政机构的中枢，就是采取总务中心主义，以期确立中央集权制度，加强纵的统治和横的联系。②网罗对“蒙古运动有功劳者”及汉族有代表性的人士，组织政务委员会，做为伪主席的咨询机关，以资调整蒙汉关系，沟通各方意见。③废除盟公署的总务、民政、财政、教育四厅制，改设一个官房和民政、畜产、保安三厅制，以明确施政重点，密切政府与盟、盟与盟之间的联络。④将“巴彦县”（即过去归绥县）合并于“厚和”市，并将“厚和”市升格为特别市，以便逐渐发展为国际都市的新兴首都，作为政治、军事、经济的中心。⑤各县配备以纯蒙古人编成的保安队，负确保治安的责任，确定军、警责任的区分。根据以上原则，改革后的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的主要人事阵容如次：我任伪主席兼政务院长；李守信任伪副主席兼伪总司令；秘书处处长仍为赛吉尔胡。伪政务院下的总务厅长为陶克陶，下设五个处，总务处长仍为图木勒巴塔尔，人事处处长乌勒吉图，主计处处长翟

克济胡（霍翰甫），企划处处长金谷勒模（金养浩），外交处处长仍为赵那苏图。伪民政部部长特克希卜彦，下设内务、教育、建设三个处，内务处处长札拉戈穆济（白景畲），教育处处长仍为陶克托胡，建设处处长恩和阿木尔（张绍庭）。伪财政部部长仍为吉尔戈朗，下设两处，理财处处长李丹山，税务处处长仍为巴雅尔。伪保安部部长换了雄诺都布，下设警务、司法两处，警务处处长仍为昌都冷。司法处处长仍为卓里克图。伪畜产部部长郭尔卓尔札布（郭王），下设牧业、畜产两处，牧业处处长哈斯瓦齐尔（肖佩玉），畜产处处长米济道尔吉（黄葆庆）。直属伪政务院的机构还有地政局，没有发表局长，由顾问黑泽隆世代行职务。伪司法局长仍为刘永誉。驻满代表金永昌，因任伪蒙疆联合委员会委员，继任代表为恩和布林（吴恩和）。参议会议长仍为吴鹤龄，派往日本留学。

## （二）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的反动统治与设施

在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时期，为了巩固我的统治权，在内政上、军事上、文教上也有些变革和设施。我总觉得取得盟旗王公的拥护和伪蒙古军的支持，是我的政治资本。因此，特别侧重盟旗行政的加强。至于汉人居多的各县，日本人把持得很紧，我想管也管不了，干脆就任凭日本人摆布。我在盟旗内政上的设施，首先是设置伪巴彦塔拉盟（巴彦塔拉是富饶平原的意思），管辖的区域计有土默特、正红、正黄、厢红、厢蓝五旗及“巴彦”（即归绥县），萨拉齐、清水河、托克托、武川、陶林、丰镇、集宁、兴和、凉城等县，包括旧绥远省政府所统辖的大部地区，是五盟中人口和收入最多的一盟。补英达赖自被解除伪蒙古军政府办公厅主任后，本是满腹牢骚，伪巴彦塔拉盟公署成立后，我任命他为盟长，才心满意足，不发牢骚了。伪巴盟的主任顾问开始时是安宅，后为泽井铁马。盟署下设总务、民政、财政、教育各厅。发表超克拔都尔（陈绍武）为

总务厅长、贺云章为民政厅长、李树声为财政厅长、李春秀为教育厅长。嗣于一九三八年秋实行机构改革，又改设官房和民政、保安、劝业三厅，调任贺云章为官房主任，超克拔都尔为民政厅长，默尔根巴图尔为保安厅长，李树声为劝业厅长，调李春秀为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参议会参议。

对于旗县并存、蒙汉杂居的地方，我曾想采用蒙汉分开的办法来统治。具体就是说：以铁道为界，居住在铁道以南的蒙民，移至铁道以北，居住在铁道以北的汉民，移至铁道以南。经和补英达赖、默尔根巴图尔等商量，他们都不同意我的意见。认为这样办理，是叫蒙汉民众大搬家，牵涉面广，困难甚多，不易办到，甚至还可能引起蒙汉人民的反感。因此我才没有发布命令强制执行。结果还是沿用属人主义的蒙汉分治政策。例如土默特旗和“巴彦”等县所统辖的区域，是蒙汉杂居，其中的蒙民归旗管理汉民归县管理。对于察西四旗和集宁、丰镇等县，也是采取蒙汉分治政策来统治蒙汉人民。至于各县、市伪县、市长，大多数是任用汉人，除了蒙人韩绍祖当过萨县县长外，其他各县均由汉人中的绅士之流充任。如“巴彦县”县长亢锦荣，集宁县县长张书常就是一例。这是为了拉拢汉族上层人物，调整民族关系，起到巩固伪蒙政权的作用。至于各旗总管，当然都是任用蒙人，例如土默特旗总管先是亢仁，后为森额，察西四旗总管都是留用旧人，为的是驾轻就熟，便于统治。

其次是设立伪厚和、包头两市，由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直辖。自占领绥远建立伪蒙政府后，就把归化和绥远这两个名称取消，改为“厚和豪特”，并建立为市，作为伪蒙政府所在地，发表贺秉温为伪市长，是酬劳他在日蒙军占领绥远时出而维持治安的“功劳”，也是想通过他笼络商民，拥护伪蒙政权。奈因他发财心切，仍愿继续做鸦片买卖，把他调任为“土药公司”理事，由李春秀继任伪市长，也是想通过李春秀这个老官僚，拉拢满汉人士，拥护伪蒙政权。嗣因“厚和市”是伪蒙政府所在地，是政治文化的中心，将其升格

为特别市，并把“巴彦县”撤消，将其所属地方归“厚和市”管辖，扩大伪“厚和市”的统治区域。至于包头设市的原因，主要是为适应经济上的需要，不过政治和军事的因素也与设市有关。因为包头是平绥铁路的终点，黄河水运的渡口，为皮毛百货的集散地，而且是军事上的前哨，日蒙军集中驻地，日本帝国主义者为了搜刮战略物资，掌握经济命脉，供应军队所需，更愿加强包头的行政组织。因此，特设包头市，任命刘继广为伪市长。

第三是加强各盟行政机构。盟在清朝时期，本是各旗会盟的地方，不是一级行政组织。在国民党政府时期，蒙藏委员会虽制定过蒙古各盟部旗组织法，也迄未施行。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成立后，除伪察盟公署早已设立确定为行政组织外，对于锡、乌两盟也确定为行政单位，在贝子庙（现锡林浩特）设立伪锡盟公署，我仍兼盟长，任命林沁旺都特为副盟长，中村浅吉为主任顾问，下设总务、民政、保安、畜产各厅。除总务、保安、畜产各厅尽量任用当地人员为厅长外，并派蒙汉兼通的玛哈希力（赵文儒）为民政厅长，管辖区域仍为原来十旗。在百灵庙设立伪乌盟公署，任命巴宝多尔济为盟长，沙拉巴多尔济为副盟长，山本信亲为主任顾问，下亦设总务、民政、保安、畜产各厅。除总务、保安、畜产各厅尽量任用当地人员为厅长外，并派墨尔根巴图尔（宝道新）为民政厅长，管辖区域除原有六旗外，又增加了一个固阳县。至于伊盟地区虽在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组织大纲上规定为统治领域，但未被日寇占领，伪蒙政权的行政力量仅能达到准格尔、达拉特两旗的河东局部地区。在伪蒙联盟政府建立后，国民党伊盟副盟长兼杭锦旗札萨克郡王阿拉坦鄂齐尔（阿王）派员前来和我联络，探询他是否可以来，我答复说：“请阿王自己考虑吧，这时如来我当然欢迎，如果脱身不便，暂时不来也可以，反正迟早是要收复伊盟的。”当时我固然愿意早日占领伊盟，日寇为了向西扩张侵略势力，进犯伊盟更是心切，因此特派伪蒙古军的潘井指导官和团长图门巴雅尔率领一团骑兵，前

往杭锦旗迎接阿王。阿王是做官心切的人，为了急于得到伊盟伪盟长的地位，就于一九三八年春初前来，我当发表他为伊盟副盟长代行盟长职务，黑泽隆世为主任顾问，暂在包头成立伪伊盟公署，下设总务、民政、保安各厅，除总务保安各厅尽量任用当地人为厅长外，特派我的得力干部吉尔格朗（吉致祥）为民政厅长。发表奇子祥为准格尔旗西协理代行札萨克职务，章巴多尔吉（章景文）为达拉特旗的札萨克。日本方面又拉拢了达拉特旗的保商团长森盖林庆，发表其为伪鄂尔多斯挺进军司令，企图通过阿王等人，策动伊盟其他各旗归向伪蒙政权。

第四，在内政设施上，我到达绥远城建立伪蒙政府后，曾经幻想，日方既然表示“帮助”蒙古，必然帮助发展经济和文化事业，因此很想把绥远旧毛织厂接收过来，预备叫贺云章为经理，把原有工科学校等文化教育机构也恢复起来，用以收拢人心，巩固统治。不意占领绥远不久，日本军就把旧绥远毛织厂拨归“满铁”会社经营，并将旧工科学校的机器也都拆卸给了毛织厂，把旧绥远省立第一幼稚园做了日本军御用的“厚和”旅馆。我曾提出交涉，日本方面总是支吾其辞，不作明确答复。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业日本，农业中国”的侵略政策，具体到内蒙古，更是要把内蒙古作为供应原料，销纳商品的殖民地。因而绝不允许恢复工科学校，培养工业人材。至于产业、金融、交通事业，都归“蒙疆联合委员会”直接掌握，分别交由日本企业机构经营。例如平绥铁路就由满铁会社管理，蒙疆银行、邮电事业、矿产开发、畜产收购等，都由日本资本家投资直接经营。

在文化教育上，我是侧重蒙人教育，为了培养急需“人材”，特就大台什村旧有的农科学校原址，设立“蒙古学院”，任命郭尔卓尔扎布为院长，郭调任畜产部长后，由金永昌继任院长，由那苏图（王庆三）任教导主任，吾勒吉卜林任事务主任。在专业设置上计有旗务、师资、师范、电报、补习各班，我特亲笔书写“勤敬忠

诚”四字为院训，有时还到该院亲临“训话”，希望在院的青年学生们，对我有深刻的印象，毕业后供我驱使。并在市内大会堂后边设立“蒙古文化馆”，任命伊德钦为馆长，吸收地方绅士郭象仪等为馆员，分设总务研究、图书、印刷各组，进行编纂小学教科书、课外读物、发行文化专刊等工作。我为了训练王公子弟，又特设一个蒙族学校，由民政部长特克希卜彦兼校长，调任超克曼度夫（汪文林）为教导主任。由保安部筹设中央警察学校一所，任萨彦毕勒格图（陈靖寰）为主事，训练警官和警务人员。为了培养通晓日文的各项“人材”，选送蒙古留日生十名，下令锡、乌两盟各设蒙古青年学校一所，责令各旗一律设立小学一所，卫生所一处，一律设置无线电台，加强通讯联络。

第五，在军事上，我也知道充实武装力量，是加强统治的主要工具。因此，对于各旗保安队发给新枪，充实装备，并派伪蒙古军官学校毕业的学员充任教官，从事训练工作，居中掌握官兵，希望对我能起拥护的作用。对于伪蒙古军方面，我虽然放弃了总司令，改由李守信继任，但我认为伪蒙古军还是我的政治资本，故不惜增加蒙民负担，为之征兵买马，总是力图扩充，不愿缩小编制。记得在“蒙古联蒙自治政府”末期，日本方面主张将蒙古军各师一律蒙古化，把蒙古军由汉人编成的第一、二、三师改编为驻在各县的警察队，我很不以为然，认为第一、二、三师虽然多数是由汉人编成的，各师军官均与李守信有密切的关系，但在绥东战役和占领绥远各县的行动上，曾出过很大的力气，多数都效忠于我，其中背叛我的毕竟是少数，所以我提出反对。但因日方持之甚坚，争执无效，也就只好如此。日方把第一、二、三师改编为靖安警备队，设两个集团，第一集团长为郭光举，第二集团长为门树槐，集团之下设大队、中队和分队。这个警备队，完全部署在后方汉民居多的各县，用以镇压汉族人民，而把由蒙古人编成的第四、五、六、七、八、九各师，则改称为某某部队，多部署在包头、百灵庙及锡、乌两盟的



边境地带，配合日军防止国民党的反攻，并切断共产党的国际联系。

一九三八年春，傅作义率部突然打到一间房一带，距离“厚和市”很近。这时驻在凉城的伪蒙古军第三师团长慕兴亚背判我归降傅作义，以致谣言纷起，人心恐慌。我为安定社会秩序，收买人心起见，亲在小教场召开的民众大会上讲话，强调在此春夏之交，农作物正在生长时期，傅作义军竟不惜踏毁庄稼，遭害青苗，突来进行扰乱。我是想用这样挑拨性的言辞，引起当地人民对傅作义的反感，转而拥护伪蒙政权。我正在兴高采烈地讲话时，忽然刮起一阵大风，把飘扬在讲台前的蒙古旗撕成两半，我当时迷信地认为这是不祥之兆象征蒙古政权要垮台。幸而为时不久，傅作义军就撤退了，这才又转危为安。

第六，对于汉民居多的各县，日本人虽然抓得很紧，不叫我管，但是对于能够买好人心的事情，还是想过问。例如日本人在各县城镇地方设立的赌博性质的俱乐部，为地方公正人士所反对，因此，我曾下令取缔俱乐部。但是各县日本顾问总是不理会，当然我的命令也不发生作用，不过我却因此博得了一些人的奉承。在一九三八年夏天的时候，久旱不雨，我特到“厚和浩特”舍力图召焚香祈雨，表示关心民瘼，用以收买人心。

### （三）旧阴谋，新花样

#### ——我向日本要权未遂

在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时期内，我向日本要权，也有过几次“冲突”，原因是我虽说当了傀儡，还想掌握伪蒙政府的军政大权，实现我统治蒙古的野心。日本方面自然是把我这个傀儡当做他们侵略蒙古的招牌，要我俯首贴耳地听从他们的指挥。因此，我便和驻在蒙古的日本军部和当权的日本政客发生过几次“冲突”。首先是在

占领绥远城、武川、陶林等地问题上，引起日本军部的不满。占领绥远城、武川、陶林等地，固然是日本军起了主要作用，但配合日本军作战的我的伪蒙古军，因全系骑兵，行动迅速，往往走在日本军机械化部队的前面，假如不是日本军部阻止前进，等候日本部队，很可能先行到达。例如我在百灵庙组织“各盟旗联合军”攻打武川，和当地守军井得泉（原系伪蒙古军的团长，在七七事变后投归傅作义军）部队接触时，由伪蒙古军官学校毕业生道毅德尼玛等率队冲锋，当时被击毙，因而后退。我又命令伪蒙古军第九师从陶林进兵，准备再次攻打武川。迨至仓都固仍（包海明）率队到达后，听说井得泉已准备撤退，武川业已垂手可得。我计划拿下武川，即进攻绥远。不意这时桑原特务机关长特乘机到达百灵庙，让驻在百灵庙的军事顾问山内转告我说：“现在占领凉城的日本军，正向绥远开拔，俟日本军到达后，再行攻打绥远，较为稳妥。务要阻止第九师前进，以免孤军深入，而冒危险”。并且说“蒙古军已经作战很累，应当休息。”桑原这些话，虽然说得很好听，似对伪蒙古军关心，不叫受到损失，实际上这时绥远各地，傅作义的三十五军业已调往山西，其它正规部队，多已撤离绥远，仅留国民兵等地方团队维持局面，这种情况当为日本军部所侦知。因为绥远城很易拿下，因此日本方面计划叫日本军率先入城，不愿叫伪蒙古军先行到达，所以特来阻止伪蒙古军进攻。当李守信率领伪蒙古军主力到达平地泉，第八师师长札青札布和第九师师长仓都仍率领伪蒙古军到达陶林时，日本军部也是严令停止前进，让等候日本军到达再行进攻。根据以上情况，我和包海明等，曾向人夸说伪蒙古军的“勇敢”，在占领绥远城、武川、陶林等地立功很大。不意这话竟引起日本军部政治参谋大桥雄熊的不满，说我有意图抹杀日本“皇军”的“战绩”。记得在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成立后，日本外务省官员大桥忠一到北平，嗾使吴佩孚出山，后便窜到“厚和市”视察情况，前来见我时说：“我这次到北平，是专为做吴佩孚的工作，便中前来看看

你这老朋友。”我问他：“你工作的怎样！”他答说：不行！吴佩孚比你还硬，要的条件太高，如果他要出来主持华北局面，要求日本军全部撤退。这个条件怎能接受。”接着他又向我买好说：“我在军部听说，你在占领绥远城等地时，称赞蒙古军的‘功劳’，军部却认为你有意抹杀‘皇军’的‘战绩’，对你很不满意。我以老朋友的资格劝你，不要和军部起摩擦，因为你和军部摩擦，是对你不利的。你如对军部不满意时，可到日本国内呆一个时期。”由此可见，我指挥伪蒙古军进攻陶林、武川、绥远城等地，固然为了实现我的政治野心，其实本来是为日本帝国主义卖力气，做日本帝国主义西犯的马前卒，不想因为夸说伪蒙古军的“功劳”，竟惹起日本军部的不满和猜忌。这充分说明日本帝国主义的蛮横。同时也说明，充当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伪蒙政府主席，只有看日本军部的颜色行事才行。

其他几次“冲实”是：

一、当日、蒙军联合西犯时，由伪察盟安宅顾问组织政治接收班，随军前进，委派伪县长，恢复地方秩序，出安民布告等。例如集宁、丰镇、归绥、包头等伪县、市长，都是由安宅率领的政治接收班临时委派的。伪蒙古军政府虽然也组织两个随军工作班，一个是由陶克陶等率领的一部分职员，由张北出发到达张家口，沿着平绥路随军前进，做“宣抚”工作。一个是由郭尔卓尔札布率领的一部分职员，由张北出发，经化德、苏尼特右旗、锡拉木伦庙等地到百灵庙，接收武川，做“宣抚”工作。不想我以伪蒙古各盟旗联合军总司令名义，发表徐荣侯为武川伪县长，却引起安宅顾问的不满。他说这是他所率领的政治接收班的职权，我委派县长不应当。好在生米已经做成熟饭，没有把徐荣侯更换。

二、在伪蒙古联盟政府成立后，日本宪兵队竟把设在“政府”后院的直属电台的报务员葛孟库、陈寿山二人逮捕。我听后很恼火，认为既未取得我的同意，又未说明原因，竟将“政府”直属电台报务

员逮捕,是对我的藐视,是侵犯“政府”职权。我当时就把总务顾问中岛万藏和最高顾问的秘书和佐良之助请来,叫他们立刻去和日本宪兵队江草队长交涉,把葛、陈二人放回。中岛与和佐应付我说:“现在时间已晚,城门业已上锁,恐怕叫不开城门。”我驳他们说:“你们别瞎说了,你们还叫不开城门?显见这是托辞,你们如果不愿去,我就亲身去办交涉。你们如去,我就在办公室这里等着,等把葛、陈二人放回,我才离开这里去休息。”中岛与和佐二人见我持之甚坚,又怕我亲身出马去交涉,惹出更大的麻烦,于是他们二人就答应着去了。两个小时工夫,就把葛、陈二人用汽车送回来,中岛与和佐也座汽车回来向我复命。我没再问是怎么交涉放回的,为什么把葛、陈二人逮捕,反正放出来就算完事。

三、有一次,因为预算问题和宇山兵士发生了“冲突”。在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时期,日本人一律是顾问和辅佐官,不充任正式官吏。我还妄想不叫日本人掌握实权,特别不叫掌握人事权和财政权。人事处长乌勒吉图曾和我说:“人事顾问(忘其名)要求看公文,并说他是人事顾问,连关于人事的公文都看着,什么事情也不知道,最高顾问要问他,他如何答复呢?”我说:“还是不叫他看好,他看了就要盖章,无形中便成为制度了,不能开此先例。”我对人事权虽然抓得很紧,但自宇山兵士来任最高顾问后,在一个时期内,虽对人事不加过问,却极力抓财政权。日本顾问部先作出了预算指标,强令各部接受,民政部经费要得多,而预算指标列的少,民政部长特克希卜彦极力争要,我也坚持非多给不可。宇山兵士却斥责民政顾问岸川兼辅无能,不能掌握民政部事务,责成他非接着预算指标通过不可,因此闹成僵局。我听到后也很生气,就把宇山兵士请到我的办公室里进行谈判,我质问他:“蒙古联盟政府的事情,是你当家还是我当家?要是我当家,我就有最后决定权;要是你当家,我就回旗去。”宇山兵士说:“你是主席兼政务院长,我是你的顾问,当然是你当家。”我又说:“那么,为什么

我主张列入的教育经费就不算数呢？”宇山兵士说：“这件事好办，容我和有关顾问们商量商量。”结果重新列入蒙人教育复兴费十万元，我也再未说什么，这场争执就这样作了结束。从此宇山兵士改变了做法，对我极力敷衍，并要深入各盟视察，表示愿意辅佐我好好地干一场。我也给各盟打电报，说宇山兵士是很好的顾问，叫各盟旗准备欢迎他。有一次，我和他及其他顾问在蒙古会馆聚餐，我表示不同意“蒙疆联合委员会”的成立和该会的做法。宇山兵士说：“‘蒙疆联合委员会’的做法我们可以不管它，不是还有联盟政府吗？我们只要把联盟政府的事情做好就行了。”并表示把旧绥远省立第一幼稚园做了日军御用的“厚和旅馆”，把旧绥远省立工科学校的机器拆走做了兵营等等做法是不妥当的，说这对于收揽人心有影响。不意宇山兵士说过这些话之后，没几天就被调走，由畜产部顾问泉名英（系日本退役少将）升任最高顾问。据我推测，宇山被调走的原因，是他对我有迁就的倾向，这就不符合日本军部的高压政策；他表示不应把学校做有兵营或旅馆，显系对日本军部的批评。这些事被日本军部知道了当然对他不满意，所以很快地就把他调走了。

四、在扣捕色林保问题上，我和日本特务机关发生了“冲突”，色林保原系西公旗的协理兼保商团长，在百灵庙蒙政会时期，因为西公旗争夺札萨克职位问题，他和石拉布多尔济（石王）结成一党，以绥远当局为靠山，与蒙政会对立。迨至日蒙军占领绥远，建立伪蒙政权后，色林保又投靠日本特务机关，对我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日本特务机关则因他在西公旗掌握一部分武力，可供利用，对他极力拉拢袒护。色林保每到“厚和”就住在特务机关，简直把我不放在眼里，使我甚为恼火。为此我就命令司法处长卓里克图，到日本特务机关去要色林保，想加以制裁。卓好克图前去交涉，不想特务机关的工作人员岩崎竟为色林保保镖，抗不交出。嗣又经中岛万藏出面，向特务机关说明色林保在西公旗事件中的情况，特务

机关方面才了解色林保过去与蒙政会搞过对立，并考虑到：为了袒护一个色林保，惹起我这个“主席”的不满，很不适当，于是卓里克图又去交涉时，便提出条件说：“可以将色林保交由政府处理，但要顾全特务机关的面子，不要到特务机关扣捕，要在别的地方设法诱捕。”有一天，色林保为了拉拢日蒙军政人员，企图展开政治活动，在凤林阁饭庄请客，中岛万藏和卓里克图均在被邀之列，卓里克图得到这个机会，便预先布置下军警，待到宴会开始后，把岩崎悄悄请出来，说明要进行扣逮色林保的布置，要求岩崎最好把色林保交由“政府”处理，否则就指挥军警进行扣逮。岩崎初则不肯，只管摇头，但最后还是接受了卓里克图的要求，亲乘汽车把色林保送来，我即交由卓由克图送到监狱，管押约近二个月。然后由我旗（西苏尼特旗）派来保安人员，将色林保带至我旗监管，后因病身死在我旗。

#### （四）从伪蒙疆联合委员会到

#### 伪联合自治政府

我和日本方面最大的“冲突”是关于“蒙疆联合委员会”的设立问题。在蒙古（即伪蒙古联盟政府）、察南、晋北三个伪政权相继成立后，行政上虽不相隶属，但都在平绥铁路线上，交通、金融、产业都有密切的关联。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加强控制这三个伪政权，掌握经济命脉，搜刮战略物资，就在日本军部操纵下，成立伪“蒙疆联合委员会”，特由伪满调来金井章二主持筹备成立事宜。并通知三个伪政权，各派代表缔结协定。由“察南自治政府”派出代表于品卿、杜运宇二人，由“晋北自治政府”派出代表夏恭、马永魁二人，“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的代表，日本方面内定为卓特巴札普、陶克陶、金永昌等三人。

这次在日本军部和金井章二的指使下，通过三个伪“自治政府”代表协商的形式，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缔结伪协定如次：

- 一、本会称蒙疆联合委员会，处理关于各政权有关联的产业、金融、交通及其它重大事项。
- 二、联合委员会设总务委员会及产业、金融、交通各专门委员会，与必要之职员构成之。
- 三、总务委员长总理并代表联合委员会。
- 四、联合委员会置日本顾问一名，参议及顾问若干名。
- 五、联合委员会之决议，须经关系委员、最高顾问及关系顾问之同意，始为有效。
- 六、联合委员会发布有关指导统制命令，须以联合委员会名义行之。各政权为了援助易于执行，得分担义务。
- 七、联合委员会得管理各政权委托之公有财产。
- 八、非经各政权之同意，委员不得脱会。
- 九、本协定用日文、蒙文、汉文作条文，如有疑义，依据日文解释之。

缔结协定后，即正式成立伪蒙疆联合委员会，由日本军部派金井章二为最高顾问并代理总务委员长职务。任命村谷彦治郎为参议，卓特巴札普、陶克陶、金永昌、杜运宇、马永魁等为委员，分管总务、产业、金融、交通等事项。

到了一九三八年八月一日，在金井章二的操纵下，通过“伪蒙疆联合委员会”的会议形式，决定实行机构改革，把几个专门委员会改为总务、产业、财政、保安、民生、交通六部。由卓特巴札普任总务部长，派野田武为总务顾问；由金永昌任产业部长，派高津彦次、森田清为产业顾问；由马永魁任财政部长，派寺崎英雄、久间猛为财政顾问；由陶克陶任保安部长，派伊藤祐为保安顾问；由杜运宇任交通部长兼民生部长，派满尾君祐、赤板亮一分任交通和民生顾问。进一步强化和扩大了“蒙疆联合委员会”的组织与职权。其强化的程度，是由协商性质的结构，变成行政组织；其扩大

组织的范围，是由代管产业、金融、交通、扩大到管理民政和保安，形成了蒙古、察南、晋北三个伪政权的太上机关，公然发号施令。

我对伪“蒙疆联合委员会”的成立，起初是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委员派谁就派谁，来了通知或指示，合乎我心意的就执行，不合乎我心意的就放在一边。记得陶克陶担任“蒙疆联合委员会”委员后，返回“蒙疆联盟自治政府”和我们几个人闲谈时，竟洋洋得意地说：“我是蒙疆联合委员会委员，是管你们的。”我都毫未介意，还认为他不敢藐视我，因为他虽是伪“蒙疆联合委员会”委员，但在伪蒙古联合政府中，他是总务厅长，我是主席兼政务院长，仍是管他的。他说这话不过是对在坐的其他人员表示得意而已。总之，我对“蒙疆联合委员会”的态度，不敢积极反对，只有消极抵抗。

一九三八年秋，日本军部决定，令金井章二陪我和于品卿、夏恭、李守信等访日，日程业已作了安排。我这时正在锡盟巡视，没有按照他们规定的时间到达张家口，日本军部的政治参谋大桥雄熊很着急，就责陶克陶催我火速前来。陶克陶竟发牢骚说：“在这紧急的时候，德王却回到锡盟巡视不来，把他杀了算啦。”（这话是李守信告诉我的）这说明陶克陶已经不为我用，完全站在日本军部方面去了。

我到了张家口便起程，经北京、山海关、奉天（即辽宁）、朝鲜等地，渡海到达日本下关车站。我对日本国内欢迎人员致辞时，总是说“蒙古”，不说“蒙疆”。我讲完话后，我的随身翻译吉尔嘎朗译成日语。金井章二在旁边，马上向新闻记者和欢迎人员解释说，方才德王所说的“蒙古”就是“蒙疆”，使我很感不快。日本内阁总理大臣近卫文磨招待我等一行宴会，宴前我和近卫周旋闲谈说：“现在蒙古民众都不愿意‘蒙疆’这个名称，仍愿意用蒙古代表新的政权。”正在说这话时，招待人员给近卫送来“挨拶子辞”



（系应酬致辞之意），近卫看过之后，见上面所有“蒙古”二字都换成了“蒙疆”，因我方才说过反对“蒙疆”之言，近卫似有觉察地踌躇了一下。但近卫致辞，仍是把原稿宣读一遍，可能金井章二又预先做了工作。

这时坂垣征四郎任日本内阁陆军省大臣，东条英机任陆军省次官。当他们约定和我见面时，虽然都是旧相识，因为金井在座，只说些应酬之言，未谈重要问题。见面后，坂垣的亲信人员（忘其名）和正在日本留学的吴鹤龄说：德王和坂垣大臣过去就曾相识，为什么见面时没说心里话，未谈重要问题呢？其中不无原因。”吴鹤龄答复说：“会见时因有他人座（指金井章二）不便谈吧。”这个日本人顿然领悟说：“啊！原来如此！那么，我向坂垣大臣说，再约德王单独见面。”吴鹤龄将此情况具以告我，于是我就和吴鹤龄商讨扩大蒙古政权和实现蒙古建国问题，当经提出两个方案：第一案，以“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为基础，向外长城纯蒙旗地带发展，放弃内长城以南汉人居多的察南、晋北地区，进一步扩大蒙古政权，逐步实现蒙古建国。第二案，以“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为基础，吸收察南、晋北两个“自治政府”，进一步扩大伪蒙政权，逐步实现蒙古建国。起初我是主张第一案，吴鹤龄极力主张第二案。并强调说：“察南、晋北过去都是蒙古地方，为什么不要呢？我们蒙古现在没有力量，如果有力量的话，连北京、河北都想要呢！”接着他又告诉我说：“我来到东京后，为了实现蒙古建国，曾和日本朝野有名人士作过多方面的接触和联系，曾向他建议，对中国实行‘分块统治’的政策。象‘北京临时政府’、‘南京维新政府’这样的政权，无妨多来几个。有的日本人非常赞成我的说法。”当时我感觉到，吴鹤龄的野心比我还大。但又意识到，吴鹤龄向来主张“拣到筐里就是菜”，他是特别注意现实利益的人。他所说“连河北、北京都想要”之言，不过是强调不要放弃察南、晋北的陪衬语而已。经吴鹤龄反复陈述理由，我也觉得目前吸

收察南、晋北，扩大伪蒙古政权，比较接近实际，易于实现，也就再未说什么。吴鹤龄便将第二案定为甲案，第一案定为乙案。当坂垣再次约我见面时，即将这两个方案亲手交给坂垣，并说明这两个方案的内容。坂垣答复说：“俟经详密研究，再行答复。”过了几日，坂垣又在陆军大臣官邸召集我们，答复关于蒙古建国问题，他说：“关于蒙古独立建国问题，时机还不成熟，条件尚不具备，俟将外蒙‘收复’，实现内外蒙的统一，才能帮助蒙古独立建国，这是我们大日本帝国对蒙古的国策，希望大家相信。”这话虽然是坂垣支语其词，用以安慰我妄想蒙古建国和实现大蒙古主义的迷梦，但也暴露出日本帝国主义无止境的侵略野心。等我访日返蒙后，曾接到吴鹤龄的来信，说是坂垣同意甲案，并由陆军省通知住在张家口的日本军部实行。

金井章二见我到处仍是只说“蒙古”，不提“蒙疆”，当然非常不满。他认为“蒙疆”这个名称，是日本军部和他金井章二主张应用的，非在日本国内展开宣传使人周知不可。当我访日行将结束，东京放送局约我向日本全国广播时，金井章二认为这是强制我把“蒙古”改说成“蒙疆”的好机会。他虽未对我直接警告，却派人向吉尔嘎郎恫吓说：“德王在日本，不许再说‘蒙古’，不许在说‘建国’。他如果再这样说，你也不许给他译成日语，要把‘蒙古’二字一律改称‘蒙疆’。如果你不这样办，要小心你的脑袋！”这时正在东京留学的朝克巴达尔夫（陈国藩）前来看我，听到金井所派人员恫吓吉尔嘎郎之言，也很气忿地说：“日本人真厉害，连‘蒙古’二字都不叫说，还能谈到其它吗！”但我在广播中还是只说“蒙古”，不提“蒙疆”。我在访日期间，也曾见过日本天皇，我说的是感谢日本的援助，他说的是希望协力维护东亚和平事业。都是应酬之语，没有谈到实际问题。

我访日回蒙途中，想到金井章二在日本东京控制我只许说“蒙疆”，不许说“蒙古”，不许说“建国”的种种说法，有很大的反

感，越想越不是滋味。我总觉得，“蒙古”与“蒙疆”二字，不是微不足到的字义问题，而是有重大意义的政治和民族问题。因为“蒙古”二字不仅代表民族，并代表土地、人民。而且一提起“蒙古”二字，世界上是无人不知的。这是历史上早就确定的名称。如果改称“蒙疆”，就意味着仍是中国的边疆，不是独立的蒙古政权，是隶属中国的地方政权。在向国民党中央政府要求自治时期，把我“复兴蒙古民族”、“实现蒙古自治”，做为号召蒙人参加的两块金字招牌。迨至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后，又把“复兴蒙古民族”，“实现蒙古建国”，做为号召蒙人参加的两个幌子。用这“蒙古”二字，笼络不少的青年为我所用，可以说是我的“得意杰作”，是我在政治舞台上有用的幌子。而在访日时期，却连“蒙古”二字都不能说了，今后将何以号召蒙人，言念及此，不胜烦恼。

我等一行回到张家口后，适逢举行“蒙疆联合委员会”成立周年纪念典礼，约我前往参加。我开始托故不去，金井章二很着急，因为这时日本北支（华北）派遣军的参谋长（忘其名）、伪满代表等很多来宾都来参加祝贺，我如不参加，显见其中有了裂痕，对日本方面所宣传的“日蒙亲善、密切合作”是个讽刺。金井特又连次派人前来劝我参加，我在大家一再相劝之下，才勉强地迟迟前往参加。我到典礼会场时，所有参加人员和来宾均已先行在座等候，我到后才开始举行典礼。我并没有讲话。

我由张家口回到“厚和豪特”后，前来参加“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成立周年纪念典礼的各盟盟长各旗札萨克、总管等，因为等我回来听取访日的情形，尚未返任。我就召集他们开会，提出反对“蒙疆联合委员会”问题，大家均表同意，并经决定由各盟旗送来盖有印鉴的公文六份，备我使用。各盟旗首脑返回后，即陆续送来，就是尚未归属伪蒙政权的伊盟各旗，也由阿王设法弄到盖有印鉴的空白公文。唯有察盟盟长明安旗总管卓特巴札普送来的印文，没有署他自己的名字，仅有总管代理人署名。听说他向人表示说：

“我们反对‘蒙疆联合委员会’反不动嘛！何苦来此一举。”我收到各盟旗送来的印文之后，就责成民政部长特克希卜彦起草反对“蒙疆联合委员会”的公文，提出的理由是：张作霖曾当过“蒙疆经略使”，对东部盟旗横加压迫，强制开垦，引起蒙人对“蒙疆”二字的极大反感。现在仍沿用“蒙疆”二字，作为代表新政权的名称，是对蒙古民族的莫大侮辱。这个公文拟就后，又译成蒙、日两种文字，并把蒙文的一份，写在盖有各盟旗印鉴的公文纸上，作为主件，把日文的一份作为附件，总共制成六份。我计划寄给日本内阁首相，外相、陆相、参谋本部、驻在张家口的日本军部各一份，自留一份。即将付邮时，旋又考虑到直接向日本国内首相等寄送，不大妥当，结果仅寄给在日本留学的吴鹤龄一份，嘱他相机办理。适在此时，日本特务机关派人向陶克陶的秘书张锦堂密探此事，并表示愿出重资购买该项公文稿件。陶克陶忙来和我说：“你联合各盟旗反对‘蒙疆联合委员会’之事，日本方面已经知道了，曾向张锦堂询问并要出资购买公文稿件，怎么办呢？”我答复说：“这有什么可怕的！我正要把这反对的公文送给日本军部，他们既要出资购买稿件，告诉张锦堂可以卖给他们，赚他们一笔钱。”张锦堂得到我的许可后，就将公文底稿抄了一份交出去，听说仅给报酬五十元。由此可见，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掌握我们内部情况，什么卑劣的手段都能使出来。

待我将反对“蒙疆联合委员会”的公文送交日本军部后，为时不久，日本军部便通知我到张家口去商量事情。我到张家口后，大桥雄熊前来看我，我便谈到不同意用“蒙疆”二字作为机关名称问题，并反对设立“蒙疆联合委员会”的措施。大桥雄熊说：“现在预定请你当总务委员长，所有一切事情，你都交给我们吧。”翌日，莲沼兵团司令官又约我相见说：“关于‘蒙疆’问题，我们可以商量解决，你何必发动各盟旗联合反对呢？”我把反对“蒙疆”公文的内容，又向他作了说明，并强调这是各盟旗的意见，不是我

个人的意见。最后，莲沼也表示请我当总务委员长。我和莲沼会谈后，大桥雄熊又约我到另一会客室里，向我解释：“‘蒙疆’二字，有今昔之不同。张作霖任蒙疆经略使时期，应用‘蒙疆’二字，是意味着压迫你们，今日用‘蒙疆’二字，是意味着日本帮助你们建立新的政权。”我仍是坚持我的意见，表示不同意他的说法，结果是不欢而散。

我和莲沼、大桥会谈后，经反复考虑，认为日本军部是想用让我当总务委员长的方法，封住我的口，不再反对“蒙疆”。我为了不在各盟旗中留下只顾个人升官的口实，于是又调动人马，通知各盟选派代表，到张家口日本军部面见莲沼兵团司令官、田中信一参谋，反对沿用“蒙疆”二字作为代表伪蒙古政权的名称，并说明我不就总务委员长的理由，嘱陶克陶作他们的翻译，务要把盟旗代表的意见表达出来。谁想陶克陶自任“蒙疆联合委员”委员后，早已倒向日本军部方面。并因大桥雄熊政治参谋的态度蛮横，说话强硬，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代表人物，陶克陶只有顺从其意，不敢作丝毫的折冲，不但对于盟旗代表们所说的话，没有完全翻译出来，还有可能从中捣鬼。金井章二也对“蒙疆”二字任意曲解，说：“蒙疆是蒙古之疆域”意思，既能包括察南、晋北，代表新的政权，又能起到‘协和民族’的作用，并且“蒙疆”二字早已成了常用的习惯语，你们蒙古还是蒙古，不会因为沿用“蒙疆”二字，而把蒙古取消了”因而各盟旗代表林泌旺都特等，到张家口进行反对“蒙疆”问题的活动，没有达到我所预期的目的。

我虽因为策动各盟旗反对“蒙疆”，招致日本军部的不满，但这时他们还须利用我这块招牌，统治蒙古地区，因而又授意陶克陶劝我就任总务委员长。陶克陶深恐自己劝不动，特把李守信搬出来，一同前来劝我说：“现在金井已表示愿意辞去代理总务委员长一职，请你前往就任，如果仍然表示不就，恐怕影响不大好。胳膊还能扭过大腿吗？现在日本军部方面已经说好了，还是到张家口去

就任吧。”这时我也考虑到，胳膊怎么也扭不过大腿，既然日本军部已经这样决定，各盟旗代表反对也不行，也只好就任了。因而就向李、陶二人表示说：“就任就就任吧。”但我以为，就任仪式可能要通过推选形式，不意我到张家口后，陶克陶早和日本方面作成圈套来捉弄我。

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九日晨，陶克陶特来请我到日本军部“商量要事”。我到后，大桥雄熊就迎出来和我说：“现在就举行任命式。”金井章二等先已在座，莲沼兵团司令官在几个人当中严肃地站立着，田中信一参谋长陪侍一旁，大桥雄熊就宣布任命式开始。首由金井章二表示，辞卸代理总务委员长职务，继由莲沼宣布，任命我为总务委员长。当时我虽知道受了欺骗和玩弄，心中充满了苦恼，但是面对这种情况，也只好接受任命，没有表示不就。这就显露了我的外强中干，色厉内荏的奴隶性，任命我为总务委员长后，莲沼又以司令官名义，给我赏金一万元，我也就接过来。我返寓后，认为今天举行任命式，事先既不和我商量，临时又不叫我，知道，诳我到了日本军部后，就突然来了一个任命式。把我玩弄到了这个地步，越想越难过，就拿起威士忌酒来喝，一气喝了几碗，喝得东倒西歪，醺醺大醉。这时陶克陶前来见我，我一看见他，不由的无名火起，把怒气完全泄在他的身上，猛然打了他一拳，并严辞责斥地说：“今日举行任命式，你为什么事先不和我说，反和日本军部作成圈套，来欺骗玩弄我！”陶克陶推说事先不知道，就抓个空隙溜走了。

嗣后，我把被任命为总务委员长的经过，写信告诉了吴鹤龄，囑他向日本陆军大臣坂垣征四郎反映。不久，接到吴鹤龄复信，说坂垣表示，日本军部这个做法不对，不应采取任命的方法，惹得德王不愿意。我认为坂垣还“同情”我，因而胆子又壮起来。有一次，在张家口又和大桥雄熊见面，我根据访日时给坂垣的甲、乙两案的内容，谈到扩大和强化伪蒙政权及实现蒙古建国问题，大桥

面带狞笑而用嘲弄的口吻说：“你们蒙古独立得啦”。我猛然听到他的话还很惊讶，怎么他也说出允许“蒙古独立”的话来？紧接着他又说：“干脆你们蒙古独立，我们日本军撤退好了。”结果又是弄的不欢而散。

我返寓后，回味大桥所说的话，是给我软中有硬的钉子碰，是对我的藐视和嘲弄。我这才深深感觉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可恶，再不能“合作”下去，便打算出走。那么究竟向何处去呢？经过左右思维，既不愿走向苏联或蒙古人民共和国，也不想投向中国共产党，而是仍想投靠蒋介石。因而通过军统特务在“蒙疆”工作的高荣和马汉三等，又和蒋介石发生了一段关系。因为这是后一个时期发生的事情，准备在写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的成立与瓦解一文中，再作详细的叙述。

我既然打算出走，对于日本方面的所作所为，也就不过问了，更不争执了，日本方面说啥就是啥。“被休的媳妇，不管牛犊隔奶”这句蒙古谚语，很能表达我当时的消极心情。例如，这时日本方面提出，以“蒙疆联合委员会”为基础，将蒙古、察南、晋北三个伪政权合并，在张家口成立统一的“蒙疆政权”，并主张不用“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原有的旗号，另制新的政权旗号。这本来是我不同意的。我的主张一直是以“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为基础，吸收察南、晋北两个“自治政府”，撤消“蒙疆联合委员会”，在“厚和浩特”成立统一的蒙古政权。并主张仍用“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的原有旗号，不另制定新的政权旗号。这两个方案是截然不同的，应当争执，只因我这时一心想要出走，不惟没有力争，反服从日本军部的意旨，于一九三九年六月十一日和于品卿、夏恭等面见莲沼兵团司令官，表示我们三个“自治政府”愿意合流，成立统一的新政权。结果就在日本军部和金井章二的操纵下，于是年九月一日实行合并，在张家口成立了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把“察南自治政府”改为“察南政厅”，把“晋北自治政府”改为“晋北政厅”。

虽然降为地方政权，仍保持原来机构。仅把“蒙古联盟自治政府”裁撤，由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直接统辖锡、察、巴、乌、伊五盟，并将“厚和”市划归巴盟管辖，把包头市划归伊盟管辖。至此，不但“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寿终正寝，连我妄图依靠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蒙古帝国”的迷梦，眼看也将破灭了。



# 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的成立与瓦解

## （一）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的成立

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成立于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

在成立之前，我当“主席”的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察南自治政府和晋北自治政府三个政权之上设有蒙疆联合委员会。而该委员会直接听命于日本陆军省兴亚院驻蒙分支机构蒙疆联合部和张家口日本军部。

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成立在前，我又自恃投靠日本在先，日军进犯察、绥地区和西部盟旗时，又卖过力气，并有蒙古军和各盟、旗王公为后盾，在军政机关方面虽已采用日本顾问制，但我和蒙古职员尚有一定“权力”，所以有时我就撒娇卖乖地不受蒙疆联合委员会的指挥。就是察南、晋北两个政权，对于蒙疆联合委员会的指示，在执行上也不全都是不折不扣的。日本军部为了取消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和削弱察南、晋北两个政权的权力，加上这三个政权统治的地区毗连关系密切，张家口的日本军部为了进一步控制产业、交通、金融等重要部门，加强殖民统治，搜刮战略物资，认为应该加以合并，在张家口建立统一机构，便于日本军部就近监督指挥。另外，日本和德、意结成“防共”轴心后，本以进攻苏联为目的，在制造张鼓峰和诺门汗两事件中，知道苏联力量的强大，于是由企图进攻改为防御。而“蒙疆”地区北部，正与蒙古人民共和国毗连，日本帝国主义把这一地区划成“防共”的特殊区域，企图切断共产党的国际联系，特将蒙古、察南、晋北三个政权合并，以资集中力量，发挥防共回廊的作用。同时，通过蒙疆联合自治政府这个御用

工具，更可加强殖民统治，搜刮重要战略物资，建立兵站基地，作为再度侵略蒙古人民共和国和进攻苏联的跳板。

在三个伪政权合并问题上，我和日寇是有过主奴之争的：日寇主张以蒙疆联合委员会为基础，撤销“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与察南、晋北两个政权合并，在张家口成立一个统一的政权。莲沼兵团司令官，任命我为蒙疆联合委员会总务委员长时，就是实现这个主张的先声。当时，我想以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为基础，取消蒙疆联合委员会，吸收察南、晋北两个伪政权，在呼和浩特（厚和浩特）建立蒙古自治国。因此，我与日寇多次发生过主奴之间的争论（详见《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始末》）。由于反对蒙疆联合委员会的失败，感到不能再和日本“合作”下去，一心打算出走，从此我在三个伪政权合并问题上，就不再和日本军部争执了。

一九三九年六月十一日，我邀同察南、晋北两个伪政权的首脑于品卿、夏恭二人，依照金井章二之嘱，前往日本军部面见莲沼兵团司令官，表示三个政权愿意合并。但我对“建国”问题仍不死心，还想趁合并机会谋求实现，密派我的秘书胡克巴达尔夫（陈国藩）和伪满驻蒙代表李义顺联络，取得通过伪满进入日本国内的证明，到东京和吴鹤龄进行建立蒙古自治国的活动。朝克巴达尔夫所带的草案是他和吉尔嘎郎（德古来）连夜拟具的。我主张要求建立蒙古自治国，吉尔嘎郎恐怕不易实现，主张要求建立自治国或自治邦，并嘱朝克巴达尔夫到东京后，请吴鹤龄斟酌实际情况进行。吴鹤龄也认为应要求建立蒙古自治邦。他们向日本陆相板垣征四郎处活动之后，适日本军部政治参谋大桥雄熊也返日，向陆军省请示三个伪政权的合并问题。吴鹤龄请大桥帮忙，大桥答复说：“我是代表军部为了要求建立蒙古自治国而来，偏遇你们又来要求建立自治邦，现在‘国’不能成了，‘邦’也不能成了，仅允许成立联合自治政府。这都是你们闹坏了，可别埋怨我们！”于是建邦、建国问题就又搁起来了。

日本军部和金井章二确实有过建立蒙古自治国的活动薄准备，因为三个伪政权合并后，曾使用过印有蒙疆联合自治国而又抹掉“国”字改印“政府”二字的公文用纸和封套。根据这一点来看，才知道是有过建“国”的酝酿和筹备的。即从日寇对华政策来说，当时是采取分割统治的办法，事实上已在东京制造了满洲国，在华北制造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华南制造了维新政府，也许有过建立蒙古联合自治国的打算。为什么又中途变卦了呢？绝不会如大桥雄熊说的那样简单，可能出于两个企图而变更：一是由日本首相近卫文磨发表“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的声明，想用政治攻势诱降蒋介石媾和；二是这时汪精卫可能与日寇有了秘密活动，日寇为了政治诱降蒋介石或实现利用汪精卫分割统治中国的阴谋和策略，蒙疆也就不能成“国”，所以就变更了。

我派朝克巴达尔夫密赴日本，并向日本陆军省要求允许召开第四次蒙古大会，讨论三个伪政权合并问题。当由日本陆军省军务局长田中隆吉出面答复，表示同意，并向吴鹤龄说：“听说德王老和日本军部摩擦，他们（指日本军部）要杀他呢！希转告德王，今后不要再和日本军部摩擦，以防生命危险。”这不过是田中隆吉恫吓我，叫我附首贴耳地作日本军部的忠顺傀儡而已。

朝克巴达尔夫返回后，我就草草召开了第四次蒙古大会，表示同意三个伪政权合并。至于建立什么样的统一伪政权，算作大会授权我这个“主席”全权办理。我在九月一日前赴张家口商洽合并问题时，已决心不再和日寇争执，金井章二提出来早已准备好的三个伪政权合并方案（如政府组织大纲、施政纲领、旗帜等），我连看也不看，就表示同意。他提名卓特巴札普当伪政务院长，我本来不怎么同意，口头上也说：好！好！好！表示甘心愿意饰演这幕傀儡剧的主要角色。

我虽然这样恭顺服从，日本军部仍恐我演不好这出傀儡戏，特于蒙疆政府成立前一天，由金井章二负责预作排演，把我和于品

卿、夏恭召集在一起，说业由日本军部内定我为主席，于、夏为副主席。又说合并必须强调基于民意，明天就举行推选式和合并典礼，应当事前演习演习。于是金井章二指于品卿说：“你应当说，我代表察南一百七十万民众推选德王为主席。”指夏恭说：“你应当说，我代表晋北一百五十万民众推选德王为主席。”指我说：

“你应当说，我代表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区域内三百万民众，推选于品卿、夏恭为副主席。”最后，又吩咐说：“这是在推选式上你们三位正副主席应当讲的话。在举行政府成立典礼时，由夏副主席宣读政府成立宣言，由于副主席宣读政府组织大纲和施政纲领，并希德主席先讲话，说明合并的意义和经过。”于、夏当时应承了。我这时的心情，实在不愿意讲话，当表示推托之意，结果就由金井章二担当报告合并的意义和筹备经过这场戏的角色了。接着他又嘱咐一些话，甚至开会的一般常识，都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们。在这出傀儡戏中，金井章二真是很负责任的一位导演。

到了九月一日，仍由金井章二主持举行仪式，把我和于、夏二人请到蒙疆联合委员会最高顾问室，在日本军部田中信一参谋长、大桥雄熊政治参谋等少数人参加下，举行推选式。进行的程序和会上的发言，一如前一天的预演，一言一动都没有变更，仅是增加照像这最后一幕。从此我就当上了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主席，于、夏二人就当上了副主席。接着举行蒙疆政府成立典礼。我和于、夏二人就以正副主席身份出现，在莲沼兵团司令官、来宾、地方首脑和蒙疆联合委员会全体职员参加下，首由金井章二报告三个政权合并成立为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的意义和筹备经过，由于品卿宣读所谓政府组织大纲和施政纲领，由夏恭宣读所谓政府成立宣言，继由莲沼及来宾等致祝词。所有这些，也是按照事先排演的进行，没有什么变更。

推选式和成立典礼举行后，我就依照金井章二提出来的名单，任命卓特巴札普为政务院长和各部局长以上官员，及察南、晋北两

个政府长官与巴、察、锡、乌、伊各盟盟长。接着就由政务院长卓特巴札普召开政务院会议，通过政务院、参议府和地方行政机构官制，确定张家口为“首都”，用成吉思汗纪元年号，规定统治区域，说明政府旗帜制定的意义。兹将蒙疆政府组织大纲等件摘录于后：

（一）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组织大纲：（1）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以蒙疆地域为统治区域，团结东亚各民族；（2）新政权称为蒙疆联合自治政府；（3）新政权首脑称为主席；（4）新政权以发扬东亚道义，尊重民意，为施政之大本；（5）首都设在张家口。

（二）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施政纲领：（1）宣扬东亚道义精神，并期其实现；（2）大同协和诸民族，大施经纶；（3）振兴民生，确保安宁，保障人民幸福；（4）从共产主义“毒害”中解放诸民族，以资强化“防共”战线；（5）团结友邦，同志相契，以奠定东亚新秩序。

（三）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的旗帜：向来蒙疆各政权各自有代表旗帜，现在伴随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的诞生，应有代表整个区域统一政权的表徵。因此，特制定从上而下横条黄、蓝、白、赤四色七条的政府旗帜。黄色象征汉族，蓝色象征蒙族，白色象征回族，中间赤色象征日本。就是以日本为中心，大同协和汉、蒙、回各族，作为代表政府的表徵。

（四）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的领域：规定依据从来的“蒙疆”的区域为领域，确定地方行政机构为两个政府、五个盟，其中察南政府管辖原属十县和张家口一市；晋北政府管辖原属十二县和大同一市；巴颜塔拉盟管辖原属十一县、五旗和“厚和”、包头二市；察哈尔盟管辖原属八旗、八县；锡林郭勒盟管辖原属十旗；乌兰察布盟管辖原属六旗和固阳一县；伊克昭盟管辖原属七旗和五原、临河、东胜、沃野四县（实际当时伊盟政权的政令仅能达到黄河以北，乌加河以东的准格尔、达拉特二旗部分地区）。

（五）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成立宣言：维成吉思汗纪元七百三十四年九月一日，合并蒙古、察南、晋北三治，肇建蒙疆联合自治政府，转移运会，乘济时艰，开大同大顺之宏图，奠长治久安之不

基。为此，特昭示境内各族民众，敬告东西邻邦及世界各国：我蒙疆地域乃历史上著名之故疆，民风朴素，资源丰富，人民勤劳勇敢，安于农耕牧业久矣。况且地势挟天险而兼大陆，幅员依长城而跨北海，惟自民国成立以来，军伐割据，残民以逞，凌虐百端，民不堪命，二十年来，委诸虎狼，徒供饲饵而已。

蒋也何人，不择手段，伪定一时，开府南京，以联苏容共为国是，以割据抗日为至计，并罪友邦。进行抗日以来，连遭败北，仅保残喘于岷峨之间。而彼虎狼乘此空隙，时欲吞噬瀚海百旗之野，咆哮跳跃，薄我门墙，窥我堂奥，赤化之祸，行将临头。

我蒙古、察南、晋北三治，夙具同戚同休之心，誓图防共安民之治，必须标本兼治，通力合作，因而肇建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以期防止共产，协和民族。爰承友邦日本之提携，密切联系日、蒙、满、华达成巩固之一环，向建设东亚新秩序迈进，发扬东亚道义之精神，光被世界，增进人类之福祉，功垂金帛。特将政府组织法及其他重要法案公布，通告各族，昭示内外，莫不咸庆是赖，并希东西邻友及世界各国，幸垂鉴察，天日在上，其共鉴之。

## （二）蒙疆自治政府组织和主要人事安排

依照蒙疆自治政府组织法规定，主席是最高首脑，由我担任，和我并列的是最高顾问金井章二。其下是于品卿、夏恭两副主席。主席的办事机构是秘书处，由村谷彦治郎任处长。在主席、最高顾问领导下，设有管理政务的政务院，由卓特巴札普任院长。与政务院平行的机构，有管理军事的蒙古军总司令部，由李守信任总司令，还有咨询建议性质的参议府，由李守信兼任议长，聘任杨桑为名誉议长，特任吴鹤龄为参议，由村谷延治郎兼任参议府秘书处处长。政务院设有总务、民政、治安、司法、财政、产业，交通七部和一个牧业总局。总务部长关口保；民财部长松津旺楚克、次长大场晨之助；治安部长丁其昌；司法部长陶克陶，次长波多野义雄；

财政部长马承魁、次长日比野襄；产业部长杜远宇；交通部长金永昌、次长伊藤祐；牧业总局长郭尔卓尔札布、次长泉名英，后为柏五郎。由院长和各部、局长组织政务院会议，讨论决定有关重要政务事项。实际上，任何事必先经日系总务部长和各部、局日系次长的研究决定后，才能提到政务院会议上。对于提出的事项，只能通过，不能否决。至于我这个主席的权力，仅是公布法令、教令、教书、大赦、特赦、授勋等，虽然还有“主席统率军队”的规定，实际上是无权过问，真是高高在上的傀儡。至于两个副主席更是无事可干。政务院还设置了两个咨议，一个是特克希卜彦（王宗洛），一个是雄诺敦都布。因为他两曾任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的部长，合并后没有适当的位置，只好给与咨询名义，置诸闲散。

直属政务院的机构有蒙疆学院，由总务部长关口保兼任院长，副院长是日本人田边寿利，专司训练培养效忠日本的中下级职员。有驻外代表部和办事处，驻满代表是恩和布林（吴恩和），后为李丹山。驻日代表部的代表是日本人，后为特克希卜彦。驻北京的外交机构是办事处，处长是日本人。还有地政局、审计局，局长都是日本人。至于各部、局机构的情况是：民政部管辖的直属机构有蒙古学院，院长仍由金永昌兼任。蒙古文化馆，馆长仍是伊德钦。治安部管辖的直属机构有中央警察学校，校长是日本人早根务男。司法部的直属机构有各地法院和检察厅及各地监狱。财政部直辖的机构有蒙疆银行，总裁是萨音巴雅尔（包悦卿），继为巴萨尔，后为寺崎英雄。经济监视署，署长先是巴彦泰，后为于兰齐。税务监督署，署长开始是日本人，后为霍克济呼（霍翰甫）。产业部直属的机构有专管鸦片、盐业的清查输运总署，署长是吉尔嘎朗。至于大同炭矿、电业、铁道、交通、畜产、食品等名目繁多的会社或公司，有的是日本资本家投资经营，有的是日蒙合资经营，理事长多由日本人担任。少数会社的理事长是由蒙人或汉人担任，也是管不了事的，大权都操在日系付理事长的手中。

司法机关分为三级，设在中央的有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厅。在蒙疆政府成立时，最高法院院长和最高检察厅长还未发表，我乘机向金井章二说：“补英达赖是蒙古的元老，现任巴彦塔拉盟盟长，仅是简任级，应当给他一个特任官。”金井说：“现在特任官的缺都没有了，仅有最高法院院长一缺，可以发表他。”我说：“补现任盟长是行政官，按制度上说不能兼任司法官呀。”金井说：“我想个变通办法发表就是了。”果然为时不久，金井特把法院官制中关于行政官不能兼任司法官的规定修改，提到政务院通过后，发表补英达赖为最高法院院长。最高检察厅长开始是刘继广，后为金永昌。巴盟高等法院院长是卓里克图（关荫南），巴盟高等检察厅长是那苏图（王庆三）。“厚和”地方法院院长是李介庵，“厚和”地方检察厅长由那苏图兼任。其他各地法院院长和检察厅长的姓名都不记得了。

地方行政机构主要人员是：察南政厅长官陈玉铭，次长竹内元平。晋北政厅长官田汝弼，次长前岛升。巴盟盟长补英达赖兼，副盟长亢仁（默尔根巴图尔），参与官泽井铁马。察盟盟长由卓特巴札普兼，副盟长特穆尔博罗特，参与官筒牛耕三郎。锡盟盟长是林沁旺都特，后由兴蒙委员会委员长松津旺楚克兼任，副盟长是补达巴拉，参与官中村浅吉。乌盟盟长初为巴宝多尔济，后为林庆僧格，参与官是山本信亲。伊盟盟长阿拉坦鄂其尔，参与官黑泽隆世。至于各县、旗长的安排，仍是采取蒙汉分治政策，旗札萨克或总管一律是蒙古人，县、市长是汉人或回民。人数很多，不再列举。

### （三）我和蒋介石秘密勾结

前面说过，我曾与日寇发生过主奴之争，特别是在蒙疆联合委员会问题上的争执以后，我就有了出走的打算。这时，日本驻在张



家口的特务机关长酒井隆，因我的态度突然消沉，也引起他的怀疑和注意，这我就更不能不谋早日出走了。但是，走向何方呢？反复思考，既不愿走向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更不愿投向中国共产党，想来想去，还是认为以投靠蒋介石为宜。因为我知道，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政府，还承认蒙古封建制度的存在，还掌握着大量的军队，有统治中国的力量。更认为我和蒋介石还有过一段政治关系，总觉得他还赏识我。总之，是反动的封建阶级本质支配着我要重走这条路。出走的方向决定了，又考虑采取哪条路走向重庆。我计划从我旗走向蒙古人民共和国边境，一夜间就可以到达，是神不知鬼不觉的事情。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后，再取道苏联转赴重庆，认为这样走比较稳妥。出走的方向和计划决定了，就寻找线索进行联络。忽然想起“厚和”市警察局长那木尔（刘建华）曾向我说过，蒋介石派来工作人员，劝我与其联络。因为当时日本人还敷衍我，使我过得去，我就对刘建华严辞拒绝，表示绝不搞这一套，以免惹起麻烦和危险。以后刘建华也再未和我提及此事。这时我既然决定出走，觉得刘建华是联络引线。恰巧此时，迪力瓦由张家口要去“厚和”，我就嘱咐他秘密告知刘建华找寻蒋介石派来的工作人员，我不日前往“厚和”与之相见。接着我以视察巴盟为名前往“厚和”，刘建华见我说，有蒋介石派来的高荣少将，现在萨县工作，已经取得联络，近日即来此地。我当即密嘱刘建华，一俟高荣到后，在新城建设厅巷我的官邸相见。俟刘建华陪同高荣见我时，我把打算出走的方向和计划告诉高荣，希望我到达苏、蒙时，重庆能照会苏、蒙准许我通过，转赴重庆。高荣当即答复我说：“这个事情很重要，需要我亲自去重庆请示蒋委员长。”我问他：“什么时候能答复我？”高荣说：“往返需要两个多月的时间。”他走后，刘建华向我报告说：“高荣见您后，认为得到意外收获，现已返重庆进行联络去了。”过了两个多月的时间，还不见消息，使我甚为焦急，正打算找刘建华问讯时，刘建新特到张家口报告我说：

“好险哪，听说高荣返经平津，几乎被捕。但是还好，高荣逃脱了、我们的事情还不至于败露。”嗣后高荣再也未来见我，这一段秘密联络，就暂告中止了。

高荣虽然杳无踪影，联络一时中断，但驻在陕坝的“军统”负责人员马汉三（当时化名马龙文），潜来“厚和”活动。这时和“军统”发生关系的有巴彦塔拉盟公署官房主任贺云章，科长梁芝祥，托克托县长肖兆庚，蒙古军总司令部副官处科长吴君玉等。但做我这方面工作的主要是梁芝祥。约在一九三九年末，我因事到“厚和”，梁芝祥送来重庆方面给我打来极密电报，我记得原文大意如次：“佛君（是我的化名）南来，抗战军民，无不欢迎，惟取道北路，殊不相宜。最好取道包头，渡过黄河，这边派白海风率队迎接。”报尾署名是贺耀祖。我嘱咐梁芝祥说：“这是极为秘密而且是关系重要的事情，希望你不要对任何人说。”梁芝祥很郑重地对我说：“请主席放心，我保证在任何情况下，绝不泄露。”我返回张家口不久，梁芝祥又来见我，带来蒋介石以军事委员会名义派我为蒙古自治委员会主席兼八路军总司令，派李守信为热河省主席兼第十路军总司令的任命状。并对我说：“李守信的任命状是李叫我带给主席看的。为了避免检查起见，特由吴君玉穿着军装带到张家口交我的。”我当即把委任状收下，认为可以做为我出走通过外蒙和苏联的凭证。我问梁芝祥：“厚和”还有蒋介石派来的工作人员吗？”他答说：“还有一个马龙文。”我当即嘱咐梁芝祥速返“厚和”，通知马龙文密来张家口与我见面。为了避免发生差错，梁芝祥当将他的名片，取出一张分为两半，一半交给我，一半由他带回交给马龙文，备作前来见我时的暗号和凭证。不久，马汉三即密来张家口，由赛吉尔胡领来见我。我看暗号凭证相符，就出而相见。我说：“前次我和高荣联络，提出取道北路通过外蒙、苏联，转赴重庆；嗣由梁芝祥给我转来复电，叫我取道包头这条路前往。经我详细考虑，认为这条路赴渝，很不妥当。因为这

条路必须经过包头，渡过黄河，日本军警岗哨很多，并且我是“主席”，举止行动，惹人注意，很容易被日本方面察觉。请你把我的意见转达蒋委员长，仍准取道北路赴渝，并请蒋委员长照会苏、蒙，对我不要留难。”马汉三答应转告请示。并说“军统”在张家口的联络和掩护机关是私立华北医院，今后来往密电或文件，均由该院转递。又说：“蒋委员长打听吴鹤龄在这里做何工作？”我即指定旺尔克札布秘书负责联络，并编好电报密码交给他使用。马汉三走后不久，即由华北医院给我转来复电，大意如次：德总司令（因为这时蒋介石已任命我为第八路军总司令），取道北路南来，绝不相宜，因为诺门汗事件业已和平解决，日苏关系已趋和缓，台端如果取道北路南来，通过苏联时，有被日本引渡过去的危险，仍宜另寻别途南来。如果无道路可寻，希勿庸前来，留在当地训练军民，忍辱负重，以待将来。”报尾署名仍是贺耀祖。我接到这个电报后，认为还有和马汉三面谈的必要，就叫旺尔克札布通过华北医院把马汉三找来。我和他说：“现在我已接到复电，知道蒋委员长不叫我取道北路赴渝，是对我深切的关怀，我至为感谢。今后只有按照蒋委员长的指示办理。并请你再次转请蒋委员长，准许在伊克昭盟也成立一个“蒙古自治政府”。这样一来，那边的自治政府和这边的联合自治政府便形成对立的局面，日本方面为了避免那边的争取，可能放松对我的控制，我就可以腾出手来，进行“训练军民，以待将来”的工作。马汉三说：“我一定把你这个意见转报蒋委员长考虑。”

一九四〇年春，日本军部调遣蒙古军各师开赴五原，第八师师长札青札布及第九师二十五团团长沙景春路过张家口时，曾来见我，乌古廷亦在座。札青札布向乌古廷说：“这次调遣蒙古军各师到五原作战，是帮助玉英的绥西联军打天下，将是一场激烈的战斗。我们蒙古军是为谁而死呢！”我从他们的谈话中，知道五原将有战争发生，又引起我借机出走的念头，于是又叫旺尔克札布把马

汉三找来面谈。我对马说：“听说傅作义正在五原布置军事，这边日本军部也正在调动兵力迫近五原，战争行将爆发。请你和傅作义联络，把五原作战暂缓一步，我趁此机会以慰问前方军队为名，亲赴前线，找个空隙溜走，你看怎样？”马汉三答应立即同傅联络。可是，他走后，五原战争就发生了，我这个出走计划，又成了泡影。

我通过“军统”和蒋介石进行秘密联络，除了梁芝祥、旺尔克札布外，就是我最亲信人员赛吉尔胡、朝克巴达尔夫、超苦拔都尔也不详细知道，甚至对我的长子都嘎尔苏隆也未告知，仅把蒋介石给我的任命状带回我旗，交由我妻妥为保存。并计划出走时，才临时通知陈绍武、丁我愚、都嘎尔苏隆等跟着我走。就是梁芝祥、旺尔克札布二人，也仅负传递电报文件及进行联络之责，所有来往密电都由我亲自翻译，绝不假手他人。我和马汉三见面谈话时，梁芝祥、旺尔克札布、丁我愚等都不在场，把马汉三领进我的官邸，他们就躲开了，我认为进行得极为秘密，万无一失，但是这个事情终于败露了。

一九四〇年春天，李守信前来张家口对我说：“坏咧！坏咧！日本军警在‘厚和’搜查‘通敌’事件已经三天了。我们的事，可能都暴露了，你还不知道吗？”他这样一说，我也断定必然败露，但这个事情究竟怎样败露的，日本方面怎样发觉的，我是不知道其中的底细的。据我推断，可能在刘建华身上引起的。因为在五原战役中，日本军打了败仗，据说，策划这次战役的桑原特务机关长，在战场上自杀了。指挥这次战役的日本军部，为了泄愤和推卸责任，就在“厚和”、包头一带大事搜查寻找“通敌”线索，偷听“通敌电台”，驻在“厚和”的日本宪兵队长去找“厚和”市的警察局长刘建华，质问他：“你曾推荐一个人（忘其名）在土默特旗工作，现在发现这个人“军统”分子，有‘通敌’的事情，但是这个人逃跑了。这个人既然是你推荐的，你可能知道逃往何处，

希你提供线索，以便进行逮捕归案法办。”刘建华是个狡黠的人，听了这话之后，马上答复说：“这还得了，我仅给这个人介绍工作，哪知人心叵测，竟敢干出‘通敌’这样重大的事情，真使我大吃一惊！我们警宪是一体，搜捕‘通敌’要犯，我与你有共同的责任。我一定用尽方法找寻这个人，找到以后，交你处理。”日本宪兵队长信以为真，当又囑令从速寻找归案就走了。刘建华恐怕这事大败露后，株连到他的身上，就与吴君玉同到包头，乘坐蒙古军的汽车混出城门岗哨，渡过黄河，经过后套陕坝，投向重庆。日本人发觉刘建华逃脱，追查到吴君玉身上，在吴家中搜查出密藏的小型发报机和参加“军统”的名单，接着把贺云章、梁芝祥、肖兆庚等也逮捕下狱，供出我和李守信通过“军统”与蒋介石的勾结关系。这时马汉三正在张家口，但是不知他住在何处，无法通知他。李守信就故意放出风声说，“军统”案件败露了。马汉三听到这个消息，即从张家口逃脱。

我和李守信知道事已败露，认为与其坐待日本军警追查，莫如亲往日本军部自首承认。这样商量之后，李守信即去日本军部一趟，他回来时对我说：“我已经和岗部司令官说了，你也去说了吧。”我即偕同朝克巴达尔夫赴日本军部对田中信一参谋长说：

“我今天来是对你谈谈我和蒋介石联络的一段经过，大概这个事情你也知道了吧。”田中信一说：“这事我也知道了，你为什么要和蒋介石联络呢？对我们有什么不满意的事情吗？”我考虑一下认为还从大的方面说较好，便答复他说：“因为我不满蒙疆联合委员会的成立，不满意取消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的合并方案，更不满意不许蒙古独立建国。适在这时蒋介石派人联络我，我就要求蒋介石许可蒙古独立。”对取道外蒙、苏联南下一节，避而未谈。田中信一进一步追问我说：“蒋介石如许可蒙古独立你怎么办呢？”这使我颇为窘迫，一时不知如何应答才好。正在筹思之际，朝克巴达尔夫在翻译时，看出我的窘态，即用蒙语向我提醒一下。我当即领会他的

意思，便答复田中信一说：“蒋介石即便许可蒙古独立，我也不能凭信一句空话，就冒然从事。因为我知道蒋介石说话一向是不兑现的。要看看实际上能否实现，才能解决我的行止。”不意我的这番话正与梁芝祥的供词不谋而合。据梁芝祥获释后对我说：他在宪兵队供称是蒋介石派人潜来策动我去重庆，我没有去。关于取道外蒙苏联一节，他因不知，也未供出。因为我的说法和梁芝祥的供词相符，田中信一便转怒为笑说：“这个事情经过我也全部知道了。蒋介石叫你走，你没有走，这就好。希望你不要为此担心，我对你完全谅解。”我这才象一块石头落了地，心境平稳下来，便又向他请求说：“对于其他人员的处理，能够使我知道才好”。田中信一说：“可以。”过了几天，田中信一邀我到日本军部，他拿出一个准备判刑的名单来。记得上面有梁芝祥、肖兆庚、贺云章，还有吴君玉、刘长荣、杨金声（察南政府的财政厅长）等，拟一律处死。我又请求说：“这件事情应由我全部负责，其他人员均是从犯。既然对我谅解，希望也宽恕他们。”田中信一说：“既然你这样说，对于其中的蒙古人，可以从宽处理，”我就提出贺云章、梁芝祥是蒙古人，肖兆庚虽不是蒙古人，但在蒙古工作多年，也等于蒙古人了。田中信一说：“这几个人究竟如何处理，俟和有关部门研究后，再告知你吧。”不几日他又亲到我的官邸，仍拿出那个判刑的名单，对我说：“贺云章业已病死（据×××从日本宪兵队翻译探听，说是被用凉水灌死的），梁芝祥、肖兆庚二名从宽发落，各判徒刑八年，其他人员仍处死刑。”我认为再提出要求也是无用，因此我就未再谈什么。日本军部就把吴君玉、刘长荣、杨金声等按“通敌抗日罪名”执行枪决了。这年五月间，我想回旗安排一下，但又恐日本方面阻拦，就故意向村谷彦治郎（蒙疆主席府秘书处）说我要回旗，试探他的口气。他如表示阻拦，我就不去，以免惹起日本方面的怀疑和阻拦。但试探结果，村谷并未表示阻拦，反为我准备车辆。我一看日本方面没有阻拦动向，就返回我旗，把蒋

介石给我的任命状烧了。

这个案件处理以后，蒙古军总司令部顾问潘井少佐，曾向第九师师长包海明说，他曾参加过讨论处理这个案件的会议。田中信一参谋长主张对我和李守信不究，大桥雄熊政务参谋主张严办，经田中参谋长说明不究的理由是因为我俩是蒙疆的军政首脑，如果深究下去恐牵涉面广，影响太大。大桥还说：“德王这次和蒋介石联络，可以从宽不究，如果德王要和苏联和外蒙联络，那可不是玩的，一定要从严处理。”包海明把潘井少佐这番话告知吉尔嘎朗，吉尔嘎朗又转告我。这可能是日本军部有意识地授意潘井通过包海明转告我，无非是希望我死心踏地的作日本帝国主义的帮凶而已。另一方面是警告我不要和苏联、外蒙联络。其实，这是日本军部的过虑，我当时只愿和蒋介石联络，绝不愿走外蒙、苏联这条路。后来我为什么又去蒙古人民共和国？是因为走头无路被迫而去的。记得我曾和吉尔嘎朗谈述过这一段的经过，并表示对蒋介石感激心情。吉尔嘎朗说：“据我看蒋介石不叫你取道北路赴渝，不是对你的关怀，而是怕你和外蒙联络起来，给他增加麻烦，所以特用‘恐怕被日本引渡过去’这句话来吓唬你。”吉尔嘎朗和我说的这番私房话，是很有道理的，蒋介石在电报中叫我留在原地，“训练军民忍辱负重，以待将来”，是期待我借用日本势力，组织蒙古武装，当时作为“防共之用”，将来用以“反共”，是想实现他不可告人的阴谋。可是我在日本投降之后，就离开军队去北平，假如日本投降时我掌握着军队，一定会按照蒋介石的指示，进行反共反人民勾当的。这个反动企图，当时虽未如愿以偿，待到一九四九年春，人民解放军已打到浦口，国民党反动集团迁到广州，我还趁此机会，企图东山再起，暗与美帝国主义勾结，收集残部，在阿拉善旗定远营拼凑起来一个“蒙古自治政府”，企图组织武装力量，再与人民为敌。但为时不久，宁夏便告解放，我和李守信率同残部逃至阿拉善旗西北部，因为缺乏给养，军队四出抢掠，牧民逃避一空，陷入

几百里地无人烟的境地。我在重重罪恶之上又加上了纵兵殃民的罪恶。

#### (四) 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时期的对外关系

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成立后的对外关系，首先是与汪精卫伪政权的关系问题以及我的第二次访日和第三次访“满”，还有一些伪政权的对日和别的所谓驻外活动。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二日汪精卫和其党羽陈公博等逃出重庆，先到越南河内发出通电，响应日本首相近卫文磨关于“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的对华政治诱降声明。继即到达上海与日寇“讲和”，缔结卖国协定，并于一九四〇年三月三十日实行所谓还都南京，标榜中国领域内分治合作，反共和建国，参与建设东亚新秩序。日本侵华派遣军总部也声明今后对华政策不以蒋介石为对手，承认汪精卫政府是中国的合法政府。同时将以梁鸿志为首的伪南京维新政府随之撤销；以王克敏为首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改为华北政务委员会，降为特殊的地方政权；关于蒙疆政权问题，日汪之间不能没有默契。汪精卫为了扩大他的权力，妄想作统治全国的首领，当然不愿蒙古独立，只承认蒙疆高度自治，日寇也不得不暂时迁就汪精卫的意见。

为了确定蒙疆政权和汪精卫政权的关系问题，蒙疆方面派出代表李守信偕同总务部长关口保、翻译陈有声等，汪精卫派出代表周佛海，在青岛缔结协定，并履行签字手续。这项协定的要点如次：  
①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根据近卫首相提出的“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承认“新中央政府”（指汪伪政权）是继承中国法统的正统政府。认为重庆政权，无论在法理上，实质上已降为地方政权。  
②“中央政府”承认“蒙疆”是日、满、汉、蒙各族强度结合的地方政权。鉴于历史的、国防的、经济的重要性，在



“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全盘施政既成事实的基础上，承认“蒙疆”高度自治。

李守信返张后向我详细汇报了他在青岛签字和与汪精卫会见时的情况。他说：签字仪式是在青岛一个宽阔的大厅举行的。当时日本华南派遣军参谋长坂垣征四郎和汪精卫都在青岛，却没有参加签字仪式，是由他和周佛海代表双方签字的。签字以前也未进行谈判，签完协定之后，又签定了一个附件。这个附件载明的事项主要有三点：①“新中央政府”承认“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沿用成吉思汗纪元年号；②“新中央政府”承认“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四色七条政权旗帜；③“新中央政府”承认“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在长城各口的驻兵权。签字之后，汪精卫、李守信参加宴会，并限定他一人代表“蒙疆”参加，计参加宴会者还有王克敏、梁鸿志、周佛海等。宴会间只是闲谈漫话，毫未涉及政治问题。

宴会后，汪精卫又邀李守信单独会见。李守信和坂垣住在一起，他就和坂垣商量说：“汪精卫单独请我谈话，是要谈什么话呢？谈政治我不懂，谈军事我倒知道一些，并且见面时怎么称呼呢？他如叫我李守信，我就叫他汪精卫、还是称他为汪主席呢？如果称他主席，他是谁的主席呢？”坂垣说：“管他是谁的主席，就称他主席吧。”于是李守信同他的随从付官郝贵堂去见汪精卫。见面时，郝贵堂要照象，汪精卫说：“这个人进来行吗？”李守信说：“他是我的随从付官，靠得住。”照完了象，汪开始谈话说：“李总司令，你辛苦了。”李守信说：“汪主席，你也辛苦了”。汪说：“彼此都一样，没有什么。”李又说：“早没见面，久仰大名。你可说是不避危险诋毁，一生为国家大事奋斗。”汪说：“实在抱歉得很，我很愧对全国父老。”接着，汪问：“你的防地安静不安静？”李说：“傅作义前年反攻厚和，去年袭击包头，都被我们蒙古军配合日军打退。”汪又问李：“你的部队有无困难，你可以向我说，咱们研究一下，我好替你解决。”李答：“咱们亲日，

不能叫兵们跟上受罪，没吃的问他们要，没花的也问他们要。蒙古军的补给很好，武器装备也不太差。”汪见李不向他求援，就又问：“听说满人和蒙人之间有摩擦，有这个事吗？”李说：“满洲人是蒙古人的外甥，你知道不知道？”汪说：“我知道。”李接着又对汪说：“蒙疆有多少满洲人，恐怕你不明白。蒙疆的满人都住在厚和市的新城，现在剩下不到一千户，就产生了一个满洲人市长李春秀。我们那儿也照顾少数，讲究民族协和，因为汉、满、蒙、回、藏各族，都是中国人，没有摩擦那回事。”汪一听，再不吭声。呆了一阵，汪又问李守信部队有无困难？李再次拒绝地说：“主席老问我有无困难，可见对我们蒙古非常关怀。我们的困难，可以就地解决，不愿给主席多添麻烦。”汪见李始终不向他张口求援，便扯了一阵询问关于我的生活起居的闲话，即由周佛海、褚民谊和梅思平等陪同吃午饭，饭后李守信即告辞离去。

这个协定原稿，金井章二曾给我看过。我不但不同意这个协定内容，根本就不愿和汪精卫政权打交道。因为当时我认为：①如果和他缔结这样的协定，虽然没有明确规定汪精卫政权和“蒙疆”政权是隶属关系，仅是互相承认，互相支持的关系，但在协定里却指出，汪精卫政权与蒙疆政权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这就意味着“蒙疆”是汪精卫政府统治下的高度自治区域，与我一向谋求蒙古建国、脱离中国而独立的主张相反。尤其使我不满的是，汪精卫已经承认了“满洲国”，却不承认蒙古的独立。因此，我主张对汪精卫政权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不愿缔结这样的协定。②当时我还认为我之所以投靠日本帝国主义，是基于“民族立场”与日本合作，用“为民族复兴”这块遮羞布来掩饰自己的丑恶。可另一方面，我却认为汪精卫是国民党元老之一，在国民党中央曾担任过重要的职务，居然脱离抗战后方，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真是厚颜无耻，实在有点看不起他。③当时我还认为：我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在先，汪精卫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在后，他却要后来居上，当我的顶头上司，把蒙

疆地区划在他的统辖范围内，真使我有点不服气。不过我这时正与蒋介石秘密勾结，一心打算出走，因而对协定也没有表示反对的意见。汪精卫政权举行所谓还都典礼时，金井章二提出派政务院长卓特巴札普代表前往致贺，我也表示同意。

一九四〇年春天，汪精卫以国民政府主席身份，偕同他的宣传部长林柏生等乘坐气机前赴张家口视察访问。前一天，金井章二对我说：“明天汪精卫主席来张，主席（指我）应到飞机场迎接并设宴招待，当然也要谈些话，希从早作好准备。我为遥向蒋介石买好起见，推说有病，明天不能到飞机场欢迎。金井章二知道我的牛脾气又上来了，就讪讪地对我说了“既然有病，应当请医生看看，注意休养。”说完就走了。金井章二走后不久，日本军部就派军医官前来给我看病，我也谢绝了。推说我的病适宜服中药，不宜服西药。翌日汪精卫等一行果然乘飞机来张，我仍称病未去欢迎，仅由卓特巴札普代表我到机场迎接。汪精卫来张视察是事先得日本军部同意的。我称病不见，既给汪精卫以难堪，更使日本军部下不来台。汪精卫却向日本军部田中信一参谋长等表示说：

“既然德王有病，我去看看他。”大桥雄熊政治参谋当即给我秘书朝克巴达尔夫来电话，要我勉支病体，出而相见。我仍坚持不见。这可把大桥激怒了，当用电话对朝克巴达尔夫说：“现在汪主席就去看德主席，切望务要出而相见。如果仍然拒见，我们日本军部要用全付的武装力量把汪主席护送到德主席的床前。”这个电话说完之后，大桥雄熊就陪同汪精卫前来我的官邸，我只好勉强出迎至大门口与汪相见，让至客厅座谈。大桥雄熊坐在一边监视着，汪开始慰问我的疾病，嘱要诊治休养。继则说：“蒙古过去是我们的同胞，现在是我们的同胞，将来还是我们的同胞。应当加强团结合作，共同致力‘反共和平建国’。”我也淡淡地回答数语，相谈不到二十分钟，汪即辞去，由金井章二、卓特巴札普等陪同在远来庄宴会。当日下午即乘飞机返平转宁，我未去欢送。在飞机场汪还发表谈话

说：“我这次来张，承军政各界亲切招待，表示感谢。特别使我高兴的是，还亲往慰问德王的病情，看到他满面红光，一望而知是病情好转。”暗示讥讽我称病未去迎接之意。

不久，吴鹤龄由日本回来，我和他谈到拒汪的经过。他说：“汪精卫真是个八十分的大混蛋，全国军民都在抗战，他却前来投日。他之投日与我们不同，我们是基于“民族立场”与“日本合作”，他之投日是破坏全国抗战。并且我们与日本合作在先，汪之投日在后，现在又叫汪精卫来管辖我们，这等于叫我们随娘改嫁。他同我一样，这一套话，也是诵的一套汉奸经。伪满驻蒙代表李义顺有一次和我说：“德主席拒见汪精卫的消息，香港报纸亦有登载，标题是‘德王拒见，汪逆碰壁’。”我当时听了还很得意呢。嗣后，听说汪精卫政府还颁布“蒙古自治法”，下达到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日本人也未拿来给我看。大概这个“蒙古自治法”，可能是触犯了日寇直接控制蒙疆的权利，所以对汪精卫政权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

关于我的第二次访日。这次访日是为了参加祝贺日本天皇纪元二千六百年纪念典礼，报告蒙古、察南、晋北三个政权合并后的“蒙疆政情”及恳请今后的援助。陪同我的有金井章二、李守信和随员等二十余人。一九四一年二月十一日由张家口出发经过北京、山海关、汉城等地，二月二十五日到达东京。日本松岗洋右外相及其他军政首脑人员到车站欢迎。日本外务省次官大桥忠一负责招待，与我接触机会较多，他在口头上表示尊重我的“权力”，因而我对他有好印象。我在日本东京的活动，无非是访问军政首脑，游览名胜，参观学校、工厂，到处受到日本各界的招待，可以说，对我是极尽怀柔拢络之能事。当我见到日本天皇裕仁时，他很尊重地接见我，在致辞中希望我致力东亚和平事业。我在答辞中表示感谢日本的支援。但因见日本天皇时，我是身着蒙古长袍、坎肩便装，听说有的日本人背地议论我未穿马褂，不够隆重。当我参加日本外相招

待宴会时，松岗洋右没有照例在宴前致辞，仅举杯说了祝蒙古万岁一句话。我在访问期间主要的活动，是与吴鹤龄前往陆军省面见陆相东条英机，军务局长武藤章，兵务局长田中隆吉（都是旧相识）。我和吴鹤龄当时提出改组“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的方案。这个方案主要内容是：在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下成立两个委员会，一个是“蒙古联盟政务委员会”，专管巴、察、锡、乌、伊等五盟事务，这是为了恢复类似“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机构，我好从中掌握，做为我的政治资本。一个是“蒙疆自治委员会”，专管察南、晋北两个政府的事务。这是因为察南、晋北两个地区日本人抓得更紧，我什么事也不能过问，干脆放弃不管。这个方案提出之后，并抄录一份面交近卫首相，他们当时没有明确答复。田中隆吉当着我和吴鹤龄的面说：“吴先生很能干，叫他当政务院长吧。”本来田中隆吉对吴鹤龄的印象不很好，为什么又主动提出叫他当政务院长呢？大概因为吴鹤龄在日本三年期间经常和陆军省联系，并且学会了日文、日语，娶了日本女子作妾，对他的印象已经好转，叫他当政务院长是为日本帝国主义统治“蒙疆”人民又加上一个得力的帮凶。吴鹤龄又去陆军省探问对于我们所提出的改组政府方案作何处理，回来报告我说：“武藤章对我说，德王提出这个方案，是因为他愿意专办蒙古事。既然他愿意这样做，给他在德化设立一个专办蒙事的机构，叫他干不好吗？”虽然没有成为事实，但后来有“兴蒙委员会”之设，或即种因于此。

我在访问期间，还以个人身份访问过吉田骑兵监，因为吉田在包头担任日本驻军部队长时，我曾去包头慰问军队，他特开一例，把日本部队集合起来，列队欢迎我讲话，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我觉得他和其他日本军人不同，当我访问他时，他除了殷勤接待外，并对我说：“我虽然离开了包头，但是对包头那里的事情，还时常打听，因此颇为熟悉。听说我走以后，继任我的中岛部队长做的很不好，逮捕了很多的人，并把为首的“遗敌”人员王文治等杀了。

我认为他这个做法太拙、太笨了，捕杀这些人有什么用？为什么不利用他们的组织和人员，反转来为我们搜集情报，窥探‘敌情’！不是更能知道许多消息，使我们的耳目更灵通吗？”我当时还很佩服他的见解高明，现在回想起来，他的做法不过是更为阴险，更加毒辣罢了。同时也说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无论在做法上或软或硬，对蒙、汉人民都是不怀好心的。

我在日本访问游览一个多月，本拟在归途中访“满”，只因东条英机要来“蒙疆”视察，就停止了中途访“满”，于当年三月十六日返抵张家口。我返回后不久，东条英机就乘日机前来，我和他见面之后，没有谈到什么重要问题，他只是嘱咐我不要灰心，致力“东亚和平”和蒙日亲善工作。并说送给我步枪五百支，叫我组织卫队。他走后不久，又派富永中将前来，适我返旗未得见面，我回张家口后，兴亚院联络部长官竹下义晴转告我说：“富永叫我转告你，一切不要灰心，仍要努力工作。”大概不久，我即把曾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哈丹布和（暴德彰）从伪蒙古军调来，担任我的卫队队长，并从七、八两师调来精壮的蒙古士兵，组成了卫队，把东条英机送给我的五百支步炮装备了卫队。

关于我的第三次访“满”。本来预定访日后即行访“满”，不意我偕同金井章二及随员等到达北京时，偶染重感冒病，不能坚持前往，中途折回，以致预定安排的访“满”通知，没有及时传达经过的各地，使伪满在奉天（辽宁的沈阳）迎接的人员扑了空，伪满方面难免啧有烦言。这种情况，传到金井章二的耳朵里，又引起了对我的怀疑和不满。他曾向陶克陶等说：“德主席这次中途停止访满，使满洲国对“蒙疆”的印象不好。他是真正病重不能坚持前往呢？还是别有用意呢？据我看德主席一向主张吸收外蒙建立大蒙古国，这次中途停止访满，可能不满意所订立的《日苏中立条约》吧？因为他认为在《日苏中立条约》中，日本默认了外蒙古独立。”实际上我没有这个意思，但也不便向他解释，只好听之任之。

一九四二年，适逢满洲建国十周年，我又偕同李守信等，作第三次访“满”，祝贺满洲建国十周年并感谢对“蒙疆”的援助。我等一行于这年四月二十一日，到达“新京”（长春），伪满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军政大臣于深澄，兴安局总裁札嘎尔及日本关东军参谋长等，均到车站欢迎。当我拜见满洲国皇帝溥仪时，他已不以臣属之礼相待，而以“蒙疆”政权首脑之礼，飨以国宴，隆重招待，在宴前致辞时，称我为“贵主席”了。我在访“满”期间，无非是参加庆祝典礼，访问各部大臣，游览名胜，没有什么重要活动。我访“满”回来不久，满洲国特派治安大臣于深澄为团长，兴安局参与官博彦满都为首席代表，带同随员十余名，到达张家口作回访了。

此外还有一些对外活动是：①一九四二年日本政府在东京召开所谓“大东亚会议”时，参加的有中国的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满洲国总理大臣张景惠，菲律宾的总统洛克菲勒，缅甸的总理八博莫士，蒙疆因为没有建国，仅以地区的各义，派民政部长松津旺楚克为代表，偕同翻译札奇斯钦（于宝衡）前往参加。嗣日本召开大东亚经济会议，蒙疆派财政部长吉尔嘎朗前去参加。②约在一九四一年八月间，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揖唐要来“蒙疆”访问，吴鹤龄对我说：“听说王揖唐最不愿意改称蒙古自治邦和使用成吉思汗年号，我们要做一个大大的蒙古自治邦政府牌子挂上，等他来时叫他看看，刺激、刺激他。”王揖唐到达后，仅是敦睦友邻性质，应酬访问一天就返回北京了。嗣后朱深继任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又派苏体仁来访，亦系拉拢关系应酬性质，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可以记述。③蒙疆联合自治政府驻外常设机构，计有驻日代表部，过去概由日本人担任代表，仅和日本陆军省发生关系，日本外务省还不以外交机关看待。到了一九四二年，特派特克希卜彦为代表，经过交涉才由日本外务省取得外交人员证明书三份，确定由代表、参事官、秘书官三人使用，其他人员还不发给。每当日本外务省召集各

国使节团开会，宣布有关外交重要事情时，不挂蒙疆政府旗<sup>1</sup>，经特克希卜彦出面交涉，才挂上。驻日代表部所办的经常事务<sup>2</sup>等管理蒙疆留日学生和登记审核日本国内入蒙经营工商业的资本家。特克希卜彦秉承我的意旨，常到日本陆军省、外务省联络，探听消息，遇有机会就进行蒙古独立建国的活动。但是驻日代表部有日本警视厅特派的名为保护实则监视的警察人员时常进入，有关重要的消息，不敢用信件传递，只有托咐妥靠人员捎来报告我。此外在伪满“新京”设有蒙疆驻“满”代表部，也算是外交机关。在华北设有驻北京办事处，是联络性质的机关。

## （五）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改称“自治邦”与历次机构改革。

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成立后，经过几次行政机构改革和主要人事变动，主要原因是蒙疆地区既然是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殖民地，各级政权当然是日本帝国主义统治的御用工具，每当日本驻军司令官或参谋长、最高顾问或总务厅长调动时，就有机构改革和人事调动。在历次改革机构中，有时也有我和吴鹤龄的意见，但须得到日本军部的承认，才能行得通，否则就遭到碰壁。下面记述几次较大的机构改革和主要人事变动：

### （1）政务院的变动与成立“蒙古自治邦”。

一九四一年春，吴鹤龄从日本回来，我提出叫他当政务院长，但金井章二不愿意，就去鼓动高桥参谋长不要承诺。高桥和我说：

“叫吴鹤龄当政务院长合适吗？”我说：“既然叫我当主席，我很需要他帮助，并且这是出于陆军省田中隆吉的意思，大概你也知道吧。”经我这样一说，高桥才无话可说了。金井章二见此计不售，就去策动卓特巴札普不要让出政务院长的位置。当我动员卓特巴札



普把政务院长让给吴鹤龄时，无论如何劝说，卓也不愿放弃。并强调说：“在蒙古政府中，我是年纪最老的人，吴鹤龄是比我年轻的人，为什么要我把政务院长让给他呢。”说了几个钟头也无效果，最后我不客气地对他说：“这个事情和日本方面都说好了，你也说过吴鹤龄能干，你如不让，就是阻碍贤路。”这样吴鹤龄便当了政务院长，把卓特巴札普调任为参议府议长。

吴鹤龄当上政务院长以后，就协助我进行蒙古建国工作。因为吴鹤龄既是一个政治野心家，也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主张“建国”要分成两步走：第一步是建立蒙古自治邦，第二步才是建立蒙古国。他在蒙古军政府时期，就草拟过蒙古基本法（似宪法），和蒙古建国计划。他在日本东京时，也秉承我的意旨，到处钻营活动“建国”，甚至不惜破坏祖国的统一，向日本朝野人士作过分割中国的建议。对于蒙古建国的国体和政体问题，也是作过研究，并且这样说过：“蒙古建国的国体问题，如仿照日本和‘满洲国’，应当采取君主国体或君主立宪政体，比较容易行得通。但如从远大目标说，我们不是还希望吸收外蒙建立大蒙古国吗？为了实现这个远大目标，应当采取民主共和国体。”又说：“无论采取共和国体或君主国体，主席（指我）当国家元首是没有问题的。建立蒙古共和国你是终身总统，如建立蒙古帝国，你是民选皇帝。”

关于建国的年号问题，我也再三考虑过。我认为最好是用“成德”二字。因为“成”是成吉思汗的成字，“德”是我名字的头一个字，合起来就是我继承成吉思汗之德。这与伪满皇帝溥仪登基后，应用康德年号表示继承康熙之德有同样的意义。我这个幻想和迷梦，简直狂妄已极，反动透顶了。

我们虽然做过这样的研究，吴鹤龄总认为一时不易实现，应当先把蒙疆自治政府改为“自治邦”，他就分向日本兴亚院蒙疆联络部长官竹下义晴和日本军部高桥参谋长活动。日本方面起初还不同意，至希特勒进攻苏联后，才允许对内改称“自治邦”，对外仍称

“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吴鹤龄把接洽经过告我，我仍坚持建立蒙古自治国。吴鹤龄劝我说：“主席别再坚持了，建立蒙古自治邦问题，好容易遇到德国进攻苏联机会，得到高桥参谋长的承诺。设再延搁，深恐过了这个村没有这个店，反而又成了问题。”我再未说什么，表示默许，日本方面也再无异议。即于一九四一年八月四日挂上“蒙古自治邦”的牌子，算是宣布成立。既未举行典礼，也未展开宣传，一般仅知有蒙疆联合自治政府，而不知有“自治邦”，我深感不甚惬意。吴鹤龄解释说：“蒙古建国问题事体重大，关系复杂，牵涉更多，必须逐渐实行，以求实现，第一步先成立蒙古自治邦，第二步再谋求建国。并且‘国’与‘邦’在汉文解释上虽有不同，但用蒙文翻译过来，都叫“敖洛斯”，对蒙人也能说得下去。”他更进一步作试探性地说：“蒙古建国不但主席一再坚持，力求实现，就是我也是梦寐以求的。如果蒙古一旦实现建国，主席登了大宝座，我这个政务院长，还不是总理大臣吗？”

## （2）最高顾问的调动。

一九四二年元月，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最高顾问金井章二换成大桥忠一。金井章二的调职，固然在日本人内部有其矛盾原因，但与我之反对他也有一定的关系。金井章二是一个很狡猾的人，他知道日本在“蒙疆”实行反动统治，一时还找不到另一个适当的傀儡，仍有利用我的必要，因而在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成立后，对于某些事情也很敷衍我。例如在汪精卫开始投日时，他曾和我说过：“蒙古建国之事，在汪精卫未建立政权之前，就应做成事实。”这话很合我的口胃。我提议要在纯蒙地带，建立一个新兴都市，作为根据地，他也表示同意，并到各处看过。但我总认为金井章二这个人，口蜜腹剑，笑里藏刀，特别是在制造“蒙疆”问题上，使我最伤脑筋，对他成见已深。因而在访日期间，就向日本陆军省兵务局长田中隆吉说他的坏话，表示对大桥忠一有好感，有意请他来当最高顾问。适至日本帝国主义发动所谓大东亚战争后，考虑到需要我调动蒙疆

力量支援战争，就把我不愿意的人金井章二调走，把我欢迎的人大桥忠一派来充当最高顾问。大桥忠一到张家口后，没有先到日本军部请示机宜，先来见我。他的亲信人员提醒他，这样做会招致军部的不满。他却强调说：“我是德王特意聘请的最高顾问，当然要先拜德主席。”甚至连在张家口的日本神社，他都疏忽了，未去参拜，这更招致日本军部的反感。他上任之后，表示尊重我的“权力”，并对日系职员训话说：“你们把日本对蒙政策执行错了。在蒙古政府中，你们帮助蒙系人做事，不应对当地人藐视。”这样一来，在蒙疆政府当权的日本人，对他也心怀不满，同时他与驻在张家口的日本公使岩崎民男也发生矛盾。日本陆军省得知这种情况后，特派一个军官前来了解，听说也不赞同大桥的做法。这个人回去不久，陆军省就迫令大桥忠一回来。我听说以后，就去日本军部面见七田司令官表示挽留，七田坚决不肯，一定要撵大桥走。我见大桥后仍表示挽留他，并劝他暂时不要走。大桥对我说：“主席不必为我一个人惹了军部和公使馆，我还是走吧”。当大桥走的时候，岩崎公使和日本军部参谋部等均未到车站送行，仅派一二个中下级军官到车站应付一下，大桥理也不理就登上火车走了。大桥走后，吴鹤龄对我说：“咱们老蒙古就是心实，总认为大桥忠一好，金井章二不好，一切信任大桥忠一。但是他来了之后，我们什么权力也未得到，还失掉了一些权力。例如蒙疆银行总裁，向由蒙古人担任，大桥来了之后，说由日本人担任吧，结果寺崎英雄当了总裁，特穆尔博罗特任为付总裁。另一方面我们要让蒙古人当总务厅长，可是没办到。当他来的时候，我还问他，你还亲任总务厅长吗？最高顾问是在政务院长之上的，总务厅长是在政务院长之下的，你如感觉兼任不合适，可以仍由蒙古人担任总务厅长。他立即答复我说：‘我兼，我兼。’由此看来，他是不管制度上是否合适，有权利的就抓，一点也不放弃。据我看来，大桥走了也好。大桥这一走连最高顾问也带走了，有什么不好呢？”的确，日本军部是用

高压手段控制我，大桥忠一这个日本政客是用拢络手段软化我，统治蒙古的目的是一致的，只是方法不同而已。

### （3）蒙疆政府几次的行政机构改革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太平洋战争后，特在蒙疆联合政府内设立一个“总务委员会”，由总务厅长武内哲夫任主任委员，由各部、局、会日系次长分任委员，下设一个“弘报局”，担负宣传动员支援战争之责。一九四二年六月一日，日寇为了实现蒙汉分治政策，便于从中驱使利用，又进行机构改革。这次改革的要点是：①撤销牧业总局，成立兴蒙委员会，专管盟旗属于蒙人的事务。②将民政部、治安部合并为内政部，专管政厅、盟、县、市属于汉人的事务。③特设“回教委员会”，专管拉拢回族和联络西北回族工作。④将产业、财政两部合并为经济部，以便统一管理徵用战略物资。⑤将司法部改称司法委员会，将交通部改为交通总局。随着行政机构的改革，主要首脑人员也有很大变动：调任民政部长松津旺楚克为兴蒙委员会委员长，调任吉尔嘎郎和察盟劝业厅长穆克登宝为付委员长调任村谷彦治郎为主任顾问。原财政部长马永魁调任经济部长。原治安部长丁其昌调任内政部长，中央警官学校校长早坂冬男调任内政部次长。原产业部长杜运宇调任司法委员会长官，司法部次长藤井五一郎仍任司法委员会次长。交通部长金永昌仍任交通总局长。新任蒋辉若为“回教委员会”委员长，李郁周为付委员长。总务厅长关口保离职，暂由金井章二兼，嗣后又调来武内哲夫任总务厅厅长。武内哲夫离职，又由次长前岛升署理总务厅厅长。原司法部长陶克陶，原牧业总局长郭尔卓尔札布调任参议，产业部次长藤公平调任顾问。这次机构改革是高桥参谋长到任后主持进行的。关于司法部改称司法委员会，因未设一个委员，所以称司法长官。我实在感觉不合理，提出应当考虑。高桥参谋长说：“这次机构改革，谁都说好，我看就这样吧，不用改了。”对于兴蒙委员会的设立，汉人方面啧有烦言，认为蒙古政府内不应再有兴蒙委员会之设；既

设有“兴蒙委员会”，就应有“兴汉委员会”，才算公平合理。

一九四三年秋，又进行机构改革，因经济部所管业务特繁重，乃补充为经济、产业、财政三部，调任晋北政府长官田汝弼为经济部长，任吉尔嘎郎为财政部长，调杜运宇为产业部长，把原经济部长马永魁调任参议。调任晋北政厅民生厅长文画君为司法委员会长官，调任金永昌为最高检察厅长，特任穆克登宝为交通总署长。各部、会、局又配了次长，陈有声、陶克托胡（陶布新）为总务厅次长，恩和阿穆尔（张绍庭）为交通总局次长，图木勒巴塔尔（刘定一）为产业部次长，超苦拔都尔为兴蒙委员会付委员长，张子荣为经济部次长，赛吉尔胡为内政部次长。同时把察南政府改成宣化省，由张家口迁至宣化办公，把察南政府原址，做了我的“主席府”，调任察南政府长官陈玉铭为参议，原最高检察厅长刘继广调任为宣化省长。将政北晋府改称大同省，调任巴彦塔拉盟劝业厅长李树声为大同省长，将张家口市升格为特别市，归政务院直辖，任命崔景岚为市长。在张家口升格为特别市时，吴鹤龄认为张家口这个名称不好听，想改称“怡和浩特”特别市，用蒙文解释是“大都”的意思。而用日文翻译过来，“怡和”二字是很不体面的意思，日、蒙等人都说不好，因而未改。为了在行政上配合日本帝国主义西进的企图，特在包头设置西部临时行政区，将包头市、萨拉齐、安北、固阳三县划归西部临时行政区管辖，由伊盟盟长阿拉坦鄂其尔兼任该区区长官，与伊盟公署合并办公。阿拉坦鄂其尔这个盟长，由仅管准格尔、达拉特二旗河北局部地区，一跃兼上管辖三县、一市的长官，从此有地盘、有收入，有警察队的武力了。巴彦塔拉盟盟长补英达赖，因失掉了包头市和萨拉齐县的管辖权，甚不满意。再把省、盟的官房、民政、畜产、警务各厅的编制一律改为总务、民政、实业、治安等处，并把厅下科的编制也改为股的编制，缩小了行政组织。

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成立时，已确定张家口为“首都”。按一般

常理说，也应把最高军事机构同时迁到“首都”，保持军事和政治的联系，但蒙古军总司令部仍在“厚和”。日本军部把蒙疆的军、政最高机构分开是别有用心的：一者是蒙古军各师部署在包头、百灵庙一带，把总司令部设在厚和就便于指挥；另一方面，日本军部知道蒙古军是我的后盾，把最高军政机构分设两地，就减少我和带兵军官的接触，割断我和军队的联系，不能依据政府组织法“主席”统率军队的规定过问军事。特别是自从我和李守信秘密勾结蒋介石事件败露后，对我和李守信更不放心。因此，让李守信常住张家口执行付“主席”的职务，把我和李守信当做军事、政治上的傀儡，便于日本人一手操纵蒙古军的指挥权。我为了把军事和政治联系起来，吴鹤龄也想伸手抓军事、行政权，想在政务院下设军政部或军事部，日本军部仅准设立一个军事联络部。结果就这样决定了，从蒙古军调来突布格日勒（乌云飞）中将为部长，下边配备几个校级和尉级军官，办理有关军事联络事宜。这等于蒙古军总司令部驻张家口的一个办事处，什么实际权力也没有，是一个有名无实的军事机关。

#### （4）“主席、副主席”的改选和调动

按照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组织法的规定，主席、副主席的产生都要经过推选程序。但在一九四一年春，不知为了什么缘故，金井章二提出将夏恭副主席“依愿免官”，给予“前官礼遇”，调任为大同炭矿理事长。

迨至吴鹤龄当上政务院长后，看见夏恭“依愿免官”，副主席出缺未补，就想向掌握军事实力的李守信买好，就同我商量趁着这个机会，向日本人提出要求由蒙古人当副主席，我表示同意后，他就向金井章二提出这个意见。金井章二不客气地答复说：“你们要求蒙古人当副主席，要是晋北民众不向政府纳税怎么办呢？”吴鹤龄又向日本军部说，日本军部认为给李守信一个“付主席”的位置，便可常驻张家口，蒙古军司令部的日本人更便于工作。这样金

井章二才表示同意。吴鹤龄为了符合政府组织法推选的规定，特向察南、晋北两个政厅要求拥护李守信为“副主席”的推选书，于是李守信便算合法当选为“副主席”了。吴鹤龄为了拉拢李守信，不仅为他奔走“副主席”的位置，还把李守信的亲信旧部刘继广、李树声、崔景惠等安排在省、市长的位置。这些人经常在李守信的公馆进出，关系非常密切，引起我的秘书朝克巴达尔夫的怀疑，提醒我说：“近来吴院长和李副主席走的非常密切，不知在搞什么？我是很注意这个事情。”但我认为吴鹤龄和李守信接近，无非是互相利用，还不至于对我有不利行为，因此，并未介意。

按照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组织法的规定：“主席任期三年”。我这个“主席”到了一九四二年八月底任期已满。因我认为仅由正副主席互相推选的形式，既不体面又不隆重，坚持应当召开第五次蒙古代表大会进行推选。日本方面大桥忠一也主张召开。于是这年八月三十一日在张家口召开第五次蒙古代表大会，推选我连任“主席”，于品卿、李守信为副主席。我发表了下面的就职讲话：“兹承蒙古大会推戴我为蒙古自治邦政府主席，深感责任重大，如临深渊，惟有不计功过，竭力奋勉，达成历次蒙古大会之使命，而副全体官民一致拥戴之殷情。大东亚战争系东亚解放之战争，我邦夙与大日本帝国及满洲帝国有密切不可分之关系，辐车相依，休戚与共，协力完成兴亚大业，为我全体官民应尽之义务。必须坚定信念，精诚团结，一心一德，努力迈进，以期邦基之安定。”

#### （六）日寇通过蒙疆政府对蒙汉人民的血腥统治

蒙古、察南、晋北三政权合并后的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如从年号、旗帜和组织上看，摒弃中华民国年号，应用成吉思汗纪元；不用中国的国旗，只制四色七条的政府旗帜；保有政务院和七部的编制，俨然是“独立”状态，脱离了中国的版图。但实际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均受日本帝国主义的严格控制，变成了日本的殖民地。随着合并后的伪政权的建立，更进一步加深殖民地化。

日本帝国主义通过蒙疆各级政权对蒙汉各族人民进行了血腥统治，哪里有半点独立的味道！

### 军事上镇压

日本帝国主义把蒙疆作为侵略中国西北的前哨，进攻苏联、外蒙的基地，特派一个兵团的兵力，分驻各地，把大部分兵力部署在包头一带，准备伺机进犯西北；把一部分兵力分驻张家口、大同、厚和及其他重要地点，用以镇压各族人民。在张家口设立蒙疆派遣军司令部，负责统一指挥，并在张家口、大同、厚和、包头、多伦、百灵庙、贝子庙、西苏尼特旗、西乌珠穆沁旗等地设置日本特务机关或日本宪兵队，搜罗地痞流氓充当特务。因而特务遍布城乡，打入机关团体学校中，监视人民的言论行动，刁难商旅，调戏妇女。当时巴彦塔拉盟付盟长墨尔根巴图尔曾和我说，有个日本人（忘其名）率领警察特务搜查户口，竟把几个妇女关在屋中，迫令脱去衣服，赤身露体，供其玩耍作乐。我听见这个事情，曾请金井章二追查法办，当时金井章二也答应了。但过了几天，金井章二即对我说：“这个人已经应征入伍，无法追查了。”至于日本人带警察下乡，勒索、奸淫更是层出不穷，也从未听到受过什么处分。但在这一时期，曾发生日本军部逮捕据说是违反纪律的蒙古军第九师十几名士兵，处以枪决之事。该师师长包海明认为士兵不守纪律，应当归由本师处理，日军不应越俎代庖。当向蒙古军总司令部报告并请转向日本军部交涉，对越权处决该师士兵的部队长，给予应有处分，并且声言如不作公平处理，他就要带领该师士兵拉出去，激愤异常。经李守信转向日本军部交涉，高桥参谋长反说：杀了违反纪律的蒙古兵是应该的，对擅行杀戮的日本部队长竟纵容不究。李守信处在日本军的压力之下，只有忍气吞声，息事宁人。这充分说明，在日寇统治下，日本人做出无法无天的事情，可以逍遥法外，所谓违反纪律的蒙兵，便要受到极刑。

一九三九年冬，傅作义军反攻包头，包头几乎失守。日本南支



派遣军参谋长坂垣征四郎特来视察，冈部司令官和金井章二陪同到包头、“厚和”，我听到后也乘飞机赶到厚和和坂垣会见。当时包头日本驻军小岛部队长，为了推卸防守有欠周密的责任，推说包头内部有“通敌分子”，泄露机密，这是政府所管警宪防查不周所致，不是战斗部队日本驻军的责任。金井章二是政府的最高顾问，面对冈部司令官也推卸责任说：“中国军队的反攻，正是日军调动之时，一定有人给敌人供给情报，李总司令（指李守信）可能知道，并且应负一定的责任。”李守信也不相让说：“带兵官的调动，军队的换防，这是常事，并且都是秘密进行的，敌人何以知道？我听说，敌人反攻时，包头的商务会给敌军驮运烙饼做给养，内部也有“通敌”人员给敌军送消息，这是政府所管警宪防守不周的责任，与蒙古军无关。”这样推来推去，结果反而是包头地方倒霉。在小岛部队长主持下，逮捕各界人士甚多，计有包头市公署职员王文治等。金井当向我说：“在调查‘通敌’案件中，发现包头市长刘继广也有重大嫌疑，可能牵连在内。”我向金井说：“刘继广曾当过蒙古军第一师师长，在绥东战役和进占绥远出过力，就是他与是案有关，也应当顾念他过去的功劳，免于深究。并且他当过中将师长，军级很高，现在仍当包头市长，很不适当，应当设法调转职务，可否调他为最高检察厅长，请您考虑。”金井当时表示尊重我的意见。果然，不久，就发表刘继广为最高检察厅长。我为刘继广解脱，是从私人情感出发，希望他感恩图报，为我效力。至于其他被捕的爱国人士，有的判处死刑，有的判处徒刑，饱尝铁窗风味，我就置若罔闻了。一九四〇年春，在我通过军统勾结蒋介石案件中，刘长荣、吴君玉、杨金声被判处死刑，贺云章被非刑拷打死于狱中，梁芝祥、肖兆庚被判处徒刑，前已述及，兹不多赘。值得一提的是在抗日救国联合会的案件中，日伪宪警逮捕教育界人士和学生多人，受非刑拷打折磨而死者一百余人，至日本投降，张家口第一次解放，得庆生还者仅二十余人。对此案件我始终未曾过问。约在一九四四年，

张家口日本宪兵队又将曾当过蒙古军第二师师长的尹宝山和陈生建逮捕下狱。这时因我勾结蒋介石案件暴露，自知有短处，深恐招致日本人的疑忌，就连要求宽恕也未敢正面进行，只是暗地设法营救，结果由李守信花了六万多元，买通张家口日本宪兵队长，才把尹、陈二人释放。但尹宝山因遭非刑拷打，已成残废，在北京德国医院身死，陈生建也落了个孱弱的病体。还有百灵庙特务机关曾将乌盟茂明安旗札萨克奇默特色楞好若劳，以勾通外蒙的“罪名”逮捕，囚禁在特务机关内拷问取供。奇王被逼不过，自杀身死。以上几个案件，是我所知和所闻的事情，至于被日寇加以莫须有的罪名而残害的无辜人民就更多了。

日寇常以确立治安为名，抽调日本机动部队，配合蒙古军、警察队扫荡八路军，特设置重点于龙关、赤城、延庆和大青山一带山地，到处执行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杀害人民，惨绝人寰。八路军为了保护人民，常和日伪军警展开游击战，打死打伤日伪军警很多，就是日本的将级军官和警监也被打死过几个。因为死一个日本将级军官，就得举行一次慰灵祭，迫令蒙疆机关、团体、学校的职工和市民参加。我这个主席或政务院长就得前往致祭。记的在一九四四年的一个时期内，日本张家口警备司令官某中将（忘其名）被八路军打死，就以“光荣战死”的名义，举行过一次慰灵祭。因为连续举行政务院葬，蒙疆政府的礼堂，一个时期变成了葬礼场。最使人可笑的是日本人弄虚作假，自欺欺人。当时日本军部有一个日本天皇裕仁的弟弟北白川宫殿下，在张家口清河桥侧观看空军演习，被一架飞机失事坠落砸死，这是有目共睹的事情。而日本军部却说北白川宫殿下，以金枝玉叶之身，转战蒙疆各地，“光荣战死”，就举行慰灵祭。驻在中国各地的日本派遣军的参谋长都来参加，并在张家口为北白川宫殿下建立纪念碑，迫令各界人民经过碑前，都要鞠躬默哀。各界人民在日寇淫威之下，只有绕路而过，表示消极抵抗。

日寇在蒙疆的主要城镇和交通要道，均派有日本军警把守，对来往行人严加搜抢，无理非难。又时常调查户口，夤夜闯入民宅，持枪恫吓，任意搜翻。还强迫实行保甲连坐法，一人有事，全村不安。压迫人民最狠毒最凶恶的是日本宪兵队，假如被当成“国事犯”抓到宪兵队去，便受灌凉水，压滚杠，用辣椒面薰，用铁条烙，用军犬咬，用钉子钉穿脚背等等非刑拷打。当时蒙汉人民称之为阎罗殿，无不畏之如虎。总之，当时蒙汉人民处在日本帝国主义淫威之下，真如日处愁云惨雾之中，人人提心吊胆，昼夜胆战心惊。

### 政治上控制

日寇在政治上所采取的策略，首先是找寻蒙汉败类，做为帮凶。其用人原则，对蒙旗则是尽量拉拢封建王公阶级，如我和雄诺敦都布，松津旺楚克，郭尔卓尔札布，卓特巴札普，穆克登宝等，不是王公出身，就是旧日总管。对于地方蒙旗更是沿袭封建制度，任用封建王公担任盟长、札萨克职务。对于汉、回族尽量利用地主豪绅和工商业资本家等上层阶级，如于品卿，贺秉温，马永魁都是。资本家夏恭、田汝弼是晋北一带的地主豪绅，王英是后套的恶霸地主。对于旧时官僚政客和军阀也是网罗利用，如吴鹤龄、李守信、蒋辉若等。至于留学日本的亲日分子，也给予高位，如杜运宇、陶克陶、吉尔嘎郎等。日寇统治蒙疆将近十年，就是通过这一类人作为帮凶。其次是政治上分化。日寇在表面上标榜“民族协和”，做为欺骗性的宣传，暗地使用挑拨离间伎俩；当着蒙古人说汉人不可靠，应由蒙古人当权；当着汉人说蒙古人低能，应由汉人执政。记得杜运宇就向我说过：“日本人对我说，如果不是我们日本人居中控制蒙古人，蒙古人对汉人的压迫统治更利害呀。”并把当地人划分为蒙系、汉系、回系、满系，分别对待和使用，以期在日本人操纵指使下，达到互相牵制，供其利用。其三是日本人中心主义。在各级政权及各会社公司中，日本人自成一个统治的系统，掌握一切权力。凡是重要事情和机密文件，都是由日本军部或兴亚院蒙疆

联络部通知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最高顾问或总务厅长，由总务厅长通知各部局会次长、各省、盟公署次长或参与官，各公司或会社的日系负责人，再由省、盟公署下达各旗、市、县日系参事官或顾问做秘密处理，不使当地人首脑知道。其中有的事情，需要当地首脑讲话时，给他作出文稿，让他当众宣读。所以各级政权、机关首脑，大都成了签名划行的傀儡，有时仅起传声筒的作用。就是特别接近日本方面的金永昌、陶克陶、杜运宇之流，也不能参加日本系统的会议。卓特巴札普身为政务院长兼察哈尔盟盟长多年，如果问他政务院的事情，什么也不知道。有时他到察哈尔盟公署去，还先给盟公署顾问送名片，说是我上班来了。结果博得日本顾问称赞说：“达吉桑是（卓字日文译音）伟大。”

### 经济上搜刮

日寇从经济上把蒙疆做为吸取原料、销售商品、输出资本的殖民地。日本国内垄断资本家，为了赚取高额利润，就地廉价采购原料，招雇低价人工，特在蒙疆设立株式会社或股份公司，直接操纵经济命脉。据当时日本出版的昭和十七年度《北支蒙疆年鉴》记载，除京包铁路由华北铁道株式会社直接管理经营外，由蒙疆政府直接统辖的计有蒙疆银行、大同炭矿、龙烟铁矿、电业会社等株式会社九所，准特殊会社十所，普通会社五十八所，其中蒙疆政府出资占总数百分之三十一，蒙疆银行出资占百分之十，日本出资占总额百分之五十七，现场工地出资占总数百分之二。并且各会社的理事长或经理，绝大多数由日本人担任，其中虽有少数会社由蒙、汉人担任理事长，也是由日系付理事长总揽大权。不但金融、电业、交通、煤矿、铁矿、畜牧等重要资源控制在日本人手里，就是食品、石油、烟草、面粉、洋灰、砖瓦、木材、火柴等也都由日本人掌握。特别是由蒙疆政府公布鸦片管理令后，设立清查总署，组织土药公司等机构，公开收购、贩运鸦片，而鸦片组合和烟馆更是普设城乡各地，以搜刮和毒化人民。各县市公署还在城镇设立官营赌博

场，美其名曰“俱乐部”，公然设赌抽头，聚敛民财，因之倾家荡产者不知凡几，投河上吊者也不乏人。自太平洋战争发生以后，军费开支浩繁，日寇更巧立名目，增加税收，把这沉重的负担转嫁在沦陷区的人民身上。特公布集谷管理令和家畜搬出取缔法，强行粮谷“集荷”，垄断收购农牧产品，用极低的价格收购，残酷掠夺人民财富。而主管其事的伪官和奸商，从中压等压价，饱充私囊。大米、白面等细粮，拨归日寇军用和日本人食用，当地人民只配给掺砂掺假、发霉的杂合面吃。还强行棉布统制，收购价格甚低，出售价格甚高，黑市价格更昂，广大劳动人民无力购买，以至饥寒交迫，无以为生。牧业地区牲畜头数逐年下降，严重损害了牧民的生活。

### 文化上麻醉

日寇毒化蒙汉人民的思想、麻醉知识青年的手段，可以下列几方面说明：1、实行奴化教育。以所谓亲日防共，民族协和，发扬东亚道义精神为教育方针，在学校中每日清晨举行升旗仪式，先向东方遥拜。经过日军岗哨，必须向“皇军”敬礼。通过日本神社，必须鞠躬致敬。每逢日本天长节等节日到来，各机关、团体、学校必须放假，悬挂日本国旗，举行纪念仪式。为了实行“工业日本、农牧业蒙疆”的侵略政策，仅准设立农牧业中等学校，禁止设立工业中等学校。2、实行分化和同化教育。在中小学课程设置上，日文每周占七至十小时，而汉文或蒙文仅占三至五小时。专收蒙族学生的学校，限于学习日文和蒙文，不学习汉文。当时有的蒙古人主张应学汉文，日本人说：“汉人文化不如日本文化高，与其学汉文不如学日文吸收现代知识快。”另一方面在专收汉族学生的学校，限于学习日文和汉文，不准学习蒙文。更尽量设置日语补习学校、日语进修班等来普及日语，就是想用普及日语的方法，达到同化蒙汉回各族人民的目的。用限制学习蒙文或汉文的方法，阻止蒙、汉、回各族人民自然融合。3、在张家口设立蒙疆学院，在省、盟所在

地设立官吏养成所或训练班等，对现职官吏从政治上灌输奴化思想。为加强亲日教育，并组织蒙疆兴亚协进会、蒙古兴亚协力会、蒙疆青年兴亚同盟等团体，拢络各界人士，麻醉各族青年。更在城乡广泛组织劳动奉公队，强迫人民负担修公路、修工事等沉重的义务劳动。4、利用喇嘛教、佛教、道教、天主教、耶稣教、回教、红卍字会、青帮、一贯道、纯一善社等宗教团体和反动会道门，麻醉人民思想，进行特务活动。5、设立弘报局、放送局，发行“蒙疆新闻”、“蒙疆新报”、“蒙疆通讯”等报章杂志等，经常组织电影宣传班，深入农村牧区巡回上演，大事进行“亲日防苏、蒙日亲善”等反动宣传。自太平洋战争发生之后，更尽量宣传所谓“建立东亚共荣圈”、“建立东亚新秩序”等，企图从人种、肤色、地域上来麻醉和欺骗人民，从而支援日本，反对美、英。

以上是日寇通过蒙疆各级政权强加于蒙汉人民的血腥统治。我是蒙疆政府主席，当然是不能辞其咎的。

我对于日寇强加于蒙汉人民的统治，做了很多的帮凶事情。择其要者，有如下列各端：

(1) 调动人力，支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所谓“大东亚战争”。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太平洋战争。蒙疆自治邦政府，为了动员全部人民支援战争，特由政务院长吴鹤龄起草，以我这个“主席”的名义，于一九四二年一月十九日颁发“兴亚教书”如次：“成吉思汗纪元七百三十六年十二月八日，盟邦大日本帝国天皇陛下，对美、英颁发宣战大诏。鉴于本邦与日本帝国有特殊密切关系，应一致努力，誓共休戚，况大东亚战争之开始，乃大东亚解放之天机，本邦为大东亚共荣圈之一翼，须尽共同奋斗之责任。凡我邦官民应愈加巩固团结，发挥总力，内竭奉公之诚，外尽协力之义，迅速完成兴亚大业，是所至望。随着这个“兴亚教书”的颁布，就借口确立治安，加强“剿共”工作，从而搜刮

战略物资。由于战争范围的扩大和战争局势的紧张，对蒙汉人民的压榨，就愈益残酷。

过了一年，为了响应汪精卫政府参战，仍由吴鹤龄起草，以我这个“主席”的名义，于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九日，颁发第二次“教书”如次：“维我盟邦大日本帝国，为求大东亚共荣圈之确立，以期东亚各民族、各国家共存共荣，业于成吉思汗纪元七百三十六年十二月八日对美、英宣战。本邦与大日本帝国夙有特殊密切之关系，为大东亚共荣圈之一翼。曾与成吉思汗纪元七百三十七年一月十七日颁发“兴亚教书”，以期一致协力此次战争，与盟邦大日本帝国，誓共休戚。现在开战一年，大日本帝国业经取得赫赫之战果，美、英侵略东亚之势力殆将净尽。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指汪伪政府）亦于成吉思汗纪元七百三十八年一月九日，布告对美、英两国宣战，披沥同生共死之诚，誓协力大日本帝国，由此大东亚战力更进一层强化，增添战争前途之光芒。我邦官民必须遵照兴亚教书之主旨，发挥总力，继续奋斗，各尽其责，确立治安，增强生产，以期本邦之隆昌。更应全力以赴，赞助盟邦，协力战争，排除万难，歼灭东亚之公敌，确立东亚共荣圈，是所至望。”因此，又开展以“确立治安，增加生产”为中心的罪恶活动，使各级政权机关整备警察队，编练靖乡青年队，加强乡镇街村基层组织，实行保甲连坐法，进行“剿共”。更加强化粮谷“集荷”，强迫劳动奉仕，并由蒙古兴亚协力会开展献机、献铜、献铁运动，支援日寇作战。

## （2）坚决防共

我在防共方面，不仅表现在言论上，而且表现在行动上。例如在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时期，就把“防共”定为基本方针，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成立后，又把“防共”定为施政纲领，当众讲话时，更强调蒙古地区“防共”的特殊性。当蒙古军配合日本“剿共”时，我总是谆谆嘱咐带兵官努力完成“剿共”任务。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在太平洋战争失利时，我为了巩固反动统治，谋求将来的出路国

竟依照蒋介石对我“训练军民，忍辱负重，以待将来”的指示，有组织有计划地扩编军队，组织武装，准备向八路军争夺胜利果实。

### （3）进行民族分裂

我总认为蒙疆原来是蒙古地方，蒙古人是这个地方的主人，把汉、回人民当作异族看待，蒙族应在其他各族之上。因此，在联盟政府时期，凡属政府处长以上的官员，都不肯任用汉人，选送留日学生一律限于蒙古人。联合政府时期，选送留日学生蒙、汉、回人数虽然有一定比例，但蒙古人仍居多数。我曾想把铁道以南的蒙古人移至铁道以北，把铁道以北的汉人移至铁道以南，来一个蒙汉大搬家，兴蒙委员会开会时，我又策动亢仁提出我这个意见，并把土默特旗青年分期分批移到纯蒙旗地带，学习蒙文蒙语，免受汉族同化。亢仁等认为这样做，很易惹起麻烦，没有按照我的意图提出建议而作罢。在蒙疆联合政府时期，察盟参与官简牛耕三部主持实行旗县划界，我极力赞成，有的主管人不愿把蒙旗地方划归邻县，我曾力劝他们忍痛割爱，要为长远打算，现在宁肯失掉一些地方，可是从此割断汉民的移入，保持蒙旗地带的纯洁性。结果这次旗县划界实行了。由此可见，促使蒙汉分家，防止民族融合，我是有过于日寇而无不及。

### （4）维护封建制度

日寇在东北制造满洲国以后，特颁布旗制实行令，将札萨克制度改为旗长制度，把王公世袭政权逐渐转为地主阶级政权。但在蒙疆的做法，却是极力维护封建制度。一九四〇年八月二十九至三十日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召集各盟旗的盟长、副盟长、札萨克、总管等在张家口举行蒙古会议时，最高顾问金井章二在讲话中宣布：“蒙疆特殊区域的社会构成，是纯蒙地带，蒙旗制度，社会制度和历史沿革。因此，维护社会构成的阶级制度，是尊重现行札萨克旗制的存续。”

日寇维护封建制度的措施，当然我是同意的。为了延续封建制



度，还发表了宣言和纲领。

宣言原文是：“我们祖先奄有欧亚版图，创立君临世界之大帝国，有光辉之历史。惟自元以后，势力衰微，不如往昔，然仍坚持蒙古民族之传统。近二十年来，更受边吏军阀百般之压制，缅怀太祖，自觉赧颜，不敢再事因循苟安。云王等各位先进，曾在百灵庙发起自治，但议民族复兴，复在友邦大日本协力之下，举“防止共产，协和民族”之大旗，作复兴蒙古之前驱。我等应继承其衣钵，内则同心和爱，外则敦睦邦交，是我等自觉之使命。进而发展生产，增殖人口，振兴教育，致力厚生事业，拥护政府主席，建立东亚新秩序，发扬东亚道义精神，太祖有灵，当护佑之。”

纲领的序文如次：

“①我等缅怀太祖之伟业及发扬其传统精神，谋求民族之复兴。②我等巩固团结与友邦提携，以强化“防共”战线。③我等力求吸收世界知识，促进文化之发展向上。④我等勤俭自持，历精图治，促进生产之兴隆。⑤我等力求厚生事业之发展，以期民族之繁荣。”

东乌珠穆沁旗札萨克多尔吉横征暴敛，压迫旗民，引起旗民之反对，下令将其免职。但唯恐动摇封建制度，仍令他的很小的儿子继任札萨克，叫多布丹暂时护理札萨克职务。乌盟乌拉特中旗札萨克林沁僧格当了盟长，呈请准由他的儿子雄诺继承札萨克职务。其子年令尚幼，不合惯例，兴盟委员长吉而成郎向我请示处理办法。朝克巴达尔夫趁机向我建议说：“蒙旗王公世袭的封建制度，应当逐步改革，现在应当把王公爵位和札萨克分开，实行袭爵不袭职。”我婉言拒绝了。吴鹤龄也坚持沿袭旧的封建制度，不应骤然变更，因而林沁僧格的呈请亦被批准了。由于日本当权者宣布尊重蒙旗的封建制度，不仅札萨克旗制一直没有变，还想把察哈尔有的总管也改为世袭。例如卓特巴札普因为自己当政务院长兼察盟盟长，呈请准叫他的年令幼小的儿子任为明安旗总管。我起初还表示不肯，深恐引起该旗人士和青年人的不满，但经不起卓特巴札普一再请

求，并为了敷衍他的面子及调和我们二人之间的矛盾，也就默认了。但青年职员啧有烦言，因而又以不到年令为理由，准许他的儿子为记名总管。

我虽忠于日寇，只因在某些问题上有过意见，反招致日本军部和公使馆的不满。记得在召开第五次蒙古大会推选主席时，中岛万藏向我透露消息说：“岩崎公使曾对我说过，德王这个人老是不听话，总是嗷嗷不休，换另一个人代替他为主席不行吗？”日本军部政治参谋大桥雄熊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典型，有时就把本来的狰狞面目暴露出来。有一次，在“远来庄”饭店请他便宴，在谈话中涉及有关蒙古的事情，希望得到他的支持，不意他却以很不耐烦的样子说：“你老是蒙古蒙古的，蒙古干脆灭亡就得了。”我的秘书胡克金太知道这话不是滋味，不敢翻译给我听。我因与日本人时常接触，也能听懂一些简单的日语，知道他所说的意思，但我这时却有了“涵养”，装作不知。

## （七）支持吴鹤龄的工作与蒙疆垮台前夕的挣扎

我支持吴鹤龄当上政务院长以后，曾作了下列几项工作：

### （1）设立蒙旗毫利希亚

日寇既从军事上、政治上控制蒙疆，又从经济上成立大蒙公司和蒙疆畜产公司，收购牲畜皮毛，运售日用物资，从中获取高额利润。吴鹤龄为了抓经济权，特把原有的蒙古生计会加以整顿，仍由他兼任会长，聘请中岛万藏为顾问，在蒙古生计会之下，设立豪利希亚部，在各旗一律组织豪利希亚，经营收购牲畜皮毛并运销日用百货业务。这事着手进行以后，察盟参与官筒中耕三郎为了维护日商的利益，特提出反对意见说：“蒙古王公们现在组织豪利希亚，是想从中获利当资本家。”我和吴鹤龄听到这话以后，便规定蒙民每人入股至少十元，至多三千元，来抵制日本人的反对。豪利希亚

设立以后，吴鹤龄究竟从中赚了多少钱，我无从知其底细。他的亲信人员罗励甫可是发了大财。听说在北京就买了多处房产，并设立聚义银号。吴鹤龄对罗励甫不仅未加责斥，反尽力庇护和代为遮掩，时常夸说罗励甫如何能干，能办到别人办不到的事情。因为我支持吴鹤龄，曾引起日本军部的怀疑，冈村参谋就曾问过陶克陶：“德王很支持吴鹤龄，是否他们二人有经济关系。”陶克陶答复说：“德王支持吴鹤龄是政治关系，还不至于有经济关系。”这话是陶克陶向我说的。

### （2）设立蒙古留日预备学校

我支持吴鹤龄设立这个学校的目的，是想培养忠于我们的人材，取得蒙古知识青年的拥护。先组织一个蒙古留日学生后援会，由松津旺楚克为会长，继而设立蒙古留日预备学校，由吴鹤龄兼任校长，莎音托布任主事，主持招收蒙古青年，着重学习日本语文，补习一个时期后，便送往日本留学。这个学校确定是民办官助性质，资金来源大部分是蒙疆政府补助，少部分是私人捐献。我将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时期划拨尚未花用的蒙人教育复兴费五万元拨作该校基金。这时恰巧日本军部给我五万元，也悉数拨作该校基金。我将此款拨交吴鹤龄后，还向金井章二说明此事，金井说：“这是军部给你的钱，你怎么处理都可以。”同时，这个学校计划在十年期间，筹集基金一千万元，保送蒙古留日学生一千名。我认为计划送这么多的留学生到日本去，是促进蒙日亲善的具体表现，必然得到日本方面的好感。不意金井听到以后说：“用这些钱，送这么多留学生到日本去，是给日本增加负担，对日本没有什么好处，因为在日本的留学生多是抗日的。”

### （3）制定蒙旗十年建设计划

这个计划是吴鹤龄起草的，予定分期分批建设蒙古新村，其中的中心新村予定设在旗公署所在地。中心新村内政治上有旗公署，经济上有毫利希亚，文化上有中心小学，军事上有保安队，形成每个

旗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并于一九四三年组织三个蒙旗建设队，分在锡盟苏尼特右旗、察盟镶黄旗、乌盟的四子王旗开始建设，所有建设资金悉由兴蒙委员会支给，不叫所在蒙旗负担。我是尽力支持这个工作的。因为我和吴鹤龄及一部分蒙古中上层职员，认为蒙旗是我们的政治资本和根据地。并且日寇在太平洋战争中已走下坡路，一旦失败，我们在蒙旗建设一些据点，好作东山再起的根据地，继续统治蒙古人民。

吴鹤龄虽然费尽心机，培植个人势力，拉拢晋北人士（如田汝弼、文画君等）和察盟总管（如穆克登宝、包楞那木济勒、阿由尔扎布等），想着巩固政务院长地位，但其为人度量狭小，骄傲自大，排除异己，特别是利用罗励甫等亲信，经营蒙古生计会和毫利希亚，从中赚钱肥己，更招致物议。被其打下擂台的陶克陶，调到司法清水衙门的金永昌，前政务院长单特巴扎普等，对他素即不满，便趁机起而攻击。补英达赖认为自己是蒙古元老，企图争取政务院长的地位。杜运宇为“亲仁会”●首领，察南一带颇有势力，因调动职务关系，对吴鹤龄已有不满。吴鹤龄的妹夫乌古廷，时任蒙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依仗吴的势力，把持军权，又使李守信与吴亦不无芥蒂。于是这几个人便联合起来攻击吴鹤龄，揭露蒙古生计会和毫利希亚的黑幕，由陶克陶出面向日本军部冈村政治参谋告密。冈村对于吴鹤龄把持政权和乌古廷把持军权的所作所为早已不满。恰在这时，乌古廷和其四弟乌臻瑞（第七师参谋长）在德化一带私购大批鸦片，乘坐汽车前来张家口，竟被日本宪兵队扣获。冈村得到这个把柄，便来向我告知。我认为既然冈村参谋长正式提出这个问题，不能等闲视之，就转向吴鹤龄商量说：“乌古廷这个人既不能令，又不受命，现在又出了私运鸦片的事情，就得撤换他的参谋长。”吴也同意，经我俩研究结果，认为包海明向与潘井顾问关系密切，不会得到李守信的同意，便决定叫宝贵廷继任参谋长。吴

●亲仁会——日本投意社运宇组织的亲日团体。

鹤龄失掉了掌握军权的乌古廷的支持，陶克陶等更群起攻击，更成了众矢之的。冈村参谋还采用陶克陶的建议，特把补英达赖找到军部，面许叫他当政务院长，用这个方法来抵制我支持吴鹤龄。补英达赖这时升官心切，既然得到冈村参谋的默许，就来见我说：“这回吴鹤龄下台，政务院长该轮到我了。”我只有默不作答。嗣后我又到日本军部与中川参谋长和冈村参谋商量政务院长之事。他们表示要我亲上第一线，主持政务。于是吴鹤龄便在各方攻击和日本军部胁迫之下，离开政务院长职务，由我兼理政务院长。我为了维护吴鹤龄颜面，满足补英达赖的政治欲望，特在政务院之下，各部会局之上设置内务、军事、经济、司法四个长官，由吴鹤龄任内务长官，负责指导兴蒙委员会、内政部、回教委员会的事务；由副主席于品卿兼任经济长官，负责指导经济、财政、产业、交通各部局的事务；由副主席李守信兼任军事长官，负责指导军事、保安等事务；由补英达赖任司法长官，负责指导司法委员会、各级法院、及检察厅事务。吴鹤龄因此却一气去了北京。补英达赖颇为满意，向人表示说：“我现在总算和两位副主席平行了。”这一场互相倾轧、互相排挤、争权夺利的内部纠纷，才算结束。

我在未兼政务院长以前，日本人麻生达男（蒙名麦德尔札布）、猪口和玛尼巴达拉等从满洲国来张，募集在王爷庙建筑成吉思汗庙经费，我在官邸宴请他们。宴后麦、猪两个日本人走了，我和玛尼巴达拉、朝克巴达尔夫等密谈，关于日本失败后怎样谋求出路的问题。我们认为，日本失败后，国民党的军队必然反攻过来。趁着这个机会，东西蒙要联合起来，共同谋求出路，至于集中地点，认为王爷庙偏东，张家口偏西，约定以林西、林东、经棚一带，为集中地点。日本一失败，我们就把东西蒙的军队力量集中到这一带，组织建立一个蒙古自治国。

我兼政务院长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在太平洋战争上着着失利，德国在欧洲战场上，也是节节败退，第二次世界大战谁胜谁负

问题已见分晓。我便依照和玛尼巴达拉的约定，组织力量，企图作最后的挣扎，谋求将来的出路。

### （1）组织武装力量

我一向是迷信武力的，便从下列几方面组织武装力量：一是把蒙古军以蒙人编成的七、八、九各师及直辖骑兵队、炮兵队，加以整备充实，做为基本力量。二是把从蒙古军划出、改编为各盟、省靖安警备队的一、二、三师归还原建制，并将各市、县的警备队改编成十六个旅，作为机动力量。三是把各盟旗所属的保安队，改编为五个警卫师，由盟长兼任师长，作为盟旗地方的防卫力量。我这个计划，因涉及内政部警察管理权，招致内政部次长早坂冬男的反对。嗣经与日本军部几次交涉，才得到中川参谋长的同意。早坂冬男才无话可说了。并为了统一指挥，在政务院之下设立军事部，由李守信兼任部长，由崔玉瑗和郭勒敏色为次长。这时我有计划地把武装力量组织起来，有两个企图：一是把隶属不同力量分散的武装集中起来，掌握在我的手里，阻击八路军。二是把分散的武装力量组织起来，易于灵活调动到林西、经棚一带，做为东西蒙古联合起来建立蒙古自治国的支柱。

### （2）设立行政统监部

为了把政府的文职人员集中在纯蒙地带，备作日本失败后另谋出路为我驱使，特在察哈尔盟明安旗设立行政统监部。并派出一部分蒙古职员，着手勘察地址，准备房屋，运送物资，备作第一步退守的根据地，第二步再向林西、经棚一带集中。

### （3）处理日伪军警残杀丰镇县九宫道徒事件

一九四三年九月间，丰镇县警察署派员下乡，催交公粮、逼要烟土，迫令连夜送缴，无力缴纳者都被严刑拷打。九宫道的道士李伍仁等起而抗辩，也被殴打，因此激起全村民愤，聚众一千余人，手持斧头镰刀，群起暴动，打死胡姓翻译一人，打跑了警察队，缴枪十余枝。丰镇县又调派军警三百余人，将聚众暴动的民众包围，开

枪射击，结果打死打伤的民众甚多，焚烧民房数间。这次残酷的镇压，民怨沸腾，我兼理政务院长后，认为这是收买人心的最好机会，便提出将丰镇县县长、日系参事官、警察队长、惩戒免官，以平民愤。内政部次长早坂冬男，还不同意，我是坚持非办不可。这时我因有事回旗，暂由李守信代理政务院长，临行前对李守信说：

“假如对丰镇县长、参事官、警察队长不实行免职，我就不回来了。”这时日本人由于太平洋战争失利，对我的控制比前松些，早坂冬男也就再不坚持了，结果是按我的意见实行。警察队长安恩达被免官后，特到张家口见我诉说委屈。我认为他是李守信的旧部，今后尚有需用之处，便安慰他说：“你的委屈我知道。这个事情不是你主持干的，而是日本人主持干的，但你是参与人之一，不得不把你免官。希你善体我意，暂时忍耐，今后遇有机会还会重用你”我当面又给他蒙疆币一万元。这是我用明惩暗奖的两面手法，阳则示好被害民众，阴则奖励杀人罪犯，希望今后更好为我效忠。

#### （4）召开县长、绅士会议

我知道日寇强行的粮谷“集荷”是最不得人心的事情，因此，开县长、绅士会议，提出整顿粮谷“集荷”问题。我讲话说：“自从实行粮谷‘集荷’以后，把民众血汗换来的粮谷‘集荷’起来以后，不加妥善保管，任令人马践踏、风吹雨打，以致霉烂损失，实在对不起民众。”我说这话的目的，是希望取得与会士绅的同情，并且通过他们为我宣传，博得当地民众的称赞，意图日本失败后，不至于反对我。我讲话之后，与会绅士多表赞同，嗣又谈到处理丰镇县九官道事件问题，表示我惩罚失职官吏，对死伤民众甚为痛心。集宁县绅士张某（系张书常之父）说：丰镇县九官道不幸事件的发生，德主席非常痛心我建议在建事地点建碑一座，上书“罪在吾身”四字，这是主席下罪己诏的意思，用以纪念这次不幸的事件。”当时他这个恭维性的建议，我很感舒服，对他极口称赞，他也自鸣得意。但是参与会议的内政部次长早坂冬男，听到我的讲话

之后，甚为不满，向内政部长丁其昌说：“德主席在绅士会议讲话时，有反对粮谷‘集荷’的意思，是不愿再对大东亚战争协力吧。”虽然他这样疑忌和不满，但还未正式提出反对而惹起大的麻烦。

我正在积极准备退守之际，太平洋战局日趋紧张，联合国军连续轰炸日本本土，欧洲战局，更是急转直下，苏联红军很快地解放了柏林。接着就出兵东北，打垮号称百万的日本关东军，帮助中国解放了东北人民。日本天皇裕仁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宣布向联合国无条件投降。苏蒙军很快进至锡、察两盟，解放了张北县城，八路军也迫近张家口周围。这时李守信正在张家口，给宝贵廷拍发急电，叫把蒙古军各师调至张家口和阳高县一带。因为铁路已被八路军切断、调动军队确有困难，同时宝贵廷为谋个人出路，打算投靠傅作义，也不愿执行我和李守信调遣军队的命令。驻在锡、察盟的蒙古军已被苏蒙联军缴械，张家口仅有少数警察队，日本军部对我表示他们业已奉命投降，希望我们自找出路，并由中岛万藏前来向我和李守信等说：“谁如愿去日本避难，日本军部可以为之准备飞机。”嗣由李守信向张家口渡边警备司令官询问可否去日本？他答说：“不行！我们日本已是战败国，对战胜国就得无条件服从。人家如果向我们要人，我国就得交出来。”这时在张家口的各机关蒙族职员，纷集我的官邸，有的主张南下投靠国民党政府，有的主张北上投向蒙古人民共和国，有的主张就地等待八路军解放，议论纷纭，莫衷一是。我这时，也是徘徊不定，经与一部分蒙族职员商量，决定分向各方面谋求出路。当前最好先派代表向苏蒙联军试探接洽，结果就派定亢仁、朝克巴达尔夫、特木耳都克什为代表前往接洽。但因一时仓卒，既未带证明文件、也没有俄语翻译，就连把在押的外蒙政治犯放出来充当俄语翻译和联络人这个事情都未想起来。同时也认为以蒙疆政府名义发给证明文件，苏蒙联军是否接受也是问题。亢仁等三人就仓卒乘上汽车，和日本军部联络通过军事



前线，前往张北与苏蒙联军进行联络。后来听亢仁说，他们到了张北就被当成俘虏拘留起来。原因是他们虽然见到了苏军上校瓦斯列克，蒙古人民共和国少将色恩道说明来意，但斯、色却表示说：“你们过去既与苏蒙没有联系，现在又无具体表现，更未带证明文件说明你们的代表身份，日本虽然宣布无条件投降，而前方军队仍在对峙，这简直是把关于国际交涉的事情当成儿戏，无法承认你们是代表，只有把你们当作俘虏对待，暂时拘留起来。”从此，即与我失去通讯联络。适在此时，苏蒙联军的飞机飞临张家口上空，散发传单，痛骂我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官吏们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爪牙，号召群众起来斗争。我认为联络苏蒙这条路已属无望，又不愿迎接八路军解放张家口，只有走投靠蒋介石这条路。恰在这时“军统”特务王野人、梁芝祥和国民党绥蒙党部特派员于福康、杨润霖等前来张家口，拉拢我和李守信等投靠国民党，并由王野人给我和李守信送来军统局的电报，内容大意是：兹经请准派德王为蒙旗先遣军总司令，李守信为热察先遣军总司令。希即重整军队，严防共军，如果武器不足，应即收缴日军武器，装备军队。台端训练军民，忍辱负重有年，现在为党国效忠，正是其时，务要保卫绥察蒙旗地方，勿使共军得逞。”这时吴鹤龄也由北平返张，劝我不要和外蒙联络，应即赴平设法与蒋介石接洽。我也认为我曾和蒋介石有过联系，可能得到他的谅解，因此就决定先去北平。并由超苦拔都尔拟具电报，电请蒋介石派来飞机，以便前往重庆，交由王野人派人送到北平拍发。日本人知道我要走，为了“酬劳”，特由中岛万藏给我送来几车大烟板子，共十五万两，让我分一部分给职员，一部分归我花用。我因为野心未死，仍想东山再起，深恐临行时拿上几车大烟土，落一个贩卖大烟土客的名声，对于我的政治前途有影响，并怕分赃不均引起争吵的麻烦，就拒绝未收。但临行时却带了蒙疆票三亿元，银洋三万元，到北平后，除分给大家外，给我买了一处住宅。至于三万银元，中岛万藏移交我花用，我听了中岛的建

议，恐怕银元贬值，换成法币。结果法币贬值更大，很快就花完了。

我既然决定南下投蒋，于九月十九日派人通知中上级蒙族职员连夜在车站集合，我和李守信即率同到站职员，乘上备好的专车赴平。

在日寇统治下，成立了六年之久的伪蒙疆联 自治政府，随着日寇的失败，而瓦解了。

---

（注一）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统辖地区是：锡林郭 勒盟、乌兰察布盟全境，察哈尔盟的部分地区和伊克昭盟黄河以北部分地区。首府设在绥远省会归绥市——即今呼和浩特市。

（注二）伪察南自治政府统辖地区是现在河北省蔚县、宣化周围各县 和张家口市、首府设在张家口市。

（注三）伪晋北自治政府统辖地区基本上是现山西省大同专区所属各县，首府设在大同市。

## 北 平 三 年

蒙疆政权随着日寇投降而垮台，我于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日离开张家口到了北平。表面上做了闭门谢客、销声匿迹、不问政治的寓公，实际上仍是野心未死，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企图卷土重来。我狂妄自大地认为自己是“蒙古的中心人物”，仍以民族复兴事业为己任，因此便找寻机会，奔走联络，进行所谓“蒙古高度自治”的活动，实际上仍是作反共反人民的勾当。兹将我在这一时期的政治活动，分别叙述于下。

### （一）我和蒋政权官员们的联络

我到北平不几天，从广播中听到蒋介石讲话，谈到承认外蒙古独立及内蒙古自治问题，就大喜过望。认为趁此机会，仍可谋求内蒙古高度自治，便电蒋表示要亲往重庆，面报蒙事，请派飞机来接。蒋复电叫我和军事委员会驻平代表何其巩接洽，安排飞机前往。我即前往与何接洽。何说：“现在飞机正忙于运送接收人员和军队，日本的飞机尚未接收过来，实无飞机可派。”因此，又由乌臻瑞与胡宗南的驻平办事处联络飞机，结果胡宗南派高参刘庆曾乘飞机来接。

我在出发前，想把吴鹤龄留下，办理善后事宜，不意吴鹤龄却怫然作色地对我说：“蒙古事情不是由你一个人包办，大家都有分。我正想乘这个机会，飞往重庆面见蒋委员长，报告我受他的指示在蒙工作的经过，洗刷我的污点，你却不叫我去，我是碍难从命，非去不可。”他既执意要去，我也不好强留。我就借同李守信，

吴鹤龄、乌古廷、超苦拔都尔（陈绍武）及随员色登道尔吉、郭木布札布、乌臻和等飞往西安，旋又由胡宗南派员送至宝鸡改成民航机飞往重庆。军统局特派马汉三率领数人，拿着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贺国光的名片到飞机场迎接，当即把我们安排在军统招待所“激庐”居住。过了两三天，军统局局长戴笠特从南京乘坐飞机前来，为我等一行设宴洗尘，席间戴笠极力吹嘘“国军”力量的强大，说些“打共产党必操胜算”的大话。宴后又谈关于结集伪蒙军队进攻八路军的问题。继而贺国光前来访问，认为我们在“激庐”居住不便，当由蒙藏委员会派蒙事处处长楚明善前来接我们转到蒙藏招待所居住。

到了九月十日左右，蒋介石就分别而见我们。当我前往见蒋时，蒋特从客厅中的座位上站起来，表示很亲切的样子说：“啊！你来咧，来了，快到屋里坐。”接着他就问我说：“你们一同来了几个人？”我当具以实告。继而他说：“吴鹤龄来了，好！我要见见他。”紧接着他就问我：“你还有多少军队？”我说：“现在蒙古军还有几个师，一个直属炮兵队，并又组织五个警卫师，还计划把警察队改编为十六个旅。”他又追问：“现在你究竟还有多少兵呀？”我答：“李守信当过蒙古军的总司令，俟和他询明情况后，再来报告委员长。”他说：“噢！原来李守信就是你的总司令呀！”接着谈到承认外蒙独立问题。我想趁此机会，请求许可内蒙高度自治，刚说了：“我这些年来是在委员长的领导下，本着三民主义扶助弱小民族使之自决自治的精神，谋求蒙古民族的独立自主……”几句话，蒋就表示不耐烦的样子，他就扭转话题，问了些生活小事，就叫我和李守信一同吃饭。席间蒋向李守信询问蒙古军情况，尚有几个师旅和多少兵？李当据以回答。饭后，我又向蒋说：“现在蒙古虽然仍是沿袭王公制度，但我想向民主进步方面做，以适应时代的精神。”蒋说：“蒙古的王公制度是可以存在的，只要有民主精神就行。”谈至此，我们就一齐告辞。

继而蒋又分别接见李守信、吴鹤龄和乌古廷。吴鹤龄见蒋时，也曾要求内蒙自治，蒋很不客气地说：“你们做了日本的官，现在还没有下文，国民参政会有人对你们反对的很厉害，你们还要求自治呢？内蒙是蒙汉杂居的地方，你们自治，把汉人都撵出去吗？”超苦拔都尔见蒋时，蒋的侍从秘书曹圣芬因和他有同学关系，特别关照他说：“见到委员长时，千万不要说蒙古独立，因为前次德王见委员长时，曾说过‘谋求蒙古独立’之言，我在一旁侍立，看到委员长很不高兴的样子。蒋委员长嘱我转告你，关于德王的处境，他是谅解的，但是现在有人对德王很不谅解，你要好好地劝劝，今后最好保持缄默，忍耐一时，徐图未来。不要老唱高调，喊叫什么蒙古高度自治，给人以不良印象，自绝政治前途。至于德王的日常生活和政治前途问题，蒋说他一定随时照顾，叫他放心。”

我见蒋后又分别到各方活动，曾经拜访过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军政部长陈诚、外交部长王士杰、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罗良鉴、中央党部组织部长陈立夫、国民党中央委员陈果夫、考试院长戴传贤、监察院长于右任、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参谋总长程潜等，无非谈些蒙旗情况。记得程潜对我说：“你们不得已留在沦陷区，是可以原谅的。对于从抗战后方跑到敌人那里当汉奸的汪精卫之流，是不能饶恕的。”吴铁城还设宴招待我们，在宴席间他曾说过：“你们对抗战虽然没有起到积极的作用，但在消极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吴鹤龄见蒋后，就忙着组织蒙古宣导团，请商震转呈蒋介石核示，并征询我的意见，请我担任宣导团主任。我无心就任这个职务，就对他说：“你干吧，我不干。”嗣后我去拜访商震，商震对我说：“蒋委员长现去西昌巡视，我曾和张治中商量，给蒋委员长去电报，请示给你蒙旗宣抚的名义，当接来电，答复暂缓。”商将来往电报给我看，我见蒋答复他的电报中，给吴鹤龄和乌古廷各五十万法币，并有令我等返平等语。蒋从西昌返后，又叫商震转告我，

催促李守信、吴鹤龄、乌古廷等返平，叫我留下，还有要紧的话说。于是李守信、吴鹤龄、乌古廷等就相继返平，我暂留重庆等候见蒋，经几次催促商震转蒋约期见我，总是推说有事，一再延缓。嗣楚明善由外蒙返回，向蒋报告监督外蒙举行公民投票经过，便中向蒋建议，每月给我补助生活费五十万元。蒋当即批准，并表示叫我回北平，于是才约我再次见面。这次见蒋时，他突然问我：“你马上就想内蒙独立吗？”接着他又自己改口说：“你马上要想内蒙自治吗？”我委婉地对他说：“现在外蒙已经独立，对于内蒙问题，总要有个办法才好，希望委员长指示。”他答应我说：“俟把共产党解决了，蒙古的事情好办。”从此我认为要求内蒙高度自治问题，已归无望，在重庆不再活动，白天游山逛景，晚间观看电影戏剧，以消磨时光，又在重庆悠闲自在地逗留一个时期，才偕同超苦拔都尔、包登道尔吉、郭木布札布等回北平。

我返平后，约有两个多月，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部长陈立夫给我和李守信、吴鹤龄及北平市长熊斌来电谓：“奉总裁谕，对于在伪蒙疆政府的蒙籍官员，一律不咎既往，并予尽量安置，量才使用。”曾在伪蒙疆政府当过内政部长的丁其昌，从李守信处看到这个电报，认为自己是汉人，过去与国民党政府又无联络，当不在既往不咎之列，恐怕治以汉奸之罪，并且看到已把当过伪蒙疆政府产业部长的杜运宇（汉族）逮捕，丁其昌即于一九四六年旧历正月初一，用手枪自击头部身死。丁其昌这个人把国民党政府的法令看得太严重了，假如他不自杀，有我和李守信居中说情，是不会治以汉奸之罪的。

一九四五年冬，蒋介石到北平视察，我想去见他，派超苦巴都尔先去联络，回来报告我说，蒋介石很忙，无暇接见。但蒋却把李守信找去，面令速到东北，招集旧部，募集新兵，尽量扩充武装，配合“剿共”工作。对我又不好意思太冷淡，特派他的侍从秘书曹圣芬到我的住所访问。曹对我说：“蒋委员长一向主张内蒙可以实

行高度自治，预备将来收复外蒙。”这年十月间国，共进行谈判，缔结双十协定，一九四六年春又成立军事调停处执行部，听到有马歇尔建议把张家口划归八路军之说。我即电蒋，提出张家口与蒙旗关系密切，为西北重镇交通枢纽，地势重要，不应叫八路“盘据”，应从速收复，值此谈判之际，务请注意及此。蒋复电夸奖我：“公忠体国”。我的秘书色登道尔吉看到这个电报，很欢喜地对我说：“你看！蒋委员长对你很奖励哪。”

一九四七年蒋又来平，我去见他，特为杜运宇求情说：“委员长既然对我原谅，对于在蒙疆工作过的无论蒙汉人，亦请给予不咎既往的宽容。曾在蒙疆政府当过部长的杜运宇，尚在监狱管理之中，希望予以释放。”蒋答复说：“可以，只要他不当共产党，准予释放。”果然为时不久，杜运宇就被释放出狱了。

一九四八年秋，辽沈解放，蒋介石特来北平布置军事，企图作最后的挣扎。我去见他，试探地谈到内蒙高度自治问题，他很颓丧地说：“如果共产党不灭，民族也没有了，国家也没有了。”我也就附和着说：“现在是戡乱要紧。”接着他又问我说：“你有什么困难没有？如果有困难可尽量向我说，我当设法解决。”他的意思是要给我一些钱。我说：“没有什么困难。”他又问我说：“你想到南京去吗？你想到杭州去玩玩吗？你还有什么话说没有？”我说：“没什么话可说。”就告辞而去，这是我在北平期间和蒋最后见的一面。

在这一时期，我和傅作义也有过接触。我初到北平时他曾经来过信，我到重庆后又给我去过电报，希望我督导伪蒙军队和蒙旗地方力量，协助他安定地方工作。一九四六年，我听说他到北平，就给他打电话表示要去看他，他说他要来看我。当他来到我的住所时，我谈到在五原战役前夕，想以赴前线慰问军队为名，借机出走的一般经过。他问我说：“五原战役后，我把被俘的刘大光放回去见你，并嘱咐他好些话向你，他没有见到你吗？”我说：“没

有。”接着他又问我说：“听说你在蒙疆政府时期，反对念汉文有此事吗？”我说：“那时纯蒙地区的小学念日文或汉文我都反对，因为恐怕年龄幼小的学生，同时学习三种文字负担不了，所以只准念蒙文。”继而我请求他释放尚在管押的胡格金台（曾任伪巴彦塔拉盟总务处长），他说：“这事好办，我回去说说好了。”我又说：“有机会我想去绥远看看。”他说：“欢迎你去。”他回绥远后不久，就来电说已把胡格金台释放了。以后傅还派王任之来请我到张家口去居住，我恐怕在他的势力范围之下，身不由己，没有表示意见。傅还派“张垣绥靖公署”驻平办事处处长李腾九给我送来五万元。傅作义就任华北“剿总”后，楚溪春对我说：“傅总司令很忙，没有时间来看你，很以为歉，叫我代他向你致意。”我和傅作义虽然发生多次的矛盾，存有成见，但当时我却希望他“剿共”成功。这说明我反动到了极点，只要傅作义反共，我就可以消除成见，表示赞同。

当北平局势紧张时，华北“剿总”交际处长李腾九由超苦拔都尔领来见我说：“傅总司令早想和你谈谈，总因事忙抽不出时间来，特派我来看看你。北平局势现已日趋紧张，你打算到南方去吗？依我看大局业已如此，往南方去没有什么意思。”我说：“我也不愿意离开蒙古地方和民众到南方去，愿意到蒙旗去活动，但是现在张家口已经去不成，到什么地方去呢？”他说：“我把你的意思转达上去。”过了一、二天，他又来见我说：“你既然打算到蒙旗去，最好由我们备一架飞机把你先送到绥远去，但明着走还不相当，应当改换衣着或穿军装去。”我说：“容我考虑考虑再说。”这次李腾九和我会谈，是含糊其辞的，究竟是什么用意，我也弄不清楚。

## （二）我和蒙旗人士的接触

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后，东部盟旗在苏蒙军的支持下，在王爷



庙（乌兰浩特）成立了东蒙自治政府。因苏蒙有过须向中国政府请求许可的嘱托，特派玛尼巴达拉、桑杰札布等五代表前来北平，向国民党政府请求许可东蒙自治，北平行营当优予招待。军统特务梁芝祥见到玛尼巴达拉更是如获至宝，整日不离左右。适这时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到平，当即由梁芝祥介绍玛与戴笠见面。玛和戴笠见面后曾对我说：“我和戴笠会谈结果很好，他说他一定向蒋委员长报告，并说蒋委员长是国际上的‘伟大人物’，只要你们拥护中央，进行反共，我想东蒙自治是好办的，可能获得蒋委员长的许可。”戴笠返回南京时即因飞机失事丧命。后来郑介民来平参与军统执行部工作，又经梁芝祥介绍玛尼巴达拉与郑见面，所谈内容如何我不知其详。但不久听说玛尼巴达拉曾接受梁芝祥的拉拢，军统所派的特务人员携带电台随他前往王爷庙秘密进行特务工作。嗣伍如恭格从王爷庙来平，带来东蒙自治政府主席博彦满都给玛尼巴达拉的密信，伍如恭格曾在伪蒙政府工作过，所以先把这封密信交给我看，记得内容大意是：“我等已和中国共产党内蒙负责人乌兰夫在赤峰见面了。希不要再和国民党政府方面请求许可东蒙自治，从速返回。”当玛尼巴达拉返回王爷庙的前夕，我曾先往看他，就住在招待他的屋中。次日临行之前，他特别嘱咐他的一行人员说：“那个中医大夫和他所带的必须随同我们一同走。”据我推断，这个中医大夫和所谓他所带的，可能就是军统所派的特务人员和电台。

玛尼巴达拉在北平期间，也曾表示请我到王爷庙去，共同致力蒙古自治事业。我答复他说：“我需要观看一下局势变化再说，如果将来我去时，在博彦满都之下当一个部长就行了，不要为我的地位问题费考虑。”玛当即指示他的随从人员说：“快把这一段话记下，这一段话很重要。”他和我谈到恢复百灵庙蒙政会问题时说：“吴鹤龄前来看我，说国民党×中全会上有过许可内蒙自治之议，我们正可趁此机会向中央请求恢复百灵庙蒙政会。可是我们这位德王爷连这个都不愿意做，不知他想干什么。这可不是我传闲话，是提醒你

的注意。”的确吴鹤龄对我有过这个建议，但我认为蒙政会既是过去的事情，又是地方性质的自治，不能满足我的政治欲望。因我当时一心想进行高度自治，对于恢复蒙政会工作，已不感兴趣。

一九四五年冬，国民党察哈尔蒙旗党部主任特派员于绍文，为了报销领到的大宗党费和进行“策反”●工作，请我介绍锡盟十旗的国民党书记长的人选。我为了安置在我处居住的赋闲人员，以减少我对他们的供应负担，并从中拉拢蒙旗力量，供我的驱使利用，就给他开了一个名单，介绍丹巴色楞为西阿嘎旗书记长，道尔吉色楞为西苏尼特旗书记长，还有根柱、色登道尔吉等。于绍文令他们深入蒙旗工作，其中有的人怕被八路军抓住，不敢前往，就在北平张家口两地鬼混，按月领薪。例如色登道尔吉和道尔吉色楞二人，不仅连谎报情况虚应故事都不做，与于绍文也不大亲近，后被解除了书记长的职务。唯有丹巴色楞很会应付，有一次说是要深入蒙旗，进行“策反”工作，实际上到大同绕了一个圈子而回，捏报一些情况，骗领党费，居然得到赞许，把他调任为西苏尼特旗的书记长。并因他惯会奔走钻营，捏造情报，自我吹捧，还得到“张垣绥靖公署”的青睞。有一次他到北平见我，说是“张垣绥靖公署”要给他一个上校保安队长，并说只要我表示同意出名保荐就无问题。我因为有我的想法，没有答应，他对我很不满意。

约在一九四六年春，东阿巴嘎旗札萨克补达巴拉派旺吉勒巴陞到平见我，并找札奇斯钦说：“补王已和外蒙取得联系并接受了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使命，调查国民党这方面的情形。因此，特叫我来报告你，并叫我询问你这方面是否有办法？”我告诉他说：“要求内蒙高度自治，或有可能。但现在不宜乱动，应静待时机的到来，务要回去嘱咐补王，目前不要盲目行动。”不意在国民党军进占张家口，内蒙自治运动联合会迁至贝子庙（锡林浩特）时，布里雅特

●：一九四五年，苏蒙联军从日本军手内解放了察哈尔各蒙旗，其后即移交给晋察北边区政府统辖。

部落总管仁亲多尔济组织反动武装，企图扰乱锡林浩特的安全，东苏尼特旗协理仲乃与仁亲也有勾结。这时补达巴拉不听我的嘱咐，竟与仁亲勾结起来，进行反动活动。为时不久，这一股反动武装，就被当地人民组织起来的革命武装所平定，补达巴拉被捕，仲乃后来畏罪自杀，仁亲率领残部逃至多伦。自居是锡盟代表，经由张家口到达北平，勾结军统特务马汉三，积极进行反动活动，并用剥削布里雅特部落人民的血汗所得来的金钱，买了一辆吉普车。我从张家口带来的亲卫队百余人，因给养无着，就拨归仁亲统带。但这一百多人把枪交给仁亲后，就零星逃散，有的回了乌盟老家，有的流浪在土木尔台一带，没有起到什么作用。这些人的暴乱，虽然不完全由于我的策动，却受到我投靠国民党走向反动道路的影响，我是不能逃脱罪责的。

国民党军占领张家口后，西苏尼特旗的梅伦佐领帕克巴在国民党特务人员刘铁夫的指使下，策动旗保安队排长根敦拉出士兵三十多人到了土木尔台，梅伦嘎拉桑端都布也跟着跑出来。帕克巴和嘎拉桑端都布二人经由张家口前往北平见我，述说策动保安队的经过，并说阿拉坦瓦齐尔（我的侄子）对我不忠实，投降八路军，当了西苏尼特旗的旗长。我对他们说：“我旗在八路军进入的情况下，阿拉坦瓦齐尔那样做就对了。”接着我又对嘎拉桑端都布说：“你不是没有策动根敦拉出保安队吗？那你还可以回到旗里去。”他们二人对我的这番话，惶惑不解，便一同返回张家口，嘎拉桑端都布返回本旗家中，帕克巴不敢回旗，便在土木尔台一带逗留。我当时并不是真的同意阿拉坦瓦齐尔投向共产党，而是不愿蒙人为察省当局所利用。至于叫嘎拉桑端都布回旗，是希望他告知旗民，策动根敦拉出保安队之事不是我干的，以减少旗民对我的反感。

一九四七年察哈尔省的汽车队到达西苏尼特旗所在地达赖陈吉庙，旗长阿拉坦瓦齐尔因为傅作义业已占领张家口，就表现动摇，随着察省汽车队跑出来，经由张家口前往北平见我，看到我毫无办

法，大失所望，深感后悔。阿拉坦瓦齐尔一方面受了札奇斯钦和达格瓦齐尔的拉拢，参加蒙古青年同盟，另一方面因在锡盟初经解放时，曾和外蒙有过联络，嗣又转与苏联领事馆和外蒙联络，做争取我走向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工作。我曾问过他联络苏蒙的情形，他对我说：“我与达格瓦齐尔曾到苏联领事馆去过，苏联领事馆要给我五十元美金，我没要。”这时我虽然想投靠美帝国主义，但在人民解放军日趋胜利、国民党军日趋溃败之际，也想留一个退步，就听任阿拉坦瓦齐尔潜入蒙地与蒙古人民共和国边境上的工作人员秘密进行联络了。后来我从阿拉善旗的拐子湖前往蒙古人民共和国去，就是由于阿拉坦瓦齐尔的引线和拢拉。

约在一九四六年冬，东苏尼特旗珠尔亥其喇嘛贡嘎到平见我，表示要组织地方武装进行反共。吴鹤龄认为贡嘎“倾心内向”，即向北平行营反映，并领他到北平行营活动，请求发给枪械，返旗组织地方武装，进行反共。北平行营即转请国民党国防部批发武器。嗣后听说交由“张垣绥靖公署”代领转发，却没有发到贡嘎的手里，贡嘎企图组织地方反动武装之事，也就中途停止进行。

一九四七年春，曾当过西乌珠穆沁旗包衣达<sup>①</sup>的胡图凌阿到平见我，表示要进行反共。军统特务梁芝祥在我处见到了他，认为是奇货可居，就介绍他与军统在北平负责人马汉三见面，又由马汉三准备飞机把他送到开鲁与李守信联络，设法进入西乌珠穆沁旗。但他到开鲁不久，解放军就解放了开鲁，把他俘虏解送到王爷庙（乌兰浩特）去。适在这时内蒙古人民代表大会正在王爷庙召开，参与大会的西乌珠穆沁旗的代表等，不知他在搞反动勾当，念在乡谊，出名具保，内蒙古自治政府就将他释放。不意他获释后，又在多伦纠集一些民族败类，组织反动武装，准备进入西乌珠穆沁旗。当他到达东浩济特旗<sup>②</sup>时，该旗地方进步人士就听到了这个消息，惟恐对

①：包衣达是旗级机关的小官员的职称。

②：东浩济特旗在今锡盟西乌珠穆沁旗西部一带地区。

内蒙党委派在该旗的工作人员补旭等不利。因补旭等来到该旗后，帮助建立该旗人民政府，进行民主改革，争取团结各界人士，深得人心，大家对补旭等安全至为关心，就劝补旭等暂离该旗，免遭不测。补旭等表示坚持工作岗位，不能随便离开。并说：“如果胡图凌阿真有为蒙古之心，是可以争取过来，共同合作的。”当胡图凌阿到达该旗后，补旭等还出面与其开诚相见，劝他归向人民。但胡图凌阿在北平时既和军统特务马汉三有过联系，到达多伦后，“张垣绥靖公署”又助以枪械，因此一心反共反人民，不为补旭等劝告所动。竟指挥他所率领的反动武装，将补旭等杀害，又搜捕该旗进步人士，加以蒙古八路之名，杀害了数人。该旗进步人士桑嘎听说此事，躲到该旗北部，得免于难。胡图凌阿杀害补旭及地方进步人士后，凶形毕露，更加猖狂，倒行逆施，荼毒人民，强迫该旗蒙民，参加他的军队，扩充反动武装力量达五百余人。内蒙古自治政府特派军队前来围剿，胡图凌阿自知力不能敌，便胁迫该旗年龄尚幼的旗长米济德章楚布逃到张家口。“张垣绥靖公署”对于米济德章楚布这位“小王爷”备极礼遇，对于胡图凌阿又给以司令的头衔，并为之补充武装。于是他更加洋洋得意，又率队伍返旗，继续进行反共反人民的罪行。胡图凌阿率领乌合之众到达该旗后，在乌兰哈拉克和喇嘛仓勒两地，一经与内蒙古自治政府所派军队接触，便被打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被迫退至内外蒙交界地带，被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军队解除了武装，把胡图凌阿送回西乌珠穆沁旗，受到当地人民的惩罚。迨至张家口解放，胡图凌阿之弟和该旗官员托克托胡等，带同米济德章楚布逃到阿拉善旗定远营去投奔我，我从托克托胡陈述中才知道这一段事情的经过。这一段事情虽不完全是我的亲身经历，但在该旗来说，还是一段重要史料。

### （三）我和美帝国主义的勾结

我在日寇投降后就投靠了蒋介石。当时认为他既掌握大量的军队，又操纵着国家的政权，实力雄厚，不可一世，八路军绝非他的对手。同时还想请求蒋介石的恩赐，实现内蒙高度自治的遂梦。但又看到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贪污腐败，民怨沸腾；国民党军队的士兵不愿打内战，士气十分低落。认为这样将把战事拖下去，拖来拖去，第三次世界大战必然发生。美帝国主义拥有原子武器和强大的武力，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中有获胜利的可能。我基于以上错误的看法，就想转而投靠美帝国主义，企图依靠美帝国主义的力量，重上政治午台。认为美国与蒙古远隔重洋，基于“远交近攻”的观点，不会象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那样压迫控制蒙古，我可以借用美国的力量，掌握蒙古政权后，就可为所欲为，实现继续统治蒙古的野心。因此，就寻觅和美帝国主义拉拢的引线。

一九四五年冬，美国特务人员拉铁摩尔来平，因在百灵庙蒙政会时期，他和我就已相识，所以他到平后，即到我的住所访问，适我外出未见。后我去六国饭店访问，并对他说：“你是知道蒙古事情最清楚的人，希望你在美国宣传蒙古问题。”他说：“蒙古事情我是知道的，但是美国人和美国政府还不知道，得慢慢地来。现在我急于到别处去，调查一宗重要事情，关于宣传蒙古问题，以后再谈。”他走后曾给我来过一次英文信，我叫包国义和札奇斯钦代我写了一封英文信回复他，来往信件内容大意，仍是关于宣传蒙古问题。继我复信之后，郭木布札普等几个青年人，曾给拉铁摩尔去信，请他帮助把外蒙从苏联分离出来，提到联合国去。

到了一九四六年冬，陶克陶介绍美国新闻处特务人员李嘉胜前来见我，请我介绍两个蒙古青年当电务人员，到王爷庙去做秘密工

作。我曾给他介绍伊国璜和王桂丛二人。伊国璜去后不久，又返回见我说：“在王爷庙做破坏民族工作，实感于心有愧，不愿再做这个工作，所以返回，再不想去。”王桂丛嗣亦返回，在平居住。嗣后李嘉胜特在六国饭店请我吃饭，在未进餐前他特赠我白银镯子一支，并给我介绍陪同吃饭的美国人白智仁和司马笑二人（都是美国新闻处的特务人员，白智仁以辅仁大学的学生名义作掩护）。宴席间李嘉胜说他要到日本去，我嘱咐他如见到麦克阿瑟将军时，务要请他把蒙古问题提到联合国去。

札奇斯钦曾经邀我在他家中和美国大使馆的女职员若斯冰见面，我向若斯冰说：“现在外蒙业已独立建国，你们美国为什么还不承认呢？如果承认时，有美国使节驻在外蒙，不是可以得到一些消息吗？”她答复我说：“因为马歇尔将军不愿意多一个倾向俄方的国家。”接着我请她在美国宣传蒙古问题，并给她写了一付蒙文对联如次：“不因路远而不走，只要走就能走到；不因物重而不搬，只要搬就能搬动。”这是摘自成吉思汗语录，寓有请她注意蒙古问题之意。

关于在美帝国主义操纵下的反动组织——“蒙古青年同盟”，据我所知是席振铎、贾鸿珠（纪贞甫）等组织成立的。听说起初还不愿意吸收喀喇沁人参加，但把札奇斯钦这个喀喇沁右旗人视为例外，特别吸收他参加。札奇斯钦去南京时曾给我来信，说是已和美国人进一步拉上关系，嘱我看过信后立即烧掉，没有谈到进行组织蒙古青年同盟问题。席振铎由南京来平，特给我送来法币二百万元。我问这是谁的钱，他说这是我们大家伙的钱，也没有谈到“蒙古青年同盟”问题。实际上这笔款绝不是席振铎对我的慷慨资助，可能是美帝国主义通过席振铎用钱来拉拢我的。我知道“蒙古青年同盟”这个反动组织一些情况，还是道尔吉色楞告知的。道尔吉色楞在平一向就住在我的住宅，有一天晚上他回来的很迟，喝的醺醺大醉，翌晨醒来，我问他说：“你昨晚到那里去了？怎么喝醉了？”他

说：“昨晚我参加了‘蒙古青年同盟’当了盟员，大家聚餐都以酒来向我祝贺，我一时高兴就喝醉了。”我又问他：“都有哪些人参加呢？”他说：“有札奇斯钦、达格瓦索尔、郭木布札布等参加。”至于其他情况，因为他是甫经参加，又未担任重要职务，不很详细知道。嗣后札奇斯钦由南京返平前来见我，才听他说：“‘蒙古青年同盟’是以‘政治民主，经济合作’为宗旨。对于‘政治民主’美国人没意见，对于‘经济合作’美国大使馆的女职员若斯冰很不同意，经我详细解说才确定下来。”我虽然没有参加这个组织，但从此便和他们发生了关系，他们想捧我做招牌，我想把这个反动组织做为拥护我的政治团体，进一步和帝美国主义拉拢关系。

辽沈解放之后，北平局势渐趋紧张，美国新闻处在上海工作的特务人员马滋来平，札奇斯钦约我在赵宝纲（补英达赖的儿子）家中与马滋见面。我说：“你们美国如果愿意帮助蒙古的话，是否可以抛开蒋介石，我们直接进行联络。”他说：“完全可以，我们今后就直接进行”。嗣后札奇斯钦请他接洽美国飞机前来接我离开北平，马滋答应可以。他回去以后，特接洽美国飞机一架由兰州起飞到平接我，并催促我马上就走。我因一时准备不及，而这时北平局势还未到非常紧张的局面，所以没有坐这架美国飞机离平。后来吴鹤龄和我说：“马滋说，他曾化了一百二十两金子雇了一架飞机请一位空军上尉驾驶去接德王，德王却未乘坐前来，实在辜负了他的好意。”嗣后我在阿拉善旗进行“西蒙自治”时，又和马滋见过面，俟撰写关于“西盟自治”资料时，再为详细叙述。

#### 四、由北平到南京

由于我一心投靠美帝国主义，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企图卷土重来，再掌蒙古政权。到了北平解放前夕，还不想归向人民怀抱。当人民解放军包围北平城，局势非常紧张的时候，我也吴鹤龄请



其洽派飞机接我。玛哈希力（赵文儒）、札拉嘎穆济（白景畲）、超苦拔都尔等知道我要走，特邀请我在东安市场“森隆”西餐馆聚餐，恳切地劝我不要走。其中以玛哈希力劝说最切，他对我说：“现在国民党军已经节节败退，解放军已经节节胜利，胜败之局，已见分晓，还走干什么？我听到乌勒吉敖喜尔说过，只要你归向人民，他负责保障你生命财产的安全。”我不但不为他们的恳切劝告所动，反狂妄自大地对他们说：“我是一定要走的，仍搞民族事业，一定要走。你们都知道我一向是以‘民族事业’为已任的人，不是计较个人生命财产安全的人。”札拉嘎穆济见我拿出‘民族事业’做挡箭牌就说：“你既然说到这个地步，我们再无话可说了。”玛哈希力也再不对我劝告。这时迪延其喇嘛也向我说：“北平苏联领事馆内，有一个过去在蒙旗从事教会工作的俄国人和我早就认识，他叫我转告你不要走，共产党进城后，苏联领事馆保障你的安全。”我这时虽然一心要去，但面对局势紧张的情况，又恐飞机不来走不了，陷入北平城中，就想一个退步，备作将来回旋的余地，就对迪延其喇嘛说：“你去对苏联领事馆这个人说，我是可以不走的，但如果南京派来飞机接我，我可是不能不走的。”后来，迪延其喇嘛把这个俄国人领来在嵩祝寺见我，所谈之话仍如上述，我更进一步拒绝他说：“我仍在国民党特务监视之中，希望你不要到我住宅来。”到了一九四九年元月一日，南京才把飞机派来，我在蒙藏委员会驻平办事处处长何兆麟陪同之下，偕同迪延其喇嘛、副官图门德勒格尔等，在临时开辟的南苑飞机场乘上飞机直达南京。吴鹤龄和迪力瓦等特到飞机场接我，吴鹤龄对我说：“为了接你来京，我特面见总统府军事局长俞济时，请其速派飞机，他因事忙，总是支吾推托，表示派遣飞机有困难。我对他一再坚请说，听说现在已经派飞机把胡适接来，难道德王还不如胡适重要吗？如果把德王丢在北平不管，为共产党所用，恐怕对于中央不利吧。俞济时听到我这番话后，才答应马上转请蒋总统派飞机赴平接你。”继而我去见蒋介

石，蒋对我表示抚恤和关怀之意。

有一天席振铎领我去面见美国大使司徒雷登，适蒋介石把司徒雷登请去商量重要事情，我仅见到了美国大使馆的一等秘书舒勒太斯，由席振铎当翻译，谈些有关蒙古的问题，翌日席振铎又来见我，说：“舒勒太斯对你的印象很好，说比蒋介石还强。”过了几天又由席振铎领我去会见了司徒雷登，我谈到要进行蒙古独立建国，希望美国帮助等语。司徒雷登用汉语答复我说：“你的志愿很好，必然有志竟成，我一定把你的意见转报我国政府。”嗣后我在阿旗定远营搞“西蒙自治”前往广州请愿时，又到美国大使馆见舒勒太斯，他对我说：“司徒雷登大使不在南京，他听说你来特用电报通知我，说把你前次所谈的意见，已经转报我国政府。我国政府答复，承认你能代表蒙古，今后进行蒙古工作，要以你为对象。你已经在搞起自治来，我们正研究要派一个代表，驻到你们那里。”但我回到定远营之后，时局已经紧张，美国大使馆没有来得及派人来。

我在南京时，札力瓦与我常相往来，他曾表示想去印度，后来由于南京局势趋于紧张时，他忽来向我说：“不去印度，改去美国，并且马上乘坐飞机要走。”我和吉力占太即到他的住所（章嘉驻京办事处）送行。吉力占太向我建议说：“现在迪力瓦活佛就要去美国，你可以委托他当你的私人代表，以便与美国各方面进行活动，有机会时还可以晋见杜鲁门总统。”我甚表同意，就请吉力占太执笔写了一个蒙文的委托书，原文是：“兹委托迪力瓦为我的私人代表。”写好后，就盖上了我的章交给了迪力瓦，请他代表我个人与美国各方面联络。我当时想通过迪力瓦这个人，进一步勾结美帝国主义。

蒋介石由于战事失败，被迫“退休”，李宗仁代理总统，孙科组阁当了行政院长，白云梯当了蒙藏委员会委员长，他们为我安排了与各部首脑会见的日程，计曾见过吴铁城、朱家骅等，无非是一

般的应酬联络，没有谈到什么重要问题。惟当我见到社会部谷长部正纲时，他对我说：“因为有人主和，蒋总统走了。”我说：“现在还有人主和，与共产党和得来吗？如果和的话，什么都是共产党的了。”他很赞扬我说：“你的话是非常中肯的，你的见解是至为正确的，假如人们都象你似的就对了。”

我在南京时，曾向吴鹤龄表示想去西部盟旗搞自治活动。吴鹤龄向我建议说：“你如果去最好在中央弄一个‘蒙古各盟旗自治督导长官’的头衔，驻在兰州发号施令，才能得到各盟旗的重视，不要贸然就到盟旗去。”我当时没有表示可否。吴鹤龄认为我业已默许，就促动蒙古各盟旗驻京办事处处长乌云鹏去找孙科、吴铁城等活动此事，白云梯更热心帮忙。嗣后孙科设宴招待我，特约白云梯作陪，在宴席未开始前，我和孙科、白云梯在另一屋里谈话，孙科询问白云梯进行组织‘蒙古各盟旗自治督导长官公署’之事，白云梯答称正在进行此事。宴会完了白云梯过后即责成蒙藏委员会的主管蒙事人员起草此案，并面令起草人员把理由说得要充分，办法要具体。嗣经我详细考虑，在此时局急剧转变时期，出任这个“长官”等于为人作嫁，实在没有什么意义。并想起在我要离开张家口去北平投靠国民党政府时，陈国藩、霍而义、郭木布札布、伍如恭格等青年职员们劝我说：“你是搞民族事业的人，何苦去当国民党的工具。”在北平居住期间，也有些蒙古青年对我做过这样的建议。我如出任这个“长官”，不但得不到什么好处，起不了什么作用，反会失掉一些蒙古青年的信任和拥护，实属得不偿失。想到这个地方，就去面见白云梯婉言说明在此时期，没有出任这个“长官”的必要。白云梯见我如此说法，就对我说：“那就算了吧。”就在组织蒙古各盟旗自治督导长官公署起草计划案上批以“暂缓”二字搁浅起来。因此反引起蒙藏委员会主管人员的怀疑和议论，说白云梯不同意我当这个“长官”。

我在南京期间，薛兴儒对我说立法委员中有一个刘不同，对于

蒙古问题颇感兴趣，他愿介绍前来和我谈谈，我答称可以。薛兴儒就在饭馆约我和刘不同聚餐，边吃边谈，刘不同向我建议说：“你们蒙古不是建立过大元帝国吗？你现在可以进行复国运动呀。你如果愿与美国大使馆或苏联大使馆联络时，我可以为之介绍。”我这时虽然正与美帝国主义进行勾结，但对苏联也有试试看的心里，便和他说：“请你试向苏联罗申大使谈谈关于蒙古独立建国问题。”经他联络后向我说：“罗申大使表示，在当前形势下，德王想搞蒙古独立建国，殊不相当。”

为时不久，解放大军逼近浦口，南京局势顿时紧张，国民党反动政府各机关准备疏散迁移，呈现动乱状态。蒙藏委员会当局想把我送到青海塔尔寺居住。但我这时认为国民党军队已退守西南一隅，无暇顾及蒙古问题，人民解放军尚未到达西部盟旗，正好趁此机会，进行“西蒙自治”与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分庭抗礼，便向蒙藏委员会当局表示不愿到青海去，愿到阿拉善旗居住。经征得阿旗札萨克达理札雅（达王）的同意，就乘坐飞机到了定运营（巴音浩特），纠集我的旧部李守信、德古来、吴鹤龄、乌古廷、札奇斯钦等，联络国民党政府的旧军政人员达王、白海风、巴文峻、何兆麟等，进行组织所谓“蒙古自治政府”。这个“政府”甫经成立后，西北局势又趋紧张，札奇斯钦急于要去美国，请我给他一张盖有这个“政府”大印的空白公文纸，以备应用。因为札奇斯钦是我信任的旧部，又知道他与美国拉上关系搞得很好，就毫不犹豫地给他盖有这个“政府”大印的空白公文纸一张，请他相机行事。这是因为我具有崇美思想，妄想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捞一把，实现我的政治野心。

## 搞“西蒙自治”经过

### (一) “西蒙自治”的名堂是怎样搞起来的

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包围北平，局势非常紧张的时候，蒋介石派来飞机把我接到南京。我到南京不久，国民党军又在淮海战役中溃败，解放大军很快地迫临浦口，国民党反动政府各机关呈现一片混乱状态，粉粉疏散迁移。此时我鉴于国民党反动政府摇摇欲坠，自顾不暇，而解放大军尚未到达西部盟旗，我正好趁此机会，搞“西蒙自治”，成立所谓“蒙古自治政府”，与在王爷庙（乌兰浩特）的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相对立。如果站不住脚，也想打着“蒙古自治政府”这个招牌，经由青海、西藏去印度，流亡海外，周游各国，依靠美帝国主义支持，进行宣传蒙古问题，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发生，再行卷土重来，重上政治舞台，实现继续统治蒙古人民的迷梦。

我决定要搞“西蒙自治”，就偕同达密林旺楚克、吉利占太、何兆麟、赵汇川及我的付官图们德勒格尔等，由南京乘飞机到达阿拉善旗。在南京临行时我去见李宗仁“代总统”辞行，并向他要了一个密电本，以资联络。路经武汉停留时，我即用电话与白崇禧联络，白即派汽车把我等接去，并设宴招待。在宴席间谈到和战问题，白崇禧说：“即便我们尚有一小块地方，共产党也不允许我们存在，因此，必须备战言和。”我向白也要了一个密电本。

乘飞机到达西安，我和胡宗南晤谈时，问他说：“你看现在局势怎样？”他答复说：“今后只有努力奋斗，你到宁夏如能开展工

作，我可以把白海风过去带过的骑兵旅拨给你，或者在你未到达之前就派去，作你开展工作的前驱。”我当表示感谢，但他这样说说就算了，再也不提此事，我也不好再作进一步的要求，所以始终没有派去。

我在西安住了几天，又飞到兰州。这时阿拉善旗札萨克达理札雅（达王）已先我而来兰州，他表示欢迎我到阿拉善旗去，并说：

“我接你来了。”接着我便去见西北军政长官张治中，他即举行宴会招待我等一行人员。在宴席未开始前，我与张治中单独谈话，把孙中山的“扶助弱小民族使之自决自治”的遗训提出来做根据，请他帮助蒙古进行自治。他说：“我是三民主义的信徒，帮助蒙古是光荣的事。”后我听说他向达理札雅打听我是否还有号召力，并谈到“我国政府曾帮助朝鲜金九进行亲近中国的朝鲜独立建国工作，结果没有起到什么作用，等于把帮助他的巨资白花。如果帮助德王，是否也要蹈此覆辙。”

不久张治中就忙着去当和平谈判代表，从兰州走了。这时，前来参加西北军政长官会议的各地军政首脑马鸿逵、马鸿宾、包尔汉、陶峙岳等均在兰州，我就分别访问，进行拉拢。我访问马鸿宾时，试探地同他说：“吴鹤龄对我说过，‘他在日本东京留学期间，与曾在承德当过特务机关长的松室孝良（已退役在东京居住）有过来往。松室孝良说他曾给你们来过信，表示愿帮助西北回族建立回回国’。嗣接到你们复信说‘日本说要帮助蒙古建国，现在尚未实现，还能帮助回族建国吗？’有此事吗？”马鸿宾说：“那封信是马鸿逵写的。”我在访问马鸿逵时，请他帮助我搞“西蒙自治”。他说：“咱们蒙回合作吧。”表面上和我打着官腔。另外，我听到他向达理札雅说：“你来兰州干什么来了？德王要到阿旗去干什么？”大概责怪达王没有把我来兰州要去阿旗之事先告诉他，所以达王就偕同何兆麟先我回旗了。

我在兰州又活动了一个时期，对于搞“西蒙自治”虽未得到各

方面的有力支持，但也未发生大的阻挠。我赴银川途中，曾与马鸿逵相遇，他说也回银川。我到银川后，马鸿逵对我款待甚殷。这时绥境蒙政会秘书长巴文峻也在银川，我和他谈到搞“蒙古自治”，组织“蒙古自治政府”之事，他表示赞成，并提出应当成立“蒙古人民自治政府”。我就给伊盟付盟长阿拉坦瓦奇尔（阿王）及各旗写信，请他设法转交并通知各旗前来参加筹备自治。适这时伊盟盟长图王（图布信吉尔嘎郎）在银川病故，我特亲往吊唁，便中与伊盟在银川的人士接触。

我于一九四九年四月间到达阿拉善旗定远营，达王把我安排在庙上居住，殷勤款待。这时白海风、巴文峻、林庆僧格（林王）等也先后到来。我和达王说：“我想进行蒙古自治，你如同意，现在各盟旗人士到的很多，就召集会议研究成立蒙古自治筹备委员会。”达理扎雅表示同意，就召集前来定远营的各旗蒙古人士开会共同讨论，并有马鸿逵派的国民党宁夏省党部书记长×××参加，结果决定成立“蒙古自治筹备委员会”。我为拉拢阿王亲来参加，以壮声势，并腾出身子来前往广州请愿，特推定阿王为主任委员，我和达王为付主任委员，林王，达密林旺楚克、巴文峻、白海风、何兆麟、赵汇川，再加上新从广州来的德古来，吴熙宪等为委员，何兆麟、札奇斯钦为正，付秘书长，主持进行筹备工作，起草“蒙古自治政府”组织法和宣言等文件。因为达王是东道主，有举足轻重的关系，我特对他说：“百灵庙的自治，是在云王（云端旺楚克）大力支持下搞成的；这次自治是在阿旗定远营发动，全赖你大力支持。”

“蒙古自治筹备委员会”虽经成立，阿王仍是迟迟不来。我特派吉致祥前去请他从速前来，主持筹备工作，号召伊盟各旗踊跃参加，不意吉致祥未及到达，阿王就得急病死了。于是我就当了主任委员。

## (二) 赴广州请愿

“蒙古自治筹备委员会”成立后，一面电请国民党中央政府许可自治，一面组织代表团赴广州请愿，由我任首席代表，乌盟盟长林王、阿拉善旗的金巴图道尔吉和我的秘书赵汇川等为代表，于一九四九年五月间赴广州。飞经西安时，特去见胡宗南请他帮忙。他说：“你去广州请求许可蒙古自治很好，我也给中央打电报，说明实行蒙古自治有助于‘戡乱’军事的进行，恳请中央许可自治。”我又请他拨给枪枝，他答称：“可以，请与罗列参谋长具体商洽。”接着我就和赵汇川与罗接洽，他表示现在武器均用于“戡乱”军事，不能多拨，仅能拨给二、三百支。我嫌少没领。

我等一行经由重庆转赴广州，先到蒙藏委员会见到了委员长白云梯。这时在广州的蒙古人士吴云鹏、席振铎、薛兴儒、李鹤龄等先后来访，我请他们帮助，大多表示赞同。惟有李鹤龄向来是唱低调的人，主张要求蒙旗地方自治；我是向来唱高调的人，主张要求高度的民族自治，争论好久，相持不下，结果不欢而散。又有一天陈立夫、洪兰友、李鹤龄来看我，陈等问我说：“你们要求什么样的自治呢？”我答复说：“我们要孙中山所说的‘扶助弱小民族使之自决自治’的那样的自治。”他们再未多谈就走了。

继而我去见李宗仁“代总统”谈述来意，他未作肯定的答复，叫我和行政院长何应钦、内政部长李汉魂接洽。我即去见何，他托故未见，嗣经薛兴儒探询何应钦对蒙古自治的意见，旋即转告我说：“何应钦表示，德王过去在百灵庙搞自治，结果投靠日本组织伪蒙疆政权，现在他又来要求自治，靠得住吗？”我认为何应钦对我既不放心，再未要求见他。后又去见李汉魂，陈述了自治的很多理由，他答称需要提到行政院会议上研究解决。接着国防部次长秦



德纯前来看我，谈到蒙古自治问题，他对我说：“从前马鸣洲代表东蒙自治政府前来请求中央许可东蒙自治，政府没有很好的对待，以致东盟投了共产党。日本投降后，山东省有杂牌军四十多万人，占据几十个县的地盘，表示愿归向中央，政府也没有及时争取，也投了共产党。这次你来仍是有人这样对待你，我很不以为然。”他在谈话时，不住地跺脚，表示极为惋惜的样子。

这时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白云梯也向我透露消息说：“胡宗南来过电报，向中央建议，应当许可蒙古自治，俾资调动蒙旗地方力量，协助‘戡乱’军事的进行。”白参加行政院会议时，曾经讨论过蒙古自治问题。李汉魂说：“德王曾向我表示，我们前来向中央请求许可自治是好事，希望中央准予照办。根据蒙古民众的迫切要求和蒙旗现在的情形，如果中央不许可，也要自己干。”白又说：

“秦德纯基于加强‘反共’的立场，调动蒙旗地方力量，协助‘戡乱’，也主张适当地对待蒙古自治问题，不要使你不满意而归。”

这时行政院正在酝酿改组，蒙籍立法委员薛兴儒和我谈到行政院改组经过说：“本来这次内阁改组关于行政院长人选提出居正和阎锡山来，我秉承二陈（指陈果夫、陈立夫）的意见，连络蒙籍立法委员，反对居正组阁，赞成阎锡山组阁。因为基于反共立场，认为居正年老力衰，又无实力，不能担当‘戡乱’的大任。阎锡山是在太原被围中逃到广州，是反共最坚决的人，所以同意他组阁。”我说：“可是阎锡山是向来反对蒙古自治最力的人，他出任行政院长，对于蒙古自治不利。如果居正出任行政院长，对蒙古自治或者比阎锡山强一点。”薛兴儒也同意我的看法，但是木已成舟，无法挽回了。

迨至阎锡山组阁后，蒙藏委员会委员长换了关吉玉，就向关吉玉谈述蒙古自治问题，他不敢做明确答复，叫我直接到行政院接洽。我即去见阎锡山，阎当偕同行政院秘书长贾景德接见我。我们在会谈之间，争执很大，争执的焦点是：（1），我根据国民党第一次代表

大会宣言中“承认国内各民族自决权”的规定，说明蒙古自治是符合党纲的，中央应当许可。阎、贾则强调蒙古自治是背离中央的运动，表示绝不许可。（2），我强调蒙古民众迫切要求自治，实行自治可以团结蒙古民众，调动蒙旗地方力量，协助“戡乱”进行，分担中央北顾之忧，对于国家和蒙古都有好处。阎、贾强调在这个时候要求自治，是给中央增加困难，对于国家和蒙古都没有好处。

（3），我最不满意的是：在民国十七年国民党政府奠都南京，阎锡山与蒋介石合作，主持撤销热、察、绥、宁、康、青等特别区，设置热、察、绥、宁、康、青等边省，对国内弱小民族实行分割统治，侵蚀盟旗政治权利，把持蒙地财政税收，破坏蒙人团结。因而我提出取消边省。阎、贾则强调取消边省，就是破坏国家的统一，绝对不能允许。（4），我要求马上许可高度的民族自治，并强调在当时情况下，中央如不许可，蒙古自己也要进行自治。阎、贾则强调未经中央许可，如果擅自进行自治，就是不服从中央命令。并推托说等到“戡乱”军事胜利之后，才能谈到地方自治问题。在争执中阎是越说越气，后来简直是申斥口吻，恫吓语调，看样子恨不得实行军事讨伐。我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他说我顶，也不相让，旋而我转念到他毕竟还是行政院长，大权在握，不能过于顶撞，使他难堪，并认为他到了这个时候，还是沿袭满清对待异民族的“宁赠友邦，不给家奴”政策来对待蒙古，就不再和他争执，另作别的打算对付他，即怫然退出。当他请我宴会时，我故意多喝了几杯酒，带有醉意地问他：“我来请求许可蒙古自治，是根据孙中山‘扶助弱小民族使之自决自治’的遗训，并且实行自治当中，可以把蒙古民族团结起来，力尽‘戡乱’的责任，分担中央北顾之忧，是应当得到政府许可的，还请阎院长再加考虑。”阎锡山说：“孙中山所说的是主义，我所说的是政策，不能把主义和政策混为一谈。”经过这样争执后，我对阎锡山至为不满。这时候吴鹤龄也来广州，为我出谋划策，他主张向蒋介石（此时蒋在台湾）请求，

我就与蒋的亲信桂永清（时任海军总司令）接洽，表示要去台湾见蒋，请他代为联络。他答称即回台湾向蒋请示，不久，他由台湾给我复电说：蒋嘱我不必去台湾。

我在广州期间，除请求许可自治和拨给枪械外，并召集我的旧部及邀请在广州的蒙古人士前来帮助进行自治活动，计有札奇斯钦、德古来、吴熙宪等表示愿意先行，我即嘱他们到阿旗定远营后，鼓动达理札雅等大力支持自治，并着手进行一切筹备工作。这时李守信也从台湾到了广州，他也表示愿意跟我一同去搞“西盟自治”。嗣又听说陶布新在蒙藏委员会任职，在南京局势紧张时被疏散到广西桂林，我给他寄去旅费，约他到广州来做我的随从秘书。他由桂林到达广州后，向我建议说：“现在进行蒙古自治，从全国的大环境上说，共产党已占领中国大部，正在胜利进军，国民党退处西南一隅，已入垂危之途。我们向国民党政府要求自治，听说还不许可，就是许可了，也等于空头支票，无济于事。从西北小环境上说，二马（指马步芳、马鸿逵）盘踞，统治甚严，是否允许我们进行自治也是问题。依我之见，莫如赶快回去，改走共产党的道路，派代表前往北京接洽为宜。”我对他说：“现在二马方面业已说通，表示不干涉我们进行自治。对国民党中央方面，我是尽量要求，无论许可不许可，我仍是要搞自治，只要把自治搞起来，有了政府组织就有办法。那时即便共产党来了，我们也可组织流亡政府，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那时美国一定会支持我们的。我是为了蒙古好，谁对蒙古好，我们就应跟谁合作。据我所知，美国对蒙古的政策是主张内外蒙古统一建立大蒙古共和国，那么就应和美国合作。我如流亡国外，要到台湾向蒋介石要求蒙古独立，就不要求自治了。”陶布新劝我还是赶快回去，改走共产党的路，较为合乎实际情况。我说：“那么做也是一条路，我们回去之后再说吧。”

我在广州进行请愿，虽然碰了阎锡山的钉子，总是于心不死，又去见李宗仁继续请求许可自治并拨给枪械。他对自治仍未作明确

答复，仅允拨给加拿大手枪五十支，叫我到国防部具领。继而又去见行政院付院长朱家骅，他说：“你们为了安定蒙古人心，加强地方治安而进行自治，也是一片苦心，只要不违反政府法令，有利于‘戡乱’，无妨试试看。我叫财政部拨给你们一些经费，备作筹备之用。”朱家骅口头上既有允许自治的诺言，我就派人向财政部洽领银元一万元，向海军总司令部洽领步枪二百支，机关枪四挺，向国防部洽领加拿大手枪五十支，准备回盟。席振铎来向我说：“听说蒋介石近即来此，为什么不等一等，忙着要走呢？”因为这时飞机既已洽妥，“蒙古自治筹备委员会”也来电报催我赶快回去，于是就偕同李守信、金巴图道尔吉、策仁道尔吉、陶布新、乌臻瑞、赵宝钢、图们德勒格尔及流落广州的蒙古青年学生等十数人准备起飞（林王业已先回）。不意经与飞机场联络，开飞机的一个空军上尉，强调超过了载重量，易于发生危险。不得已仅带上步枪八十支，银洋一万元和予定人员起飞。把赵汇川留下，押运其它枪械返蒙，运到重庆，快临解放，未能运返定远营，赵汇川即与我失去联络。后来听说，蒋介石在台湾还把赵汇川找去面谈，赵衔蒋之命，拟潜来内蒙活动，但甫经登陆即被公安部门扣押。我等一行，由广州起飞，经由重庆到汉中，因天气连日阴雨，飞机不能起飞，就在汉中停留几天。这时胡宗南已退守汉中，特派高参刘庆曾招待我们。

天晴，我等即乘飞机到兰州，前往访问西北长官公署代理长官马步芳，谈述前往广州请求许可自治经过。马步芳说：“要不是到了这个时候，中央还能叫我这个老回回当西北军政长官吗？趁着这个时候，你们也进行你们的自治吧。”我看他没有阻挠自治的表示，就进一步请求他通知青海蒙旗派代表前来参加自治，他不高兴地答复说：“那用不着。”

在兰州停留了几天，就改乘汽车经银川到达定远营，接着吴鹤龄从广州来信说：“蒋介石到广州后，曾派人找你晤谈，可惜你回

去了。”我赴广州请愿搞“西蒙自治”，印象是：马步芳、马鸿逵等没有明确表示阻挠；阎锡山、贾景德等坚决反对；朱家骅、李汉魂、秦德纯、关吉玉、胡宗南、桂永清等表示赞同。反对者固然是对蒙古继续实行大汉族主义的反动统治，就是不阻挠或表面赞同者，也是企图利用我这块招牌，调动蒙旗地方力量，继续进行反共反人民的罪恶勾当而已。

### （三）召开“蒙古人民代表会议”与 成立蒙古自治政府

我由广州回到定远营，因招徕了我的旧部和聚集了一些旧军政人员，自认为有了政治资本，骑兵第一旅和锡察零散部队又从东北逃窜前来，也有了武装力量。我就着手召开“蒙古人民代表会议”和筹备成立“蒙古自治政府”。为了使这次会议开得象样，还做了一番准备工作：

（1）拼凑代表：参加会议的代表，除了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绥东四旗、土默特旗、阿拉善旗和额济纳旗派来代表外，已经解放的呼伦贝尔、哲里木、昭乌达、锡林郭勒、察哈尔等盟旗的代表，就从逃亡在定远营的旧军政人员和骑一旅及锡察零散部队官佐中拼凑出来，共约一百余人。计阿拉善旗有达理札雅，达密林旺楚克、陈爱尔德尼巴图、陈那逊巴图等；土默特旗有巴文峻、陈应权、云英飞、李守信等；绥东四旗有贺华儒、贡森等；乌兰察布盟有林庆僧格、雄诺、包达玛等；伊盟代表，恍惚记得有黄维世、齐文卿、韩裕如等；呼伦贝尔盟有德古来，达格敖斯尔等；哲里木盟有敖木巴图尔、韩撒嘎拉、韩凤歧、刘振东等；昭乌达盟有孙鸣海、海福泉、策仁道尔吉等；卓索图盟有吴鹤龄、白海风、何兆麟、吴熙宪、札奇斯钦、白瑞、乌古廷、乌臻瑞、陶布新等；锡林郭勒盟

有我和吉利占太、米济德章楚克、色仁道尔吉、托克托胡等；察哈尔盟有色楞那木济勒、阿由尔札那，蒙太等。胡乱拼凑的这些所谓代表，李守信本是卓盟土默特右旗人，因卓盟在定远营的人特别多，就以东西土默特旗原来是一家，作为土默特旗代表的名额。卓盟还把在定远营的卓盟人召集在一起，好象煞有介事地进行了选举。有的盟在定远营就有几个人，互相商量一下，就确定了代表。有的盟旗在定远营仅一二人，就自封为代表。为什么用“蒙古人民代表会议”这个名称呢？因为面对当时局势的变化，一部分人有向共产党作政治投机的心理，所以不顾国民党官员的猜忌，而采用了这个名称。

（2）讨论宣言：宣言是札奇斯钦起草的，要点是：①蒙古有土地、有人民、有自己的语言文字，有光荣的历史，理应实行自治，管理本民族的事务。②根据孙中山先生制定的建国大纲及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揭示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及扶助弱小民族使之自决自治的遗训，应当实行自治。③现在蒙古民族经济不振，文化落后，人口下降，岌岌可危。为了挽救民族危亡，特俯顺舆情，博采众意，召开蒙古人民代表会议成立蒙古自治政府。在这个宣言原稿中，本有侮蔑“共党倡乱”一段文字，在讨论研究时，白海风以为是我的主张，低声向我征求意见说：“已经到了这个时候了，还用这类辞句干嘛？”我虽是反动透顶的人，但面对当时局势的演变，也认为在宣言上有诬蔑共产党的辞句甚不相宜，就对他说：“我同意你的意见，请你发言吧。”他就起立发言，委曲婉转地说明了很多理由，别人也未提出反对的意见，就把这类辞句删掉了。

（3）讨论蒙古自治政府组织法：这个组织法主要内容是：①蒙古自治区域之最高行政机关定名为“蒙古自治政府”。②蒙古自治政府以蒙古原有地方为领域，但暂以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阿拉善旗、额济纳旗为自治区域。③蒙古自治政府设主席一人，副主席一人，其下设政务委员会，为最高行政机关，由十一人组成之。

④主席下设秘书厅，置正副秘书长各一人；设保安委员会，置委员长一名，副委员长二人；设内务、财政、教育、实业四署，置正副署长各一人。⑤设蒙古议会为最高立法机关，置正副议长各一人，议员若干人，秘书长一人。

关于名称问题，在筹备期间曾有过争执。有一部分人主张用“西蒙自治政府”这个名称，避免与王爷庙的“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相矛盾。但是从东部蒙旗来的蒙古人，如敖木巴图尔、达格瓦敖姆尔等坚决反对，提出如用“西蒙自治政府”这个名称就意味着不要东部盟旗地方和东部盟旗来的蒙古人。结果还是采用了“蒙古自治政府”这个名称。这个问题虽然早已解决了，但是在预备会议期间，吴鹤龄提出在蒙古自治政府之上加上“临时”两字，表明是过渡时期的政府名称。白海风提出反对说：“我们不是打算扛着政府牌子流亡吗？为什么不打着漂亮的‘蒙古自治政府’的牌子而要加上‘临时’两字呢？”结果还是维持原案，没加上“临时”字样。

（4）大会发言的布置：因为在会议时准备邀请国民党政府官员参加，为了避免引起他们的怀疑，特在预备会议上做了布置，具体安排是：从代表中指定敖木巴图尔、蒙太等，用激昂慷慨的语气，强调自治必要，再由何兆麟秘书长解释说明既俯顺輿情而进行自治，又体谅中央的困难。

（5）准备开幕辞：开幕辞是札奇斯钦起草的，由我宣读，内容大意是：首先追述蒙古民族在成吉思汗和元朝时代的文治武功，次即说明现在蒙古民族的衰微，应当急起直追，奋发图强，努力自治运动。最后强调精诚团结，努力奋斗等语。大家没有提出什么意见，就通过了。

（6）确定正副主席候选人：在预备会议上推定我为主席选候选人，达理札雅为副主席候选人。但札奇斯钦很欣赏美国所谓的“民主政治”，提出要有陪选人。经大家研究确定白瑞为主席陪选人，林庆僧格为副主席陪选人，经征询林、白二人的意见，均表同意。

当大家推定我为主席候选人时，我还想推辞一下，表示谦逊。旋即想到当推定我为蒙古自治筹备委员会主任时，我为了拉拢伊盟地方力量，壮大自治声势，特提出阿王为主任，我愿退居副主任的地位。嗣听到王亲札布告诉我说：“美国人萨拉黑说，德王在这次选举中失败了。”所以这次我就没有吭声表示默认了。记得在正副主席候选人确定后，还有人说这次正副主席分由德、达二王担任，固然可以，可是他们都是王公，为了表示民主使人看着象样起见，应当再加上巴文峻这个平民出身的人为副主席，不是更好些吗？嗣经考虑，如果再加上副主席一人，深恐牵涉太多，就没有提出来。

在预备会议上除做了以上各项的准备外，我为了博取蒙古人士的拥护，想在这次“蒙古人民代表会议”上，声明放弃王公特权和封建制度。这个问题我在北平时，就和达格瓦敖斯尔说过，因为他对美国式的假民主非常陶醉，就怂恿我率先带头放弃王公。我这时虽然也知道王公制度已不合时代的潮流，却还把它当成宝贝，不愿轻易放弃。就对他说：“我一个人声明放弃，起的作用不大，最好联络各盟旗王公共同声明放弃，才能打响第一炮，应再等一等。”原来，日本投降后，我在北京闲住期间，伊盟盟长图王偕其孙子到达北平和我见面，我曾鼓动图王的孙子劝其祖父主动倡导放弃王公特权和封建制度，比将来被人民把封建王公制度推翻好些。当我在广州见到美国新闻处特务人员马滋时，也曾谈过放弃王公制度问题。到定远营后，达理札雅曾向我说过，他已向阿旗官民作过不叫其子继承札萨克的声明，又引起我想在这次会议上声明放弃王公特权和封建制度的想法，并经征求吴鹤龄的意见，他也表示同意，我又请他撰拟声明的草稿，但他没有写出来。旋又想到锡盟业已解放，我的王公头衔早已名存实亡，人们还称我为德王。设知我出头倡议，恐人说我是慷他人之慨，又怕人怀疑我倾向共产党，就又作罢了。通过这一个事情，说明我这个人优柔寡断，就连这一点自认



为开明的事情，虽然想起来了，却未实行。这说明封建阶级的烙印，深刻地打在我这个王公身上，无论到了什么时候，绝不肯轻易放弃特权地位，能够保存一天，就要保存一天。

这幕戏剧性的会议，经过后台悉心研究和布置，就于一九四九年八月初旬开场了。我扮演了这幕开场戏的主要脚色，以临时主席的面目粉墨登场，依照预备会议通过的原稿致开幕辞。原稿宣读后，我又继续说：“我们是为民族才自治的，如果共产党来了，民族也没了，自治也完了。”休息时白海风埋怨我说：“你怎么又把反共的话明显地说了出来呢？”继请来宾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弓科长、马鸿逵的代表周百煌、国防部驻阿旗军事专员罗大渭、中统局驻阿旗的负责人王君惠讲话，他们都未登台表演。继由大会秘书长何兆麟报告蒙古自治筹备经过，被指定的代表敖木巴图尔、蒙太、韩撒嘎拉等发言，说明自治的必要，的确做到了后台布置的要求。记得当时有的代表说：“中央派在东北的几十万大军，在长春、辽沈、锦州战役中，被俘的被俘，投降的投降，试问跑出来归向中央的有几个？只有骑一旅的几千人，冒险突围，投向中央。就凭这一点表现，我们要求蒙古独立，亦不为过。现在降格以求自治，应该获得中央的许可，为什么中央还不许可？”代表们相继发言以后，何兆麟以委婉的语调，诚恳的表情，作了解释说明，既肯定自治的必要，以安慰大家的激动情绪，又说明了中央没有明令许可的困难。会后都说何秘书长表演得不错。

第二日进行讨论宣言，无异议通过。接着讨论蒙古自治政府组织法，尽管在预备会议上沟通了意见，而在大会讨论时，仍然发生争论。首先在“凡在蒙古自治区域内居住三年以上，年满三十五岁者，均可当选为主席”一条上，吴鹤龄提出主席要限于蒙古人，白海风主张维持原案，不要加上限于蒙古人字样，以示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双方争执很久，各不相让，最后付诸表决，仍照原案通过。继在“蒙古自治区域内各族人民之权利义务一律平等”一条

上，关、白二人又发生了争论，弄得面红耳赤，相持不下。陶布新提议把这一条改为“蒙古自治区内各族人民之权利义务另以法律定之”才把这场争论调解了。这样，一个不伦不类的自欺欺人的“蒙古自治政府”组织法，总算勉强通过了。

第三日进行选举。选举的结果，我当选为“蒙古自治政府”主席，达理札雅为副主席，吴鹤龄当选为蒙古议会议长，陈那逊巴图为副议长。我和达理札雅即当众宣誓就职，所谓蒙古人民代表会议，就此宣告闭幕。当日晚间在会场上演戏，大摆筵席，以示庆祝。胡宗南还给我来电报，恭贺我当选为“主席”。会后便将蒙古自治政府组织法、宣言等文件报请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备案。听说阎锡山很不以为然，主张责斥我们。

“蒙古人民代表会议”开过之后，我即着手组织成立“蒙古自治政府”。首先任命白海风、李守信、林庆僧格、何兆麟、巴文峻、吉致祥、德古来、达密林旺楚克、吴熙宪等为政务委员，组织政务委员会。继则任命巴文峻为秘书厅的秘书长，陈爱尔德尼巴图为副秘书长，何兆麟为内务署署长，陶布新为副署长兼蒙古议会秘书长，吴熙宪为财政署署长，韩凤歧为副署长，白海风为实业署署长。在任命保安委员会正副委员长时又发生了问题：任命白海风为委员长吧。李守信不甘居其下，任命李守信为委员长吧，白海风更不愿意。因而又来了一个调和办法，由副主席达理札雅兼任委员长，白海风和李守信均为副委员长。并任命陈应权为该会的参谋长，李文钦为副参谋长。我为拉拢阿旗地方势力，又任命阿旗区防司令部的副官长张元忻、阿旗稽查处主任李树德为蒙古自治政府参事，但张、李二人坚辞不受，只好作罢。白瑞老头不远万里而来，仅仅得到一个蒙古议会议员，也有点不高兴，又因人设事任命他为咨政委员会的主任，可是他仍然不满意，又跑回了广州。吴鹤龄到达定远营后，由于和达密林旺楚克争夺议长及和白海风闹意见，弄得四面楚歌，我支持他当选为议长后，仅主持召开一次蒙古议会的会议就

逃之夭夭了。

“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后，急待解决的是关于骑一旅安置问题。因为骑一旅从东北逃来之后，即住在布鲁淖尔及三盛公一带，宝贵廷曾来定远营和我接洽，表示愿意归属“蒙古自治政府”统辖。但“蒙古自治政府”虽然以西部盟旗为暂时自治区域，而在时局急剧转变之际，各盟旗多是意存观望，不肯以实际力量支援，因而无法解决部队给养问题。宝贵廷看到这种情况，便转与宁夏省方面接洽，马鸿逵为了掌握这一部分部队，增加反共力量，给宝贵廷等官佐银洋五百元，以示拉拢。这时李守信为了掌握这一部分力量，也去宁夏面见马鸿逵商洽解决这一问题。马鸿逵之子马敦静表示，骑一旅归由宁夏收编后，限住黄河以东的陶乐，不能开往黄河以西阿旗地区，如果开往河西，便以武力对待。继又发表李守信为陕甘宁边区骑兵总司令，宝贵廷为参谋长，都固仍仓为副参谋长，苏和巴图尔为骑一旅旅长，孙鸣海为副旅长，经费、武器、弹药、给养等概由宁夏省负担。这一部分队伍归宁夏省指挥调遣后，李守信即率队开往防地陶乐县。

“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后，我和达理札雅、白海风、何兆麟等，前往宁夏慰问马鸿逵的疾病。适在这时，国民党政府军令部长徐永昌因前往包头策动绥远军队路过银川，我等特去见他，说明召开蒙古人民代表会议经过和成立蒙古自治政府情形，请他转向国民党中央政府建议，早日予以正式批准。他强调将来全国各地都要实行地方自治，蒙古可以实行地方自治。我说：“我们所要求的是高度自治，不是地方自治。”徐又追问：“什么是高度自治？”我回答说：“高度自治是：除了国防、军事、外交归中央统一掌管外，凡属政治、经济、文化和保安等事，都由蒙古自治政府管理。”徐便厉声说：“你们这种要求，迹近要协中央，中央当有办法，依我之见是不能许可的。”我又申辩说：“现在听说新疆维吾尔族阿合买提江倡导成立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我们起而要求自治，这是民族问

题，应用政治方法解决，依我看中央派在新疆的军队可以调回。”徐说：“中央派往新疆的军队尚有用处，不能调回。”接着达理札雅质问徐说：“请问中央还要不要蒙古？”白海风也说：“我认为蒙古自治是合乎时宜的，应当得到中央许可。希望不要曲解我们的意见。”徐总是摇头不许可。我们认为再无争执必要，就告辞而归。

我等返定远营后，我便请何兆麟起草给蒋介石的电报，声述新疆是民族问题，应用政治方法解决。继而我们又讨论应付时局的办法。白海风说：“我出一个馊主意吧，趁着这个时候，应当由政府派人到伊盟把各旗的武力调来，必要时也可以抵抗一下。”我当表同意，就决定派云英飞前往办理此事。云英飞去后，也没有什么结果，伊盟连一个兵也未派来。嗣白海风的家眷从兰州来到定远营，他曾对我说：“已经到了这个时候了，她还来此干什么？在兰州等着解放就得了。”由此我认为白海风在时局紧张的时候，出去“调遣伊盟武力，必要时用以抵抗”的主意，实际目的是为了集结地方武力，作归向人民的献礼，而所谓“可以抵抗一下”的建议，无非是应付我罢了。

就在这个时候，我也曾考虑过派代表前往北京作政治投机。我曾向巴文峻说过：“现在是否可以派代表去北京接洽呢？”他说：“可以。”我又说：“就是无人可派。”他又说：“云英飞就可以当代表去北京。”我说：“他已去伊盟了。”嗣因西北局势顿形紧张，我积极准备出走，再未商谈此事。

#### （四）“蒙古自治政府”的分裂与改组

“蒙古自治政府”成立不久，西北局势便告紧张，继吴鹤龄、札奇斯钦、白瑞之后，德古来、乌古廷、吴熙宪、乌臻瑞等亦相继飞逃，接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就解放了兰州。兰州解放后，就派第十九兵团向宁夏进军，很快地逼近银川外围。马鸿逵、

马敦静父子在仓皇失措中相继飞逃。这个消息传到定远营来，“蒙古自治政府”内部因之发生了动摇。我和达理札雅、白海风、巴文峻、何兆麟等商量应付时局的办法。我主张出走草地，通过青海、西藏去印度。白海风说已经到了这个时候，何必再行出走，达、巴、何等附合白的意见。我看再坚持也是无用，只有分道扬镳，各奔前程。“蒙古自治政府”也就从此分裂了。我又单独和达理札雅说：“你既然决定留在定远营等候解放，我是决定出走，将来也许你拉我一把，也许我拉你一把，”达理札雅对我出走未表态阻拦，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于是我就吩咐我的从众，从速准备出走。在临走的前一天晚上，陶布新特来劝我说：“现在西北已经解放，各路要隘当有重兵把守，已属无路可走。你应留在定远营与达副主席亲密合作，主持军政大计。待至骑一旅到后安置在牧区，做为我们的政治资本，并派代表前往兰州、北京等地接洽，或者还能开辟一条政治出路。前途尚可有为，不要轻易出走，而致动摇人心，重蹈在日本投降时由张家口狼狈逃走的复辙。”我因为需要他随我做秘书工作，就反而劝他说：“我们还是到草地看看局势的变化，看看共产党对蒙政策如何，并且我们不是无路可走，尚有两条路可走：第一条路是经由阿旗草地，通过青海、西藏而去印度，转往海外各国流亡，宣传蒙古问题，等待国际局势的演变；第二条路是和外蒙接洽，我过去和外蒙就有过联络，现在还派阿拉坦瓦齐尔、雄诺敦都布二人在进行接洽。我认为外蒙是蒙古人，我们也是蒙古人，避难相求，是可能念在同族情谊收容我们或帮助我们的。”陶布新又对我说：“据我看西进这条路是死路，因为现在西北既然解放，各处要隘必须重兵把守，凭我们这一点军事力量，很难通过。北上外蒙这条路也是有问题的。因为内蒙地方是属于中国的领土，内蒙问题是属于中国内部问题，应当派代表前往北京接洽解决，前往外蒙接洽是解决不了的。况且外蒙和中国都是一类性质的国家，不能因为容留我们影响了国交，甚至还有被引渡的危险。”

并且我的家属都在北京，无人照拂，扔下一走，也觉于心不忍，我是打算不走的。”我又劝他说：“我看你还是跟我一同走。我们和达副主席等不同，因为他们仅和国民党有关系，没有和日本人合作过，是可能得到宽恕的。我们既和日本合作过，现在又和国民党打交道，深恐得不到饶恕。并且你跟我工作十余年之久，现处在穷途末路的时候，更应患难与共，一同出走，你如缺乏骑乘，我可令图付官设法。”经我动以感情，这么一说，陶布新有些犹豫起来，对我说：“容我再考虑考虑吧。”我就连夜准备，于九月初旬（记是旧历八月二日）的一个早晨，偕同图们德勒格尔、敖木巴图尔、王亲札布等二十多人，离开了定远营。走出了一天的路程，发觉陶布新仍未随同前来，又派图们德勒格尔带同骑乘回定远营，去接陶布新和徐实斋二人。徐实斋因人老力衰，甫上骆驼就被摔下来，只有留在定远营养伤；陶布新随同图们德勒格尔前来，我即率同随行人员向土后木庙进发。在行进途中，听说李守信、宝贵廷、苏和巴图尔等率同队伍，由陶乐县绕经鄂托克旗，在磴口渡过黄河，奔向土后木庙来。我认为这一部分部队到来，就有了保护我的武装力量，心中为之一畅，就当众宣布成立“蒙古军总司令部”，发表李守信为副司令，宝贵廷为总参谋长。

我到达土后木庙后，暂时组织起“主席行辕”来，由吉利占太任总务处长，负责向当地牧民征用牲畜和粮食，供应食用。我即前往哈拉尔格与蒙古人民共和国人员联络。待我返后，吉致祥借用阿旗政府公用骆驼八十只押运粮食到达土后木。李守信、宝贵廷、苏和巴图尔等也率领部队到达。我们会合在一处后，就计划西进并着手改组“政府”、议会和整顿部队工作。改组“政府”的结果是仍由我任主席，并给达理札雅保留副主席。因各厅、署的首脑也必须从新安排，乃另任吉致祥为秘书长，策仁道尔吉为副秘书长，阿由尔札那为内务署署长，王亲札布为财政署副署长，贺华儒为实业署署长，陶布新为教育署署长，韩聿修为副署长。“蒙古议会”以

海福泉为代理议长，新任张士杰为议会秘书长。军事方面重新组织“蒙古军总司令部”，除由我仍兼总司令外，正式任命李守信为副总司令，宝贵廷为总参谋长，都固仍仓为副总参谋长。下设副官、参谋、军需、政工、军法等处，分由策仁道尔吉、拉希那木济勒、敖木巴图尔、韩聿修等分任处长。把骑一旅和锡察零散部队整编为两个师：第一师师长苏和巴图尔，副师长孙鸣海，参谋长赵殿臣，师下分编两个团，第一团团长沙伯音；第二团团长沙撒嘎拉，副团长葛瓦拉西。第二师师长吉利占太，副师长塔拉巴，参谋长托克托胡，师下也分编两个团，第一团团长沙布僧巴克什格根，副团长阿克登阿；第二团团长沙翁盖；各团之下有连的编制，连下有排的编制，总共不过一千多人。记得我甫到土后木时，鄂托克旗的图们吉尔嘎朗前来与我接洽，我为了拉拢伊盟地方势力，特派他为第三师师长，嘱他组织队伍，但是他一去未返，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为了表明“蒙古自治政府”的独立性，与国民党政府没有隶属关系，不用中华民国的旗章和纪年，改用伪蒙疆时期的旗帜和成吉思汗纪年，居然把日本帝国主义卵翼下的伪蒙疆政权这个僵尸复活起来，表明我搞“蒙古自治”的连续性。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反动到了透顶的地步。

改组“政府”和整编部队初步就绪后，就在土后木庙东边一块草地上，召集文武官员及全体士兵开会。我登在土台上“训话”，首先宣布“政府”的改组，“蒙古军总司令部”的成立和部队的改编。次即强调继续进行蒙古自治，打开民族出路。最后号召大家加强团结，克服困难。我“训话”完毕后，即宣布散会，各部队也就四散居住。

## （五）我纵兵殃民引起阿旗军民的反抗

我和部队相继到达土后木庙后，已是秋末冬初的季节，牧草枯

萎，气候转寒，人困马乏，给养无着。为了积极准备西进，更需筹措给养和乘驼。在此人无食粮、马无草料、纪律松弛、怨声载道的情况下，很易发生抢掠的行为。由于我对部队无力约束，部队便四出抢掠骆驼、粮食、牛羊、衣物等，特别引起牧民痛恨的，是部队中少数分子的破坏行为。例如抢夺骆驼时，如果四散奔跑，圈拢不住，就用枪打死；抢夺人民粮食喂马，任其撒落满地；把驮运所用的草屉子也割破了喂马，强奸妇女等等。据跟随我的吉儒穆德（阿巴嘎右旗人）报告说，在天气很冷的时候，部队中有人将一个十三、四岁牧羊的孩子皮衣抢去，致使这个小孩冻死的惨事。居住这一带的牧民，实在不堪其扰，大多逃往沙窝或山区中躲避。但因部队多系蒙古人，既通晓蒙古语言，又惯于牧区生活，无论牧民躲在哪里，也能追踪赶到。当部队进到蒙古包时，发现有人在家，就杀牛宰羊，大吃二喝起来，酒足饭饱以后，就翻箱倒柜，乱行抢夺，稍拂其意，便持枪恫吓，打骂交加。如果牧民弃家而逃，不但把能带走的东西抢掠一空，还把无法搬移的东西如缸瓮盆罐之类砸毁，抛弃满地，牧民就更向远地逃避。凡是经过之地，都是有室皆空，杳无人烟。我听到这种情形，至为焦灼，却又无法约束和制止。

由于部队的疯狂掠夺，果然引起阿旗军民的反抗。阿旗政府为了制止我所率领部队的掠夺，保护人民生命财产起见，特调动保安队和组织民兵，布置在我部队的周围，把守要路，封锁粮食，监视行动，每遇部队外出抢掠时，就给以突然的袭击，因此，发生冲突多次，我部队被打死打伤多人。我认为这样冲突下去，不仅导致蒙古人打蒙古人的流血事件，还可能招致解放军前来围剿的后果，影响我们这一伙人的存在。为了缓和冲突，消除敌对起见，当我们流窜到巴伦沙尔札庙北边的地方，特派王亲札布、图们德勒格尔二人，前往阿旗保安队与副总队长罗瑞光接洽，请派代表前来会谈。罗瑞光当派左甲木英、段塔拉登岱、达希敦都布三人前来，提出二事与我商谈：第一劝我率领部队接受解放；第二约束部队不许抢掠。我对第



一个问题拒而未谈，对于第二个问题表示愿意共同商量，却又强词夺理说：“约束部队，不再抢掠，固属应当，我应尽力去做。但部队的给养和职员的生活，实在无法维持，这个问题应由达副主席负责解决。你们既然代表前来，应速为解决部队给养，乘用骆驼及确定驻扎地方，并希在一周内解决粮食问题。”阿旗代表说：“你们从定远营出走时，运送粮食的骆驼是我们达王爷私人的骆驼，你们早应归还而未归还，又抢了人民这些骆驼，谈不到再征用骆驼。”这个问题遭到拒绝之后，就置而未谈，又继续商谈其他问题，结果约定三事如左：①关于部队驻扎地方问题，阿旗代表提出拐子湖是水草肥美、燃料丰富（有杂克林即索索树），交通便利的地方，遇有旱年牧民多移牧于此，最好你们移到拐子湖去住，比沙尔札一带水草好些。我认为拐子湖水草丰盛，可以解决牲畜困乏问题，同时也知拐子湖是阿旗西北的边境与外蒙接壤，既利于西进，又便于和外蒙接洽，就同意移兵前往驻扎。②关于避免冲突问题：当经商定，我们部队外出时打起兰旗，阿旗保安队外出时打起红旗，以做信号。双方部队相遇，见信号，都不许开枪射击，但有零星小股私出抢掠者，任由阿旗保安队袭击。③关于粮食供应问题：阿旗代表提出，当我们部队移住拐子湖时，再考虑接济。这样商定以后，阿旗代表就返回了。

阿旗代表返后，我即准备向拐子湖移防，苏和巴图尔、韩撒嘎拉、萨伯音等来向我说：“现在给养非常困难，部队都没有吃的，应当想个办法才好。”我对他们大吹其牛说：“只要你们把部队纪律约束住，西进也好，北上也好，我自有办法。”韩撒嘎拉说：“我向主席担保，从此严格约束部队。否则主席就枪毙我。”萨伯音也说：“我也向主席担保，从此严格约束部队，否则也请主席枪毙我。”这时第二师也向我提出设法解决食粮缺乏问题，于是就共同研究办法，结果决定由统筹委员会派员配合第一、二师部队外出征用粮食，曾与阿旗保安队相遇，当即拿出兰旗摇幌，阿旗保安队确

也遵守约定，没有开枪。不意韩撒嘎拉团下的排长托克托胡，有意破坏双方约定，竟任意抢掠，先行开枪射击。阿旗保安队未还击，就暗地监视这一伙人行动。俟这一伙人抢夺骆驼粮食归返时，阿旗保安队便转移到有利地势，向这一伙人开枪射击，把甘为祸首的托克托胡打伤甚重，其跟随士兵在惊慌之余，遂将抢到的粮食骆驼抛弃逃回。韩撒嘎拉看到驮回来的托克托胡伤势甚重，气息奄奄，至为愤激，前来见我说：“阿旗保安队把我团的排长打伤甚重，生命危在旦夕，我要带领我团的人去打阿旗保安队，为我团的排长托克托胡报仇。并向主席说明，我仍是蒙古自治政府的人，打了阿旗保安队后，仍然回来，希望允许我这样做。”我因为这时已经接到阿旗保安队的段塔拉登队长的来信说：“现在双方已经发生冲突，深恐扩大，造成流血事件，希望从速设法制止。”我也认为如果把事情闹大了，不仅是蒙古人打蒙古人，两败俱伤，更易招致解放军前来围剿，影响我们自己的存在。因此，就很气愤地对他说：“你如果这样蛮干，最好先把我打死只要我还存在，是绝对不许可你这样做的。”韩撒嘎拉受了我的责备，很委屈地哭了一场，表示听从我的命令。

接着我就率同部队移往拐子湖。这个地方水草果然不错，烧柴确也丰富，但是三面环沙，交通极不方便，牧民不见一人，阿旗保安队更未接济粮食。阿旗代表所以叫我们移住这个地方，是为了他们利用居高临下的地形，便于监视控制，更有利于包围作战，使我们部队没有四出抢掠的机会。并于我们移驻之前，把当地牧民都迁移他处，采用坚壁清野的办法，封锁粮食的进入，迫使我们投诚。但我这时还妄想阿旗保安队接济粮食，并企图利用阿旗保安队的监视控制，迫使我部队的纪律转好，以资收拢人心，再作垂死的挣扎。

总之，我率领部队流窜阿旗西北草地，经过苏木图、吉兰太、土后木、哈鲁乃、红古尔玉林、巴彦乌尔根、巴伦沙尔札、巴音乌拉、宗乃、拐子湖等十几个巴嘎（注①），抢夺宰食骆驼三千

注①：巴嘎——蒙古旧行政区划之一种名称，相当于自然村。

峰，仅在拐子湖一地，驼骨就堆集如山，使阿旗人民遭受严重损害，造成几百里地无人烟的惨境，犯下了滔天的罪行。这样惨无人道的罪行，跟随我的部队固然不能辞其咎，但主要的责任应由我来负。因为这些部队官兵投奔我来，捧我当首领，我没有把他们领入归向人民的正路，而把他们引入反人民的歧途。特别是我没有及时采取有效办法，严格约束部队，竟至发生扰乱地方，危害人民的严重罪行。由于我之纵兵，才有兵之殃民，我既有罪于阿旗人民，也有愧于跟随我的兵。因为这时我虽已当了地道的土匪头子，但还抬出“为民族”的招牌，用以蒙骗他们盲目拥护我并保护我西进。

## （六）我与美帝国主义的勾结

我与美帝国主义的勾结，是互相利用的关系，是建筑在一致反共的基础上。从美帝国主义方面来说，当时是通过它所御用的“蒙古青年同盟”，名义上捧我当首领，实际上是利用我这个招牌，在西部盟旗搞出一个局面，作为它在蒙古进行反共的据点。并以“将来实现泛蒙古主义，把内外蒙古和新疆、青海蒙古，以及布利雅特蒙古统一起来，建立“大蒙古共和国”为钓饵，引诱我这个具有狂妄政治野心的人，向其靠拢和我受其利用。从我这方面来说，第一步实现“蒙古自治”，成立“蒙古自治政府”，第二步进行“泛蒙古运动”，实现“大蒙古主义”，建立“大蒙古国”，更是我蕴藏已久的梦想。这个狂妄的梦想，从前是想利用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谋求实现；日寇投降后，我又把这个幻想，寄托在美帝国主义身上。我过去曾因买汽车而与欧美人所经营的公懋洋行和亨利洋行打过交道，当时看到价格甚贵的交易，被雇用的中国人就可作主，洋人从不过问，便认为欧美人大方，不象日本人那样小气。更认为美

国与蒙古远隔重洋，不象日本距离蒙古那样近，可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与美国拉拢。就是美帝国主义势力进入蒙古来，它无非是谋求经济利益，我还有活动的余地，不致象日本似的，把一切都控制起来，使自己的手脚动转不得。我还认为美帝国主义拥有原子弹，有左右世界局势的力量，一旦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美帝国主义可能获胜，我就可以利用美帝国主义的力量，卷土重来，重上政治舞台，实现我继续统治蒙古人民的迷梦。基于这些幻想，我不但在北平、南京期间，通过“蒙古青年同盟”主要负责人员札奇斯钦、席振铎、达格瓦敖斯尔等介绍与美国特务和外交人员若斯冰、李嘉胜、马滋、拉铁摩尔等有过接触，并委托迪鲁瓦喇嘛为我的私人代表，经常驻在美国进行联络。我在搞所谓“西蒙自治”前后，更与美帝国主义加紧勾搭。记得我在北平时，达格瓦敖斯尔和乌古廷曾向我说过：“美国新闻处迫切希望我们在西部盟旗搞出一个政治局面来，他们愿意尽量帮助。”这样，我深信搞“西蒙自治”的活动就又有了一个新靠山。

我由南京到阿旗定远营路经兰州时，曾与陈纳德所经营的民航公司驻在兰州的负责人斯特尔色敏见面。他对我说：“我与美国共和党主要人物阿鲁门认识，你如希望美国帮助时，我可以为之联络。”我对他说：“我希望美国帮助枪械、经费、飞机等物，以便进行自治。”他就提笔写了一个单子，计有枪械若干支、经费若干元、飞机若干架（具体数目我忘了），写好之后，他说他即转请阿鲁门向美国政府接洽。交由我保存的单子，后为达格瓦敖斯尔取去，不知他有什么用处。达格瓦敖斯尔还和在兰州的善后救济总署联络，弄到大卡车一辆，但经手人萨拉黑是个美国商人，竟把汽车轮胎换成旧的。我听说之后，向达格瓦敖斯尔说：“萨拉黑太看不起蒙古人，应当拒绝不要这个旧轮带汽车。”嗣经达格瓦敖斯尔又去交涉，换上新的轮带才要了。萨拉黑还送给我美制电台一座，带到定远营后，想与达王府的电台试验通话，安置在定远营备我通讯

联络之用，因达王不许可，我就把这部电台交由林王带到巴彦陕丹安置应用。

我在广州请愿时，曾由札奇斯钦、德古来等七八个人陪同，秘密地到广州郊外与美国新闻处主要人员马滋见面，由札奇斯钦当翻译，谈到在阿旗进行“西蒙自治”问题，希望美国帮助。他表示赞同和帮助。我为了表示“进步”，取得美帝国主义的支持，特又向他表示愿意放弃王公特权，采取民主制度。他说：“如果你肯率先这样做那更好了，世界上的人都要鼓掌欢迎。”嗣经札奇斯钦等联络，马滋特给美制电台数架，其中有大型的一座，需用汽油机发电，可与很远的地方通消息。这批电台当由美国新闻处派他们训练的特务人员运到银川，又转运到内外蒙交界地方巴彦陕丹附近，责由达格瓦敖斯尔主持搜集情报，刺探动态，向美国新闻处报告。我由广州返回定远营后，曾向达格瓦敖斯尔说：“你打算怎样办？”他说：“估计阿旗地区不久也会解放，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准备依据美国新闻处的指示，在阿旗草地潜伏下去。”我又提醒他的注意说：“你们七、八个人当中，有的是东盟的蒙古人，有的是新疆的蒙古人，语言与当地有所不同，在辽阔的草地中，不易潜伏下去。并且在几架电台中还有大型的电台，需要柴油机发动机器，轰隆隆的马达声，很易暴露目标，被人发觉，你要慎重考虑。”嗣后我又听说，美国新闻处给他们一批金条作活动费用，因为分脏不均，达格瓦敖和斯尔贡森等竟至吵起来，闹得很不象话。

我在广州期间，曾到美国大使馆接洽，因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仍在南京，即由秘书舒勒台斯接见。他对我说：“现在接到司徒雷登大使来电话，我们美国政府承认你是蒙古的代表者，今后进行蒙古事情，决定以你为对象。”我又提出现正在阿拉善旗进行自治工作，希望美国帮助。他答复说：“我们已知道你又搞起自治来，为了今后进一步加强联络，大使馆打算派一个适当的人为代表，常期驻在你们那里。”嗣因时局日趋紧张，没有把代表派来。

美国的外交人员虽然没有派来，但是美国新闻处特务人员白智仁同另一个美国人，早就前来定远营驻下。除与“蒙古青年同盟”达格瓦敖斯尔等密切联络外，并曾参加过我搞的所谓“蒙古人民代表会议”，照像和宴会，与我也曾有过接触。有一次他见我，说：“听说绥远的董其武受傅作义北平起义的影响，现在动摇不定，态度不明，趁着这个时候，你可否派兵去打他！根据蒙古现在的情况，你可否和外蒙联络或者到外蒙去！”我认为他这个建议，是对我无话不谈的亲切表示，没有什么坏心。但当时我衡量自己，既无进攻董其武的力量，又不愿意多树敌，对外蒙更有戒心，所以对于他的这个建议，就以漠然对之，未置可否，没有进一步追问他的用意何在和计划如何。后来我到蒙古人民共和国被审问的时候，曾把这个事情谈出来，竟引起审问人员巴雅尔的一再追究，我也没有谈出所以然来，在其严词逼问下，只是胡诌一套混过去了。现在回想起来，这个建议出自美国特务白智仁之口，绝不是漫无边际的闲谈，一定是别有用心的恶毒阴谋。现在我认为他这个建议，是企图利用内外蒙古的民族关系，把我安置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内，供其驱使利用，这比叫我流亡海外或驻在美国起的作用较大，对美帝国主义更为有利。至于建议攻打董其武的企图，可能他们知道我过去和绥远当局有过矛盾和冲突，当时绥远地区虽然酝酿起义，但名义上仍在国民党反动政府统治之下，我如去打董其武，从表面上看，是和国民党军的冲突，不是和解放军作战，从武力对比上看，进攻绥远必然失败，从当时局势来看，进攻绥远失败后，必然被逼的无路可走，非去蒙古人民共和国避难不可。而蒙古人民共和国因为我和国民党政府隶属下的绥远军作战，也就可以容留我。我如因此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呆下去，美帝国主义就可以利用我和其他特务人员供其驱使，如果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把我摆在蒙古人民共和国也许更有用处。

当我搞“西蒙自治”成立“蒙古自治政府”后，札奇斯钦表示不愿当政务委员或署长之类的职务，就准备要走，向我要了一张盖有“蒙古自治政府”大印的空白公文纸一张，准备转往美国去活动，

必要时还要见美国总统杜鲁门接洽蒙古问题。临行时又向我建议，在万分紧急时，应当打着“蒙古自治政府”的招牌，率领军政人员，取道河西走廊陕丹等地西进。

## （七）我派陶布新赴宁夏接洽的经过

我率领部队在土后木盘踞期间，有些人认为在此地驻扎，解放军可能从三条路派兵前来围剿。一是通向绥远这条路：这时听说绥远业已起义，如果由绥远派兵前来围剿，有新绥公路直通土后木，可以朝发夕至，因而耽心驻在此地不安全。我对他们解释说：“绥远虽然起义，听说驻在包头的刘万春、鄂友三二人尚不甘心情愿，是勉强起义的，未必派兵来打我们。如果我们主动与刘、鄂进行联络，还有共同合作、壮大声势的可能，希对这条路不要耽心。”我当时虽然有此看法，只因一时摸不清绥包一带的真实情况，又无适当人可派，也就说说算了。二是通向乌盟这条路：当时听说乌勒吉敖喜尔率领内蒙解放军骑兵在乌盟一带驻防，深恐前来围剿，想派王沁札布为代表前往联络缓冲，王则推说道路不熟，只身前往恐有危险，表示不愿前去。我还带有半骚的意味说：“现在我们只有与各方面联络缓冲，才能存在，但是派谁也派不动。”王仍坚持不去，只好作罢。三是通向定远营和宁夏这条路：有的人认为我们出走后，留在定远营的人，一定投向共产党接受解放，驻在宁夏的解放军很可能通过这条路，配合阿旗保安队前来围剿。我虽然估计甫经解放的阿旗，未必就派保安队来打我们，但也耽心驻在宁夏的解放军前来围剿。因此，不愿在此久停，积极准备西进。

适在这个时候，达理札雅派洛不登、包国栋等前来给我送信，信中大意是：“现在兰州的彭德怀总司令派张钦武前来争取你归向人民，宁夏省方面也请我劝你回来。这里自从解放以后，没有清算斗争一个人，不象我们从前所说的那样，我看共产党对人 是宽大

的，是给以自新之路的，希你从速前来和宁夏方面商谈。”同时也带来徐实斋给我的信说：“我深知你是‘为民族’的，这里解放以后，共产党对少数民族的政策很好，你如回来一样可以做民族工作。”并带来蒙太等给色楞那木济勒、阿由尔札那等的信。洛、包二人为了争取我归向人民，并对我这样说：他们从北京来人听说，北京报纸上刊有讽刺性的漫画，画着杜鲁门在一张软椅上趾高气扬的坐着，李宗仁在前面跪着伸手要美援，孔祥熙、宋子文卑鄙下贱地给杜鲁门点烟，并哀告说：“再给点美援吧。”宋美龄妖里妖气地一手给杜鲁门捏脚，一手给杜鲁门捶背，我穿着蒙古袍子指着他们说：“你们要钱吧，我不要钱，我要自治。”他们说：“从这张漫画看起来，共产党对你的印象还不错，请你随我们到宁夏去商谈吧。”但是当时我这一伙人当中有主张东去宁夏接受解放的，有主张北上去外蒙找出路的，有主张西进找美蒋的，三种不同的见解，而以西进一派的人数最多，势力最大，最占上风，我就是主张西进最力的人。因此，有人就向我作过“如果西进，利在速行”的建议，深恐洛、包等前来传达接受解放问题，而致动摇军心，影响西进。于是，我把洛、包等招待在土后木庙中一个院落里，不叫与部队接触，并把他们带来的蒙太给色、阿等人的信件，悉予扣留，不叫投到本人手里。这时陶布新特来向我建议说：“两国交兵，不斩来使，何况洛、包二人曾是我们共同工作过的人，这次通过前线冒险前来，为的是送达信件，就这样对待人家，殊觉不妥，应当好好地对待他们，并考虑派代表前往商谈各种问题。”我当时虽然主张西进，又恐宁夏派兵前来追剿，正好趁此机会，派遣代表前往谈商，作为缓兵之计。认为在派代表谈商期间，宁夏不致派兵来打，我好利用这个机会安全西进。经和有关人员商量，也都同意这个做法，于是就决定派陶布新为代表随同洛、包等前往定远营转赴宁夏商谈。陶布新即秉承我的意旨草拟致宁夏党政方面的信件，信的主要内容是：首段说明“蒙古自治政府”是蒙古民众代表选出的自治



机关，不是国民党的附属品，是蒙古自治运动的产物，不是国民党的尾巴，反复说明与国民党政府无关。次段说明我自己从事蒙古自治运动有年，是一个熟悉蒙古地方情形，深知蒙古民众愿望的民族工作者，在解放战争期间也没有做过国民党政府的官吏。最后提出具体要求有三：一是要求采取公民投票方式，实现内外蒙古的合并，二是要求把国民党政府对蒙旗实行分割统治的各边省政府撤销，归由蒙古自治机关统辖，三是要求承认我搞的这个“蒙古自治政府”。陶布新把信稿撰拟后送我核阅，并提出意见说：“我们在信件上既要求内外蒙统一，又要求成立‘蒙古自治政府’，不是自相矛盾吗？叫我怎么自圆其说呢？我想宁夏方面希望我们去商谈接受和平解放问题，当然也就涉及部队改编及人员安置问题。这些具体问题不谈，仅谈内外蒙统一及承认‘蒙古自治政府’问题，很感距离太远，叫我这个代表不好当，应再修改和补充一下。”我答复他说：“要求承认‘蒙古自治政府’是先决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才能谈到其他问题。现在大家都主张西进，反对接受解放，你如老是在此劝我接受解放，有人要杀你呢，保不定生命都有危险。你还是先去宁夏走一趟，看是如何答复。如果宁夏方面不作答复，你去兰州见彭德怀，如再解决不了，可去北京见毛主席，你就从速准备走吧，我们明天就西往巴伦沙尔扎。”陶布新又向我要求说：“既然派我为代表前往宁夏，你们就应当等我回来，否则我当代表去和人家商谈，你们率队西进，我还代表谁呢？”我又对他说：“你去吧！我们到巴伦沙尔札庙等你，也许再向西走，你如交涉无成，就从旱路赶我。”陶布新临走的时候，我特送他庙门外边，又对他叮咛嘱咐说：“你去只谈信上所提出来的问题，不要谈我个人出路问题，使人家看不起我，我不丢那个人。并要设法购买或向达副主席要上几块电池来，以备应用。”陶布新应诺而去。

我率领部队由土后木流窜到巴伦沙尔札庙。约计有十八天的工夫，陶布新由宁夏返回，即将潘自力主席赠给我的礼品（四瓶白干

酒四条纸烟)和复信交给我。复信主要的意思是：“陶布新代表前来带到你的来信，内情尽悉，希你亲来面谈。”

陶布新把赴宁夏经过，详细地向我报告之后，又向我建议说：“现在中国大部已经解放，在北京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共同纲领，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一来，过去国民党统治的中国，已经变成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当前的重要措施，是在于安定人心，确立社会秩序，对蒙旗的政策更是宽大，听说还争取王公。你现在如亲往接受解放，不仅个人安全没问题，并可能得到参议或委员之类的位置。盖因你在蒙旗王公中是个名声最大的人物，对你宽大不咎既往，足以影响其他王公消除顾虑。这对安定蒙旗人心和确立地方秩序是有一定作用的，我认为你个人的安全和你还能存在的理由就在于此。并且我在银川亲眼看到宁夏的旧军政人员，都安然无事，照旧供职，共产党的政策的确是宽大的。至于民族出路问题，我与宁夏党政方面接触中和在市街上听见到的传单标语上，知道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是区域自治政策。并且听说东蒙古自治政府和在张家口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已经合并，成立了内蒙古自治政府，实现了东西蒙古的统一。我们多年来没有办到事情，现在人家已经办到了，看起来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与国民党的民族政策不同，希你亲往宁夏面谈。”

我听取陶布新汇报和建议之后，仍故作矜持，狂妄自大地说：“我已发誓今后不做被人委任的官，要做就做民众选举的官。我到任何时候，仍是搞民族事业，固然民族事业成功未必是我，但白云梯之流，已经腐化堕落，追随国民党这些年，什么名堂也未搞出来，真是饭桶。假如他能搞出一个蒙古局面来，也好收容我们这些流亡的人。乌兰夫倒是很行，现在已经搞出一个蒙古政治局面来，快把东西蒙古统一起来，这一点我是佩服的。可惜他走的是共产党路线。当今之世，以民族复兴事业为己任者，舍我其谁与归！并且共产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与国民党的地方自治有什么不同！反正他

们都是汉人，对于蒙古可能都是一样。”

接着由我召集和主持我这一伙人的文官科长以上、武官排长以上的会议，首由陶布新当众宣读潘主席给我的复信和传达赴宁夏接洽经过。我即向大家征求意见说：“现在宁夏潘主席请我亲往面谈，你们大家意见如何？”当时会上有三种不同的反响：愿意接受解放的人说，陶代表的报告和看法很有见地，大家应当考虑研究；站在中间立场的人说，德主席是我们的军政领袖，不能轻易离开此地，如需再度接洽，仍派代表前往；不愿接受解放主张西进的宝贵廷说：“我是主张迅速西进的，同意的请举手！”会中许多人就举起手来。我虽然也是主张西进的人，但不满意宝贵廷僭越我这个主持会议主席的职权，代行付诸表决，我就很气愤地退入蒙古包里。我斥责宝贵廷说：“开会也有个主席吧，只有主席才有付诸表决的权利，今天我是主持会议主席，我没有提出付诸表决，你就僭越主席职权付诸表决了。既然大家表决了，我们就西进吧！马上就走。”宝贵廷又强调说：“我们既然前已决定西进，就应快走，不宜迟延。我看主席总是优柔寡断，犹疑不决。”我更为气愤地说：“我并不是优柔寡断，而是慎重考虑。你倒是能够当机立断，你想想你在日本投降后所做的事情吧。”因为在日本投降时，我虽然也是反共的，但不愿意伪蒙古军追随傅作义去反共，曾给宝贵廷去电报，叫他把伪蒙古军调到张家口、万全县附近集中，作为我自行支配的反共力量。不意宝贵廷不听我的命令，竟率领伪蒙古军投靠傅作义，甘心充当傅作义的反共炮灰，使我失掉唯一的政治资本，因而对他非常不满。这次在争吵中又把这桩旧事勾起来，所以对他有上述的责斥之语。在座的人看我们二人发生了争执，都来劝我说：“宝参谋长虽然提议西进，但这不算最后的决定，最后的决定仍由主席裁夺，我们绝对尊重主席的权力，服从你的指示。”这时宝贵廷也知理亏，含着眼泪向我赔不是，承认自己不对，我的怒气才消，大家也就相率散去。

经过这次争吵后，主张西进最坚决的敖木巴图尔又来和我说：“陶布新代表回来报告说，只要向人民低头认罪，就能得到宽大。这就是说，叫主席向共产党低头，咱肯向共产党低头吗？”这个带有挑拨性的话，的确打中了我的要害，触动了我不愿向共产党低头认罪的顽固思想，助长了我的狂妄自大感。因为当时我错误地认为共产党和人民应分开看待，不认识党和人民血肉相连的一致性，竟把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伟大的共产党与代表官僚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等同看待，认为既是党就有私；反之，把我这个自己打着“民族”招牌，断送民族利益的人，却认为是“民族利益的代表者”。由于这个极端反动思想的支配，所以不愿意向共产党低头认罪，虽然党和政府对我仁至义尽，宽大为怀，但我仍想反动到底，不愿退出反动政治舞台。

大家散去之后，陶布新又来向我进言说：“我看西进这条路走不通，北投外蒙有被引渡的可能，与其那时被人家缚着送来，莫如现在应潘主席之请，自由自在地去宁夏。”我答复他说：“还是你再去一趟吧。”陶布新说：“人家请你前往面谈，你仍叫我前往，叫我到宁夏说什么呢？”我又答复他说：“你这次去主要是催促答复上次信上所要求的事情，宁夏省方面如不予肯定答复，你就要求去兰州见彭德怀。”陶布新又对我说：“仅我一个人去不好自圆其说，应再派一个负责较重的人前往。”我即准许他的要求，又加派第二师师长吉利占太一同前往宁夏。记得吉利占太也曾问过我说：“如果宁夏方面仍请你前去面谈，我们怎样答复呢？”我答复说：“如果宁夏方面派来汽车接我，我就去吧。”于是陶布新和吉利占太就动身前往宁夏。我率领部队移驻拐子湖，为时不久，我抱着幻想到了蒙古人民共和国，从反动的道路上走上错误的道路。后来听说吉利占太恐怕路上有危险没有回来，仅陶布新返回拐子湖，联合孙鸣海、吉致祥等率同留在拐子湖的员兵，前往定远营接受解放，由反动走向新生，由黑暗走向光明。

我和李守信、陶克陶、达格敖斯尔等由于坚持反动立场，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相率逃至蒙古人民共和国边境的察干套老盖，一九五〇年二月二十七日被蒙古人民共和国逮捕，于是本年九月十八日被引渡回国。

## 赴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经过

### (一) 赴蒙前的联络

我于一九四九年四月间到达阿拉善旗定远营，虽然想通过国民党政府的许可和美帝国主义的支持，进行所谓“西蒙自治运动”，但面临当时局势的变化和我的“大蒙古主义”思想的支配，对蒙古人民共和国也有试试看的心理。因此，当我赴广州请愿路过银川时，就派我的侄子阿拉坦瓦齐尔前往内外蒙交界地方与蒙古人民共和国方面联络。他到了乌盟中公旗一带就停留下来，一直到了当年八月间才接上头。在阿拉坦瓦齐尔未与蒙古人民共和国方面取得联络之前，蒙古人民共和国方面因为内蒙西部盟旗尚在国民党反动政府统治之下，很想把我争取过去，就派人（忘其名，可能是巴图吉尔嘎郎）带着我的长子都嘎尔苏隆（当时在乌兰巴托乔巴山大学学习，我的家属在日本投降后苏蒙军到达锡盟时，即到了乌兰巴托）的亲笔信和我的家属照片以及缎子、银碗、哈达等赠品，由阿旗北部防卡段塔拉登岱队长伴同前来定远营见我。适我当时在广州未回，段塔拉登岱就把信件和赠品等物交阿旗协理罗巴图孟柯代为保管。蒙古人民共和国派来的人员还要求说：“既然德王不在，可否见见你们阿旗的达王爷（达理札雅）谈谈。”段队长说：“那我可不敢作主，我看不用见了。”这个人就未见到想要见的人而回去了。我从广州回到定远营后，乌盟盟长林庆僧格便对我告知此事，罗巴图孟柯也将信件和赠品等物交给我，我看都嘎尔苏隆来信所云，无非报告他和家属的情况和探询我的工作情况。我因当时的阿旗尚在

国民党反动政府统治之下，不仅在定远营有马鸿逵的军队控制着我们，更有“中统”、“军统”等国民党的特务人员注视着我们，深恐事机不密，惹出麻烦，就给都嘎尔苏隆复信，嘱他不要给我来信，而致引起国民党方面的怀疑，影响我搞的所谓“西蒙自治”工作。把信秘密交段塔拉登岱设法送去。

当我在定远营召开所谓“蒙古人民代表会议”后不久，锡盟阿巴嘎右旗札萨克雄诺敦都布从乌盟的巴彦陕丹来到定远营，带来阿拉坦瓦齐尔对我的书面报告，内容主要是：“在内外蒙交界哈拉而格地方，见到蒙古人民共和国主要负责人员道洛道克和巴雅尔（即敖齐尔巴图）二人，他们说：当日本投降时，我国曾派飞机到张家口上空散发传单，因为当时你是伪蒙政权的首领，在传单上不能不提到你。并且这个传单是早就印好的，准备和日本作战时用的，嗣日本虽然投降，前方仍在相持状态，所以前线部队仍把这个过时的传单散发，竟至引起你的顾虑去了北京。我们衡量一个人的好坏，要看这个人对于人民怎样。据我们了解你在日本强力压迫之下，还能委曲求全，折冲樽俎，与日本方面有所争执。你在北京期间也未做过什么坏事，感觉你还不错。我们不愿逼的一个人无路可走，就叫阿拉坦瓦齐尔转去你家属的信，谅都收到了吧？最近听说你又与美帝国主义拉拢，我们认为不对，请你想一想，美国对黑人怎样？就可预知对蒙古如何了。我们很希望你到蒙古人民共和国来，如果你肯来的话，乔巴山元帅和全体人民都将亲切诚恳地欢迎你。”来信对我在伪蒙时期的罪恶有所隐讳和原谅，这是因为当时蒙古人民共和国想争取我，当然不出责斥之言，故做隐讳之语，使我容易接受而往。实际上我在伪蒙时期的罪恶是严重的。

当宁夏已经解放，我正准备从定远营出走时，段塔拉登岱特来见我说，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巴图吉尔嘎朗前来见我有要事接洽。我答说在定远营见面不方便，我准备明日出走，希望你告知来人在草地等我，他即告辞而去。当我由定远营向北出走约有一天的路

程，便的路旁一处洼地中，发现有一顶帐房，即叫图们德勒格尔乘马前去询问，段塔拉登岱和巴图吉尔嘎朗便从帐房中走出来，图们德勒格尔当即引来见我，巴图吉尔嘎朗把蒙古人民共和国赠给我的缎子、哈达等礼品和我儿子都嘎尔苏隆的来信交给我，并说都嘎尔苏隆和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导上所派的人员罗布僧等，正在沙尔札以北的察干套老盖地方等候已有一月之久，希我即行前往会晤。我拆视都嘎尔苏隆的来信上说：“爸爸前次来信，我已接到了，本应依照爸爸的嘱咐，不再给你去信，以致影响你的工作。但是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上很希望你来，你如果肯来时，愿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任何地方居住都可以。依我看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的胜利，就在眼前了，希望您赶快到蒙古人民共和国来吧。”我看过这信后，巴图吉尔嘎朗和段塔拉登岱又劝我就此前往。但我这时西进心切，急欲到土后木庙转往巴彦陕丹去，用预先布置下的电台，通知集结在内外蒙边境上锡察零散部队前来，供我的驱使，我对蒙古人民共和国存有戒心，就对巴图吉尔嘎朗说：“我这时不能去沙尔札，要到巴彦陕丹去，请你速去沙尔札通知他们，务于八月十八日到巴彦陕丹等我。”他即告辞而去。

我向土后木庙行进途中，遇见雄诺敦都布派来的贡布，他即拿出雄的介绍信给我看，记得信上写着：“听说你正在从事蒙古自治工作，我没有什贡献的，现在我把贡布派去帮助你。贡布这个人很忠实，希你放心使用。”我看过信后，就迫不及待地问贡布说：“你知道布置在土后木庙和巴彦陕丹的几部电台的事吗？”他对我说：“我听说这几部电台，都被阿拉坦瓦齐尔送交蒙古人民共和国了。”听到这个消息，使我大失所望，心中至为不快。待我到达土后木庙后，就派人把阿拉坦瓦齐尔找来，他见了我就劝我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去。我仍狂妄自大地说：“现在以民族复兴事业为已任者，舍我其谁与归！我仍打算西进，从事蒙古工作，设如我现在去蒙古人民共和国，人家必然说我为了家庭团聚，因私废公，我是有口难



辩。”并声色俱厉地严辞责备他，不应该未经我的许可，就把几部电台当成礼物送给蒙古人民共和国，使我不能与各方面通讯联络，更责备他五月间即奉我之命与蒙古人民共和国方面联络，竟在乌盟中公旗一带逗留迟到八月才接上了头，真是误时失事。阿拉坦瓦齐尔很不好意思地对我说：“我以为你去蒙古人民共和国是不成问题的，所以就几部电台都送礼了。如果知道你仍要西进，自然把电台给你留下一部就是了。”谈至此，我看再埋怨他也是无济于事，就偕同阿拉坦瓦齐尔、达格瓦敖斯尔、图们德勒格尔等赴乌盟巴彦陕丹，乌盟盟长林庆僧格及其子雄诺和雄诺敦都布等已先到此等候。我到达后，就叫随从人员在巴彦陕丹庙北边搭起一顶帐房，等候蒙古人民共和国派来的人员罗布僧和我的长子都嘎尔苏隆等前来会晤。到了旧历八月十九日守候帐房的人员前来报告说蒙古人民共和国已派巴图吉尔嘎朗等二人到此，我即请他前来见面。巴见我后，即将都嘎尔苏隆的来信交给我，信上说：“我和蒙古人民共和国人员从察干套老盖到哈拉而格又已很久，我看人家等候的都不耐烦了，即使爸爸不到蒙古人民共和国来也应来此一次，和等候的人员见面谈谈，我们父子也可以相见。”当日晚上我就和雄诺敦都布、阿拉坦瓦齐尔、图们德勒格尔等商谈是否前往哈拉而格的问题。因为我约定是在乌盟境内巴彦陕丹见面，而蒙古人民共和国方面约我在其国境内哈拉而格会晤，雄、图二人都不言语，阿拉坦瓦齐尔因受过我的责备，更不表示意见，让我自己考虑。我本来对蒙古人民共和国是有戒心的，但业已到此，设如中途折回，恐人耻笑，就强作镇定，自逞英雄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无论吉凶祸福，在所不计，我是决心前去。没如我此去回不来，失去了自由，就请你们自己想你们的办法吧。”

这样决定和安排之后，翌晨我就偕同阿拉坦瓦齐尔、图们德勒格尔等前往。因蒙古人民共和国边卡上有信请林庆僧格前去商量事情，他自己不愿意去，特派其子雄诺代表他与我同往。路上我们住宿二宵，巴图吉尔嘎朗即派其随从人员先去送信，我等将近哈拉而格

时，见有一辆汽车朝我们迎上来，我等也就一齐下马迎上去。从汽车上下来一个蒙古人民共和国上校，自我介绍说是名叫却吉拉，与我握手寒暄后，即指挥巴图吉尔嘎朗把我的随从人员和帐房送到哈拉而格去，旋又把我让上汽车开至防卡外边停下，又把我让进一顶蒙古包里，略进茶点后，却吉拉对我说：“我们这次没有按照边界上的严格规定派人到巴彦陕丹把你请来，很觉失礼，更对不起的是内务部（实际是内防处）次长巴雅尔、中央派来的罗布僧和你的儿子都嘎尔苏隆等在此等候好久，不见你到来，以为你不来了，所以他们都走了，现在可能走到桑达赖飞机场。我正收拾东西回去，你也回去吧。你如有什么话，我可以用电报代你转达。”说着就拿出香槟酒和肉类招待我。我听到他叫我回去之言，就解除了怕扣留的戒心，和他攀谈起来。边谈边吃了一会，他就去打电报联络，我在蒙古包内等候，这时阿拉坦瓦齐尔也溜到卡子上，不知搞什么鬼。次日晨阿拉坦瓦齐尔老出去瞭望，将近中午时，巴雅尔才来与我相见说：“乔巴山元帅派来的罗布僧和你的儿子都嘎尔苏隆，在此等候好久，以为你不来都回去了。我因边境上有事未回，听说你来了，我特又赶回来和你谈谈。”我问他：“乔巴山元帅对我有什么话吗？”他答说：“他们知道，我不知道。你如有什么话，我可以转达。”接着我就和他交谈起来。记得他在谈话中这样说过：“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了、我们蒙古国与中国快要发生外交关系。你如有什么事情，最好转与北京方面请求，我们不能干涉人家的内政。”说着又以美好的烟类和肉类招待我，并边吃边说：“你的大儿子在乔巴山大学学习，二儿子在师范毕业后教书，三、四儿子正在中学就读，你的儿媳和姑娘都当小学教员，总之你的家中人都很好。”我对他说：“请你转告我的孩子们，务要用心学习，好为蒙古民族而努力。”谈话之间，天已黄昏，他说：“今天已经晚了，你们明天再回吧。”晚间他又拿出很多的酒肉来，我们是尽兴地吃喝和畅谈，不知不觉之间，我竟喝的酩酊大醉，雄诺喝的更

多，竟至呕吐起来。

翌日巴雅尔又拿出一封蒙文信对我说：“我把你嘱咐你儿子的话都用电报转达了，现在都嘎尔苏隆业已回来电报，请你看看。”我接过来看到信上说：“爸爸，我坚决向正确方向走，只要心脏还跳动时，绝不变更。爸爸既然前来，关于民族的事情，最好与巴雅尔他们商量解决的办法。”我回味信中的语汇，也像都嘎尔苏隆自己说的话，例如民族二字蒙古人民共和国是用“爱玛克”，而信中仍用“敖克撒嘎登”，因此我更信而不疑。巴雅尔又问我说：“你究竟有什么打算？”我转而问他说：“你看我往哪边去好？”他说：

“印度不错。”紧接着他加以解释说：“不过印度也是资本主义国家。”他说出这话以后，我当时认为对我是无话不谈的诚恳表示。现在回想起来，担任内务处次长重要职务的巴雅尔，绝不会无意识地脱口说出“印度不错”的话，可能从阿拉坦瓦齐尔等报告中，知道我有通过青海西藏而去印度的打算，因而故出此言试探我。谈至此，我就起身告辞，巴雅尔指着桌上放着两个半盒纸烟说：“把这个也带上吧。”我顺手把两个半盒纸烟装入一个盒内，并意味深长地说：“把这两个合起来好。”暗示内外蒙合并之意。他笑而未答。接着他就陪同我乘坐汽车到了我初到时的住所，我改换乘马向他告辞说：“我这次来感觉到蒙古人民共和国是能够自主的，把我对蒙古人民共和国过去的想法打消了。”他很郑重地说：“你现在的想法很对，你别认为对巴雅尔说说就完了，我一定把你的话转向我们的国父——乔巴山元帅报告。”谈至此，我就率同图们德勒格尔等再向其告辞而归。我归途中听说达格瓦敖斯尔、赵宝纲等已和阿拉坦瓦齐尔约定，一同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去。我返土后木庙后，不仅从此对蒙古人民共和国解除了戒心，大家也为我安全回来而庆幸。苏和巴图尔特来见我：“在你未回之前，有人认为你一去多日未回，必被蒙古人民共和国扣留，当了俘虏。曾和我商量，另推李守信为首领，率领部队西进。我认为这样做不妥当，力排众议，

坚持等你回来再说，不能毫无根据地断定你已被俘。”

我由土后木庙流窜到巴伦沙尔札后，海福泉要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去，我即与阿拉坦瓦齐尔写了一封信，叫他带去。信中记得有“我决以不屈不挠的精神，去做蒙古民族工作”的辞句。这时我已知道阿拉坦瓦齐尔完全是为蒙古人民共和国工作，因此特给阿拉坦瓦齐尔写信，表示为“蒙古民族工作”的决心，意在使他转交蒙古人民共和国人员看过，不致于看不起我。但据我现在推断，蒙古人民共和国有关人员看过我这封信后，发现会有狂妄自大，反动到底的情绪，可能联想到我不愿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接洽，仍在内蒙边界上作反人民的扰乱行为，从而招致纵容之嫌，以影响中蒙国交，恐遭纵容之嫌，所以又派人来争取我。记得在海福泉走后不久，便接到段塔拉登岱从阿旗保安队给我来信，信上除了请我约束部队，避免冲突，勿致酿成流血事件外，并说蒙古人民共和国又派巴图吉尔嘎朗前来，被阿旗保安队遇见留在队部，等候与我相见。我即派贡布前往接洽，贡布回来报称，巴图吉尔嘎朗已返回。我又派贡布前往蒙古人民共和国边界上察干套老盖地方联络，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巴雅尔和巴图吉尔嘎朗早已到此，见贡布到来，至表欢迎。巴雅尔说：

“你来了很好，我把阿拉坦瓦齐尔带来，正打算叫他前去联络，可巧他因有事到别的地方去了。你既然前来，他就不必去了。”当派巴图吉尔嘎朗随同贡布来到巴伦沙尔札庙，请我前往察干套老盖与巴雅尔相见，说是有要事相商。我答称需到拐子湖后再行前往。

我由巴伦沙尔嘎到拐子湖后，即召集李守信、宝贵廷、吉致祥、托克托胡、苏和巴图尔、都固仍仓等开会，提出要去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问题，惟恐有人阻拦，强调这次去的目的是为了联络工作，便中还治疗我腿肿的疾病。在座人员均表同意，并由吉致祥提出派韩撒嘎拉团长率领队伍护送我到国境上。

我于十二月二十九日偕同策仁道尔吉、图孟德勒格尔等，由巴图吉尔嘎朗、贡布二人带路，前往蒙古国境界上的察干套老盖地方

与巴雅尔会晤。当我出发时所有我这一伙所谓军政首脑人员都出来给我送行，我抱着激动的心情和送我的人一一握手，颇有生离死别之感。临行时李守信对我说：“你去蒙古人民共和国好好地联络吧，我也打算去，就是栽跟头也栽在蒙古地方，决不栽在八路手里。”我和送行人员道别后，就向目的地进发，当快到察干套老盖时，巴雅尔率同几个随从人员，乘坐一辆大卡车（上边架设着电台）迎上来，把我让上汽车，叫巴图吉尔嘎朗带同我的随行人员步行前往，图们德勒格尔很不愿意离开我，想一同乘车随身保护我，我以目示意，他才没有跟我一同走。到达后，巴雅尔把我让进一个蒙古包里，略进茶点后他对我说：“乔巴山元帅有要紧的话和你说，所以又特派我来请你到乌兰巴托去。”我说：“现在我接到阿旗保安队转来阿旗政府电报通知，说是驻在肃州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派五个代表将要到来和我见面，我想和他们谈谈再去。”他说：“那有什么要紧呢？”说着他把我和巴图吉尔嘎朗丢在屋里出去了。刹那间他又进来和我说：“你想好了没有？还有什么顾虑吗？”我说：“我倒是没有什么顾虑的，但是现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已与中国发生了外交关系，我如去蒙古人民共和国，是否影响中蒙国交？这倒值得考虑。”他说：“那没关系，只要你肯来，一切由我们负责。”这时我想起在哈拉而格和他见面时，记得他曾和我谈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宪法上明文规定：“凡是从事民族运动的人，如到蒙古人民共和国避难，均可容留。”同时我又这样猜想：“乔巴山究竟对我有什么重要话说呢？或者要和我谈含有民族意义的问题，如果是谈含有民族意义的问题，最重要的莫过于内外蒙合并问题。设如这一问题得到乔巴山的默许和支持，我就可以安全回来，率领部队西进，依靠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周游世界各国，宣传内外蒙合并问题，待至国际局势发生重大变动的时候，乔巴山在外蒙、我在内蒙进行这一活动，虽然所走的道路不同，将来还是殊途同归，实现内外蒙合并建立统一的‘大蒙古国。’”

我更作过这样猜想：“做为一个蒙古人的乔巴山，绝不会甘心受俄国人的控制，必有独立自主的想法。有我这样一个人配合他搞内外蒙合并问题，他一定是愿意的，即或不便公开地支持我，也会心领神会地默认。在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蒙古人民共和国虽然宣布独立，但人口少，国家穷，对于内蒙不无领土的野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中蒙两国都是一类性质的国家，乔巴山恐怕影响中蒙国交，不便进行吸收内蒙人工作，但对纯牧业地带，或者还有拿过去一个是一个的想法，却又不便自己出头这样做，正好利用我这样一个人来做这个工作。由于有这些幻想支配，我破除了一切顾虑对他说：“那这就去吧。”他又说：“你这次去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要绝对保守秘密，你穿这身衣服可不行，必须换装。”说着就给我拿出一件很好的皮袄换上，跟随我的策仁道尔吉、图们德勒格尔、贡布等也都另换服装。临行时，我对巴图吉尔嘎朗说：“护送我的队伍，现在还驻在边境上，给养非常缺乏，为了避免发生抢掠扰民事件，请这边接洽给些粮食怎样？”他即转向巴雅尔请示，巴雅尔说：“这个事情到乌兰巴托再说吧。”我就抱着搞内外蒙合并的幻想和解决部队给养的暂时目的，随同巴雅尔到了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

## （二）招待中监视

我到了乌兰巴托后，即被安排在内务部中居住，继而策仁道尔吉、图孟德勒格尔、贡布、札那等亦随后赶到。巴雅尔问我说：“你留谁和你住在一起呢？”我说：“仅留札那给我做饭的人和我一同居住就行了，他们三人到别处居住吧。”不意我等一行分开居住之后，就失去联络的机会。内务部却派来一个名叫旺丹的上校，经常和我联系，派一个名叫罗布僧道尔吉的住在招待我的住所陪伴我，后来知道他是一个上尉。派一个名叫贡达力的给我做饭，后来知道

他是个中尉，还有一个常来往的尉官名叫巴彦托克托胡。招待我的住所颇为舒适，照顾亦甚周到，吃的是小灶饭，吸的是高级烟，我认为是对我的优待，实际上我的一言一行，都在内务部人员监视之中。招待我的住所备有《列宁全集》，晋、冀、察、绥边区政府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等很多的书籍，我在没事的时候，就随手翻阅，这是我看马列主义书籍的开端，才知社会上还有阶级的说法。

有一次巴雅尔同内务部长都音科尔札布、一个中将苏联顾问（忘其名）和一个少校翻译来访问我，都部长问我究竟作如何打算？我说：“我在此办完公事之后，仍想回去干‘民族事业’。如果中国共产党乘胜利的余威，无理的压迫我，我只要有力量的话，仍要进行反抗。”都部长很惊讶地说：“你还要反抗呀！”苏联顾问接着对我说：“你错了，现在你不应再反抗中国共产党，应当凭你在内蒙过去的声望和现在的职业，发布告示，进行宣传，劝说内蒙古人民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由于我这时仍然存在着反动到底的思想，对于苏联顾问的指引明路和诚恳劝告还不愿意接受，就答复他说：“我觉得我这样想和这样做是对的。”苏联顾问听到我答复之后，表示不耐烦的样子，离开座位，在屋中来回踱步。当苏联顾问和我谈话的时候，虽然有一个少校翻译在旁，都部长却自己充当翻译，我认为他有失部长的身份，有点看不起他。就转向巴雅尔说要见乔巴山，巴雅尔推说：“你跟都部长说吧。”但我未向都部长说，而都部长却对我说：“你可以和你的家属见面了，你看看你的儿女们，受了蒙古人民共和国教育以后，现在都变成什么样子了。但是你这次来我国首都，是极为秘密的事情，你如见到你的家属的时候，务要切实嘱咐他们，不要向任何人说，以免消息外漏。”这时我想起我派陶布新赴宁夏带去的信件底稿还在我的身边，因为信件中有“采取公民投票方式，解决内外蒙合并问题”的建议，我以为一定能够引起他们的重视，就取出来给都部长看。不意他漫不经心地看了一下，就放在桌子上走了。翌日晚上，都部长和苏联顾问又

来向我说：“你不要回拐子湖了。你虽然不能回拐子湖，但从此可以公开地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呆下去，能够和家属团聚也是喜事。你如有什么事情，请与巴雅尔商量吧。”

他们走后，我和札那说：“蒙古方面不叫我回拐子湖了。”札那说：“诺颜(对我的尊称)到这里来错了，到宁夏去就对了。从前都札萨克去蒙古人民共和国时也说不久就回来，但是一去未归。”这时我也反复思维这个问题，既然不叫我回拐子湖了，我再怎么办呢？曾想要求蒙古人民共和国用汽车把我送回北京或兰州，旋又转念到：中国共产党虽然胜利了，是否能够永久保持这个胜利！并认为把我送回中国以后，难免要栽跟头，与其送回中国栽跟头，莫如我在蒙古人民共和国里，就这样呆下去，还未必栽跟头。这时我从广播上听说毛主席到了莫斯科，旋又听说周总理把赛福鼎也领到莫斯科，可能商谈有关新疆问题。因此，我又想要求蒙古人民共和国把我送到莫斯科去见毛主席，不是很有面子吗？还不失我这个所谓蒙古自治政府主席的身份，旋又转念想到：蒙古人民共和国肯送不肯送是一个问题，即使有可能性，这不是向中国共产党投降了吗？这时叫我向中国共产党低头，实在有点不甘心。同时还希望蒙古人民共和国把我留下，所以未向蒙古人民共和国方面谈想去莫斯科的事。继而又想到：我不回拐子湖，留在拐子湖的人员说我扔下他们不管，只顾享受家庭团聚的快乐。而对我不满意呢！旋又转念到：并不是我不愿回拐子湖，而是蒙古人民共和国不叫我走，对留在拐子湖的人员也能说得下去。总之，自从都部长不叫我回拐子湖后，心境上老是七上八下，忐忑不安，对蒙古人民共和国方面虽然不再抱有很大的奢望，但还存在着一线希望，希望能够让我安全地在这里呆下去。

想来想去，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和蒙古人民共和国负责人员商量才能解决问题。因此，趁看巴雅尔前来我的住所的时候，便和他商量说：“留在拐子湖的人员和部队怎么安排呢？要不我把他



们交给兰州的彭德怀吧！该怎么进行呢？我给彭德怀写信表示这个意思行吗？要不叫部队也到这里来怎样？”巴雅尔说：“武装部队来这里可不行，如来二三十个少数人员还可以，但这是我个人的意见，仍须向领导上请示。”我又说：“要不我去信叫留在拐子湖的主要人员到察干套老盖和我见面，当面交代这一问题，你看怎样？”接着他便去请示他们的领导。旋即回来转告我说：“领导上说这个办法很好，同意你去信叫留在拐子湖的人员到察干套老盖和你见面，我去把阿拉坦瓦齐尔找来，帮助你写信。”过了一天，他才把阿拉坦瓦齐尔找到我的住所，帮助我写信，记得信中大意是：“我到这里已见到了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导，现在在此看病。请转告肃州解放军派来的代表，我暂时不能回拐子湖了。希见信后，务请在“蒙古军总司令部”负责的李守信或宝贵廷、在第二师负责的都固仍苍或托克托胡，在第一师负责的苏和巴图尔或散木巴图尔六人中的三人前来边界上察干套老盖和我会面商谈要事”。把信写好交给巴雅尔之后，我又想亲去拐子湖安排工作，深恐蒙古人民共和国方面不叫我去，便提出很多的理由，说明我有亲自回去的必要。记得这个请求书是我亲笔写的，大意如次：“留在拐子湖的人员和部队，给养缺乏，无法维持，设如仍然外出抢掠，对于我的责任更大。因此，我想亲自回去一趟，作妥善的安排，把他们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并辞去我的主席职务。我把这些事办完之后，保证仍然回到这里来。”刚好写完这个请求书草稿，适巴雅尔前来，我就念给他听，他说：“这样办也是道理。”我说：“待誉写清楚再交给你。”他说：“已经写清楚了，不必再行誉清，我拿出去打字交上去好了。”同时他给我出了五个问题，叫我作详细的答复。一是日本对蒙古和苏联的政策怎样？二是成立蒙古自治政府的目的和其内部组织情况如何？三是散在各地的蒙古人口有多少？还有两问题我记不很清楚了。大概是美国和国民党政府对蒙政策怎样两个问题。他仍把阿拉坦瓦齐尔叫来帮助我写。我对于第一个问题，认为既是过去的事，

也是蒙古人民共和国方面所知道的，没有详细写的必要，就没有怎样写。对于第二个问题，恰巧阿拉坦瓦齐尔还带着“蒙古自治政府”组织法，就按其中的各项规定，把组织情况写下来，对于第三个问题，便就我所知把散处各地的蒙古族人口写出来，甚至连道听途说缅甸尚有七、八十万蒙古人也写上去了。至于四、五两个问题，我也敷衍了事的写了一些，就交由旺丹递转。旺丹看过之后，很不满意地说：“这样重要的几个问题，你写的很肤浅，连小孩子都欺骗不了，对我们怎能交代下去。”

关于要求亲去拐子湖的请求书交上去以后，竟如石沉大海，没有答复。巴雅尔却把我召唤在拐子湖的人员李守信等前来察干套老盖的信稿交下来说：“信上不能写你见到了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导，因为提到领导是指乔巴山元帅而言，仅写已经见到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达拉嘎”就行了。”我只好按照他的意思改写。我亲笔写好信后，提出想叫图孟德勒格尔送去。他说：“图孟德勒格尔骑骆驼走的慢，不如派贡布去骑骆驼走的快。”我也只好表示同意，于是就由巴雅尔把贡布叫来，把信交给他嘱咐从速把信送到拐子湖。贡布走后札那对我说：“贡布出来曾拆看你的信，我从旁观察贡布看到不叫你回拐子湖的一段时，吓的两只手都发抖了。”后来听说李守信等六人接到我的亲笔信，都到乌兰巴托来了，可是当时没有叫我知道，我还闷在葫芦里，仍等待与留在拐子湖的人员会晤。

贡布走后，我的腿肿病加重，旺丹请来苏联医生给我诊治。接着巴雅尔又陪我看电影，并对我说：“你现在可以和你的家属见面了。”我恐怕他看不起我，还打肿腮膀充胖子，故作矜持说：“我是先公而后私，待把公事办完之后，再和家属见面也不为晚，忙什么呢？”我在这个期间，虽然没有和全部家属见面，巴雅尔曾把我的长子都嘎尔苏隆带来见我，并说：“他几次要求要见你，所以我把他带来，促使你们父子见面之事，我算办到了。”我们父子见面时，本来有许多话要说，可是因有巴雅尔在座，不便谈有关政治的

重要问题，仅仅谈些家常。都嘎尔苏隆报告我说：“日本投降后，我由西苏尼特旗到了乌兰巴托，闲居约有一个月后，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导上叫我去信把全家都叫来，俟他们到后，优越照顾，给予安排住所和生活。我先入干部学校，继又转入乔巴山大学，再有一年半就毕业了。我的二弟嘎拉僧吉儒穆德入学校受过训练以后，已经当了教员。我的爱人色尔吉默德克和我妹妹巴图那迪在师范学校毕业后，也都当了教员。我的三弟敖齐尔巴图和我四弟都入了十年制中学。我的母亲和我的孩子也都很好。并且蒙古人民共和国按照部长级的待遇照顾我们家庭，逢年过节，还给一、二千元花用。”继而又问我说：“听说你带领的军队，不守纪律，疯抢乱夺，把爸爸也连累坏了吧。”接着他又翻阅桌上放的《列宁全集》，指出一段对我说：“这一段是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论断，爸爸应当好好地看看。”谈至此适巴雅尔入厕，趁此机会我问他说：“你在哈拉尔格什么时候回来的？”他答说：“爸爸还未到达的时候，我就先回来了。”这时巴雅尔也由厕所回来，就偕同都嘎尔苏隆走了。又有一次旺丹又把都嘎尔苏隆带来见我，旺丹在座陪谈，都嘎尔苏隆竟冒然地向我说：“爸爸你不愿和别人谈的话，也不要对我说。”我觉得他这话说的走咀了。接着他又告我说：“我们家中人由西苏尼特旗到蒙古人民共和国时，把我们自己的二、三百匹马和牛羊等牲畜都赶来，现由蒙古人民共和国派人照管放牧，并规定仍是我们的私有财产，我准备这几天去看看。”继而又谈些家常琐事就走了。第三次都嘎尔苏隆前来见我，是在旧历大年初一给我拜年，仍是旺丹带来的，他给我请安问好后就要走，临走时对我说：“爸爸，你有工夫叫我来吧。”看样子好像有许多话要向我说，因有旺丹在座，没有再谈什么就走了。

巴雅尔还陪着我乘坐汽车走马观花式的参观乌兰巴托的市景，他边走边指点说，这是乔巴山居住的地方，那是乔巴山大学，你的长子都嘎尔苏隆就在其中学习。继而旺丹又陪着我参观了乌兰巴托工

业区的外景。总之，在我初到蒙古人民共和国两个来月的时间，虽然被暗中监视，表面上还是优越招待，吃的是丰美饭菜，吸的是高级香烟，内务部人员还常陪同我看电影，逛大街，请医治疗腿病，使我感觉到如果这样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居住下去，虽然达不到政治上的欲望，却也悠闲自在。不意对我的招待渐渐地冷淡了，记得有一次札那告诉我说：“我听巴彦托克托胡对贡达力说，今后不要再买好纸烟了，用一般的纸烟招待就可以了！”我也感到对我的招待，不如初到时周到。有一次巴雅尔陪我看电影甫经告辞后，我叫罗布僧道尔吉又把他请来，对他说：“从前你曾叫我和家属见面，只以公事在身未果，现在派往拐子湖的贡布没有回来，趁此闲暇时间，我和家属见见面吧。”他若有所思的忖度一下说：“等一下再说吧。”过了几天，巴雅尔又来向我说：“我最近可能到东部去。”我问他说：“你走后我有事情和谁联络呢？”他说：“可以和旺丹联络，如果是重要的事情可不行，应与我们领导上直接联络。”从此以后巴雅尔就不再到我的住所来。我还以为真的到东部去了，但据阿拉坦瓦齐尔告诉我说：“巴雅尔并未到东部去，可能到拐子湖去了。”这一系列的问题，在我的脑子里不断地起伏萦迴，引起我的怀疑和猜想：为什么从前他们主动叫我和家属见面，现在为什么我要求和家属见面又不允许？为什么过去以宾客之礼相待，现在却降低了招待？为什么巴雅托尔辞东去，避不和我见面？从各种迹象上使我觉得蒙古人民共和国对我的态度变了，究竟要变到什么程度，我只有胡猜乱想罢了。

### （三）逮 捕 审 讯

一九五〇年二月二十七日（旧历正月十一日），旺丹前来请我去看曾当过蒙古人民共和国总理苏和巴图尔事迹的电影。我说：“下次再看吧。”他敦促我说：“这个电影很重要，我们先去看，随后罗布僧道尔吉和札那也来看。”我不便再推辞，就同他乘汽车前

往。到了一所官厅式的门前，汽车骤然停止，却不是电影院，我下汽车时不小心被台阶绊了一跤，他还关心地说：“怪我没有扶着你。”接着他即去打电话，我在旁边听到他问对方说：“那两个人来了没有？”我还以为是问罗布僧道尔吉和札那二人，实际上他是调动事先安排好的人员来逮捕我。顷刻之间却吉尔上校便出现在我的眼前，旺丹便板起严肃的面孔向我宣布说：“德穆楚克栋鲁普！我们党政方面，认为你是敌人，应即实行逮捕。”随即叫我举起手来，解开衣带搜查，并严辞追问我有手枪没有？我说没有带在身上，经他们详细检查以后，把我的腰带拿去。我当时本来有很多话要说，质问他们为什么对我的态度前后不一致？凭什么证据逮捕我？但在此情况下，知道说什么也是无用，不是和他们进行争辩的时候，便束手就擒，任其摆布，既未争辩，也未反抗。把我带上楼以后，便将巴雅尔在察干套老盖给我的那件皮袄脱下，换上罪犯穿用的老羊皮袄，登记随身物品，押入监狱监管。第二天一个少校监狱长带我去见旺丹和却吉尔，又登记从我住所搜查出来的物品、手枪等，并叫我签字，其中有银洋一元，我说这不是我的，是札那的，没有签字。第三天为了正式补行逮捕手续，又把我从监狱提出来，旺丹口述我的罪行是：过去依靠日本帝国主义，现又勾结国民党和美帝国主义，企图颠覆蒙古人民共和国和苏联，犯了蒙古法律上的重要条款，应行逮捕究办等语。却吉尔按照旺丹口述写好之后，追令我签了字，这时颇有“昨为座上客，今为阶下囚”之感。

从一九五〇年三月一日开始，便由巴雅尔秘密审讯我说：“现在我奉领导上的指示，负责审讯你。本来我们等待你好些日子，但你毫无悔罪的表示。现在中国方面确认你是罪大恶极的罪犯，要引渡回去处理，可是我们还没有给，答复说正在教育你。”以后便入正式审讯阶段，由三月开始进行到当年九月十八日。审讯的期间很长，审讯的问题很多，在审讯的每个重要问题上，我有供辞，他们有记录。因为年深日久，我记不清全部的问题了，现在就我记忆所

及，把几个主要问题，谈述如次：

(1) **关于勾结日本帝国主义问题。**审问时巴雅尔问我说：“你把你给日本当特务的事情说一说吧。”我答说：“你如把我当成日本的特务看待，就是掉了脑袋也不承认。如果叫我把我和日本勾结的经过谈谈，那倒可以。”他说：“那你就谈谈吧。”于是我将盛岛角芳前来锡盟各地游历；屈目恒雄前来我旗，初则充当喇嘛，继则设立善邻协会，掩护特务工作的进行；日本特务机关派中岛万藏等到百灵庙蒙政会进行特务工作的情形；我派补英达赖前往日本关东军购买枪枝的原委；我亲往伪满洲国新京面见日本关东军参谋副长板恒征四郎的经过；以及组织蒙古军总司令部和在嘉卜寺成立伪蒙古军政府的情形，全部谈述出来。我谈完之后，他特把中岛万藏在百灵庙进行特务工作的供辞记录念给我听，并叫我在供辞上签了字。

(2) **关于内外蒙合并问题。**在审问时我反问巴雅尔说：“我总觉得在哈拉而格会面时，你们对我是另有意思的。”他听到我的反问之后，立刻佛然作色，愤怒异常，态度激动地说：“你的居心太坏了，你说这话，不但想把我陷在里头，并想把我们的领导也拉进去。你搞内外蒙合并，是企图破坏中蒙国交。”我又反问他：“你不是说过想利用我做民族工作吗？”他说：“本来我们曾这样想过，但是这个时期已经过去了，现在不利用你了。你到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后，如果早把你的罪过坦白交代，知道你还懂蒙汉满文，打算把你安排在科学院工作，该有多么好呢？但是你总是执迷不悟，一味拖延，拒不交代。就是在甫经逮捕你时，仅仅我们几个少数人知道，如果你有悔罪表现，坦白交代问题，尚不为晚。可是这些机会你都错过了，现在说什么也不行了，只有以罪犯来对待你。”这一段审讯他未叫我签字。

(3) **关于勾结美帝国主义问题。**当审讯时，他们把许多美国人和其他外国人的名片拿出来问我认识与否？并把郭木布札普联络达格瓦敖斯尔等几个人给拉铁摩尔写的信，请他把蒙古问题提到联

合国去的原信稿拿出来，问我知道否？问是不是我的主使？我看这封信确是郭木布札普亲笔写的，就对他说，“这事是郭木布札普等几个人干的，不是我的主使，但是与我当时的想法相同。”接着我又把“蒙古青年同盟”成立的经过及主要人员供述出来，并声明我虽与“蒙古青年同盟”主要人员札奇斯钦、达格瓦敖斯尔、席振铎等有过联络，也与美国外交人员若斯冰、舒勒台斯及特务人员拉铁摩尔、李嘉胜、马滋、萨拉刻、白智仁等有过接触，但未参加“蒙古青年同盟”这个组织。

接着我又供出白智仁向我建议派兵攻打董其武问题。我谈出这个问题之后，他就抓住不放，严辞追问好多日子。他追问白智仁叫你派兵打董其武是什么意图？你们谈了一些什么话？都要交代出来。我供说：“当时白智仁虽向我作此建议，但当时我认为我既无攻打董其武的武力，更不愿树立政敌，所以漠然置之。”我这样答复之后，巴雅尔很不以为然，仍是严辞逼问，决不放松，非叫我说出这事与蒙古人民共和国有什么关系不可。而且威胁我说：“你如不说，你的皮肉要受苦呀。”并叫我自己写供词。在其严辞逼问之下，我曾返来复去地想过：他非叫我承认这事与蒙古人民共和国有关系不可意图何在呢？莫非以此罪名把我留在蒙古人民共和国，不引渡回国了，这种想法又触起我宁在蒙古栽跟头，不回中国栽跟头的念头，于是就迎合他的意思写了一个供辞。记得供辞的内容大意是：“白智仁向我建议派兵攻打董其武，是想以此为理由打埋伏，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乘机活动。”我写完之后交给巴雅尔，他看过之后，就把从前关于此事的审讯记录用笔抹掉，并对我说：“你应在这个供辞之后，添上这是白智仁给我的使命一句。”我就依照他的话添上了。他马上拿着这个供辞上楼请示他们的领导，约有两个小时的工夫才回来对我说：“照这个供辞来说，你可是美国的特务咧。”我恐怕他在这一问题上又行逼问，就满口应称说：“是呀！是呀！”这个案子就这样确定下来。后来我觉得这个供辞不妥，又

向巴雅尔申说这是逼问之下的假供辞，他说：“在审问的时候，我是很和平的，没有强迫你承认，是你自己招供的呀。”我又申辩说：“当时我说是说了，究竟是真是假，希望你再作调查。”他驳斥我说：“当时你说了，现在又想翻供，又叫我调查，看起来你这个人真狡猾呀。那么，你把真实的内容写出来，由内务部人员轮流审问。”经他这样一说，我恐怕又招致轮流逼问，引起很大的麻烦，想到这里，认为再行争辩也是无用，就不再吭声了，只好凭他们摆布吧。

在审讯时期中，记得内务部长都音科尔札布和苏联顾问有一次亲自参加审问我说：“你老是不很好的交代，现在准备叫知道你的罪行事实的人出头对质，看你还有什么话说。”说着便叫人把李守信、陶克陶、达格瓦敖斯尔三人唤进来，都部长问我说：“你们认识吗？”我说：“认识。”他又说：“你们有宿怨吗？”我说：“没有。”接着便由李守信首先对质说：“德穆楚克栋鲁普，在蒙疆时，想把内外蒙合并起来，连同在苏联境内的布里雅特蒙古也包括在内，建立大蒙古国，他想做大皇帝。”后来据李守信对我说：这个证词，是在未审讯前，把他训练了一周，教他这样说的，在审讯前夕还问他说，你记住了没有，他说这可不一定，到时再说吧。继由陶克陶对质说：“日本帝国主义勾结德穆楚克栋鲁普成立伪蒙疆政权，是企图以蒙疆为军事基地，进攻蒙古人民共和国和苏联，如果叫我详细说，我都能说出来。”但是审问人员没有叫他再往下说，他就停止发言。最后由达格瓦敖斯尔对质说“德穆楚克栋鲁普是“蒙古青年同盟”的重要盟员。”我当时因为精神恍惚，没有注意听达格瓦敖斯尔的证辞，当审讯人员问我时，我都马马虎虎的承认了。最后巴雅尔说：“现由他们三人作证，如果你再不坦白交代，还要叫十五人出来对质。”可是后来审讯时，我都主动的交代了，再未提出其他人员来作证。

在审讯时，旺丹曾打开一个柜橱说：“这满满的一柜橱文件，



都是关于你的材料，就连你姨太太像片都收罗在内，你不坦白交代怎能行！”又有陪审的一个少校说：“你在张家口搞伪蒙疆政权时期，我曾扮作牧工的身份，为蒙古生计会赶羊到了张家口探询情况，你的什么事情，我是都知道的，你不谈怎能行。”旺丹又说：

“日本投降时，我曾亲到张家口想挽救你，把你争取过来，不意你竟跑到北京去了，你真把我们害苦了。”翌日叫我看这次审讯和对质记录，我发觉达格瓦敖斯尔证词上说我是“蒙古青年同盟”的主要盟员，特向巴雅尔提出争辩说：“我连蒙古青年同盟的章程都未看过，说明我不但不是主要盟员，就连普通盟员也够不上。当时我因为倾听别人的话，没有注意听达格瓦敖斯尔这句话。”巴雅尔说：“这样重要的事情，你怎么不注意听呢？今后关于重要的事情，你得注意呀。”过了几天，我又提出这一问题，请求更正。他不耐烦地说：“这事已经过去了，而且你已签了字，再不用提了。”这件事情就这样确定下来。

#### （四）引 渡 回 国

约在这年八月间，一个少校把我的供词全部清抄一份叫我重新签字，我看头一个案件是日本特务机关的中岛万藏和我的勾结关系，我因为一时忘记了，就对这个少校说：“我没有这个供词呀。”他说：“你说没有，我去把原供词拿来你看。”说着就去取来，我一看确有我的签字，就无话可说了。接着我又翻看另一个案件，记得上边写着我是逃到蒙古人民共和国边界上被逮捕回来的。对于在哈拉而格和察干套老盖两次的会晤，却只字未提，我觉得与事实不符。但认为提出争辩也是无用，只好随他去吧，就在全部供词上又签了字。根据以上迹象，我就猜想为什么又叫我签字呢？恐怕是要把我引渡回国了。思想上虽然有些波动，但认为像我这样一个内蒙的罪犯，也只好等待引渡回国听候处理。

到了一九五〇年九月十八日，把我从监狱里提出来，倒剪两臂，戴上黑布蒙眼，什么也看不见，仅听见除了叫我在监狱的号码外，还叫了三个号码，因此，知道和我一同引渡回国的还有三个人。把我拥上汽车后开到飞机场，改乘飞机飞抵北京，这是被引渡回国的经过。后来听我家中人说，我被逮捕后，把我的长子都嘎尔苏隆及在伪满疆政权当过文武官员的朝克巴达尔夫等多人均行逮捕，并严行搜查我家属的住所，没收我家中人所带来的财物和牲畜。嗣又给我的次子嘎拉僧扣上“唱过反动歌词”的罪名予以逮捕下狱。把我的年仅十六岁的三子和年仅十四岁的四子及我的家属其他人等，押到最冷的地方阿拉杭盖，等于发配充军之罪。我被引渡回国后，我的家属虽已相继回国，但我的长子没有回来，十几年没有通讯！存亡莫卜。我的次子返国后，经主管人员询明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没有反动活动，即行释放，并给于安排工作。我的四子在被押赴阿拉杭盖时，因年令幼小，不知事故，惊惧异常，又加时届冬令，天气奇寒，忍受不了冷冻之苦，因而惊冻成疾，得了严重的心脏病，返国后虽经精心诊治，终成不治之症，病死于内蒙古医学院附属医院。我的三子亦因惊冻得了与四子相同的心脏病，时常犯发。像我这样罪恶滔重的人，背国外逃，把我引渡回国，理应治以应得之罪。而蒙古人民共和国，却不在逮捕和引渡我的同时，也把我的家属送返祖国，竟把不知事故的孩子们处以充军之罪，押赴最冷的地带，令受惊冻之苦，造成死亡，我总觉得未免太过。

回忆一九五〇年九月十八日从蒙古人民共和国引渡回国后，被改造的初期，虽对在阿旗纵兵殃民的严重罪行有所认识了，但对于在伪蒙疆时期的滔天罪行还不认识。记得把我从北京移动张家口时，由于我对党的教育改造罪犯的政策不理解，认为党对我这个罪犯不便在北京处决，移到张家口是交由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处死，才快人心，以平民愤。由于我猜测到张家口必死，因而产生力求速死的思想，我对教育改造我的领导上说：“如果要杀我，请求不要在张家口

这个汉人地方杀，把我送到锡盟等处蒙古地方杀。如果在锡盟等地杀我不方便时，希望把我押解到阿拉善旗去，按照纵兵殃民的罪行明正典刑，我是罪有应得，死有余辜的。”领导上答复说：“你等着吧，不要胡思乱想。”我细回味“你等着吧”这句话，认为杀我还不到时候，叫我等待死期的到来。因此更加猜疑不定，从我的住室窗户看见外边有木工做活，我疑惑为我作执行死刑的绞架。到一九五六年，由于党对我的耐心教育改造和听到看到大量的建设成就，以及在三反、五反中对贪污犯处理等等事实的印证，才逐步认识到党的伟大和领导的正确，从心里佩服了党。并且知道了党不是要杀我，而是教育改造我。遂又向领导上说：“我在阿旗的罪过，的确是非常严重的，假如我能从监狱出去的话，愿向阿旗被害的人民请罪，任凭阿旗人民处理。”领导上说：“那是部队闹的，不是你一个人的责任。”

一九五九年领导上召集我们开会说：“据说你们在阿旗造成七百里无人烟的地带，不知抢了多少东西？”我又说：“在阿旗率部队抢骆驼、抢粮食、刁东西，罪恶很大。但我的罪恶还不只此，我在伪蒙疆时期，打着‘复兴蒙古民族建立独立国家的招牌，欺骗蒙古青年追随我，跟我走上了反动的道路，我用杀人不见血的方法贻害了很多有知识、有志气、有作为的蒙古青年，例如现在改造中的陈绍武、宝贵廷等等，就是跟着我走上了反动的道路而犯罪的人。”经过教育改造，这时我认识到，我在锡盟执政时期，是统治剥削人民的封建王公；在伪蒙疆时期，是投靠日寇血腥统治人民的头号帮凶；在阿拉善旗流窜时期，是纵兵殃民的土匪头子。我的罪恶是严重的，也是罄竹难书的。

由于党对我的长期耐心教育改造，使我深深地认识到，长期以来我自认一生肩负着“复兴蒙古民族”、“建立蒙古独立国家”、“舍我其谁与归”的“救世祖”，实际上是政治野心家，对于蒙古民族，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罪人、大蒙奸；对于中华民族，我是一

个死有余辜的民族败类，大卖国贼。象我这样的人，最终还能得到党和政府的特赦恩典，给我以重新做人的机会，实在是格外恩施。在感激涕零之余，我谨抱着知罪、认罪、悔罪的心情，在重新做人开始的今天，特将我一生各个时期的重大政治罪恶活动，搜索枯肠，陆续如实写出，借以向蒙古族人民、向全国人民、向给我以新生的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请罪。并供有分裂民族、分裂祖国意念者作鉴戒。

[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

书名 = 内蒙古文史资料第十三辑 - - 德穆楚克栋鲁普自述

作者 =

页数 = 2 1 1

S S 号 = 0

出版日期 =

目录  
正文